

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埃德蒙·柏克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巴 金

云烟未散 记忆与反思

Cloud and Smoke Undispersed

Remembering and Reflecting

宋书星 著
Shuxing Song

美国华忆出版社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USA

Copyright © 2021 by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USA

Cloud and Smoke Undispersed:

Remembering and Reflecting

Shuxing Song

ISBN: 978-1-951135-72-0 (Print)
978-1-951135-73-7 (Ebook)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RememPub@gmail.com

云烟未散：记忆与反思
宋书星 著

出版： 美国华忆出版社 奥斯汀·得克萨斯州
版次： 2021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数： 317 千字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LCCN: 2021 90583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review.

作品内容受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保护，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开国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那场政治运动距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总设计师”邓小平钦命制定的彻底否定它的《历史决议》也将近二十五年了。

它历时三年、肯定与否定反复较量七年，从实践到理论上彻底否定又经历了五年又七个月。这十五年又七个月的历史一页啊！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热泪、鲜血、终生厄运乃至宝贵生命？

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历来是鉴别一人、一党、一政府、一国家文明水平和素质品位的试金石。每个炎黄子孙尤其政界“肉食者”和学界“劳心者”都应当扪心自问：对于亿万人民群众用血泪和生命谱写的这页历史，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是信口雌黄、诋毁谩骂之后又不负责任地信手翻过，甚至挥舞政治权力的刀笔肆意篡改或彻底删除？还是用心披阅、认真研究、扬弃糟粕、吸取精华？

政界当权派与学界主流派对它早已做出了历史结论，似乎“铁案如山，不容置疑”了。然而，靠强权支撑着的“历史定论”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科学性和可信度？实在值得怀疑和追问：难道拳头大就有理吗？难道大权在握就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吗？正是基于这些困惑和追问，笔者写作了本书。

它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前文革时代》和中部《峥嵘岁月》侧重于往事追忆，下部《反思》侧重于问题思考。

本书不是“传”。像那个时代的众人一样，笔者虽然有幸赶上并认真参加了那场政治运动，但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在校学生连正式的“民”都算不上，距离入传资格何其遥远，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自传。

本书也不是“史”或“志”。它既无完整的编年体制和事件过程，

也无严格的史料考证，充其量仅仅是一个“以跟随党中央之名，行反党夺权之实”的红卫兵——“十年文革，十三年遭劫”的“文革犯”——之亲历、见闻和反思。

本书更不敢妄称“研究”。它既无深奥义理的发微，也无引经据典的论证，更无规范的逻辑架构，充其量仅仅是一个“文革过来人”和社会科学门外汉兴之所至的随想。

尽管如此，它在真、善、美三个基本点上同样不敢敷衍马虎。笔者可以保证：它不乏真的事实、善的动机和美的追求。亦即，以与人为善、利国利民的道德理性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和拳拳报国之心为动因和动力，将十多年亲历见闻的史实和数十年探问思考的真实思想奉献给世人，以期为中国社会改革和民族复兴尽一点“文革一代”的责任。

世界是多样化丰富多彩的，任何事物都有多层面的结构、多向度的张力或发展趋势，曾经席卷举国上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任何人对它的直接经验和思想认识，只能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从特定的立场、观点和视角出发，经由个性化的生活道路和心路历程所获得的一孔之见，其客观真实性只能是相对的。对本书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尤其是见闻而非亲历者)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见，笔者同样也无力保证绝对的客观真实性，只能保证绝对的主观真实性和相对的客观真实性。亦即，绝不会为了计较个人名利得失而有意演绎夸大或隐瞒篡改。

像一切有良知的成年学人一样，笔者“铁肩担道义”的豪情和“指点江山”的气概早已磨灭殆尽，但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古训却未敢或忘。既不必像“人民公仆”那样，因顾及公众形象和个人进退而套话连篇；又无须像“学术权威”那样，因爱惜清誉和英名而字斟句酌；也用不着像御用文人那样，为图解美化政府政策而讳言粉饰；更不屑于像文墨商人那样，为经济效益而趋附时尚合乎流俗。它只是无求无待地如实道来、平心而论罢了。

还要特别声明，本书的写作初衷是：回答笔者自己数十年的疑问困惑。若能为严肃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奉献管窥蠡测的一孔之

见，那就更喜出望外了。祈盼读者诸君也能严肃认真对待它，通过深入思考化腐朽为神奇，从一个平凡人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想中提炼出人生智慧；或者以史为鉴举一反三，从曾经有过的历史真实中求证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应然方向和必由之路。

作 者

2005 年 11 月

目 录

序	I
上 部 “前文革时代”——文革起源（1949—1965）	1
第一章 建国与“土地改革”运动	3
第一节 建国之初：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	3
第二节 土地改革运动	4
第三节 翻身农民：“从人家身上割下的肉 贴不到自个儿身上”	6
第二章 “三反”和“新三反”运动 ——第一次向官僚主义当权派开刀	8
第一节 “三反”运动	8
第二节 儿时记忆中的政治运动	9
第三节 父亲成了运动对象	10
第三章 “农业合作化”运动 ——两条路线的第一次摩擦	12
第一节 共和国最早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摩擦	12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合作化运动	14
第三节 父亲又成了运动对象	15
第四节 “合作化运动”反思	16
第四章 从“整风”到“反右” ——对群众批评监督，是欢迎还是镇压	22
第一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2
第二节 从“开门整风”到“反右斗争”	23
第三节 算术老师成了“戴帽儿右派”	26
第四节 高小生——听说“反右斗争”	27
第五节 笔者与二姐“大分化”	30
第五章 大跃进中的“五风” ——是为民谋福利，还是为官造政绩	33
第一节 大跃进的异化	33

第二节	“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	35
第三节	干部决定一切：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37
第四节	农民都傻了，嘻嘻哈哈挺开心.....	39
第五节	学校被大跃进扭曲了	40
第六节	《石壕吏》“新传”	41
第六章	漫长的“三年自然灾害” ——“1962年的右倾”	44
第一节	经济困难与政治危机.....	44
第二节	父亲挺不住病倒了.....	46
第三节	母亲与小妹成了“末等公民”	48
第四节	豆青狗“摇摇儿”饿疯了.....	49
第七章	饥寒交迫求学路.....	52
第一节	“白专道路”烦恼无限.....	52
第二节	最难熬的还是饥饿.....	54
第三节	两难选择——考文科还是考理科？	55
第八章	“四清运动” ——“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	58
第一节	“社教”运动——阶级斗争与继续革命复活	58
第二节	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	59
第三节	大学的“阶级斗争教育”	60
第四节	“社教运动”——运动群众.....	62
第五节	大学生“四清工作队”	64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67
第一节	“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	67
第二节	政治斗争导致学术理论价值异化.....	68
第三节	“时代精神汇合论”与阶级斗争 和继续革命理论	69
第四节	学术就是学术，政治就是政治.....	71
第五节	思想认识无法改变阶级属性.....	72

中 部 峥嵘岁月（1966—1982）.....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一章 中央的文革（1965.11—1966.5.16）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章 党委领导的文革（1966.5—1966.8）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一节 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二节 工作组——镇压群众.....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三节 向“非当权派”民众开刀
——转移运动大方向.....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三章 民众自治的文革（1966.8—1967.2）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一节 大串联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二节 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三节 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四节 筹备“夺权”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四章 革委会领导的文革（1967.2—1969.9）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一节 “二·三夺权”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二节 “主义兵二线人物”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三节 与“主义兵”老战友共渡难关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四节 鲁迅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五节 第一届“校革委会”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六节 “逆流”与“反逆流”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七节 鲁迅大学“闹翻案”狂潮.....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八节 “红代会”生涯.....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九节 “八·二九”事件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十节 张子石“省革委工作组”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十一节 军训团（第二届军宣队）...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十二节 第二届校革委.....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十三节 工宣队.....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十四节 “九大”与“红十条” 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十五节 革命委员会的功与过.....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五章 军人当政的文革（1969.4—1973.8）错误!未定义书签。

- 第一节 “一打三反”运动.....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节 清查“五一六”运动.....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三节 “赴京上访”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六章 “二次革命”（1973.8—1976.10）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一节 北京“批林批孔汇报会”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节 山大“批林批孔”运动.....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三节 “批林批孔”运动喜与忧.....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四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七章 宫廷政变与过渡政府（1976.10—1978.12）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八章 彻底否定，全面复辟（1978.12—1981.6）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下部 反思：中国的社会矛盾与文化大革命.....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一章 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分析.....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一节 “金字塔式”等级化社会结构.....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节 共和国的“五大矛盾”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阶级矛盾总爆发.....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四节 官僚化——共和国的黑暗面...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五节 新官僚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因.....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章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总导演.....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一节 不断革命论“信者”与“行者”.....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节 双重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三节 对“苏联模式”继续革命.....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四节 个人崇拜与崇拜个人.....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三章 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先锋.....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四章 文革分析——阶级、派别及矛盾.....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一节 文革的阶级和派别.....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节 文革的阶级、派别矛盾.....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五章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一节 阶级斗争现实无法掩盖.....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节 阶级斗争理论无法否定.....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三节 “苏联模式”阶级斗争传统理论批判.....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四节 阶级斗争“新说”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六章 文革之败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一节 文革被彻底否定.....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节 文革失败的根源.....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 ——彻底否定文革的恶果 一.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四节 腐败法制化与官僚资本化 ——彻底否定文革的恶果 二.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五节 “中美国”的崛起 ——彻底否定文革的恶果 三.	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六节 文革的历史意义.....	错误!未定义书签。
后 记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上 部

“前文革时代”——文革起源

（1949—1965）

没有什么能比攀登于真理的高峰之上俯视来路上的层层迷雾、烟障和曲折更愉快的了。

——卢克莱修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在出生以前，社会就为他安排好了一切。这或许是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了。俗语也说：“万般天注定，半分不由人。”此处之“天”即“天道”或客观规律。个体人如此，民族或国家群体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若将文化大革命看作中华民族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节点或驿站，那么，文革前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它做准备，都是在为走向它而铺路架桥。如果，将文化大革命比作历史发展的业与果，那么，文革前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是因与缘，都是在为它的成长成熟而培土浇水。因此，共和国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可以定义为“前文革时代”。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个人（包括毛主席）规划设计与操控的结果，而是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是历史“早已安排好了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按照不同方向追求各自的目标而形成的“合力”所致。文革前的人们，谁也不会预见到历史在不自觉中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走向了文化大革命。

为了终止一盘散沙的积弊，共和国只能摒弃自由化社会制度和民主化政治制度，实行“苏联模式”严密控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如

此一来，各种社会矛盾不能得到认真揭露，更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疏导、调整和化解。只能在“铁幕”或“竹幕”掩盖下不断回旋加速、震荡放大，日益霉变化脓。最终，不得不依靠政治运动来切除“社会毒瘤”。

然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本主义积弊根深蒂固，民众的自主权、民主监督权及其民主精神、自主能力极度萎缩，社会整体的生命活力和抗病防病免疫力退化。结果，“旧毒瘤”切除了，又转移到其他部位(领域)形成了“新毒瘤”。以至于，政治运动一茬接一茬，连环套似的走向了文化大革命——病态化社会阶级矛盾破坏性冲突总爆发。

第一章 建国与“土地改革”运动

共和国建国之初，是从封建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转轨时期，也是百废待兴、除旧布新的年代，新旧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政治运动也接连不断。

第一节 建国之初：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

在共和国之初的政府组建上，毛主席遵循“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实行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共产党员、人民代表、民主党派或社会贤达各占三分之一），组织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并选举组建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在此过程中，毛主席与他的老战友——共产党新贵——发生了第一次分歧。

他认为：政府官职官位乃国之重器，而非个人（包括国君）或某一党派的私有财产，只能选择德才兼备的贤者来担当，不能论功行赏赐予本党同志和亲朋好友。然而，在共产党新贵们看来：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坐天下的也理应是我们！

这种思想分歧又导致了他们对于毛主席“不念旧情，胳膊肘儿向外拐”的用人政策愤懑不平。一句顺口溜不脛而走迅速蔓延开来：“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面对一些高级干部跑官、要官、闹官的纠缠，毛主席拍案而起：“有战功的才能当官？把我拿掉好了！我从来就没立过什么战功，连枪都很少摸过！”他凭借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超常胆略和权威，通过一哄二抚三批评，很快就平复了这股怨气。

但是，共产党新贵政要与最高领袖（国家法人代表）之间矛盾

的根源，却没有也不可能就此消失。它与共和国同时产生同步发展，成为日后路线分歧和阶级矛盾产生的根源。

第二节 土地改革运动

共和国成立时，家乡的老百姓很少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们那样热血沸腾欢欣鼓舞。原因或许有二：一是早在抗战胜利时就获得了解放，其后再没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的二茬罪。二是国家不论称“民国”还是称“人民共和国”，老百姓不论是做“朝廷子民”还是当“国家主人”，反正都是种地纳粮。收成如何“天老爷”说了算；缴税纳粮“官老爷”说了算，“人家咋活，咱也咋活呗！”

真正称得上社会震荡而在老百姓中激起死水微澜的当属“土地改革”运动。它改变了农村经济基础层面的生产关系，是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

1. 地主——“矧子里面拔将军”

笔者家乡北辛村定了四户地主：常姓两户（常延祥、常洪修），刘姓一户（刘朋云），宋姓一户（宋席珍）。

他们各家大约有三、五十亩土地，在本村儿算得上富户了，但与当地的富裕村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是典型的“矧子里面拔将军”“贫困村里的富裕户”。

其一，他们各家成年男人都常年参加生产劳动，常洪修家更是舍不得顾“打短儿的”，农忙时全家娘们儿孩子齐上阵。宋书照（宋席珍独子），也是村里有名的种地高手或农活儿巧手，直到公社化后，他家的自留地仍然是全村儿的“样板儿田”。

其二，他们的家庭主妇也大都“过日子仔细”，会精打细算勤俭持家，邻里关系也处得挺好“人缘儿不错”，没有谁家那种“关死门子吃，开开门子拉”的户儿。

其三，农忙时他们各家大都请“打短儿的”（短工），到劳动力过剩的庄乡邻居家“问人”求告，好吃好喝好待承。人丁不旺劳力

不足的人家，则出租部分土地，收成分配一般是“三七”或“四六”：地主三或四，佃农七或六。只有关系不错的家庭之间，才能形成租佃关系。

其四，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庄乡邻居并无多少差别，也是“萝卜条子酱碗家常饭”，甚至比贫穷人家过日子还细。真正的奢侈品，只有宋席珍那辆马拉木轮蓝布罩的“轿车子”——民国县政府“书办”的代步。

2. 亲兄胞弟，下场迥异

听父亲说：刘朋云兄弟俩分家时，田亩与胞弟一样多，为了让两个儿子以后“过得下去”，又省吃俭用买了一些地。结果，不多几年就赶上了土改运动成了地主。而刘朋祥，几个闺女出嫁后就成了“老绝户”，一是没有“未来希望”过得没劲，二是年龄渐老操持不过来，土改前陆续卖了一些地。结果，坏事变好事，不仅没成为地主，反倒当了多年“劳动模范”。

宋席珍与其兄分家时，人均土地也一样多。其后，家庭人口发展却大不相同，他家三代单传只有五口人；他侄儿（笔者同辈儿人称“聋子大哥”）却一妻一妾儿孙成群，且“四世同堂”多达十六、七口人。结果，土改运动时，宋席珍家成了地主；“聋子大哥”家三户都成了贫下中农，娘们儿汉子一大帮都成了“土改积极分子”。斗争地主的诉苦大会也成了他们自家人的“历史旧账清算会”。到了悲愤处，他们不敢对“亲二爷爷”宋席珍大不敬，对“亲叔伯小叔”宋书照则难免“暴风骤雨”。不久，宋席珍被县政府枪毙了，原因也不是“地主残酷剥削农民”，而是“民国县政府书办操纵诉讼、民愤极大”。

这次诉苦大会，并未激起贫下中农“强烈的阶级仇恨”。母亲和书味嫂等人私下里当笑话儿说，还大不以为然：“有吗理儿可说？自家大吃大喝过得掉腚三尺，反过头儿来抓破腚赖着人家，不就是仗着人多有势力吗？欺负人！”

3. “地主鸡”下了两个“革命蛋”

当时的“划成分”是非常公平的：严格以人均土地数量为标准，共产党干部家庭也毫不例外。例如，常延祥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共产党“南下干部”，一个是八路军“革命烈士”，真可谓“地主鸡下了两个革命蛋”。但是，他却未能因为“下了两个革命蛋”而甩掉地主帽子。

这足以证明：当时的共产党官员还是相当清正廉洁的，非常注重客观精神和公平原则。不仅开国领袖毛泽东实事求是地给自己家定为地主，而且，最基层的农村干部也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原则；即使当事人党政干部，也少有以权谋私干扰或操纵“土改运动”者。

正是从故乡故事中，笔者解读出“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第三节 翻身农民：“从人家身上割下的肉贴不到自个儿身上”

人们都自觉或被迫投入到了土改运动中，先是日夜忙着用“叉子”丈量土地、定田亩、划地界、“造册子”，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少地的贫下中农；后又召开诉苦大会斗争恶霸地主。

1. 不少人拒绝土改运动“胜利成果”

笔者家五口人仅有八亩半地，其中还有三亩只生长马齿菜的“油碱地”，是标准的贫农。但是，父母却坚决“不要人家的东西儿”，理由是：“从人家身上割下来的肉贴不到自个儿身上”“日子是个人过的，要来的饭不能饱一辈子！”弄得村干部没办法，只得把刘家闲置了两年的两间园屋连同四分园地分到笔者家名下。

2. 更多人拥护“共产主义”

更多人愿意“要别人家的东西儿”，不仅土地，连不属于没收范围的浮财也被“共产”了，当时称作“把地主扫地出门”。俗话说：“财帛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不少人家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却没有学

到他们勤俭持家“会过日子”的习惯，不是“算了吃”，而是“吃了算”。因而，大都并未能真正走上富裕路。例如三叔家，他与笔者父亲分家时，祖母随他家生活，分到的土地既多又好；土改时又分得了好几亩良田。然而，祖母与三婶子都大手大脚不过日子，“不哧啦锅不吃饭”；还经常下来新粮换烧饼馓子吃，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典当甚至卖地，成了老困难户儿年年“吃救济”。

3. 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被抛弃

土改运动对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不少人的生活观念也悄悄发生着改变。例如，母亲与妯娌姑嫂们聊天儿时常常发牢骚：“个人吃了喝了是赚的，省了细了是给人家预备的！”同时，“越穷越革命”的理论悄悄演变成了“越穷越光荣”的社会观念：过富了是罪过甚至灾难，“吃救济”的困难户成了“有头有脸儿的光荣户”；日子富裕的却藏着掖着不敢显财露富，甚至哭穷叫街。只有当媒婆子上门儿给儿子说媳妇儿时才敢实话实说。

第二章 “三反”和“新三反”运动

——第一次向官僚主义当权派开刀

共和国建国之初，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党政官员蜕化变质趋势和官僚主义风气相继开展了“三反五反”和“新三反”运动。

第一节 “三反”运动

共和国建国后，许多党政官员新贵私有观念和利己欲望与社会地位一起急剧膨胀，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贪污公款、鱼肉百姓，大肆侵夺社会公产和百姓血汗；甚至与工商业主内外勾结，强强联手、权钱交易，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刘青山、张自善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对此，继续革命者毛主席无法容忍！尤其是，正当志愿军将士在朝鲜战场上流血牺牲、全国人民节衣缩食为子弟兵捐款捐物时，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官僚新贵竟然利用抗美援朝战争之机，与不法资本家沆瀣一气大发国难财。这更加令毛主席切齿痛恨、怒不可遏，于1951年12月断然发动了“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

至1952年10月查明：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贪污千元以上者计10.8万人，为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8%。其中，以中小贪污人员为绝大多数，受行政处分的占20.8%，免受处分的占75.56%；贪污万元以上受到刑事处理的大贪污分子占3.64%，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刑立即执行的42人，死刑缓

期执行的9人。建国才两年啊！可见官僚化趋势何等强劲猖獗。

毫无疑问，“三反”和其后的“新三反”（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运动，所惩治的对象无一不是官僚化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表现。它第一次将阶级斗争矛头指向了共产党新政权当权派，而非已经被推翻的旧剥削阶级“外部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的前奏或序幕。

第二节 儿时记忆中的政治运动

也许是因为政治运动太频繁了，在笔者这样“光腚溜子”孩子心目中，什么这运动那运动，根本看不懂，更说不清谁是谁。后来才知道，当时母亲与老娘们儿、小媳妇儿偷偷议论的“谁谁的表大伯是‘一贯道’，被枪毙了”，可能说的是“镇反”运动；“谁谁的三妗子做棉军装时往里头掺沙土，把人家的好穰子（棉絮）昧下，被抓走了”，可能说的是“三反五反”运动。

不过，政治运动还是在笔者幼小心灵里第一次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天夜晚，笔者睡梦中被尿憋醒了，见母亲还在豆粒儿般的油灯下与人密谈。书味嫂俯下身子凑近母亲低声说：“听说又要运动了……”果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铤杆李乡乡长张连祥带着一帮人闯进我家。他穿一身黑制服，左肩斜挎着盒子枪，外面披扇着黄呢子大衣，戴一副墨镜。这就是当时笔者所见到过的共产党最大的官儿了。

父亲被带走了，虽然后半夜就回来了，但是，家里的生活从此变了样儿。父亲隔三岔五地被连夜带走，到鸡叫以后才回来，很少再有闲心长篇大论地教训我们，眉头紧皱和唉声叹气却多了起来；母亲的不眠之夜也越来越多了。两个姐姐常常裹着被窝坐在炕头上，陪着母亲一直等到父亲回来。我虽然不懂事，只知道胡吃海睡，但是，每当这时也平添了几分惊恐，吓得睡不着觉，害怕父亲“回不来了”……

第三节 父亲成了运动对象

父亲因为穷而未能上学读书，十二岁时，本村儿老中医兼私塾先生“王希龄二爷”爱才如命，觉得父亲可惜了儿的，便不顾祖母吵闹坚持免书修将他收入家塾中，并赐字“延寿”。勉强坚持了一年半，最终还是被祖母强行拽回了家。父亲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到了县城，时年不满十四虚岁。先在洋布铺子里当伙计，给老板的孩子崴屎端尿、洗“尿接子”；后又考入县电话局当查线员，并得以与母亲相识成亲。其后，又与母亲一起陆续把我们姐弟四人“从苇子湾里捡了回来”。

“七·七事变”后，家乡闹起了抗日活动，父亲参加了秘密抗日组织，最终擅离职守与日伪政权打起“游击”来，当过“区文教助理”等。1942年日寇“五一大扫荡”时，抗日游击队被打散了。父亲回家躲避，被族侄宋书典带领汉奸队儿抓进了汪万楼村据点，临走还抢走了我家唯一值钱的一块银壳怀表。二姑父找到了父亲的老领导王景森（以前的八路军区长，当时的伪区长）要求保释。王出主意说：“先到我这里（西段伪区公所）干几天，我再想办法。否则，不好办。”父亲应诺在他那里当了四个月零二十三天的“庶务”（伙房司务长）。被释放后重新找到地下抗日组织，当上了县民政科员。平津战役后，共产党组建了“沧州盐业公司”，父亲被调往该处任会计主任之类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父亲自然成了“革命干部”，除了土地由村里“代耕”，祖母、母亲和两个姐姐还能经常领到一百多斤小米儿贴补家用。所以，母亲一个人领着孩子们在家“过得还挺有滋有味儿的”。

然而，好景不长，乡长和村长说：父亲在外面儿“不是干革命，而是开公司做买卖。”从此，我家被清除出“烈军工属队伍”，土地无人“代耕”了，小米儿补贴也没有了。母亲一人带着三个孩子，最大的不满十岁，还得耕种八亩半地。自己“问人”帮忙，祖母又挑唆三叔领着“打短儿的”到我家吃饭到他家地里干活儿。母亲实在受不了了，整天与父亲打仗寻死觅活闹离婚，立逼着他回家。说来母亲也实在不易，出身名门大户，儿时虽然父死母嫁，但是济南

“洋学堂”毕业的伯父却视若己出爱如掌珠；虽专心女红不喜诗文，却通情达理生性要强，从来不让人家“当面说半个不字儿背后撇嘴角子”，何曾受过这等磨难和屈辱？

父亲作难了，看看八九岁的长女天天背着三四岁的弟弟上学，回家来还要推碾子捣磨、烧火做饭，农忙时更得帮母亲耕种收割，上学一年多却根本认不了几个字儿；五六岁的次女也常被强行拽回家，上地干活、打草放羊，眼看就要濒临辍学了。……为了子女的未来，他也只能忍痛自我牺牲放弃“南下”机会解甲归田了。

最终，落了个“先当汉奸，又当逃兵”，成了“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政治运动对象。由此也决定了，他自己和全家人除了忍受同时代人共同的贫穷和艰辛以外，也饱尝了更多的动荡和磨难。

第三章 “农业合作化”运动 ——两条路线的第一次摩擦

如果说，土地改革以后的政治运动主要是政府官员对少数运动对象的运动、广大农民只是旁观者或呐喊助威者的话；那么，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则像土地改革运动一样，是全体农民都被囊括其中的“全民运动”了。然而，两者却有着天壤之别：土地改革运动的结果是，除少数地主以外的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而合作化运动的结果却是，个体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被集体化，是将土地的个人使用权转变为集体使用权。然而，当民主制度不健全时，这种集体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各级政府官员和社队干部等少数人，而非社员——农业生产劳动者自己。因此，他们在两次运动中的心情和态度也大相径庭。

第一节 共和国最早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摩擦

共和国建国后，中国究竟要往何处去？

毛主席是彻底革命者，既是领导工农大众求解放的伟大领袖，又是“以人类彻底解放为己任”的圣贤。他的理想追求，没有也不会因为“坐天下”而有所改变，所改变的仅仅是其社会角色：由“共党匪首”变为共和国领袖，继续革命者和最高统治者集于一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巨，更伟大。”这不仅是他对全党的告诫，更是他自己坚定不移信守并奉行的继续革命信念。所谓“今后的路”，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

然而，作为新政权统治者，共产党各级官员成了最大的既得利

益者，他们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是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或完全没有入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仅仅停留在誓词或口号中。他们把“打天下，坐天下”当成革命的最终目的，一旦成了新官员“人上人”，就“船到码头车到站”该“享受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了，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那些身为民主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新官员们就更不用说了，作为原来的有钱人或上流社会“文明人”，一旦由在野的“士”跻身于当权者“仕”，就更不想继续革命了。

更严重的是，不想或不愿意（当时还尚未发展到自觉反对）继续革命的思想，不仅普遍存在于新官员既得利益者中，而且普遍存在于共和国决策层中，刘少奇就是代表之一。早在1949年4月，他就提出了一个纲领性口号——“巩固民主主义新秩序”，并利用一切会议或各种场合，多次宣扬“剥削有功论”，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剥削越多，功劳越大”等等。进而形成了理论：新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只能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不能靠革命，只能靠建设。后来，“邓式改革开放”，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告别革命”等口号，绝非什么“理论创新”，而是捡食了刘少奇数十年前的唾余和牙惠。

毛与刘的思想分歧公开化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它是建国后中共决策层第一次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摩擦。1951年山西省委面对农村日益严重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两极分化问题，进行了由“互助组”提高为“合作社”的试点，引发了党政官员内部的争论。显然，山西省委的做法违背了“巩固民主主义新秩序”主张，刘少奇公开批评他们“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并支持华北局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批判和清算。毛主席却明确支持山西省的实验，并专门召开了“全国互助合作会议”。他坚信：“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

体化的唯一出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

刘少奇为了保住“中共副主席”地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国君”毛泽东投其所好，从极右跳到极“左”，从反对、压制合作化道路，一跃成为“合作化运动”积极推行者。各省地方大员们同样惯于唯上唯命是从。于是，“合作化运动”像一阵飓风席卷了全国。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以后，广大无地或少地的贫困农民，获得了土地（劳动对象）使用权。但是，许多人因缺乏大牲畜（能源）和大型农具，仍然不能开展有效或高效的农业生产，新的两极分化依然存在。有的农民便自发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互通有无，实现人力、畜力和农具整合互补。作为乡村“土秀才”，父亲最早理解并学习引进了这种互助合作道路，动员三叔和“大井上”四兄弟，组成了全村乃至方圆十余里第一个互助组。他黑天白日地忙乎了好多天，制定“互助合作章程”和“换工办法”；并用竹片儿和木板儿做成“代工牌儿”。谁若请人帮工、借用大型农具和牲畜、用人家的井水浇地等等，都要商量作价支付“代工牌儿”，年终相互冲抵；“负债者”对“债主”要支付一定的报酬。如此，既解决了我家和三叔家无水井、无大农具和大牲畜的困难，又不像原来那样凭本家子或乡亲关系无偿使用人家的。双方六家人都挺乐意。

然而，没过几个月就被官办的农业合作化浪潮冲击得无影无踪了。在各级政府组织领导下，北辛村很快成立了村东头儿宋氏家族、村西头儿常氏家族和村中间杂姓三个“小社”。不久，全村儿又合并为一个“初级社”，原来的“小社”成了生产队。后来，“初级社”又不跟形势了，“红光农业生产高级联社”应运而生，官方称“高级社”，老百姓称“大社”。它由北辛家、小胡家、东汪家、西汪家和马家柳行等五个村儿联合组成，总部设在北辛村。父亲被推选为主

管会计，报酬是整劳力的平均工分儿。他除了完成“大社”的财务会计工作，还主动带了好几个徒弟，为每个“小社”培养了一个合格会计，如小胡家的马延芳、马家柳行的马学儒等。他凭着自己的德性品行、学识能力和工作成绩，赢得了前后两庄儿老少爷们儿的尊重和赞扬。自笔者记事以来，这是父亲最春风得意的时期，虽然历时短暂，记忆却特别美好而深刻。

辉煌的“大社”仅维持了一年多，最后又被汹涌澎湃的“公社化”浪潮冲垮了。北辛村也变成了“山东省乐陵县城关公社北辛大队”，下设三个生产队，即原来的三个“小社”。

正是凭借儿时朦胧的记忆和体验，笔者认为：如果说合作化急躁冒进脱离实际的话，那么，这个“合作化”绝不是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而是各级官僚新贵们刮起的“合作化运动”飓风。其根源则在于，他们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已经不再与广大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而是拥有了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独立于国家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当时主要还是政治利益和特权利益）。为了保住官位并得到提拔以巩固特权利益，他们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宁“左”勿右等信条发挥到了极致，却将国计民生抛到九霄云外。从“合作化运动”开始，以后的历次运动莫非如此。

第三节 父亲又成了运动对象

合作化以后，很少有丰产又丰收的年景，农民的粮食越来越不够吃了。各级当官儿的却依然戴着鸡翎推碾子——威风一圈儿是一圈儿，一边高喊“形势大好”谎报粮食产量（政绩），一边将上级的压力向下转移。“权力重心上移”必然导致“经济负担下嫁”，最终全都转嫁给了农民。每年两季“报产量”时，都是整宿整宿地开会，县官儿逼社官儿，社官儿逼村官儿，村官儿逼队官儿，凑不够上级指令的“任务数”就休想散会。弄到最后，只能逼迫老百姓“从肠子里往外挤粮食”。

在庄乡爷们儿心目中，父亲是识文撰字走南闯北的人，一些村

官儿、队官儿常常找他拉呱儿诉说烦恼。开始时，父亲还讲古比今地哄人家；最后，架不住犟眼子们的批驳，无奈地说：走？往哪走？下关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哪里都一个样儿；“卖盐的老婆喝淡汤”，自古以来就这样儿！当时，父亲是第二生产队会计（队长、会计、保管员“三驾马车”之一）。面对日益严重的粮荒，他也不得不与队长和保管一起策划，将生产队里一部分“公积粮”分给了社员，理由是：“不能让社员守着粮食挨饿！肠子闲着半截咋干活儿？”结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成了“瞒产私分”的典型，又一次成了“反右倾，反瞒产私分”的运动对象。经过多次批斗，最终被罢“官”，结束了他一生的“革命工作”。

对此，作为刚懂事儿的小学生，笔者心中的困惑和烦恼是大人们无法理解的：不要说书上讲的，歌儿里也天天唱啊，“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共产党毛主席的阳光咋着老是照不到我们这里呢？

第四节 “合作化运动”反思

笔者根据儿时的记忆认为：毛主席指引的合作化道路既符合社会主义大方向，也符合中国大多数农村的实际，更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

如果说，他“脱离实际犯了操之过急的极左错误”的话，那么，他所脱离的并非农村和农民的实际，而是党政新官僚权贵的实际，是官僚专制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员任命制的实际。正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造成了诸多致命的弊端：各级官员大都只为上司负责，无条件地执行上级指示，没有几个人从当地农村实际出发，更少有人真心实意尊重农民的愿望和要求。

再者，“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组织原则，毛主席本人也反复强调过多次，刘少奇更有“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在这种组织原则约束下，有谁敢于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又有几个人敢于实事求是从本地实际出发拒不执行中央和上级指示？

如此党政领导所操作的“合作化运动”，必然是“一刀切，一阵风”，不可能有任何例外和特殊。他们无视农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排斥自愿自主的组织原则，排斥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致使集体化与民主化相脱离，沦为“官僚专制集体化”，不仅未能成为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放大器，反倒成了政府强加给农民的组织牢笼，挫伤了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延迟了农村的发展速度。

其后，毛主席所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探索，之所以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收效甚微，究其根源盖在于此。

1. 新官僚化的“合作化运动”脱离农村客观实际

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农业生产方式应当由农民自主，根据生产工具等物质条件和客观需要进行自主选择。然而，当时的合作化运动却是“领导决定一切”由当官儿的说了算，以官员的行政干预取代农民的自主选择，以行政命令取代典型示范。广大农民像羊群一样被轰赶到了一起，圈禁在农业社的“羊圈”里。尤其是，从个体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连蹦四级，真可谓一日千里。

如此“飞速发展”，使集体化生产组织形式和组织规模像“吹气球”似的恶性膨胀，完全超出了农民的实际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他们根本来不及消化吸收，哪里还有时间体验什么优越性？“合作化”成了农民外在的异己力量，成了严重束缚他们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桎梏。正如乡亲们所抱怨的那样：“当官儿的想咋摆弄就咋摆弄呗！”农民根本不可能在适应的基础上主动创造。结果，脱离了农村和农民的客观需求，造成了集体组织与个体成员的脱离和对立。

2. 生产资料所有制——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被剥夺

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使用权都被充公了。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管理权归各级政府官员所有，农民只是农业社的“打

工者”，甚至像牛马一样的“种地工具”。整个农村社会形成了如下格局：国家成了全国唯一的“地主”；党委和政府充当了各级“田庄经理”和“征粮队”，农民则像他们自称的那样“是给共产党扛活的”。村里一些晒太阳的犟眼子老头儿常说：“这下子可好了，咱也成了地主了，地都被没收充公了还不算完，光等着扫地出门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被剥夺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对立势必导致集体与个人、政府与农民、国家与农民的矛盾对立。

3. 生产关系——农民既无权更无利

农民对于农业生产毫无发言权，完全听凭队长、社长按照上级或上级的上级——远离生产实际却大权独揽的官儿们——的指示和命令来铺排。农业生产的决策管理与劳动者和生产活动越来越相距遥远而相互对立。尤其是，在农产品（农民劳动成果）的分配上，劳动者农民更无发言权，全凭政府开恩赏赐。各级父母官，为了政治地位安全，又大都是“先国家，后集体，再干部，最后才是社员”；社员们只能“剩多多吃，剩少少吃，剩不下不吃”。以至于，干活儿的没饭吃，“大吃八喝”的不干活儿；政府对农民，更是“既要马儿拼命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如此生产关系，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消极怠工普遍存在且愈演愈烈：“包工戳，日工磨，自留地里出好活”“七点上工八点到，到了地头儿睡一觉；队长来了撒撒欢儿，队长走了抽袋烟儿”……

4. 生产方式——泛政治化运动群众

合作化进程和农业生产活动一律按政治运动模式操作，官员的经济管理、农民的生产活动乃至日常生活无不“泛政治化”；对管理体制和生产活动的态度、意见乃至一言一行无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在上级任命的政治体制和人事制度下，各级官吏的岗位或职位无不来自上级领导的恩赐。大小官吏们，大都把岗位或职位看作“混事儿”谋生的身份地位，而非“干事儿”的职务职责，谁肯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闹着玩儿？于是，各级政府官员对上唯命是

从，对下不顾广大农民的呼声和死活，成了典型的“运动群众”。他们只顾“政治效益”，谁还顾得上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不可能按照经济规律组织生产，让广大农民主动创造并从中获得实际利益。至于乡亲们的日子咋过，“谁有闲心管那些闲事儿？”

5. 生产管理——外行瞎指挥内行

在批判和警惕“富农路线”和“富裕中农路线”的政治原则下，即使像生产队长那样芝麻粒儿大的官儿，其选拔任命也要把出身成分和政治条件摆在首位。许多有能力会过日子且真心为大伙儿办事儿的优秀农民，被排斥于生产管理层之外。大小官吏们又大都鄙视农业劳动，离生产“一线”越远越好，因而大都成了农业生产的外行。然而，他们却放弃公共事务管理的本业，放弃为农民生产活动服务的责任，越俎代庖不务正业，强行干预农民的生产活动，以行政干预取代生产管理，进而又异化为强迫命令瞎指挥的胡作非为。正像老少爷们儿所说：“大呼隆，穷折腾；胡操蛋，瞎胡乱！”如此，还谈什么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对此，父母经常抱怨：“自个儿那几口人的日子都过得掉腚三尺、提不起裤裆来，全村儿好几百口人的日子要能过好那才怪呢！”

事实正是如此，在公社化后的一个时期内，出现了一种颇具讽刺性的怪现象：有“政治地位”的社员“日子越过越紧巴儿”；因出身不好政治不合格儿而不准“入社”的地富反坏和富裕中农“小日子儿却越过越滋润”。

6. 劳动力——农民的人身自由丧失殆尽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立制度的严格限制，使农民连自主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和人身自由也被彻底剥夺，被牢牢钉死在固定地域、固定村落、固定位置上，成了名副其实的螺丝钉。更有甚者，脱离民主化的集体化难免导致非人人性化的“圈禁”：农民不准自由流动，只能在出生地死靠干耗，无异于由自耕农退化成了“准农奴”或“准奴隶”。

如此一来，他们的生活来源就只有终身“在社队打工”这一条路了。经济收入和生存质量，除了取决于祖宗定居地的自然条件和天老爷恩赐，就只能取决于“土地爷”（当地官吏）的人性、德行和能力了，自己却毫无自主选择和自为创造的空间与可能性。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性、能动性以及经济独立性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也随之丧失殆尽，更谈何经济民主权利？连最起码的经济民主权利都没有，又谈何对社会公事和国家大事的政治民主权利？他们除了对当官儿的点头哈腰对政府“山呼万岁”，还能咋样？正像乡亲们抱怨的那样：“小命儿都攥在人家手心儿里，谁还敢说半个不字儿？”连地里种什么、活儿咋干都说了不算毫无自主权，还侈谈什么“国家主人”？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消极怠工一条路了：“为了省点儿气力儿，吃饭时省口糠窝头，只能少干点儿活儿，在一边儿甦醒着了”。农业劳动力既如此，谈何发展农村生产力？

7. 一线希望——逃离“九地之下”

农民积极性被束缚，农业发展止步不前。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乐陵县人口增长了一倍多，粮食产量却与1949年基本持平。梁漱溟先生所说“农民在九地之下”的状况愈演愈烈。种豆南山、采菊东篱等农村田园诗式的恬淡宁静也渐行渐远，成了各种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落魄者的发配去处。对城市人而言，“下放农村”成了比“劳改劳教”更严厉的惩罚。不少刑满释放农民哀求监狱给自己加刑以便赖在劳改队不走。因为，“劳改犯，吃饱饭”总比自由自在地受穷挨治、吃糠咽菜强得多。

农民唯一的指望就是子孙后代好好念书，“考出去”混个“吃国家饭儿”的非农业户口。所有家长都教育孩子：“好生儿念书，将来进城当工人吃饽饽！要不然就一辈子掏大粪在土坷垃堆里刨食儿吃！”如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农村的人才资源、智能资源和文化基因大量流失。进而陷入了恶性循环：越穷就越留不住人，越留不住人就越穷。间接后果则是，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乃至国家越来越失望、怀疑和不满。他们虽然不敢乱说乱动，但是，内心的失望和

冤、怨、怒“三气”以及由此导致的普遍消极怠工，对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加可怕。

8. 农民倒邪霉，“农官儿”还有好儿吗？

“三农”贫穷落后直接影响到农村干部队伍和基层政权的品质，导致了三种恶果。其一，农民贫穷，基层干部也富不起来；即使富起来了，也风光不起来。以至于陷入了恶性循环：贫穷导致管理人才流失，管理人才流失又加剧了贫穷。正像乡亲们所说：“只要有条韭菜叶儿宽的缝儿”，就会村官儿往乡里钻、乡官儿往县里钻、县官儿往大城市钻。好人、能人都远走高飞了，距离“三农”越远越好。结果，农业带头儿人只剩些“尖巴残子”。其二，优秀人才和文化基因大量流失，不仅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农民收入，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公众形象。时至今日，在城里人眼中，村支书、公社书记、乡镇干部等依然是“土老帽儿”“土皇帝”“有权势，无教养”的代名词，并常常被用来贬低或取笑对方。如此，谁还有心思为农业发展做贡献？谁不想赶快“捞一把”做个“土财主”？虽然不风光倒也挺实惠。其三，各级“农官儿”为了逃离“暴土窝儿”远走高飞，或为了保住虽不风光、倒挺实惠的地位，又大都是“对下横征暴敛，狠刮地皮三尺深；对上阿谀逢迎，多交一分是一分”。少数为民请命或为群众谋利益的农村干部不是被罢官，就是在上级领导“耐心教育”和“政治运动长期锻炼”下痛改前非了。

各级政府和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对抗化激烈化了，广大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农民虽然不敢冒险公开反抗他们，但是，一旦有说话机会，积压在心头的冤、怨、怒“三气”，就会疾风暴雨般发泄到身边的“农官儿”身上。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文革在农村同样获得了空前普遍而强烈响应的原因。

第四章 从“整风”到“反右”

——对群众批评监督，是欢迎还是镇压

面对共和国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毛主席的思想认识也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核心思想是：面对初露端倪而又日益尖锐的十大社会矛盾，在对经济基础进行计划性有序化控制的同时，也不断改革“苏联模式”不合理上层建筑，坚持党政官员自身的继续革命，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尤其要正确处理官与民、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

第一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本文是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重大发展的里程碑，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种论断：其一，过去许多被误认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复辟阴谋”，其实是人民内部不同思想意见、不同利益要求的正常分歧，应当“兼容共存”、正确处理。其二，超越了“共产党是革命的党，新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等概念化说教，指出：“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虽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存在着“矛盾转化的可能性”。如果不注意，任由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和贪污腐化泛滥下去，就“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敌我矛盾”。上述两种思想，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进步，是对“苏联模式”马列主义传统理论的颠覆性突破。

基于上述两种思想，毛主席又提出了三种执政理念：

其一，思想文化领域，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的“适度自由化”方针；反思并批判了“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的舆论一律“一言堂”，倡导各种文化和思想“兼容共存”的多元化原则。

其二，“少数人闹事”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强调“游行示威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罢工并不违反宪法”等。过去对人民群众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动辄定为“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和破坏活动”并予以坚决镇压、彻底消灭。与之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民主理念大飞跃。

其三，对政府和上层建筑改革，提倡“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并提出“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保证他们不脱离群众、不蜕化变质，并减轻社会基础和工农民众的负担。这充分证明：他对共和国新官僚权贵与平民大众、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所有这五个方面，都是对“苏联模式”官僚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矫正和超越，被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指责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遭到几乎全部中共“大官”们（周总理除外）的反对。（[美]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二节 从“开门整风”到“反右斗争”

毛主席既然对社会矛盾有了新的理论认识，只争朝夕的个性促使他立即付诸实践，开展了“开门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大鸣大放”，揭露中共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从而，引发了共和国君臣之间空前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矛盾本质：是继续革命，还是“维护党的绝对领导、彻底巩固新政权”？这次运动，不论是预期目标和运动方式，还是运动过程和最终结局，都堪称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1. “开门整风，大鸣大放”

许多年轻人误以为，“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创造。其实不然，它是1957年“开门整风，大鸣大放”运动中“右派”的首创。当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对群众所创造的“四大”斗争形式给予了充分肯定：“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好形式。”“‘四大’这种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四大’）归根结蒂，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

毛主席满怀激情地高度赞扬人民群众的创造：“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然而，正当毛主席为找到了继续革命的形式而欢欣鼓舞时，“大鸣大放”运动却出现了一股逆流。章伯钧、罗隆基等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竟然“要共产党下台”，实行“轮流坐庄”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原本就对“大鸣大放”运动消极抵触的大官新贵们，终于找到了翻盘的借口。一时间，党政官员像炸了营一样，群情激愤、摩拳擦掌，要为“保卫新政权”血战到底。

空前激化的社会矛盾将毛主席逼进了前所未遇的两难选择死胡同：要么继续履行“继续革命者”的社会责任，坚持推动“开门整风，大鸣大放”运动，为此，不惜涉险犯难，任由中共政权被推翻，拟或自己成为“中共叛徒”而被废黜。要么履行“最高统治者”的社会责任，及时扭转运动大方向，反击“右派闹事”，以稳定新政权，

为此，不惜将“大鸣大放”运动的依靠力量——帮助党整风的“右派”——逆向转化成运动对象。

作为一向善于审时度势“打不赢就走”的智者，毛主席痛苦地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深知生存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既要推动继续革命以谋发展，又要维护国家稳定以求生存。当时，新政权立足未稳，不仅国内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极尽破坏捣乱，而且，列强“亡我之心不死”蠢蠢欲动。一旦天下大乱，共和国难免陷于内外夹攻的困境。同时，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早已证明：除了他和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和政党能够担当起“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大业。

一夜之间，“开门整风”运动惊天大逆转，变成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右斗争”。尽管毛主席与周总理“迷途知返”，被迫暂时放弃继续革命路线，向刘、邓、彭（真）“铁三角”的“彻底巩固路线”妥协靠拢，依然未能逃脱“纵容自由化”的罪责，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

2. 新官僚权贵拼死反抗

各级党政官员原以为，“开门整风”也会像以往那样“走走过场”来一阵自我批评的“毛毛雨”或相互批评的“急急风”就过去了，不料却成了一场地动山摇大厦将倾的暴风骤雨。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和干政热情，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以往的运动都是他们整别人，现在却是如此众多被自己领导或被自己运动过的“外人”乃至“敌人”杀将了过来。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新政权”从而“反人民”还能是什么？

刘、邓、彭“铁三角”是整个新官僚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维护党的绝对领导，彻底巩固新政权”的真正领袖和斗士，他们群策群力、砥柱中流、力挽狂澜，终于迫使毛泽东扭转了运动大方向。这真是新官僚阶级的天赐良机！为了“彻底巩固新政权”，从而彻底巩固自身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他们以“百倍的仇恨，疯狂的热情”，奋起反击、尽情报复；加倍反攻倒算，彻底清除异己。他们手

中的权力杠杆或专政工具，更使这种反攻倒算“雨借风势，风助雨威”，往复振荡、无限放大，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不论是利令智昏狂妄自大的“右派”，还是目无尊长不服管教的“刁民”；不论是一贯仇恨官僚主义的“三反”和“新三反”运动积极分子，还是“惯于以理压人、得理不饶人、吹毛求疵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人，都无一漏网最终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严厉镇压。

如此，当权派们仍嫌意犹未尽怒火难平，于是又开展了党内“反自由化倾向”运动（“反右补课”），其目的就是要彻底肃清毛、周“纵容自由化”的流毒。所有恃才傲物与领导离心离德的“清流”干部害群之马、“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无一幸免，大都被狠狠横扫了一通：该批斗的批倒批臭，该罢官的一撸到底，该开除的彻底清除出党，该劳改的流放劳改，该抓捕的“绳之以法。毛、周也受到“应有的”教训，并为此付出了相当的政治代价。……最后，便是“热烈欢呼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了。

关于“抓右派”的人数问题，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伸出一个巴掌说：全国估计有5千。然而，以刘、邓、彭“铁三角”为首的各级当权派，利用对运动的实际操控权力，强行“定比例，下指标”层层加码，一口气抓了55万，是毛主席估计的110倍。例如，笔者就读的小屯儿高小，六个老师一个炊事员就分摊了一个“戴帽儿右派”，占教工总数的百分之十还多……

第三节 算术老师成了“戴帽儿右派”

笔者求学的“小屯儿高小”有五、六两个年级，离家较远的学生中午带饭，伙房里无偿热饭并提供“笼锅水”。麦秋放假前，在伙房门前吃午饭时，“大哈哈”张老师通知说：“放假后都别来了，老师们都去城里开会。”有学生问：“开什么会？”他答道：“帮助领导整风，就是给领导提意见。”十二三岁的毛孩子懂什么整风整雨的，谁又认得“领导”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对这种碍不着个人疼痒的闲事儿谁也没往心里去。二十多天后开学了，好几天都不见算数郭老师。吃饭时笔者问“大哈哈”张老师：“俺郭老师上哪去了？”

他一改往日嘻嘻哈哈，满脸严肃中带着几分怯意，低声说：“打成右派了……”我也低声问：“你不是说给领导提意见吗？咋着他成了右派呢？”他低声答：“谁知道呢，小孩子别管那么多闲事儿！”我又困惑了。

在笔者心目中，郭老师是仅次于语文梁老师的“第二好”老师。他教我们特别认真，从来不哄着孩子玩儿；讲课又特别“好玩儿”：把分割符“，”叫“蛤蟆蝌蚪儿”；谁要是把小数点儿点错了，就说“你这颗麻子长错地方儿了！”当然，正因为他“较真儿”，对不认真学习的也生真气儿。但是，从不大声训人，而是总爱说些曲里拐弯儿的蹭话儿“刺恼人”，让人心里难受久久忘不了。不过，笔者学习还行，从没挨过他刺恼，所以一直挺尊重他。也许是他把“太较真儿”和“爱刺恼人”的习惯错误地用到“党的领导”身上了？反正最终成了“戴帽儿右派”。

当时，学校还有个“大少爷”赵老师，整天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像猫儿舔的，天底下谁也不如他“能”，谁也不如他“有觉悟儿”，守着领导“净充那仁蛋的”，小嘴儿说话叭叭儿的。领导不在时，却净爱跟什么红什么兰的“小妇女儿”乱哄哄。他不仅没成“右派”，听说还成了“反右积极分子”。不久，郭老师回来了，还是教我们算数。但是，明显地没精神儿了，态度也绵软了好多，再也不刺恼人了，对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也变得和蔼可亲宽容大度多了。然而，讲课却远不如以前那么生动活泼了，一本正经的枯燥乏味，让人直打哈欠……“好老师”弄得不好了，“坏老师”更没有个老师样儿了，只隔了二十多天麦秋假，咋着就弄成这个样儿了？这到底儿是咋着弄的？

第四节 高小生——听说“反右斗争”

此时，二姐已是乐陵一中的中学生了，回家后陆陆续续向我讲了许多她们学校“反右斗争”的奇人趣事。真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见了），太新鲜了！也许笔者骨子里的“邪气儿”太重了，对她讲的那些事记忆特别深刻。大概还有个原因：她从小“挺挺，不吃屈

儿”，每当我被大孩子欺负吃了亏时，她常常充当我的“保护伞”。笔者虽然经常不买她的账、与她犟嘴，故意“气死她不偿命”，那主要是因为上学后总是考第一，父亲又经常夸奖她而把我贬得一文不值骂个狗血喷头。弄得我精神压力挺大，捞不着无忧无虑地好好玩儿。因而，在潜意识中形成了对父亲的对抗情绪和报复心理，企图通过打击他的“好典型”来反抗他的“不公道”。其实，我心里一直挺佩服二姐像父亲那股不要命的劲头儿，也一直把她当成“学习榜样”努力追赶。从高小儿追到中学，从中学追到大学。不管咋说，反正对她讲的那些“抓右派”的事儿印象特别深刻。

1. 两个“右派”老师

乐陵一中是周边好两三个县的最高学府，大概已经具有开展政治运动“独立单位”的资格了。不论是“开门整风”还是“反右斗争”，都是“上级指示与本单位实际紧密联系”，因而运动也相当激烈。一些走出学校门儿不久涉世未深的年轻教师，头脑中装着太多理想化的是非标准和愤世嫉俗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距离社会现实和“领导”要求差得远了去了，简直是格格不入。他们只知道“凭良心教书，凭本事吃饭”，不懂得“会干的不如会演的，会演的不如会舔的”，更不懂得“爱护领导就是爱护自己”的道理。平时只顾认真教书绝不误人子弟，对领导却自视才高八斗绝不同“舔腚溜沟子”，甚至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拿领导不当块咸菜”，常常鸡蛋里头挑骨头。“开门整风”会上给学校党支部书记提了不少意见，实质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阴谋要共产党下台”。这样的人不是“右派”谁还能是“右派”？

在批斗“李右派”的会上，积极分子质问：“你为什么对党支部领导不满？是什么思想？”他高声答道：“共产主义思想！”在历数了他反对党支部书记的“罪行”后又质问：“你除了要共产党下台还能是什么主意（企图）？”他更高声回答：“爱国主义！”……可见，“右派分子”是何等猖狂，阶级斗争又是何等激烈！（笔者听得出，二姐的话儿中对她的老师颇有几分同情和敬佩）。结果，他成了“极右派”，

劳改后不知发配到哪里去了，反正是到笔者上高中时一直无缘得见。

还有一个叫×国良的语文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原因是：他在课堂上讲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讲到杜十娘怒斥孙福和李甲后含恨投河自尽时，已是热泪纵横泣不成声，竟振臂高呼：“杜十娘万岁！”这还了得！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能“万岁”，喊杜十娘万岁岂不是把共产党毛主席和妓女弄到一块去了吗？太恶毒了，十足的“右派”！

也许是他运动中不太猖狂吧，到笔者念高中时，他劳改期满后回到一中继续教语文。然而，像二姐所说的那种激情却荡然无存了，他在课堂上四平八稳一身庄重，目不斜视满脸神圣，充满了“冷静理性的光辉”，却干巴得像根“柴禾棍子”。结果，只上了两三堂课，就被同学们强烈要求“下课了”。笔者更是由失望化为恼恨：“活该！这样的人就应该是右派？”长大后才渐渐明白：这或许就是“在党和政府的教育挽救下通过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吧？

2. 老校长成了“老右倾”

从“反右斗争”开始，学校领导也急剧分化了。乐陵一中的前身是中共渤海区的“渤海一中”，其实是“干部培训班儿”。自从老校长王耀华主教后，逐渐正规化成了山东省重点中学。他是个慈祥和蔼却不苟言笑的老头儿，对学生特别好，对老师却特别“厉害”。谁要是不好好儿教书或“没有个老师样儿”，叫他逮着了就没完没了决不轻饶。他还培养了一个“白专干将”任万善（不知道当时是什么职务），二姐称他“任老师”；到笔者上高中时学生都称他“任主任”，反正教导处主要是他管事儿。至于“老头儿王主任”，平常很少见他，只有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才给我们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样的校长和主任自然是爱才如命，难免“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以至于，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面前，“立场不坚定包庇右派分子”或“对右派分子恨不起来”。因而，他们后半生几乎都没有任何“进步儿”。老校长成了全县有名的“老右倾”，终老于离休

前的校长职位上。“任主任”也从此谨小慎微小心翼翼，虽然忠于职守、狠抓教学、成绩显著（升学率领先），却一生“运交华盖”官运不畅。尤其是，因为培养出了笔者这样一个“四人帮爪牙，造反派儿坏头头儿”，文革后的仕途就越发举步维艰了。

有人在其位不谋其政、多拿薪水少干事、不干好事干坏事，有人却把自己的社会责任太当回事儿了，总是“没事找事干”以无愧于“人”（包括党员、干部、教师等“社会人”）的称号。“任主任”就属于后一种人。真不幸！他也有意无意地把这种“没事找事干”的坏毛病传染给了他的学生，本书或许也是受他“不良影响”的产物吧。

同期，还有两个“书记”，一个是党支部书记，一个是团委书记。他们当然是“反右斗争”的中流砥柱了，在大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右派分子”和“类右派分子”坚决斗争。不久，党支部书记成了县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在以后的运动中“继续发扬革命传统，经受住了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一步一个台阶儿步步高升，最后成了党的市委副书记。当然，笔者只是记录一种社会现象，绝无丝毫毁师谤祖之意，而且，对所有混出个人样儿来的老师们，都由衷地庆幸和祝福。在学生心目中，老师是“精神父母”，即使居官也理应是最好的，起码是比那些无德无才、无知无能却后台坚挺的官儿们好得多吧？

第五节 笔者与二姐“大分化”

对于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乃至整个国家而言，“反右斗争”具有名副其实的“划时代伟大意义”：它使穷酸秀才们终于懂得了“夹起尾巴做人”虚心向工农兵学习麻木不仁、安分守己的“顺民精神”；文化教育事业也真正确立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方向——绝对服从坚决维护各级党政官员当权派们的权威，对基层党政组织“现管”更要唯命是从。

谁也不会想到，正是以“反右斗争”为起点和契机，在某个乡野农村的两个同胞兄弟之间也发生了“大分化”，各自选择确立了今

后的人生道路和一生命运。也许正像母亲所说：二姐“太精、太棘棵儿、太不吃屈儿”了，而笔者却“太傻、太轴、太撞到南墙不回头儿”了。同样是面对变幻莫测、纷纭复杂的政治运动，同样是面对“政治风向”糊里糊涂地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斗争”的惊天大逆转，同样是面对父亲说不清道不明地多次“被运动”的痛苦记忆，两人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和选择。

二姐认为：什么政治，太可怕了！哪有什么正事儿？离它越远越好！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理性至上论又导致了理科至上论。对文史哲等政治近亲课程的态度也冷淡起来了，觉得这类东西公说公有理儿、婆说婆有理儿，远不如数理化那样有真理儿、正理儿，不论大官儿小民，任谁都不能胡说八道。因而，对文史哲即使认真学，也是为了获知应对考试；对数理化则是玩儿命地学，而且着迷得不得了。结果，如愿考上了山东大学数学系。虽然托文革的福毕业后改行搞了大半辈子电子线路技术工作，但是，凭她那股“拼命三娘”的劲头儿，最终还是小有成就，荣获了共产党员、省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等不少“红帽子”。

而笔者却沿着自己的心路走向了另一股道儿。也许是从小儿就“太野，太爱凑热闹儿”了，拟或是皮小子天生的冒险精神所致，反正是政治运动越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就越是对它感兴趣，越想凑过去看看，弄明白到底儿是咋回事儿。就像儿时听“鬼故事”或看抬死人入殓那样，越凶险越吓得一口气儿跑回家不敢回头儿，就越爱听爱看。对于“整风反右”这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越是血糊淋拉不知道谁死谁活，就越觉得够刺激够味儿、提情绪来劲儿。最终，情感刺激至上论导致了文科至上论，觉得与文史哲相比数理化总嫌不够劲儿，给人的自由发挥空间太小了，因而太单调乏味儿。人人都必须按照一样的公式定理和术语腔调说事儿，譬如“1+1”，天底下的人谁都得说等于“2”，否则就是错。而文史哲就自由的多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不大受规矩（别人定的）限制。心里难受就哭、高兴就唱、生气就骂，反正是“嬉笑怒骂皆文章”；只要是真情实感就是好作品，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是好

文章。傻乎乎的野性和悲天悯人的小资情调儿再加许多客观原因，使笔者从上初中开始就特别喜欢文科。

然而，迫于家庭高压，却不由自主地走了一段“弯路”，考上了山东大学化学系。多亏文革把我“从理科泥坑里挽救了出来”。由此，又决定了一生历尽坎坷碌碌无为的命运，也终于看懂想通了“领导们”冠冕堂皇的猫儿腻。（起码自我感觉如此）

第五章 大跃进中的“五风” ——是为民谋福利，还是为官造政绩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民党台湾政府“反共复国”的威胁基本解决以后，究竟什么是共和国存在发展的主要危险？绝不是什么“已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阴谋”，而是：政治体制不完善所导致的国家法权控制能力弱化和国民民权监督缺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官僚权贵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和疯狂的持权抢劫。“前文革时代”主要表现是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而“后文革”——“邓式改开”时代，主要表现则是疯狂持权抢劫。

“前文革时代”的胡作非为，又可分为政治领域的胡作非为和经济领域的胡作非为，前者的典型当属 1957 年“反右斗争”，后者的典型则是 1958 年刘、邓等大官们乘“大跃进东风”刮起的“五风”。

邓小平篡国上台后，复辟的新官僚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们，却把刘、邓胡作非为的历史罪责统统嫁祸于毛主席和大跃进，尽显其政治流氓的庐山真面目。

第一节 大跃进的异化

1956 年—1957 年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因为主张“放宽限制的开明实验”，犯了“纵容自由化的严重政治错误”，遭到了从中央到地方整个新官僚政要们的抵制和反对。教训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于继续革命的基础作用。当老百姓为一日三餐填饱肚子而发愁时，不可能有闲情逸致关心国家大事，没有肚子需求的满足就不可能有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而且，发展经济造福于民原本就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他们

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组织召开了一系列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比较客观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指标。

当时，笔者还是“高小毕业生，干么么不中”的孩提时代，对于国家大事尚一无所知。但是，老师遵照上级指示，经常让我和“春来”到附近村里用白粉子刷大标语，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农业发展纲要》。至今，还清楚记得一句：（粮食两季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乐陵先打头一炮！”

由此可见，毛、周所倡导的大跃进并不缺乏科学态度，更没有犯什么“头脑发热的极左错误”。尤其是，大跃进对于推动中国工业现代化功不可没。

那么，1958年全国性“吹大牛，胡说八道；瞎指挥，胡作非为”的“五风”是如何刮起来的呢？这是困扰笔者多年的一个问题。后来终于明白了：应当到上层建筑干部——最强大的新官僚权贵中去寻求答案。

史实证明，国家发展大跃进是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1958年周总理深受启发欣然接受，并得到毛主席的赞同。当时，毛主席已经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总理主持国家党政日常工作。作为延安“整风运动”时刘少奇的手下败将，周总理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毛主席曾一度想把国家主席职位让与他）。这难免引起了刘少奇的警觉，感到“接班人”地位受到了威胁。于是，他又一次采取了“合作化运动”时的成功经验——形“左”实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要避免自己的“接班人”地位被周恩来取而代之，就必须表现得比他更“大跃进”。而邓小平，在“反右斗争”中体验到了刘、邓、彭“铁三角”的强势，进一步把赌注押给了“即将登基的储君”，与刘少奇相互勾结一唱一和，积极为“储君亲政”招降纳叛。后来，他在游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时说：“刘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了，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要尽力争取嘛……”等等，完全暴露了他追随刘少奇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卑劣动机。

另外，“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使各级权贵政要一扫“三反”“新三反”和“开门整风”运动时的压抑和憋屈，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情舒畅，焕发出了巨大的积极性。正如刘少奇所说：“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革命运动”，必将“转变为无穷的物质力量”。他利用一切会议，大肆鼓吹“大跃进”“供给制”“公共食堂”“土法炼铁”，并吹嘘：“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不仅“大跃进”口号气势如虹，而且政治势头如日中天。

在各级当权派新贵心目中：毛主席刚刚犯过“纵容自由化”的严重政治错误，差一点儿让“右派分子的反革命阴谋得逞”。与一贯“坚持党性原则，维护全党利益”的少奇同志相比，其权威性和神圣光环早已今非昔比了。当时，一句顺口溜传遍了穷乡僻壤的大街小巷，成了笔者家乡人妇孺皆知的民谣：“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它反映出了一种政局新动向：毛主席的领袖权威和“控制系统”失灵了，中央高端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权力重心正在悄悄转移到刘少奇一方。

吴芝圃、李井泉等各省大员乃至各级当权派新贵们以为：“毛泽东时代”即将结束，刘少奇正式接班“亲政”的日子即将到来。他们同样深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奥妙，何况还有“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更有少奇同志的训示：“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故而，纷纷决心为开创“刘少奇时代”建功立业，为大跃进冲锋陷阵。

于是，一场“干部决定一切，肆意运动群众”的“大跃进”——实乃胡作非为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其势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

第二节 “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

在许多人心目中，文革可谓“疯狂年代”了。然而，在笔者记忆中，与1958年大跃进时期“五风”的疯狂相比，文革实在是小巫

见大巫自叹弗如。因为，文革中的疯狂是“疯狂追求”，绝大多数人都理智清醒，不论动机高尚还是卑鄙，不论行为正确还是错误，起码人们都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而1958年“五风”，则是完全丧失了理智，除了大官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党和政府究竟要干什么？

当时，报纸上曾登载过华君武的一幅漫画，题曰“热昏”。画的是：蒋介石戴着“牛屎帽儿”躺在热气腾腾的澡盆儿里昏昏欲睡说梦话——“反攻大陆”。后来，笔者常想：这幅漫画如果把“反攻大陆”改成“大跃进”或“共产主义”，就是对当时各级官员们心态和言行的真实写照。作为十二、三岁的孩子，当时不懂得什么中央与地方、部分与全党、政府与国家的区别，认为：县委指示就是“党的指示”，《大众日报》、《人民日报》就更是党的正宗声音了。反正是各级领导嘴里的粮食产量和豪言壮语日新月异，调门儿越来越高亢。

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开始时是从上到下“层层加码”，产量数字一级比一级高，所有任务期限却一级比一级短。在全县“比武打擂”会上，县委号召“奋战100天，实现共产主义！”并将披红戴花的大红马奖给了“亩产小麦10万斤”的打擂者。到了黄夹公社，“刘书记”则发出更伟大的号召：“奋战40天，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当时，笔者为此豪情满怀了好一阵子：“俺咋恁有福？竟然生在了最先进的省最先进的县最先进的公社！”到了后来，层层加码变成了上下互动，省委也不甘落后了，亲自树立了两个典型，并在《大众日报》头版赫然登载：寿张县“小铁牛队”种出的地瓜“一块儿重达260多斤”，范县“范秀兰铁姑娘队”更是“亩产小麦百万斤，完不成任务不结婚！”笔者的自豪感让“大跃进”风暴刮得无影无踪了，反倒为家乡的落后感到心里沮丧脸上无光。

今天，人们越来越明白了，这种热昏胡说的“浮夸风”的风源，就是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官儿们！据《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载，当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省视察时说：“（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如此谈话绝

非一次、两次。而邓小平在视察东北三省时则说：“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 100%以上”，否则“就不是用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良的办法领导农业”，就是“思想还没有解放”。

只可惜，毛主席尽管一再向各级官员“泼冷水降温”，但强龙难敌群蛇，“大跃进”狂风难以禁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以刘、邓为首的新官僚权贵们胡说八道胡作非为了。

第三节 干部决定一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当时，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本儿上有一首新民歌：“天上没有玉皇，海里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或许是当时刘、邓、彭等新官僚权贵“干部决定一切”心态的真实写照。正是在这种心态主导下，为了驳斥“右派分子”诬蔑共产党搞经济建设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谬论，发誓要创造出人间奇迹，让全世界看看（或许，也为了用事实对“削弱党的领导，纵容自由化”的毛和周进行“再教育”）。

1. 胡作非为“共产风”

当时，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政经合一的共产主义”了：家庭是“私有制的毒瘤”，当然在彻底消灭之列。“锁门运动”将所有会喘气儿的活人一律赶到“集体宿舍”——野外“窝铺”（草棚）里去住。家庭不存在了，家庭生活也就随之“自然消亡”了，一切生活用具用品都一律收缴充公，为了“支援工人老大哥大炼钢铁”，除农具以外，所有锅铲瓢勺等炊具以及金属制品都一律集中送往城镇“炼钢基地”。连大小铁锁、门镣吊儿、橱柜门鼻子、抽屉拉手儿等等，都被反复清剿无一漏网。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将妇女阶级姐妹们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让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走上集体化康庄大道，享受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

2. 挥动鞭儿(政治权力)响四方

在笔者大半生经历和记忆中，没有任何一次运动能像“大跃进”时那样，对农民“发动”得如此彻底、“组织”得如此严密、“运动”得如此得心应手。被赶到田野里的所有人，阶级差别、分工差别统统消失了，按照性别年龄分别组成了“武松队”（男壮劳力）、“罗成队”（半大小子）、“花木兰队”（黄花儿闺女）、“穆桂英队”（大小媳妇）、“老黄忠队”（老头儿）和“佘太君队”（老婆儿）。各队都规定了劳动场所和宿舍区，一般是一个队在一块儿地干活儿，住一个大窝铺，铺上柴草席地而眠。而且，都是比邻结庐结伴劳作，声气相应“农歌互答”，绝不会村东村西分割独立。否则，既不利于“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也不便于开展“劳动竞赛”，更不利于领导一拨儿接一拨儿没完没了地视察、检查和参观“取经”。

当然，一些规章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如“不准私自离队、串队”等等。如果谁偷看或私闯了“花木兰队”和“穆桂英队”的窝铺，就是“道德败坏，流氓成性”，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游队示众。对此，最有意见的莫过于“武松队”了：“这叫么事儿？两口子捞不着干事儿，咱还不如那狗猫哩！”当时，笔者父母已近天命之年，因操劳过度而苍老不堪，分居于“老黄忠队”和“佘太君队”的宿舍里。星期六放学回家，笔者要见他们必须“分别会见”。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上级领导不再来检查、视察为止。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就全交给公共食堂了。开始时，吃的是“共产”来的粮食；秋收后，自然是大伙儿种的大伙儿吃，收了什么吃什么。在这场“儿童游戏”中，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了，真是从未有过的热闹好玩儿。尤其是，每当上级领导来视察、检查和参观“取经”时，总是提前通知。食堂里一接到通知，也总是又蒸饽饽又炖肉，像过大年似的。孩子们真是天天盼望上级领导来检查，“给我们带着幸福来！”当然，也有“落后分子”总爱在阴暗角落儿里吹阴风，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刮风下雨不知道，个人的家底儿不知道吗？有多少粮食架得住这么穷折腾？”

真可惜，好多事儿总是让“落后分子”说中了。没有白面饽饽

吃了，不管孩子们如何盼星星盼月亮，上级领导的检查团、参观团连一个也不来了。后来，棒子窝头也没有了，顿顿吃地瓜；连吃带糟践地瓜也没有了，只好组织人到处去捞“札菜”（水草）清炖着吃。最后，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公共食堂也“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在消亡了所有生活资料以后，美好幸福的“共产主义”也随之消亡了。

3. 从上到下演大戏

“白天红旗招展，夜晚灯火通明；人欢马嘶，热火朝天……”，这是对当时“新气象”的描绘，也是各级党政喉舌念叨得最多的。然而，这一切并非自然形成的人文景观，更不是人民群众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充分涌流”的结果；而是各级官员人为制作的人造风景。是他们通过“对群众能量加以组织和驾驭”（刘少奇语）而创作导演的闹剧。创作工具就是政治权力的皮鞭，创作方式则主要有二：一是从上到下层层“评比”，鼓励“敢想，敢说，敢干”，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二是从上到下深入基层、层层检查，“插红旗，拔白旗”，鼓励先进、督促落后。当时家乡民谣：“县委领导走一线（沿公路和大路以车代步），公社领导地头儿站（视察目测）；村队干部满地串，大声吆喝加油儿干。”如此一来，中看不中用“驴粪蛋子表面光”的形式主义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成了最时髦最行之有效的行政措施和光荣传统了。

第四节 农民都傻了，嘻嘻哈哈挺开心

“五风”创造的另一个“人间奇迹”是把自私落后自由散漫的农民彻底驯服了。面对各级官员吹大牛胡说八道、瞎指挥胡作非为，他们完全懵了，来不及思考，来不及抱怨，或者完全麻木不会思考、无心抱怨了。面对自己的劳动血汗和生计命运被父母官们视若粪土任意糟蹋，他们已经毫无知觉不知疼痛了，甚至，连最起码儿的喜怒哀乐、好恶情感和是非观念都没有了。最后，在麻木中连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祖训和美德也忘了个一干二净，“响应党的号召”跟着各级领导，疯狂糟蹋自己的血汗和生存希望——粮食和其他农产

品，不仅不心疼，而且，竟然边糟蹋边嘻嘻哈哈傻笑。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脊梁沟子冒凉气儿。

或许天老爷也被运动糊涂了，给了“大跃进”的人们一个百年不遇的大丰产。然而，各级领导们的“革命豪情”却导演了一场“丰产不丰收”的悲剧，而跑龙套的群众演员正是农民自己。其一，“物质极大丰富”的连粮食都不愿意收了，用镢头刨地瓜嫌费事，就用双铧犁耕。露在地面的捡起来；埋在土里的“谁有闲工夫儿扒拉它们！”到了耩麦子时，满地的大地瓜蛋直绊脚，气得干活的人一边骂一边用脚狠狠踢开。……到了第二年春天“翻粮运动”时，经受不住严冬考验而腐化变质的冻地瓜，却成了多少人救命的美味佳肴。其二，“共产风”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自愿将棉花无偿地贡献给国家，送往棉花加工厂。然而，路远费力“不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便干脆贡献到了半路的苇子湾里。冬天，拾柴禾的老头儿发现了，同样是“大公无私，路不拾遗”。因为，谁也不愿意往自己腩后头安一条“瞒产”的尾巴，给“翻家队儿”以铁证而给自己找不素净。其三，公共食堂的“大锅饭”给了人们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即使到了以地瓜为主食的阶段，也是有的爱吃黄瓢糖心儿的，有的专捡红皮儿干面的，掰开一看不如意就随手一扔“去他娘的”了。有的老娘们儿心疼捡起来，怀揣腰掖地偷偷拿回家切成条儿或片儿，扔到房顶上晒成熟地瓜干儿。到了以水草为主食的阶段，竟成了孩子们解馋的“好儿好儿”，“顽固坚持私有观念”的母亲就曾干过如此勾当，让笔者也有幸享受过如此口福。

第五节 学校被大跃进扭曲了

不久，“大跃进春风”吹进了学校，“停课闹革命”。一是“大炼钢铁”——各班都建起一座“炼钢炉”，分两班儿轮流上阵“歇人不歇马”，以保证“热火朝天夜以继日，炉火正红照彻夜空”。二是“科学种田”——各班都建立了一块“高产卫星田”，日夜“深耕土地，合理密植，科学管理”，希望像“超英赶美”那样，超过本县最高单产（亩产小麦10万斤），放一颗“大卫星”。

所谓“炼钢炉”，就是用砖头垒的像富裕人家做饭取暖用的大号煤火炉子。燃料，没有煤只有木柴；炼钢工具，没有鼓风机，只有手拉风箱；轧钢工具，就是铁匠用的铁锤和铁砧。而原料，既不是铁矿石，也不是废铁，全都是老百姓“自愿上缴”的铁锅、铁铲子、铁饭勺等等完好无损的炊具和其他生活用具。

所谓“深翻土地”，就是一排挨一排地挖沟，大约有一人多深，反正是没过了笔者头顶。我们二班除了参加过省运动会的“大个子”史万林能自己爬上来，其他人要上来换班，必须让别人拉上来。而且，质量检查制度相当严格，不断用皮尺或标准木杆儿仔细测量，以保证上级规定的深度。含腐殖质的熟土被深埋到了地下，沉睡千万年的胶泥和生土却“翻身得解放”。结果，良田变成了颗粒不收的“生眼子地”。所谓“合理密植”，则是将 400 斤麦种几乎一粒挨一粒地摆到每亩地里。结果，麦苗破土而出，棵棵比牛毛还苗条。后来，听了附近“老保守”农民的话，又一棵一棵地薅掉“社会主义的苗”，只留下百分之几的“先进分子”，这才开始分蘖盘墩。次年麦收时，恨不得把每一粒麦子都捡起来。经过精确计算，亩产小麦比麦种整整多了 70 多斤。为了“热烈欢呼伟大胜利”，敲锣打鼓热闹了好一阵子。

第六节 《石壕吏》“新传”

老天爷送给人们百年不遇的大丰年之后，不知敬畏、胡作非为的“各级领导”却给老百姓制造了百年不遇的大粮荒。1959 年春，天谴如期而至！

母亲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勤俭持家：一是勤，闲不住，实在没活儿干了，就一遍又一遍地扫“屋当场子”，擦堂柜、桌椅、茶壶、花瓶、粉妆盒儿。……气得父亲抱怨：“屋当场子叫你扫得比当天井凹老大一块，一下雨就往屋里灌水；有点儿财气儿也全让你扫拉出去了！”二是俭，过日子细，年景再好粮食再多，也从不铺着吃盖着睡。逢年过节蒸饽饽、包包子都分三种并做上记号儿：孩子们正发个儿，吃净面的和肉多的；父亲下力气干活儿，吃掺一少半儿白棒子面的

和肉少的；她自己则吃一多半儿白棒子面的“菜篓子”。平日，窝头陈了坏了也舍不得扔。坏得轻的经过“高温消毒”蒸透了再吃；实在不能吃的就让它长满“黑毛儿”，然后晒干轧碎，续到酱瓮子里同化成酱。而且，所有这些行为，还都有理论支撑：“整天养屁晒盖地闲坐着，还过么日子？”“糟蹋东西有罪，折寿！”“省囤尖儿不省囤底儿！”父亲多有微词：“把一分钱都攥出水儿来！吃了疼得慌，让老鼠盗蹬了不疼得慌！”正是凭着母亲勤俭持家和父亲没命地干活儿，使家庭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多次饥荒，并供养出了二姐和笔者两个大学生。

谁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家也因此成了“屯粮大户”，从此不得安宁了。三叔家却是，有了就换着花儿样地吃，吃没了就到处要“救济”，要不来“救济”就去要饭儿；甚至把孩子送人，“让他逃条小命儿去”。

1959年春，粮荒越来越严重了。为了创造政绩向上级交差，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生命安全，各级官员日益加大了“反瞒产私分”力度，开始挨门挨户儿一遍又一遍地“翻粮”，一旦翻到就全部没收充公上缴政府。像三叔家那样“不过日子”的户儿自然安然无恙，“翻粮队儿”路过他家门口也从来不去，还开玩笑：“不行，他家也得进去翻翻！”于是，“哄队大笑”。然而，笔者家却理所当然成了永久性重点查抄对象，每次翻粮都难逃法网。

记得一天五更头儿里，角门儿（院门）外传来砰砰砰的砸门声，夹杂着大呼小叫的吆喝声。全家人都被惊醒了，父亲披着衣裳出去开门，涌进来五、六个人，二话不说就翻箱倒柜地查抄起来。真不愧是“翻粮专业队”，炕席底下、灶火膛里、枕头里、花瓶里……，无一处遗漏，那股彻底劲儿恨不得挖地三尺。母亲争辩说：“你们前两天不是刚翻过吗？哪还有粮食啊？俺又不会生粮食下粮食！”最后，还是把母亲藏在柴禾垛里的最后半口袋棒子（玉米）抄走了，大获全胜凯旋而归。母亲说，其后来又来“翻过八百六十四遍”，连炕洞子都揭开了，再也没缴获到任何“战利品”。

笔者对这次抄家翻粮遭遇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或许是笔者“对

社会不满的阴暗心理”与杜甫“诬蔑大唐盛世的反动思想”一拍即合吧？到读高中时，不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外，每当读到杜甫的《石壕吏》，脑袋里总是浮现出这次抄家翻粮的情景，还偷偷模仿着习作了半篇：五更觉正香，有吏来翻粮。老翁披衣迎，老妇动哭腔：“只能生孩子，不会下食粮！日前已翻过，家无半升糠”……

谢天谢地，多亏当时就销毁了。否则，必定难逃文革中多次被抄家的法网，成为笔者“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狼子野心”的铁证。

第六章 漫长的“三年自然灾害” ——“1962年的右倾”

古语云：“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能活。”1959年的饥荒，不过是一个信号或预警，老天爷对中国人愚昧野蛮“原罪”的惩罚还在后面。

刘、邓等精明的新官僚权贵，为了开脱自己的罪名，将“五风大跃进”的人祸与老天爷的天灾搅和到一起，统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乎？人祸乎？苍天有眼，民心有知！

其一，天灾不假，人祸更不可否认。1958年百年不遇的大丰产，如果不是被“五风”吹跑刮没了，应付几年饥荒根本不成问题。正如家笔者乡民谚：“十年九不收，收一年吃十秋”……

其二，老祖宗“天人合一”的思想告诉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要尊重自然规律顺天应时而动。当天灾来临时，则要“听天命，尽人力”，努力减轻天灾程度。然而，我们的各级“父母官”们，却惯于唯上唯命是从，无视天道民意，胡作非为、制造人祸；天灾降临后，却“怨天不尤人”，毫无自责反省精神，“五风大跃进”时“人定胜天”“干部决定一切”的豪情荡然无存。

第一节 经济困难与政治危机

新官僚权贵“五风大跃进”疯狂的“穷折腾，折腾穷”，不仅把国民经济的家底儿糟蹋殆尽，而且，将国民的积极性和生命力折腾得奄奄一息。一场讨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否定大跃进”的政治斗争，又把整个民族仅有的一点清醒理智和复苏希望彻底消灭干净了。其后，国家便进入了半休克状态。面对饥饿，连内忧也变得有气无

力了。而外患却乘虚而入，苏联控制中国的阴谋受挫后，便乘人之危“撤援逼债”。真可谓内外交困、民生凋敝、国运衰颓。然而，社会机体休眠了，国家上层建筑“神经系统”的病变却仍在继续。

从“开门整风”到“反右斗争”，最大受害者无疑是民权先觉者“文化人”，而继续革命者毛主席及其反对官僚化的同盟者周总理，则成了共产党内的最大失败者。在“右派分子”失去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同时，毛、周也因“纵容自由化”而受到了新官僚权贵们的质疑和非议，失去了相当大一部分权力和权威。奇怪的是，引领“大跃进”潮流的，既不是分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不是掌管全局的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然而，他们却成了“人祸”的主要责任者。其中，周恩来是“擦屁股者”，而毛泽东，则成了代人受过的冤大头。

作为平民领袖，毛主席不乏爱民之心和与民同甘共苦的情怀，自己带头连同子女，与全国人民一起节衣缩食共赴国难。同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向全党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第一责任”，以期君臣同心同德，深刻反省政策失误。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自我批评不仅未能感动刘、邓、彭等与他一起深刻反省，反倒为他们提供了推脱责任的口实。

刘少奇除了代表中央总结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仅对自己在“五风大跃进”中的错误言行未做半句自我批评，反倒图谋嫁祸于毛、周：“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同时，勾结邓小平，扣押了吴芝圃给党中央的报告（如实反映刘少奇向他鼓动浮夸风的两次谈话），并加紧非组织活动，私下串联密谋煽动，为“储君亲政”招降纳叛。吴芝圃仅仅是揭露出了冰山一角，“七千人大会上，L某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L某。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L某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L某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

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L某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王任重还向我透露：一旦L某成为党中央主席，就让另一个人取代周恩来当总理（按：吴所说的“L某”即刘少奇，“另一个人”即邓小平。）。还有，“七千人大会”前夕，彭真组织了专门班子，秘密翻检查阅大跃进以来所有的中央文件和讲话记录，收集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言论”，以作为大会上揭露他们的“炮弹”。结果，一无所获。其后，他又利用所控制的《前线》杂志等舆论工具指桑骂槐，毛、周遂成了“五风大跃进”的祸首和诅咒对象，成了愚昧贪婪最终鸡飞蛋打的“贪心傻老婆”（详见刘、邓、彭御用文人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三家村”的《燕山夜话》）。

然而，纠正刘、邓一手制造的“五风大跃进”极左人祸，却未能回归于毛主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事求是路线，而是又成了他们“巩固民主主义新秩序”的大好机遇。他们利用主持一线工作的控制权，利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机会，全面推行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政策。在农村，强制推行“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向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反攻倒算。在工厂，“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是毛主席早在1960年就充分肯定高度赞扬的，并正式载入1961年“工业七十条”。刘、邓、陈（云）等却顽固抵制，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的“马钢宪法”（厂长负责，专家治厂，物质刺激，烦琐的规章制度，严格分工，禁止群众性技术革命）。

毋庸置疑，1978年开始的“邓式改开”及其“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什么“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而完全是1962年刘、邓等人所坚持的资本主义道路变本加厉的复辟。

第二节 父亲挺不住病倒了

敬畏上苍！1960年原本十年九旱的家乡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

洪水，多日的连阴雨停了，洪水却不见退去。漫坡遍野一片汪洋，除了“绿梆子”“花花南瓜”等青蛙和癞蛤蟆等“土特产”，粮食和其他庄稼却颗粒不收。

秋天，笔者与二姐到自留地里刨地瓜，像筷子粗细的地瓜，俩人一上午也刨不了半筐子。谢天谢地！地瓜秧子却长得绿莹莹水灵灵一片，煞是喜人。开始，还挑拣嫩地瓜叶柄蒸着或煮着吃。到了冬天，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了，挑挑拣拣的“穷毛病”也改了，将整棵地瓜秧子晒干后碾碎了当粮食吃。

父亲一生都以向别人（包括政府）伸手为耻，或许正是这种秉性，使他与母亲惺惺相惜、患难与共、至死方休。他卓越的先见之明，在维护了“不为五斗米折腰”人格尊严的同时，也有效地拯救了妻子儿女。眼见洪水毫无退意，庄稼绝产已成定局，当别人天天找村干部要救济时，父亲第一个奋起“生产自救”。不知从哪里讨换来一些“玉谷”种，天天拄着棍子扛着铁锨踢水到村边寻找露出水面的坡顶、崖头，播种下“希望的种子”。

同时，面对生存危机的压迫，他也不得不放弃大半生的信仰，将闲置了十年之久的“土改胜利果实”——刘家那四分园子地——正式接收过来，全部种上了“玉谷”。地处村里最高处怕旱不怕涝，越涝越有收成。“玉谷”又是一种耐涝且早熟的农作物，最后收获了二三百斤。虽然无法与粮食相比，但总是比地瓜秧子、棒槌子好吃多了。

父亲的辛勤汗水换来全家人生存的希望。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父亲劳动果实和全家人生存希望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父亲累倒了，并因此过早地丢掉了他那质如金玉，贱比草芥的性命。

秋后的一个夜晚，父亲突然恶心、肚子疼，折腾了大半夜，呕吐了好几次，足足有大半尿盆子，随后就昏昏入睡了。母亲为了省油，一辈子都把煤油灯严格控制在豆粒儿般大小，屋子里非常昏暗。父亲呕吐时，谁也没看清更没在意他吐了些什么。他昏睡以后，母亲端着油灯到外间屋，凑近尿盆子一看，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笔者听到动静出来一看，心也凉了半截，父亲呕吐的东西黑中透红呈暗

紫色。……然后就是四处请先生搬大夫，扎针吃药折腾了大半夜。父亲却丝毫不见起色，仍是昏睡不醒。天亮了，乡亲们用牙床子绑扎成土担架，涉水将父亲送进了县医院。

从此，母亲带领我们开始了雪上加霜的日子，一边忍受着难以忍受的饥荒，一边倾尽一切家当换钱，并四处“扒窟窿，拉饥荒”，抢救父亲的生命。谢天谢地！父亲终于又活过来了。虽然他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自己也受尽了疾病煎熬，经由胃出血——水肿——肝腹水——肝硬化——肝坏死，最终油枯灯灭脱离苦海，结束了他坎坷不幸多灾多难的一生。他用最后的气力陪伴母亲和我们度过了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用他秋风游丝般的那口气儿和饱经忧患而豁达大度的胸怀，为家庭支撑起一线希望。

第三节 母亲与小妹成了“末等公民”

家庭得以逃脱这次天灾人祸，大姐也功不可没。作为“国家人”工人，她每月有 31 斤定量口粮和 30 元工资，对于一个二十来岁的大闺女，根本谈不上富裕。但是，她却节省下每一分钱，资助家庭给父亲治病。有时，整月工资一分不留全部交给母亲。还经常勒紧裤腰带从肚子里省出馒头和窝头，带回家给父亲增加营养。她自己每天都只吃两顿饭，而且顿顿吃咸菜。在姊妹四个中，真正对父亲尽了孝道从而遗憾最少的当属大姐了。

然而，最不幸的是挣扎在灾难深渊最底层的母亲和不满十岁的小妹。母亲分配粮食的标准由三种改为四种：好点儿的留给病中的父亲，一般的尽量让笔者和二姐带到学校里；剩下的一点儿又做成两样，粮食稍微多点儿的野菜窝头和地瓜给年幼的小妹吃，母亲自己则吃多少有点儿粮食粒儿的“菜糠勾”和胡萝卜。如此分配制度坚持了四五年，直到笔者上大学和父亲去世。

在一般人心目中，“又要马儿快快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最不人道的了。然而，那时的母亲和小妹，却是“草料吃不饱，还得加紧跑”。为了“堵窟窿”还债并维持父亲吃药治疗，母亲和小妹一边忍饥挨饿，一边还要没日没夜地干活儿。冬天，村里生产自救搞起

了鞭炮作坊，一些零活儿承包给家庭，插十个“鞭信子”能挣一分钱。母亲和小妹为了多挣一两毛钱，数九寒天在不见火影儿的冰冷土炕上，围着被子干到鸡叫。小妹饿了，母亲就给她拿个生胡萝卜当“宵夜”。所有的水都冻成了实心儿冰，只能用抹布擦一擦就吃。冰凉的甜润和着泥土的苦涩一起下咽，为继续劳作“补充营养”。后来，大姐生了大外甥女，因为生于农历六月“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节，父亲给她取名“荷香”。大姐夫从军，大姐一人料理不了，便寄养在我家，当时还不满两岁。饿了就向母亲要吃的：“姥姥，吃干儿！”母亲从竹筐子里拿出一片儿生地瓜干儿递给她。那是从粮站供应的每人四两又黑又瘪的地瓜干儿中挑出来的、白生生的“婴幼儿食品”。

当然，如此生活不只是我们一家。几年过去，原本百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减少了十几户：光棍汉宋西珍、张春山母子病饿而死，其他的全家下了关东。三叔和我家十四口人也减少了三人：祖母年老先走了，五弟年幼“养不活”送人了，父亲刚刚熬过最艰难的岁月于1965年“含笑”离去……

第四节 豆青狗“摇摇儿”饿疯了

还有那只豆青狗，它是笔者与大堂弟从小喂大的，一生连个名字都没有。或许是因为它在家人面前一天到晚地摇尾巴表示亲热吧，像乡亲们召唤他们的狗一样，两家人都喊它“摇摇儿”。它身材魁梧虎头虎脑，能驮着儿时的我走十多步，在方圆五里内各村儿的“狗好汉”中打遍天下无敌手，曾经有过以一敌三大获全胜的纪录，为我们挣足了面子。笔者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去外村儿上学，不论放学早晚，它都在村头儿等着接我回家。上初中后，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久别重逢就更亲了，每次接到我，先是飞快地跑过来，连蹦带跳地围着我亲热几圈儿，再抬起前腿搭在我肩膀上，伸出长舌头在我脸上狂吻乱舔一通；然后，飞快地跑回家去给家人送信儿。接着又跑回来与我亲热一顿，再跑回家去送信儿。如此往返两三次，直到我进了家门儿为止。

而且，还不仅如此，灾荒年月，难免盗贼蜂起。自从“摇摇儿”长大后，父亲和三叔就再也用不着提着棍子围着院子“打更”了，两家人不知多睡了多少囫囵觉。盗贼也曾光临过，“摇摇儿”都以自己特有的“热情”欢迎过他们。它不叫不闹，悄悄地迂回过去，猛扑上去一口咬住，然后才边撕咬边狂吠，呼唤家人“快来抓贼！”如此，只重复了两三次，就英名远播成了大贼小偷儿闻风丧胆的“恶狗”。

然而，它却没能熬过灾荒年月的饥饿。开始时，它饿得到地里逮田鼠和蚂蚱吃，甚至吃青草和麦苗。“狗拿耗子”成了事实，犬科动物也异化成了食草动物。后来，饥饿使它越来越疯狂、越回归于祖先的野性了。先是在本村捕食邻舍儿家的鸡，后来又捕食邻村的绵羊或山羊；最后，竟捕杀起同类来，二十来斤重的半大狗一口就拦腰咬断脊骨。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小时候常听老人说：灾荒年，狗吃死人吃红了眼儿。……可怜的“摇摇儿”，竟然也落到了这步田地。最终，被受害的“奸人”给毒死了。

“摇摇儿”去世的直接后果是：不到一个月，母亲在小东屋儿房顶上晒得半干的百十斤小枣被贼人划拉了个精光。俗话说“涝梨旱枣儿。”洪灾中收获这些枣儿实在太不容易了，更何况那是大灾之年全家唯一能换钱的希望啊！全家人谁也没吃早饭，父亲坐在小板凳上一袋接一袋地抽闷烟，母亲和大姐则发疯似的轮番爬到房顶上去“骂大街”。

别人家丢了鸡鸭之类的东西爬到房顶上骂大街时，是拉着长调抑扬顿挫地“数落”，程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天晚上“寻物公告”：“迷糊到谁家一只红脖子母鸡去呀？婶子大娘说给俺吧……”第二天晚上“严重警告”：“跑到谁家一只红脖子鸡去呀？它常在你家门口儿刨食儿吃俺可知道呀，你要是昧起来，俺可要卷（骂）你了……”第三天晚上破口大骂：“你这个没爹下的呀！你黑心烂肠子地昧起俺那鸡来，你要是吃了，全家人都噎死！你要是卖了，去给你娘包药吃吧……”

母亲和大姐一辈子也没有这种艺术素养，只会直着嗓子扯破喉

咙叫骂，直到声嘶力竭嗓子全哑了为止。这是我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房“骂大街”。

第七章 饥寒交迫求学路

1961 年笔者考上了乐陵一中高中，成长的快乐不必细说。重要的是，继二姐之后又给了病重的父亲和苦难的母亲一点儿精神安慰。

笔者与全家人最艰难的高中求学生涯开始了。不过，也有一个有利条件，二姐凭着她“拼命三娘精神”和“双手提笔绝技”，成了乐陵一中的“校级好学生”。笔者因为是她弟弟，也受到了领导和老师的格外关心呵护。

说来好笑，二姐“双手提笔”是让父亲骂出来的。她从小儿拿笔、拿针、拿剪子都是左撇子，在父亲严格管教下才渐渐学会了用右手写字。不过，一离开父亲的“法眼”依然顽固地我行我素。尽管如此，在荒远偏僻孤陋寡闻的乡村，已是远近闻名了。因为，所有说书唱戏的，每当夸奖状元郎才高八斗时，都离不开“双手会写梅花篆”。不管咋的，二姐与我高中同学仅一年，我还是“兔子跟着月亮走——沾了不少光”。

第一节 “白专道路”烦恼无限

“加强党的绝对领导”的政治需要，导致“突出政治”成了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原则。一切社会生活都被带上了冠冕堂皇的政治“红帽子”或“白帽子”，学生也不例外。当时，学校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为祖国而努力学习！”然而，处在“九地之下”的农村孩子，不管嘴里喊什么政治口号，其实谁心里都明白：“为祖国？小老百姓穷学生够格儿吗？”不过，能否努力学习、通过淘汰制升学考试、最终升入大学，则是实实在在地决定着：是跳出“九地之下”成为吃国库粮的“公家人”，还是像父辈那样一辈子“修理地球，在

土坷垃堆里刨食儿吃”。所以，私下里，同学们都把升学考试尤其是高考戏称为“两种命运的决战”。

尽管如此，在几乎所有学校的教育实践中，仍然将党政官员们的政治标准，强加于毫无政治权利和参政机会的青少年学生。在极力用政治“笼头”和“缰绳”驯化的同时，也把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划分为两种类型或两个等级：一曰“又红又专”，二曰“白专道路”。它将学生追求真、善、美的道德情操和理性精神，简单化为对各级党政领导者的忠诚和服从程度。凡是有点独立思考习惯的学生，凡是因思想个性化和现实批判精神较强而对领导不太唯命是从的学生，凡是性格内向贞静自守而不能与学生干部打成一片的学生，统统被斥之为“骄傲自大”或“白专道路”。

笔者天生的“轴子”性格，当然难逃“白专道路”之列。虽然每门功课成绩大都是“5分”，却不仅自己不刻苦，反倒常常在背后讥笑学习刻苦而不讲究效率的同学是“热恋课桌，难分难舍”。虽然学习成绩不错，却不遵守课堂纪律，常常在课堂上看闲书，让老师逮个正着。尤其是，与“学习先进，政治落后”的学生过从甚密，对“政治进步，学习吃力”的班干部和老团员不理不睬，骄傲自大目无领导。如此学生不是“白专道路”，谁还能是“白专道路”？笔者的政治生命也一直半死不活，在入团问题上屡屡受挫，无论怎样努力，也“经受不住组织的考验”。除了“白专道路”，还有两条原因：一是父亲“有严重历史问题”；二是“政治落后，思想阴暗”。

尤其后一条，既是笔者迟迟达不到“团员”标准的原因，也是“誓死捍卫组织纯洁性”的老团员反对我混入团组织的永久性理由。当然，他们手上有充分的证据——鄙人半篇陋文。当时，“假话风”已相当强劲，不准学生讲真话心里话，逼迫人们打官腔、唱赞歌，满口混淆黑白的套话、假话。记不清是受到什么外界刺激了，反正是愤世嫉俗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又一次大暴露，笔者写了半篇杂文，其中有一句：“当你看到父女通奸时，千万别忘了赞美神圣纯洁的爱情……”那时，还没有到报刊上“放毒”的野心，无非是自我发泄以舒缓心中怨怒之气罢了。胡乱写了几句，随手夹到课本里，

随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知何时，被“政治觉悟高，热心关心同学”的一位老团员“捡”了去，从此便成了笔者“政治落后，思想阴暗”的铁证。感谢杨振国（校团委组织委员）和王永祥（班长），他们耐心指点和努力疏通，动员我向“老团员”表示了衷心的谦恭和感谢，才得以在高考前三个月随最后几个新团员搭上了“组织发展”的末班车“混入了团组织”。

实话实说，当时的入团动机并不纯洁：为了保证高考命中率，不得不争取一项红帽子。然而，对青年学生中蔓延起来的那种“没事找事，整人治人”的风气，内心深处非常反感，大大冲淡了荣获“共青团员”桂冠的喜悦。

第二节 最难熬的还是饥饿

因为累进或叠加效应，连续两年的灾荒其破坏性显得更加严重了。吃饭，完全依赖国家供应的每天四两地瓜干，即使母亲和小妹一点也不吃全部省下来，也无法满足笔者与二姐的需要。更何况，父亲重病缠身，小妹年仅九岁，难道能为了自己活着而让父母和小妹饿死吗？所幸，挨饿的不只是我们一家，所有同学都没有多大差别。

为了保护学生身体健康，学校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取消了晚自习，让学生尽快进入梦乡。可是，老师们不知道：十五、六岁的孩子们，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还火烧火燎丝丝啦啦地疼，根本无法入睡。还不如专心致志忘我学习更能缓解饥饿的折磨。俄罗斯作家契克夫曾在一篇小说里写道：“睡梦里是不想吃东西的。”就因这句话，他在笔者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大为失色，心想：“此人肯定没挨过饿！”二是课外活动组织学生到城外地里捡拾地瓜叶子、萝卜缨子、白菜帮子等充饥。每天早饭后第一项“功课”就是：将课桌盖儿翻过来，用铅笔刀将它们切成寸段儿，然后装进蚊帐布缝制的袋子里，集体送到伙房里蒸熟，供午饭时填饱那“不听党的话”的肚子……

从1959年未满14岁到1964年未满19岁，连续五年饥饿，把笔者培养成了“饕餮”！在大一上学期五个月里，竟然吃了360多斤粮食。大学生每月口粮定量31斤，尚有农村连过年都吃不到的大鱼大肉；离家前，母亲又给了我100斤粮票，那是大姐一家人从嘴里省出来的。二姐定量也是31斤，她一天最多吃3两饭，省下的饭票全给了我。就这样，每天上午不到11点还是饿得双手发抖、浑身出虚汗、说话气短，要讲完一句话必须换好几口气。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饥饿状况，更可以想见父母和小妹承受着怎样饥寒交迫的熬煎！

第三节 两难选择——考文科还是考理科？

1964年自然灾害稍有缓解，高中三年的饥饿求学之路也看到了头儿，高考临近了。除了像其他同学一样面临着“两种命运的决战”，笔者还多了一层专业选择的犹豫和烦恼。原因是，我各科成绩都不错，老师们都希望我选择他们各自的学科，众说纷纭弄得我无所适从。不过，我内心深处早已有了自己的选择——文史哲。自上初中开始，笔者受殷荣臣和沈玉璋老师“毒害”很深，一直真心喜欢文史哲。对其他各科都是“用心不动情”，唯独对文史哲却是“用心又动情”。然而，在二姐的强行干预下，不得不屈服于家庭责任，在高考前四个月，违背自己的意愿，放弃了文史哲，专攻数理化。

1. 二姐哀求，无法抗拒

在笔者高考的专业选择上，全家人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二姐那样看得“重如泰山”。由此可见，她对我这个弟弟的爱心和重视。成人以后，虽然因为她“干涉我的自由”比父亲还霸道，难免抵触情绪，但是，每当回忆及此，对她就不能不油然而生出几分敬畏和亲切。

为了学习，她经常放假也不回家，笔者高考前的那个春节，山大一放假就急急忙忙赶回家，整天缠着我交换意见。像儿时一样，我们自然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她先是劝说：“不论是咱的家庭条件，还是你这臭脾气，都不适合从政当官儿。”我反驳道：“我压根儿就

不想当官儿，只是想从事理论研究。”她说不服就恐吓：“大学与中学不一样，学生也兴打右派！”并举了好多例子。我不以为然：“那有什么！我追求真理，难道枪毙我不成？我不怕！”恐吓不住，她又“耍赖”甚至哀求：“你不能只顾自己愿意！你是唯一的男孩儿，是全家的希望，你要是出了事，父母咋活下去？还让我们过不过？”

至此，笔者真是无言以对了。不过，心里仍是半信半疑：“有那么严重吗？社会不至于黑暗到那种地步吧？”直到她寒假到期返校，我也没答应她改变主意弃文从理。

返校后，她又一连写来四封三、四页的长信，最后一封几近于苦苦哀求声泪俱下了，并表示：如果我还固执己见，她就请假回来，当面哀求我。

2. “请将不如激将”

如此仍不放心，她又专门给“任主任”写信，拜托他一定要说服我改变主意报考理工科。

“任主任”毕竟是老教育工作者了，深谙青少年尤其像笔者这种“犟眼子”的心理特征。他既不讲大道理劝说，更不强迫命令，而是慢声细语商量中潜藏着激将：“人们大都认为，数理化拾不起来的学生没办法才考文史类；你坚持要考文史类有点儿可惜了，是不是数理化学得不扎实没把握？”

其实，笔者早已不想再固执己见了，否则，真的无颜面对父母和二姐了。再加校领导如此一激，潜藏的“潮气儿”又冒上来了，心想：“担心？笑话儿，考理工科照样没问题！”遂于高考前不到一百天中途变卦，下决心“弃文从理”了。

命运不可违！至此，在不知不觉中，笔者沾满泥土芬芳的双脚尚未挣扎出“九地之下”，其中一只就已经迈进文革的门槛了。正是临秋末晚地中途改志愿，使我忍痛放弃了“用心又动情”的文科，违心地选择了“用心不动情”的理科。以至于，高考成绩不理想，文理两科都不优秀，没能考上北大，而考入了山东大学化学系。或许是因为培养出了一个“全国学联副主席”（化四赵淑敏），文革中

化学系高年级大师兄、大师姐们起来造反的极少。“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矧子里面拔将军”，遂使我这大二的毛孩子“木秀于林”成了“出头儿的椽子”，被革命洪流一步步推上了“坏头头儿”的位置。如果读文科，莫说北大，即使山大文科各系，造反派大师兄、大师姐也是高手如云，我这两下子根本就排不上号儿，压根儿也涌现不出来。文革后，笔者经常与二姐开玩笑：“是你硬把我推上了文化大革命祭坛！”

第八章 “四清运动”

——“1964 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

中国终于度过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经济萧条和生存危机，主要得益于：一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的党政权贵们，在休眠状态中安定了下来，除了应付自身和民众的饥饿考验，再也没有余力挥舞政治权力的魔杖、靠胡说八道和胡作非为来创造“轰轰烈烈的人间奇迹”了。二是，毛主席发动并坚持把“中苏论战”进行到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和不畏强暴的气节，演绎出又一幕以贫抗富、以弱敌强、宁折不弯的悲壮。以凛然正气的大无畏气概，给了饥饿中的人们精神振奋和信念鼓舞。从而，弥补了物质生活资料的严重匮乏，缓解了刘、邓“政策失误”所导致的民心沮丧和冤、怨、怒“三气”，正所谓“精神变物质”。

然而，人毕竟是人，不会停留在满足肚子需求的水平上。肚子的需求一旦满足，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也随之复苏。

第一节 “社教”运动——阶级斗争与继续革命复活

经过建国后十五年曲折起伏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冷静沉思，毛主席对新生官僚化趋势的严重性，体验感受和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当国家经济状况一有好转，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存需求，就立即转向了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继续革命实践探索，决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然而，自 1957 年“反右斗争”以来，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早已风光不再，“社教”运动开始不久，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再一

次尖锐化公开化起来。毛主席首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邓主持制定的“后十条”，却说：“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基层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中”。这无异于宣布：“社教”运动的重点，不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要整那些队官儿、村官儿等“四不清农民”。

同时，经过十五年政治斗争大风大浪的锻炼，新官僚权贵们也早已今非昔比，政治斗争经验成熟得多了，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因势利导转移斗争大方向。“四清”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利用对运动的实际控制权力，坚决贯彻执行刘、邓的“后十条”，上演了又一场“大官儿整小官儿，官员运动群众”的闹剧。城里“吃皇粮的洋干部”浩浩荡荡开赴农村，大张旗鼓地对生产队长“庄稼汉当权派”搞起了“严峻的阶级斗争”。似乎，农村不是在共产党新贵们“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的范围内，农民的苦难也全是生产队长们“四不清”的罪责，与他们这些“青天大老爷”没有丝毫关系。

更有甚者，他们遵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发扬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传统，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地下工作”，大搞秘密串联、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发誓要“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虽然作态作秀洋相百出，却堪称成功经验。最后，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终于使“社教”运动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毛主席继续革命实践探索再一次被他们强行奸污。

第二节 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教育”

大学生的第一课是“阶级斗争教育”。其实，这种教育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除了听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忆苦思甜”，就是看《刘树梅忘本回头》《年轻的一代》等戏剧和电影。内容无非是：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人，受“资产阶级小姐老婆”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丈母娘”的腐蚀教唆，忘记了旧社会的苦难和党的恩情，对新社会的幸福生活不满，不想当“驯服工具”和“螺丝钉”，不安心领导交给自己的神圣工作，一心想着“打野鸭子卖钱，穿148元的毛料裤子”；或者贪图享受，不服从领导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等

等。

其中，坏人个个都是出身不好的；变坏的又个个都是政治觉悟不高的普通老百姓。而领导，则个个都是正气凛然的圣人，是拯救老百姓灵魂的天使，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走上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之后，又把他们从“罪恶心灵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带入了美好的心灵天堂。

显然，其教育目标明确而专一：对党和政府（新官僚权贵）要知恩图报感恩戴德，要坚定不移“跟党走，听领导的话”，安守本分做“党的驯服工具”。

当时，像其他年轻人一样，笔者也是热血沸腾心潮难平，听到或看到动情处，更是热泪盈眶，甚至泪流满面。并暗暗发誓：一定要听党的话，艰苦朴素、刻苦学习，将来加倍报答党的恩情。然而，后来读了点儿马、列、毛的书，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老百姓听当官儿的话，整天唯命是从、磕头作揖，就能避免“党变质，国变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吗？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好事的决定因素是干部，坏事的决定因素咋就成了老百姓呢？

第三节 大学的“阶级斗争教育”

笔者虽然考上了化学系，学习《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无机化学》等课程时，却依然“用心不动情”，只是按老师要求“理解掌握”就万事大吉了。课外，除了到图书馆看各种报刊争论文章，就是读些《马克思传》以及莎士比亚、卢梭、巴尔扎克等人的书。化学系迁到新校新楼以后，除了听课与做功课，几乎天天泡在文科各系图书阅览室里。读书越多，头脑中的疑问和困惑就越多，脱离群众跟不上时代步伐，另类思想也越来越多了。

1. 女护士画像——“蜕化变质”活典型

当时，化学系是全校的阶级教育先进单位，在老校二号楼地下室开办的阶级教育展览更是成了全校新生阶级教育的课堂。实物展

品，无非是学生扔掉的大半个馒头、尚能穿的破袜子旧鞋，等等。笔者刚从饥饿与贫困中走出来，自然觉得触目惊心义愤填膺。但是，真正印象深刻而终生难忘的却是一幅素描画。作者是三年级一位大师兄，画的是一个穿高领毛衣、戴护士帽的年轻女护士头像。解说词大意是：思想阴暗，蜕化变质，满脑子“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等。

对此，笔者当然不会再冒潮气儿发表异见，但是，内心却实在不敢苟同：《大学生守则》是规定“不准谈恋爱”，可是，男人画女人就“腐化变质”了？猫还叫春、狗也知道交配呢。再说，护士不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白衣天使”吗？陈铁军、周文雍的革命爱情不也是革命文艺的主题吗？青年马克思还与燕妮热恋过呢，并且说：“爱情的痛苦就是幸福。”他也曾因为热恋中分别而“不安心革命工作”。……他不照样是革命导师吗？

2. 第一次见到“右派学生”

当时，辅导员还与学生同吃同住，再加“我们的今天不过是他们的昨天”，因此对他们感到既亲切又敬重，有不明白的事总爱向他们请教，最早知道了一些大龄学生的缘由。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被“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赶出校门的工农子弟；另一类是经多年的劳动改造而“改造好了的右派学生”。

对前者，笔者只有杞人忧天的同情：老婆孩子一大堆能安心学习吗？对后者，尤其对物理系一个既瘸又瞎的残疾“右派学生”，内心深处无限同情的同时，还多了几分因未知而诱发的兴趣。我与他同住一个宿舍大院儿在一个食堂同吃一锅饭，每当进进出出相遇时，总想打个招呼问问当年“反右斗争”的真相。不过，“政治觉悟”和“理性精神”总是能战胜好奇心；为了“未来的美好前途”，终于未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关于他的诸多“？”，在数十年中却一直挥之不去。家乡人常说：“瞎子狠，瘸子刁，一只眼的不中交。”他是如何成为“右派”的？那条瘸腿和那只瞎眼究竟是“右派”的成因，还是“右派”的收获……

第四节 “社教运动”——运动群众

不久，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由学校第二把手、校党委孙汉卿副书记做动员报告，他号召大家：要警惕懒、馋、贪、占、变，拒腐蚀永不沾，与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1. “阶级斗争严重性”——往陌生女人腩上“抹浆糊”

孙书记在报告中，列举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最严重最震惊全校的莫过于“往陌生女人腩上抹浆糊”了。事件经过是：学校图书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职工，在百货大楼排队买东西，也许是与前面那位漂亮女人的漂亮屁股太亲密无间了，致使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大暴露”，“那玩意儿”不仅硬邦邦地顶到了那漂亮女人的漂亮屁股上，竟然还“抹了人家一腩浆糊”。当然，他本人也尝到了派出所“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更严重的是，他给“社会主义大学”和“人类灵魂工程师”抹了黑。孙书记讲到“抹浆糊”处，主会场和笔者所在的分会场都哄堂大笑，我也概莫能外。

但是，事后又冒潮气儿钻起牛角尖儿来：“资产阶级”家里有三妻四妾，外面还有情人和妓女“婚姻补充”，他们才不会干这种傻事呢！再者，个别人“抹浆糊”就能抹黑“社会主义大学”？难道败誉毁校、亡党亡国的危险出自个别群众“抹浆糊”？简直是拿阶级斗争开玩笑！娶妻生子以后，连事件的真实性也半信半疑了：“跑马溜溜的山上”只能偶尔发生在沉睡的梦中；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竟然也能如此，比《红楼梦》里的“瑞大爷”还厉害！可能吗？

不过，不信归不信，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终生不敢或忘。在其后的数十年中，不论是排队买饭、买东西，还是乘车、上船，只要前面是女的，不论老少丑俊，宁可让后边的人把我挤死，也不敢与她亲密无间；而是拼命保持一定距离，并始终保持收腹撅臀姿势，以免“抹浆糊”之嫌。

2. 学兄闻丁罗——漫画揭露批判对象

化学系的“社教运动”在宿舍区全面展开了。运动的最大特点：一是运动对象全是青年学生；二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按照“校党委——系总支——辅导员”的组织体系层层贯彻；由辅导员组织学生积极分子，形成“革命中坚力量”；三是运动方式以开会发言、大字报、漫画等为斗争武器，口诛笔伐向落后学生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揭发大批判。其中，重点对象之一是“化二”的闻丁罗。揭露他“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漫画贴满了宿舍走廊的半面墙壁。

笔者之所以印象深刻，原因有二：一是叹服，艺术水准太高了，惟妙惟肖颇得漫画家方成先生真传；二是失望，政治水准太低了，揭露的内容既无反动思想，也无反动言论，更无反动行为。有的只是：爱计较小里小气，洗脚时浪费热水；碎嘴子说三道四，总喜欢自吹自擂。……笔者第一印象是：什么阶级斗争？无非是山东大汉眼里的“上海小瘪三儿”！纯粹是无事生非“上纲上线”闲扯淡。

3. 第一次挨了两大张“大字报”

几天后，笔者了有生以来也第一次挨两大张“大字报”。多年迷恋文史哲的狂热首次得到报偿，尝到了“阶级斗争”和“革命大批判”的滋味。

笔者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二：一是“公然对抗学校不准谈恋爱的规定，在光天化日之下，与×××频繁来往眉来眼去……”其实，当时我与老同学山工学生×××（前妻），已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一个尚处于“进城初级阶段”的小土包子，有贼心也无贼胆，除了想家而热衷“老乡见老乡”的集体串校聚会，以及恋人之间眉目传情，绝不敢公然违抗《学生守则》。二是“恶狠狠地用脚踢学校的排球，发泄对国家财产的不满，就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其实，此前不久，笔者在报栏里看到了一篇关于足球的报道，还配有一幅照片，那是平生第一次知道：除了用手玩儿的篮球、排球，还有用脚玩儿的足球，自然感到新奇。一天课外活动，便在宿舍院儿

里用排球模仿着体验了一脚足球的感觉。结果，竟然成了“严峻的阶级斗争表现”。又是无事生非闲扯淡！

第五节 大学生“四清工作队”

1965年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抽调在校大学生和青年教师组成“四清工作团”，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任“挂名团长”，奔赴农村和工厂开展“四清运动”。据领导说：这是党对青年学生“最大的关怀和信任”，为了把他们培养成“革命事业接班人”，理应“到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其后多年里，笔者总觉得这种说法难免冕堂皇的假话之嫌。真实原因恐怕是：其一，农村与农民问题远离上流社会和政治中心，对各级领导的政治生命影响不大，难能成为“日理万机”领导们的重中之重，因而无暇顾及。其二，农村实在太贫穷落后了，生活诸多困难，不便于领导开展工作，却非常适合知识分子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为了“培养下一代”，各级领导义不容辞把“学习锻炼的大好机会”让给了青年学生。其三，知识分子虽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但与农民的封建落后和生产队长的“四不清”相比，可能“反动”的稍微差一点儿，可以担当“四清运动”历史重任。

谁知道呢，反正山大不少教师和学生都奔赴了农村或工厂的“阶级斗争第一线”，二姐所在的数学系四年级学生也在其列。她和大师兄、大师姐们讲述的情况，笔者对如下几点印象深刻。

1. 秘密串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地下工作”

工作队出发前，省委领导按照刘、邓的“后十条”精神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向队员们介绍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为了“保证队员人身安全”，防止“阶级敌人疯狂报复”，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一是不准单独外出，离开驻地时必须两人以上结伴活动；二是所有人一律隐姓埋名，代之以化名——非本姓的“老张、老李等”。

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桃园经验”，“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秘密

串联发动群众。不仅专捡风高月黑夜深人静时悄悄走门串户“访贫问苦”，而且，每次都有严格分工，有的与贫下中农交谈，有的在门口站岗，有的在院外放哨，严防走漏消息。与小说上所描述的解放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别无二致，真可谓“一片白色恐怖”！听起来惊险又刺激……

然而，后来却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当年，共产党是无权无势的弱者，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反动统治阶级，既要闹革命又要保住自己的脑袋，不得不采取地下秘密活动。如今，共产党早已成为手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了；山东省还有十几万军队、警察等专政工具，对付几个庄稼汉“老巴子”生产队长“当权派”，用得着如此神经质的如临大敌吗？他们能不能当队长、支书，还不是公社领导一句话、县委领导一个电话的事儿？

又一场故弄玄虚演大戏！

2. 村支书，多吃多占、乱搞妇女

二姐所在的工作队派驻荣成县石岛公社某渔村，经过近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虽然没能搞出什么政治不清和组织不清，却搞出了大队支书多吃多占的经济不清和乱搞妇女的作风不清。笔者听说后顿觉索然乏味大失所望。

对前者，笔者在家乡时，早已司空见惯了。开始时，队长分地瓜根本不敢自己多分，常常是把破的小的先分给社员，把大的好的留到最后分给自己。后来闹粮荒时，为了减轻老婆孩子的饥饿，有的队长和保管员才穷极生疯偶尔从仓库里往家背“公积粮”。然而，与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权贵政要大官们相比，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对后者，笔者倒觉得“问题严重”，并困惑了多年。结婚生子后懂得了：那与其说是农村“阶级斗争的严峻性”，不如说是渔民的自然现象。其一，他们多食鱼虾，难免营养过剩；与肠子闲着半截的笔者家乡人相比，性欲自然强烈的多，饱暖思淫欲嘛。其二，青壮年劳力下海打鱼，一走就是数月或大半年，有的甚至有去无回。守

活寡的大有人在，年轻寡妇也不少。村里只剩下“公务缠身”不能出海的村干部，难免男人短缺供不应求。……按照今天的“现代化”标准，那位大队支书没准儿还能成为“模范共产党员”呢。他既是“解放思想”的先驱，又是“先进性教育”的典范，更没有像今天的“人民公仆”那样为了实践“三个代表”肆无忌惮地用公款吃喝嫖赌。

3. “清组织”——贫下中农决不答应！

运动后期，“为了把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从四不清生产队长当权派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开始“清组织”撤换领导班子。不料，如此革命举措却遭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强烈反对，让“四清工作队”既尴尬又茫然。按照农民的说法：“现在的干部已经“搂满了”，剩下的只是日常吃用，再搂也搂不了多少了。如果撤换他们，新上来的再从头儿搂起，那得多少东西才能喂饱他们啊？”|可怜的老百姓，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大学与中学最大的差别在于：消息灵通耳目开阔。各种各类报刊应有尽有，而且随时能借随处可读。不像中学时代那样，看张《参考消息》还得去教导处，借口“请示汇报”回来时“顺手牵羊”，看完后再偷偷放回去。消息灵通的必然结果是心扉洞开思想活跃。

笔者一进大学校门，就置身于“学”与“批”的信息海洋里了：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禄，批电影《早春二月》、批“合二而一论”、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真可谓眼界大开目不暇接。

第一节 “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

也许因为哲学是“科学王冠上的宝石”吧，笔者从中学时代就特别喜欢它。到了大学，对“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也最感兴趣。

说实话，不论当时还是后来，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笔者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论错误。今天就更认为：就人们的实际感受而言，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论”更强调“分”、“对立”、“斗争”，而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则更强调“合”、“统一”、“依存”。二者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只有相互兼容、融会贯通，才更能大道归一表述对立统一。

理由很简单：其一，自然界是如此——化学的全部内容就是研究物质“分与合”的变化规律和方法，现代称“分解与化合”，过去称“化分与化合”。其二，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开篇即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三，精神世界更是如此——人类思维无非是“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过程：分析，

以保证认识的深刻性和精确化；综合，以保证认识的完整性和本质化。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笔者成了既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和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虔诚信者，又是“调和论”、“中庸之道”或“中间道路”的坚信者。在实践上，崇尚“失势不矢志，得势别得意”，特别讨厌“要么彻底革命，要么诅咒革命”、“得志便猖狂，失势就骂娘”等等。信奉“要打人，首先准备挨打；要‘打碎旧世界’，首先准备被旧世界打得粉碎。否则，好事儿都是你的，坏事都是人家的，凭什么呀？”

在不久以后的文革中，这种价值观念和思想基础又决定了笔者与众不同的造反之路：既是坚定不移的造反派，最终有幸“僭越”成了山东省40几个“三种人”重点清查对象之一，又是“混入造反派队伍的机会主义分子”；既是“鲁大主义兵潜伏下来的二线人物”，又是“鲁大的叛徒、出卖‘主义兵’的儿皇帝”，等等。在曾经无限忠诚于斯的“党组织”和患难与共的造反派战友心目中：笔者既是“野心家”，又是“阴谋家”，更是“两面派”。

第二节 政治斗争导致学术理论价值异化

自古以来中国的事情太纷纭复杂了！多年以后，笔者才渐渐体会到并想明白了：其实，学者的理想追求在于学术理论的真理性，而新官僚权贵利用学术理论的动机和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或许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杨献珍本人只是学人，用“合二而一论”质疑或补充“一分为二论”，只为追求哲学理论完善，并无“反毛”政治目的。其二，他本意就是要为刘、邓、彭“铁三角”对抗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而冲锋陷阵，借题发挥从哲学理论上打开缺口，通过理论问题的争论向毛主席的权威挑战，为刘少奇“储君登基”鸣锣开道。

这两种可能性，不论哪一种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反正是正好符合了刘、邓、彭等新官僚权贵对抗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的政治需要，因而成了他们“彻底巩固”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和舆论攻

势。

建国以后，尤其是1957年“开门整风”运动以来，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使共产党新官僚们逐步认识到，他并非“无产阶级”或“共产党”的理想代表！尤其是从“开门整风”到“反右斗争”的大逆转更证明了，毛泽东并非不可战胜的！正是基于这两点判断，整个新官僚权贵阶层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各种方式，反对和抵制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路线。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百官”与“国君”的矛盾冲突和冷战对抗，已经演变为对毛主席领袖权威的公开挑战了。

第三节 “时代精神汇合论”与阶级斗争理论

与北京的“合二而一论”遥相呼应，南京的周谷城先生也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其实质是“合二而一论”在社会发展理论上的应用，或曰“合二而一的社会发展论”。

1. “时代精神汇合论”与“百花齐放”相通相合

显然，它不仅符合社会发展的文化多元化及其“优势互补，协同进化”等民主原则，而且也符合生物界的多样化客观规律。笔者至今依然认为：周老先生不大可能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只是学人的学术见解和社会理想罢了。它对社会主义民主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官僚专制及其“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的思想钳制和舆论一律，也是一种理性或理论批判。

在“时代精神汇合论”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关系上，笔者坚定不移地信仰“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在社会漫长的常态时期，斗争的动机和目的并非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更不是一部分人消灭另一部分人，而是通过合理竞争促进“协同进化”。理应“大道归一”：在坚持多样化兼容并存的基础上，通过阶级斗争促进优势互补，合理竞争与充分合作相统一，共生共进与优胜劣汰相统一。

2. “时代精神汇合论”无法掩盖和取代阶级斗争现实

社会理论与政治实践毕竟不是同类东西，二者不可能完全等同或相互涵盖。二者的差别和距离，导致了理论价值的灵活性、“超政治性”乃至“超阶级性”。

然而，在中国这样官本主义主导的社会中，赋予了学术理论太多的政治属性，致使其工具性特征特别突出。同样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学说，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即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正是基于这一点，刘、邓等为了对抗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充分利用了“时代精神汇合论”对阶级矛盾统一性的肯定，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掩盖政府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新官僚权贵与平民大众的矛盾，进而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最终，使共和国决策层的思想分歧，演化为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分裂对抗与殊死较量。

3. 新官僚权贵的阶级本性和政治目的无法否认

在理论层面上和实践层面上，如下三种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其一，新官僚权贵绝非“时代精神汇合论”的信仰者，而是它的利用者。他们绝非民主政治的代表者和追求者，而是“苏联模式”新官僚专制的维护者。他们与毛主席之间的矛盾绝非民主与专制的矛盾，而是“官僚专制”与“君主专制”的矛盾，是政府与国家的矛盾。

在马克思所说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三者的关系问题上，他们反对毛泽东的“君主政体”和“君主专制”，绝不是为了实现民主政体和民主政治，而是为了彻底巩固新官僚权贵的贵族政体和官僚专制。他们对毛主席最难以容忍并拼死反对的，并非他的“君主专制”，而是他经常站到平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立场上，鼓吹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堕落到“对共产党当权派造反”的地步。

其二，刘、邓、彭权贵政要们绝非毛主席“搞突然袭击”的受

害者，而是与毛主席长期较量的对手。而且，自1957年“反右”以来，他们不仅越来越人多势众，而且，对毛主席“反修防修”的继续革命路线，越来越由自发的排斥演化为自觉的对抗了。毛主席“逼上梁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决策层缔造了“毛司令部”（“毛、林、周联盟”），与刘、邓、彭“铁三角”相抗衡。并绕过了官僚权贵集团党政旧组织体系，构建起“君民一体，对抗百官”的政治斗争新格局。这才从根本上扭转了悬殊的政治力量对比，使他有能力与整个新官僚权贵文官集团较量一场了。

其三，究竟是要“彻底巩固新政权”，还是要“通过继续革命不断改革不合理上层建筑”？国家高端（中央决策层）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愈演愈烈，一场生死较量，已经“箭上弦，刀出鞘”了。连笔者这样无知的青年学生，也隐隐嗅到了一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息。

第四节 学术就是学术，政治就是政治

对于“一分为二论”与“合二而一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与“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之间的争论，今天进行冷静反思，在充分肯定其不可避免或必然性的同时，笔者进一步明确而坚定地认为，其中有不少教训值得汲取，主要是：学术就是学术，政治就是政治。前者属于理想理论范畴，后者属于政治实践范畴，二者不可能无限地融会贯通，更不应当人为地强行掺和与扭合。

当时，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与新官僚权贵彻底巩固路线之间的政治斗争引入学术理论领域，这是由历史传统决定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其缺陷和弊端显而易见：片面强调学术理论的阶级性、政治性及其工具价值，忽视其真理性、科学性及其本体价值，致使学术理论沦落为只是阶级斗争乃至政治斗争的“棍子”，失去了本应具备的本体价值的科学性、严肃性和神圣性。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这种“光荣传统”被全部继承下来，并发展到了极致，演变成了社会科学界和学人的普遍风气和“中国特色”——流氓化、娼妓化、无耻化！以至于，现在要查找点共和国翔实

可信的史料数据，只能去翻检《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或许也是中国学界乃至整个民族的悲哀。

第五节 思想认识无法改变阶级属性

二十多年的出身经历和成长过程决定了，在全国性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中，笔者不可能“听党的话，跟领导走”，站到新官僚权贵当权派一边。而是与无权无势的平民大众一起，坚定不移地站到毛主席继续革命旗帜下“造当权派的反”。而且，这种阶级立场选择，绝非在别人蒙蔽利诱或强力胁迫下糊里糊涂地跟着跑，而是在冥冥之中一股不由自主的力量推动下，心甘情愿地自觉选择。换言之，这种选择，既非像各种批判会上所说是笔者“篡党夺权狼子野心的大暴露”，亦非仅仅基于权衡利害得失的“理性思考”。而是，既有与生俱来的“犟眼子”性格基础，也有“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感冲动，更有学生时代所学习吸收的各种思想理论“流毒”。当然，当时的认识还非常浅薄和朦胧，大都是一知半解或似是而非。但是，它毕竟为笔者文革中的“造反之路”和行为方式，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

其后，在长达十多年各种名目的“审查”和“清查”中，许多昔日的同伴和战友都做出表率，痛哭流涕深刻忏悔“上当受骗，站错了队”。负责“清查”的领导们也多次耐心教育并为笔者开脱（起码当面如此）：“阶级斗争太复杂了，年轻人嘛，受蒙蔽被欺骗在所难免，只要‘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清楚就行了。”

然而，或许是笔者被蒙蔽受毒害太深了，对战友们的榜样无动于衷，对领导们的关怀也从不领情，而是“顽固到底”：“是我自己想要这么干的，没有谁欺骗蒙蔽我。如果非要我承认受了谁的蒙蔽，那就是‘两报一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因为，笔者始终认为：用说假话“蒙混过关”是玷污自己的心灵净土，承认“上当受骗”更是作践自己的人格尊严。只有牲畜才没有自己的主观意愿和理想追求，才只会糊里糊涂地接受主人的草料诱惑和皮鞭驱赶！

上部 “前文革时代”——文革起源（1949—1965）

中 部

峥嵘岁月

（1966—1982）

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恩格斯

从毛主席亲自发动到“邓中央”彻底否定，整个文革时期（一个轮回）长达十五年又七个月，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八个阶段：

第一，艰难前进时期（1965.11——1969.4），包括：中央的文革、党委（工作组）领导的文革、民众自治的文革、革委会领导的文革等四个阶段。

尽管艰难困苦、起伏跌宕、左右摇摆、步履蹒跚地一路走来，但基本上是朝着遏制共和国新生官僚特权——官患痼疾——的大方向走下去，是文革派“进攻阶段”。文革“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超稳定社会被搅动了起来。蜷缩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国家荣誉主人”，逐渐挣脱“党的领导”政治控制和“驯服工具论”精神控制，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自主权利，获得了与新官僚权贵平起平坐的平等地位，他们压抑了十多年的冤、怨、怒“三气”终于有了伸张机会。这或许是文革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虽然，这种伸张大都难能控制在“文化”的理性化和建设性范畴内，而是常常演变为“武化”的情绪化“破坏性冲突”；虽然，随之而来的是新官僚权贵集团以“百倍的仇恨，疯狂的热情”连续进行了多次血腥镇压和反攻倒算，最终以彻底失败全面复辟而

告结束。但是，平民阶级毕竟是又一次“打碎了身上的锁链”——“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体验了自由平等的轻松和失重感；又一次展示了与新官僚权贵集团迥异的阶级本性，伸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又一次品尝了“关心国家大事”这枚苦果的酸涩，领教了“人民公仆”们的“权迷癫狂症”和浑身血腥气……

第二，反复较量时期（1969.4——1976.10），包括：军人当政的文革、“二次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两个阶段。

进入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反复较量的相持阶段。先是林彪为首的武官反文革集团自上而下围剿文革派，整个文革派大都成了“文革犯”。继而，邓小平为首的文官反文革集团刮起右倾翻案风，试图从组织上和行动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虽然，毛主席被迫反击先后发动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是，整个文革阵营已成强弩之末，难能收到“二次革命”的成效。尤其是，政治隔离制度依然如故，平民大众重新退回到国家大事和社会公事大门之外，回归于“被运动的对象”；政治活动回归于“体制内”——官场上流社会。“二次革命”成果只能是体制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再分配。把王洪文、陈永贵等几个工农代表提拔到中央机关，无异于在官僚化汪洋大海里投下几颗石子。所幸，遏制官患痼疾的继续革命实践寸步难行气息奄奄的同时，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却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峰。

第三，反攻倒算时期（1976.10——1981.6），包括：“华中央”宫廷政变和过渡政府、“邓中央”彻底否定与全面复辟两个阶段。

毛主席逝世后，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反复较量的相持阶段结束，进入反文革阵营反攻倒算阶段。毫无疑问“华中央”逮捕“四人帮”，是反文革阵营彻底剿灭文革阵营的宫廷政变；清查“四人帮”和“帮四人”的“揭批查运动”，更是打着“肯定文化大革命”红旗对文革派为代表的平民阶级民权反攻倒算血腥镇压。而“邓中央”批判“两个凡是”，既是讨伐以“华中央”为代表的“文革暴发户”，更是彻底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国家法权、全面复辟“苏联模式”官

僚专制。

第一章 中央的文革

(1965. 11—1966. 5. 16)

文革之所以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本质在于：它不是平民大众自发反抗官僚权贵集团压迫、彻底推翻官僚专制统治的暴力革命“非法斗争”，而是“最高统治者”毛主席自上而下发动的“合法斗争”，是对“苏联模式”新官僚专制上层建筑的民主改革或改良，是国民大众在“毛中央”统一领导下有节制地“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因此，它必然地首先从国家高端决策层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开始，亦即“中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点或启动。

一、“毛林周共同体”

中央的文革运动主体是“两个司令部”：一是以毛主席为首的“继续革命”司令部；二是以刘、邓为首的“彻底巩固”司令部。

自1957年“开门整风，大鸣大放”时起，在中央政治局决策层中，毛主席为代表的“继续革命派改革派”就一直是少数派或非主流派，可谓势单力薄。而以刘、邓、彭（真）“铁三角”为代表的“彻底巩固派”（守旧派），始终是多数派或主流派，可谓人多势众。

毛主席下决心要发动文革，面对悬殊的政治力量对比，采取了两种战略决策：

其一，“调兵遣将”——将1957年“开门整风”时的“毛周共同体”扩充为“毛林周联盟”，以确保党政军一元化。力量部署则分为三条战线：一是林彪牢牢掌控军队“枪杆子”，只要军队不乱或不倒戈就不会天下大乱。二是周恩来掌控内政外交，维护正常的

生产和生活秩序，免除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后顾之忧。三是江青率领一帮“造反秀才”冲锋陷阵，以笔杆子为投枪匕首，向刘、邓、彭官僚权贵维护的“苏联模式”新官僚专制旧秩序开火。

其二，“非组织活动”——重大问题决策不再先行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而是事先决定后由政治局举手通过。在刘、邓、彭新官僚权贵主流派看来，这是“破坏民主集中制，实行君主专制”的“违法乱纪行为”。正如“邓中央”彻底否定文革后的《历史决议》所说，是“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不过，此罪名未敢实事求是地加在毛主席头上，而是移花接木地转嫁给了“四人帮”。

然而，在毛主席看来，这既是继续革命的需要，也是迫不得已地选择。否则，文革运动就无法摆脱反文革派——“苏联模式”卫道士们——的阻挠破坏，就无法将广大人民群众从反文革派掌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解放出来，更无法“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他从不讳言：我就是最大的造反派头子，是大闹天宫的孙猴子！

二、两条路线无法调和

中央的文革是国家决策层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政治斗争，是平民大众与新官僚权贵集团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其实质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斗争的焦点与核心是：共产党夺取并执掌全国政权以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依靠谁革命？

1. “彻底巩固”还是“继续革命”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面临着两种发展道路选择：一是无限巩固稳定以维护现存制度，二是继续革命以不断改善或改良现存制度。共和国建国后，它表现为“彻底巩固”与“继续革命”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对立冲突。

毛主席主张：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现两个目的：其一，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发挥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热情，不断“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遏制

党政新官员的官僚化趋势，避免中共政权重蹈“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其二，不断改革“苏联模式”不合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解放人民群众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而刘、邓、彭等人则主张：通过彻底“巩固民主主义新秩序”，实现两个目的：其一，彻底巩固无限强化“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新官僚权贵的既得利益，避免中共政权被内外阶级敌人颠覆的危险。其二，通过“党的绝对领导”，“组织和驾驭群众积极性”，将其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集中力量大搞经济建设，以解决“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

2. “革谁的命？”

1957年从“开门整风，大鸣大放”到“反右斗争”和党内“反自由化倾向”，从1964年“社教”运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继续革命对象问题上，两个司令部都进行过反复较量。

毛主席一贯主张：“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而，不断改革不合理上层建筑，遏制中共政权的官僚化蜕变趋势。

刘、邓、彭等人则一贯坚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等已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并杀一儆百震慑平民大众，以彻底巩固“党的绝对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3. “依靠谁革命”

矛盾分歧的本质是关于对待群众的态度。最早的分歧焦点是：刘、邓、彭等人坚持“要组织和驾驭群众积极性”，而毛、周坚持“要解放和发动群众积极性”。

毛主席一贯主张：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将民主权利、言论自由连同“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交还给国民大众，让他们“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

而刘、邓司令部一贯坚持：一切政治运动乃至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必须置于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加强对平民大众的绝对控制。

三、“评海瑞罢官”

自毛主席决心并实施发动文革之时起，“继续革命”与“彻底巩固”两条路线斗争随之演化成了文革与“反文革”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授意江青组织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准备向全国人民“吹响文化大革命进军号角”。然而，在文章发表问题上，一开始就受到了彭真北京市委与陆定一中宣部的坚决抵制和封锁。以至于，在共和国首都“天子脚下”，党和国家领袖毛主席推举的文章，竟然遭到了各大报纸电台——党中央喉舌——的集体封杀，不得不拿到上海《文汇报》发表。

四、“二月提纲”

自“反右斗争”就稳居主流的刘、邓、彭“铁三角”，绝不会无所作为：既然文革非搞不可，那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像“社教”蜕变成“四清”那样，让它对新官僚权贵集团既得利益的危害性最小化。于是，制定并向全国颁发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二月提纲”。

其政治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将文化大革命烈火控制在文化界，阻止它烧到党政军整个官场。二是把运动矛头引向知识分子文化人，以保护混进党政军内的新官僚权贵集团。三是把运动方式限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讨论，防止形成对当权派自下而上大揭发大批判的政治大革命。

五、“五一六通知”

毛司令部全面反击：一是“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罢免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改组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完成了对刘、邓司令部的“清君侧”。二是扭转了国家顶层的“反文革”政治路线，端正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和道路。以中共中央名义否定了“二月提纲”，颁发了“五一六通知”，再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国这种“苏联模式”集权制国家，如果没有“君权”或国家法权的支持保护，国民民权根本无力与强大的政府官权抗衡，任何形式的“要民权，争民主”都寸步难行。

中央文革的胜利为文革群众运动提供了前提保障。自此，北京成了发动和推动文革浪潮的策源地。

第二章 党委领导的文革

(1966.5—1966.8)

决策层两个司令部第一回合的斗争分出了胜负，文革派与反文革派两个阵营、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战场从国家顶层转移到了全国，党委领导的文革开始了。

毛司令部重新掌控了国家法权。但是，全国地方党政大权却依然牢牢控制在反文革派文官集团手中。而且，经过十七年政治运动大风大浪锻炼，他们的阶级性和阶级觉悟已经趋于成熟。作为一股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像一条庞大的“百足之虫”，虽然“头部”受到沉重一击，却依然“僵而不死”。而是凭着阶级自觉性和政治敏感性，充分利用手中的政权，步步为营顽强阻击和抵抗。从而，导致了共和国历史上政府官权与国家法权之间第一次公开而剧烈的大碰撞。

第一节 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之初，面对“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两个中央文件的针锋相对，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党政大员都坚定地站到了刘、邓司令部的反文革路线一边，坚决抵制毛司令部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以至于，政府官权与国家法权的对抗冲突达到空前的激烈程度：毛主席党中央以“五一六通知”严厉批判和彻底否定“二月提纲”，而地方各级党委却继续坚决贯彻“二月提纲”，对“五一六通知”则拖延抵制继续大搞信息封锁。

一、北京：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

第一场战役是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这是毛司令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打龙袍式外围战”，大批判的靶子是“三家村”的《燕山夜话》，斗争矛头指向则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对于刘、邓司令部而言，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丢车保帅式阻击战”。面对毛司令部的强大攻势，他们不得不采取新策略：既然“三家村”被推上了文革审判台，再也不能为了“保护老同志”而与毛司令部正面对抗了，只能因势利导采取“明批暗保”的迂回战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批判就是批判，不能胡乱揭发，更不能无限扩大株连“无辜”。

其实，这种斗争本身的现实意义实在寥寥。因为，对于平民大众而言，重要的不在于大批判还是大揭发，不在于如何正确运用大批判武器，而在于有没有运用“四大”武器对新官僚权贵当权派进行批评监督的民主权利！既然毛司令部解除了“不准攻击党的领导”的禁令，把“四大”武器和批评监督权利交还给了人民群众，就已经足够了。

二、山东：批判《历下夜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山东省委领导的文革开始了。批判对象是《大众日报·文艺副刊》——《历下夜话》及其“前台老板”——报社总编文菲。不久，又抛出了“黑后台”——分管文教的副省长余修和“总后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至此，省级领导层中仅有的两个高级知识分子清流干部无一幸免。

谭启龙等省委当权派的目的有三：

一是乘运动之机借力打力、清除异己纯洁队伍，这是十七年来各级新官僚当权派惯用的政治伎俩。副省长余修，曾经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则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他们显然不可能彻底“工农化”而融入新官僚权

贵主流派。抛弃他们完全符合“纯洁党组织”的长远利益。

二是丢车保帅的“弃子战术”。抛出少数非嫡系（或非核心）人物，以保障省委当权派的政治安全，避免同归于尽、全军覆没。

三是对于反文革路线而言，它也具有“仿生学”价值。他们感受到了生存危机，于是像壁虎像那样弃尾逃生。这不仅符合“牺牲个人，保护组织”的传统，而且，完全符合“党组织的整体利益”。

三、山东大学：抛出“思想史讨论班”

山东大学党委领导的文革也开始了，起点是“五·四学术讨论动员动员大会”。由大会的名称即可明了：在其后的运动中，它不可能贯彻执行毛司令部“五一六通知”的文革路线，而是按着省委部署，坚决贯彻执行刘、邓司令部“二月提纲”的反文革路线：坚持党委对运动的绝对领导，以批判知识分子学术权威的文化大革命，取代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政治大革命。

他们制造了一个“三家村式的黑店”——历史系“思想史讨论班”。所谓“黑店”，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实体，仅仅是庞朴、路遥、陈之安、葛懋春等几个青年教师不定期举行的非正规学术研讨交流的沙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白专道路”：才高八斗、年轻气盛，崇尚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秉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鄙薄权威的大一统定论。如此学人，难免离经叛道、违背新官僚权贵的一元化原则。

再者，“讨论班”根本算不得“非组织活动”，而是在党总支和系主任领导下的正常学术活动。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更具有“批判对象”的实用价值，成了山东大学党委领导的文革之重点对象。

不久，系主任、史学教授孙思白成了“黑店老板”。如此仍嫌“革命不彻底”，系党总支书记蒋捷夫（少有的几个学者型总支书记）随之成了“黑后台”。至此，还是“级别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不足以震慑学校文革全局。最终，副校长、著名学者吴富恒（除了成仿吾校长，唯一有实职实权的学人校领导）成了“黑店总后台”。

虽然，《二月提纲》有“学术讨论”的定性和“真理面前，人

人平等”口号，但是，新官僚权贵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来是既不会“人人平等”更不会右倾保守。他们继承1957年大获全胜的经验，发扬“反右斗争”和“反党内自由化倾向”的光荣传统，下定决心、再接再厉，把党委领导的文革，搞成第二次“反右斗争”和“反党内自由化倾向”运动。

第二节 工作组——镇压群众

频繁的政治运动锻炼了新官僚当权派，也让老百姓看懂了他们的猫儿腻，丢车保帅的闹剧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新官僚权贵又采取了第二项重大措施：派驻“工作组”帮助学校党委消防灭火。

一、北京：“王光美工作组”进驻北大、清华

在中央决策层两条路线的第一回合较量中，虽然彭真被罢官，刘、邓、彭“铁三角”被瓦解了，但是，刘、邓依然“在其位，谋其政”。1966年6月，他们又凭借手中的权力，决定组织下派工作组到北大和清华，帮助学校党委控制运动局势。工作组名义上属新北京市委领导，组长却是“第一夫人”王光美，实际上归刘、邓司令部直接领导。可见，他们对文革的两个“前沿阵地”何等重要。

其中原因不难理解：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曾经成功地转移了“社教”运动大方向，变成了“城里吃皇粮的洋干部”对“吃工分儿的土老巴子农民当权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四清”运动。最终，毛主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的初衷，以轰轰烈烈开始，以不了了之结束，可谓“功莫大焉”。如今，面对“毛中央”文化大革命决心不可动摇，刘、邓司令部希望她临危受命再一次来个“四清”运动。

工作组坚定不移地执行反文革路线，对抗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路线，坚持党委对文革的绝对领导和严密控制。为此，他们继承发扬“反右斗争”的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对蒯大富等在运动中公开跳出来的“新右派分子”，坚决

镇压、杀一儆百。在北京 24 所高等院校中，第一批就把 10211 名学生内定为“右派”，把 2591 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关于工作组的使命，在刘少奇与其女儿刘平平的一次谈话中讲得再明确不过了：“现在就是要‘放’，要让坏人自己跳出来，然后一网打尽……”这就是刘、邓司令部和整个新官僚权贵阶层的文革路线！

二、山东：省委工作组进驻高等学校

自 1957 年“反右斗争”时起，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学校就一直是省委密切关注和控制防范的重点。山东大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由公安厅通过两种情报实行控制：一是“敌情”——以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阶级敌人”反动言行为标志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二是“社情”——民众的异类思想、不满言论等社会动向。文化大革命引发的社会动荡日益剧烈，单靠社会常态下公安机关的秘密情报控制，已经不能给省委当权派充分的安全感了。“刘、邓党中央”派驻工作组的指示和示范给他们送来了及时雨。

省委先是向山大派驻了以省轻工业厅厅长柳青为首的第一届“省委工作组”。不久，又派出以省委常委、纪检委书记王子文为首的第二届“省委工作组”。在与全校党员干部的“见面会”上，王子文宣称：“我是省委纪检委书记，纪检委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整人的！”真可谓旗帜鲜明、杀气腾腾。

1. “中三反革命传单”事件

“五一六通知”颁发好长时间了。像所有反文革当权派一样，校党委借“内外有别”之名，继续实行信息封锁，层层扣押拖延，企图将“通知”与广大师生隔离开来，继续把他们圈禁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范围内。

1966 年 6 月 1 日，山大发生了令校党委和省委寝食不安的“反革命事件”：以刘全复为首的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刻字油印了一份 16 开“小字报”，对校党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方针提

出质疑。其中有一句复述了“五一六通知”的话：“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不能不引起省委和校党委的严重关注，并内定为“反革命传单”，指令公安厅立案侦破。

他们认定：几个平民子女青年学生不可能了解严密封锁中的“五一六通知”，更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政治水平，背后一定有“幕后黑手”！

他们确定了两个秘密调查方向：

其一，高登仁、徐经泽、梁学理、王公乾、孙云亭等一大批“异己分子”——与校党委“离心离德”而又听过“五一六通知”传达的中层干部，以证明：“中三小字报”是“有组织、有后台、有预谋的反党活动”。

其二，中三学生华殿珂（音）之父华岗——山东大学原校长、在押“反革命罪犯”。以证明：青年学生的“反党活动”就是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革命活动。

为此，公安厅法外开恩，由系总支通知华殿珂到华岗的监押处（山东省监狱）探监，并预先对探视场所作了“技术准备”，以期获得“反革命罪犯操纵学生”的证据。结果，华岗告诫女儿：“这场运动是上层的权力之争，你不要跟着胡闹腾！”

结果，省委秘密调查了好多天，始终未能找到过硬的证据。

2. 山师工作组：隔离了“准右派”王竹泉

面对文化大革命如此严峻的阶级斗争，新官僚权贵绝不会掉以轻心，绝不会只喊口号震慑，而是坚决镇压。省委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抓“新右派”，并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排列黑名单，搜集整理黑材料，为秋后算账准备炮弹。

山大“中三反革命传单”事件迟迟查无实据，省委“揪出一小撮，教育大多数”的战略部署搁浅。此时，山师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共产党员王竹泉却自己跳了出来，成了“混进群众里的准右派”。

他是山东省高校学生中公开反对省委工作组的第一人，随之被省委重点关注，成为被省委工作组隔离审查的第一个在读学生。

三、怪哉！省委工作组反对校党委

社会大动荡必然导致民众大分化。文革不断深入，迫使省委不得不变换策略，由原来的压制群众、严密控制，改变为顺势而为、丢车保帅，牺牲基层部分、保护省委全局。而校党委“土皇帝”为了自我保护而坚持顽抗硬顶，否则，任何服软退缩都可能导致一溃千里。因此，对于省委“维护大局，丢车保帅”的意图，因不理解而抵制对抗，激化了学校党委与省委的矛盾。

这种矛盾又导致了民众大分化空前纷纭复杂的局面：其一，山大、山医、山师、山工等省委重点控制的院校，造反派既反校党委又反工作组；保守派对校党委和工作组都“誓死捍卫”。其二，煤矿学院，保守派“誓死捍卫院党委”却坚决反对工作组，而造反派反对院党委却拥护工作组。其三，中医学院，保守派“誓死捍卫院党委”（实则死保书记项子正），坚决反对工作组。后来加入了红卫兵山东指挥部，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王竹泉等人任职省革委后，其负责人李仁光又成了“红山指一把手”。而对院党委项子正“造反有理”的真造反派，却成了“保省委工作组的保守派”，早已被甩下了文革列车。

第三节 向“非当权派”民众开刀

刘、邓司令部所推行的镇压群众的反文革路线，得到了整个官僚权贵阶层的衷心拥护和贯彻，誓将文革扭曲成第二次“反右斗争”。

一、步步为营，拼死顽抗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官僚阶级当权派无不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这是彻头彻尾颠倒黑白的历史谎言！十七年来，是他们为了维护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仗势欺压民众，致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导致

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又是他们为了自我保护而转移群众运动大方向，不惜向无辜的知识分子开刀；还是他们把不同意见的群众打成“新右派”“反革命”。

1. 抢先建立“文革领导小组”和“文革办公室”

他们利用执行“十六条”等中央文件的垄断权力“打着红旗反红旗”，抢先组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派遣亲信控制领导。并以官办的新机构名义继续推行反文革路线，根本不可能“按照十六条的规定，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而是，继续阻挠民众组织起来形成群体力量，阻挠民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2. 抢先组织“官办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大串联洪流势不可挡，手持“尚方宝剑”的红卫兵“天兵天将”满天飞，所到之处，党政旧组织系统（包括“文革领导小组”“文革办公室”）土崩瓦解。当权派又让“革命事业接班人”提前接班，抢先组织了官办红卫兵，继续对抗文革派。

8月22日，校党委经过严格政审选拔，从3300多学生中选拔了500名各年级学生干部和党团员骨干，组建了“山东大学红卫兵大队”。校学生会主席、史四学生郭德宏任大队长，全国学联副主席、化四学生赵淑敏任政委。当天晚上，在老校大操场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热烈庆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暨山东大学红卫兵大队成立”。500名“红卫兵”战士，穿着统一配发的绿军装，齐刷刷地坐在会场中央，其他师生则众星拱月似地按照系和班级分列两旁。

3.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党委领导的文革临终之前，他们又制造了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继“反动学术权威”之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又成了他们的第二批“文革对象”。

1966年8、9月间，他们贯彻执行刘、邓、彭“要把北京市建成水晶城”的经验，一场“斗、抄、挖、赶的红色风暴”席卷了省会

济南大街小巷。

①.横扫对象之全面“史无前例”。以往的政治运动斗争对象大都比较单一，一次运动只整一两种人，而当权派们的文革却是全面彻底地“大扫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及其子女“狗崽子”无一幸免。

②.惩治措施之残酷“史无前例”。以往政治运动，对于运动对象大都局限于批判斗争后就地管制，最严厉也不过是绳之以法。此次运动却是“斗、抄、挖、赶”同时并举。先是“斗”——一律揪上台批斗，低头弯腰“喷气式”，外加拳打脚踢“疾风暴雨”；然后“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其次是“抄”——“破四旧，立四新”，对家底殷实的人家彻底查抄，金银首饰、古董文物乃至祖宗遗像等“四旧”都被当作“四旧”扫荡一空。再次是“挖”——内查外调，清查三代、九族，深挖细找“暗藏的阶级敌人”。最后是“赶”——全部“流放充农”遣返农村。如此一来，“黑五类”及其未成年“狗崽子”，不仅赖以生存的公私职业被剥夺，而且连市民身份也被剥夺了。

4. 第一大冤假错案——“造反派打砸抢”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上述一切都成了“文化大革命浩劫”和造反派“打砸抢的罪行”！

对这种历史谎言，笔者只想指出一个史实：当时的造反派还是在“野派”，“革委会”半年之后方才建立。如果说，造反派红卫兵对官办红卫兵的“斗、抄”，还有可能“猴子跟着人学事”虚心学习的话；那么，对于他们的“挖、赶”，却无论如何都是学不来的，因为无权！作为平民百姓，他们既无“挖”——内查外调的财力，也无“赶”——注销城市户口的权力，更不可能让外地权力部门接受大批“流放者”。莫说造反派群众组织，即使厂矿、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等“非政府”单位，也无力完成如此重任！

二、对学生严加盯防

各级当权派为了稳定政局，对群众思想和行动日益加紧组织控制。各级别、各层次的秘密会议也日益增多了，会议内容无非三项：一是传达贯彻上级党委指示和要求；二是收集汇总“阶级斗争新动向”；三是分析师生员工的政治态度和表现，划分“左中右”，并要求对“重点人物”分工负责、重点盯防、及时报告。

作为学校最大的人群，学生理所当然成了各级领导操心的对象。例如化二甲班的郝树仁、李程群等，平时思想独立、个性较强，“不靠拢组织”、对辅导员老师“不够尊重”。运动一来，自然成了盯防“重点人物”。

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在党委领导的文革中，能否对同学盯梢、告密，成了鉴定学生是否“听党的话”的重要标志。

三、学生大分化

党委领导的文革的历史作用就在于：当权派维护“党的绝对领导”的政治目的，却导致并加剧了民众大动荡、大分化的社会效果。

1. 观点大分化

校党委统一部署，从“远程空对空”对准“燕山夜话”和“历下夜话”大批判，转到了对本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大揭发、大批判，并统一要求贴大字报。沿路边竖起了席棚“大字报专栏”，同时“定调子，划框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按照党委当权派的说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主要表现：其一，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借口，把工农兵子女赶出学校，“专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其二，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借口，脱离党委领导、大搞学术垄断，排斥工农干部（新官僚权贵主流派）。

其潜台词不言自明：前者无非是为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红三类”子女说话，以笼络绝大多数学生“坚定不移跟党走”。

后者则是把罪责统统转嫁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政当权派却成了“无辜又无奈的受排挤者”。

然而，随着大揭发、大批判不断深入，许多学生产生了疑问和困惑：共产党领导学校十七年了，工农兵子女被赶出校门时，你们书记校长们都躲到哪里去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你们难道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吗？而且，自1957年“反右斗争”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有屁都不敢使劲放，怎么就“专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

不久，大字报出现了“不和谐音调”：《请问校党委》、《质问×书记》……日渐增多。紧随其后，《分清“西安”还是“延安”》、《警惕有人转移斗争大方向》、《不准趁机反对党的领导》、《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以更强大的气势铺天盖地而来。

从此，开始了“质疑校党委”（造反派）与“保卫校党委”（保守派）两种观点的分化对立。

当时，山大最著名的造反派学生当中文系的属栾桢、汲玉柱了。他们《成仿吾的“三板斧”》大字报轰动全校，随后又把成仿吾“诋毁鲁迅曾与中统特务头子朱家骅交往甚密”等言论写信报告了许广平（鲁迅遗孀）。许广平“义愤填膺”复信：坚决支持造反学生！这是山大造反派得到“北京名人”最早的支持。

当时，鉴于毛主席对鲁迅“硬骨头精神”的崇高评价，周扬等文化部当权派一直尊奉许广平为“鲁迅代表”，可谓风光无限。如此，岂能不“大长了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威风”。从此，校长兼书记成仿吾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2. 大分化的内因与外缘

毛司令部的国家法权否定并打破了旧的党政组织系统，使平民阶级获得了解放，每个人都获得了思想和行为自主权力。但是，究竟是保守还是“造反”，是继续紧跟党委“现管”走还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依然取决于两种因素：其一，内因——由于出身经历、生长环境和生活体验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心境德性、价值观

念和行为方式等主体人格诸多差别。其二，外缘——社会位置、生活经历以及周边环境各不相同（主要是与当权派的关系），对于运动中的立场和道路选择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官僚权贵对于平民大众分化瓦解、分而治之，拉一帮、打一帮“挑动群众斗群众”，面对文化大革命，更是封官收买与残酷镇压同时并举。从而，成了平民阶级大分化的直接制造者。

四、“十六条”：文革群众运动的纲领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君民联手，制约百官”，对新官僚权贵文官们上下夹攻、猛击一掌，以遏制他们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蜕化变质趋势。为此，必须发动群众打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战争。

然而，他的良好愿望，遭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整个官僚权贵阶层空前的抵制和反抗。官权与君权的大碰撞在所难免。

毛主席吸取了历次政治运动“党委领导，运动群众”的教训，改变“依靠党组织”的旧传统，绕过旧的党政组织体系居中阻挠，发动人民群众起来对走资派“造反有理”，并授予他们“自下而上揭露我们黑暗面”的大民主权力，以形成上下夹攻之势。

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8月9日向国内外公开发表；8月13日又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强调：“群众是我们社会的主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毫无疑问，文革群众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权解放运动，是平民大众思想自由、行为自主的真正民主运动！

“十六条”发表后，省委工作组于1966年8月15（或16）日悄悄撤离山大，预示着党委领导的文革气数将尽。

五、大串联：冲破旧的组织体系束缚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并发出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鼓励他们进行革命大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学生之间交流串联逐步突破校党委的组织控制，由同班同系而跨班跨系，由躲避“党组织耳目”的秘密半秘密而逐渐公开。

但是，把山大老造反派从校党委高压控制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既不是毛主席党中央，也不是“十六条”等尚方宝剑，更不是“自己解放自己”，而是北京“八一战校”（北京十四中）两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

8月22日，在全校师生员工“庆祝大会”上，孙汉卿书记的报告还没讲完。……突然，一男一女两个穿军装的中学生红卫兵跳到主席台上，二话不说挥起军用皮带劈头盖脸一顿猛抽。会场顷刻大乱。……校党委旧的组织体系垮了，党委领导的文革寿终正寝，进入了民众自治的文革新阶段。

党委领导的文革之于整个文革的意义在于：“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激化了当权派与平民大众民权诉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催生出了平民阶级造反派，为民众自治的文革孕育了主体动力。

第三章 民众自治的文革 (1966.8—1967.2)

在党委领导的文革后期，大字报署名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再是“×系×级×班某某人”，而是“××战斗队”，诸如“揭内幕战斗队”、“捣黄龙战斗队”、“驱虎豹战斗队”、“战地黄花战斗队”等等。它标志着：造反派群众开始逐步摆脱当权派的组织控制，正在由个体人的造反思想和造反行动发展为“造反组织”，为民众自治的文革孕育着组织化的动力系统。

第一节 大串联

大串联之于民众自治文革的意义在于：正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长江，它极大地促进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一、北京——“革命圣地”

北京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的消息不断传到学校，极大地吸引了少数“勇敢分子”，秘密离校赴京串联，并赶上了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外四苏庆海、政三王国富、中二汲玉柱、化二李程群等还有幸登上了天安门或观礼台。这是当时最崇高的荣誉了，在死水微澜的校园引起前所未有的震动。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北京像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一样，成了造反派学生的“革命圣地”。到北京串联“取经”成了学生们普遍的强烈愿望。

8月22日，两个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的军用皮带，把校党委旧的

组织体系和严密控制彻底打翻了，造反派学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自主权利，自发组织的赴京串联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笔者所在的那一批大约 100 多人。化二甲班除了刚从北京返校的李程群、去青岛声援“三大院校”的郝树仁，其他 20 名造反派同学都结伴赴京，并推举笔者组织联络。

二、“大串联”与“反串联”冲突

造反派学生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却成了当权派心目中的“祸水鬼域”。为了阻止北京红卫兵无法无天的“邪火”烧到本地区本单位，所有大中学校的当权派都坚决执行省委统一部署，组织大批保守派教师学生到火车站“截访”，在候车室、站台上昼夜值班、严防死守，见到本校赴京人员，一律阻止并驾走或拖走。

或许是我们人多势众浩浩荡荡“所向无敌”吧，未遇到任何阻挠，轻轻松松上了车。同车厢的还有财经学院的一群学生。另有五六个济南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生，她们是“冲破白色恐怖”背着校领导秘密赴京串联的。

人们焦急地等待火车启动。……突然，一个中年妇女带领十多个人高马大的男青年闯进车厢直奔“幼师”女生而去，不由分说两人架一个半拖半架地往车下拽，有的干脆把人抬了起来。被绑架者扯破喉咙尖叫呼救：“快救救我们呀！他们是‘铁老保’，不让我们去北京串联！”

愕然片刻，全车厢的人们一哄而起，一场“英雄救美”的武戏开始了。有的上去抢人，有的在过道里层层设防拦截，有的干脆封堵了车厢门“断敌后路”，多数人则呐喊助威、痛斥怒骂。……区区十来个奉命行事的“衙役”，如何抵挡得住百十名造反学生“众怒”？他们只好灰溜溜地空手下车“对不起组织，辜负党的信赖重托了”……

第二节 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到北京后，大队人马住进了西单地质部招待所（像中学时代那样的大通铺），“化二甲班”则住到北京医学院大礼堂，地铺芦席、两人合盖一条被子或毯子。西南少数民族和新疆维吾尔族等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实在太多了，如此已属难能可贵。当然，激情燃烧年代里激情燃烧的青年学生，没有谁去计较抱怨吃住等物质条件简陋。

一、筹备成立“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参观浏览大字报的同时，也开始筹备组建造反派组织的联络会商。作为“化二甲班”的联络人，笔者参与了多次在地质部招待所招集的筹备会议。

1. 召集人与领导班子

当时，召集并主持筹备会的主要有如下几个人：

①. 张连荣——中文系三年级，口才出众、善于交际，但稍有“油嘴滑舌”之嫌。老造反派都知道，“中三”造反派核心人物是刘全复，作为“中三小字报”的炮制者享誉全校老造反派。然而，也许是因为年龄大（比笔者年长7岁）而真正成熟了，深知政治斗争的凶险。故而，无论造反派如何强烈要求，他始终拒绝作“出头鸟”。最终，派出了班长张连荣作“中三”代表，被推举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队长”。

②. 刘仲连——政治系三年级，共产党员“调干生”，老成持重、不善言辞，难免朝气不足的“右倾”之嫌。虽不能给人奋勇向前的激励，“共产党员身份”和稳重个性却能给人足够的安全感。最终，被推举为“主义兵大队政委”。

由上述职务称谓，足可证明：群众自发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向官办红卫兵虚心学习的结果。

③. 赵柏林——历史系四年级学生，身材颀长、白净儒雅的“帅哥”，郭德宏同班同学、校学生会秘书长。造反成为首批“主义兵”战士，仍干老行当——秘书长。

④. 曹靖——中文系四年级学生，曾经与张明岚、张凤清、韩剑秋、李际田等 20 来人一起写出过多篇高水平的长篇大字报，成为“投向走资派的重磅炸弹”，在全校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山东大学的‘九评’”，影响仅次于“中三”小字报。最终，作为“中四”代表，被推举为形势分析组组长，任务是：始终关注党中央部署和形势变化，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

⑤. 李本玉——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戴眼镜的鲁西黑脸汉子，“实在”的说话有点儿艮。作为“官办红卫兵大队长”郭德宏的同班对立面，被推选为对外联络组组长。

⑥. 刘光道——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其貌不扬却充满活力、不知疲倦，被推举为后勤组组长。

2. 组织名称的寓意

“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名称，包含如下两个内容和含义。

其一，改“山东大学”为“鲁迅大学”。成仿吾是山大校长兼书记，无疑是学校旧党政组织体系的最高代表，其“罪责”之一是“反对鲁迅”。将山东大学改为“鲁迅大学”，标志着：造反派红卫兵自产生之日起，与旧党委彻底划清界限，是老当权派的“对立物”。

其后两年多里，这种称谓成了鉴别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水岭：凡是自称“鲁大”的肯定是造反派，凡是自称“山大”的十有八九是保守派。

其二，改“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主义”。造反派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称谓，尚不足以表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应改为“毛泽东主义”。

到了 1967 年春天的“夺权”斗争中，全国各地凡是自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造反派组织，大都成了“激进造反派”或“极左派”。值得深思和探究。

3. 首批“主义兵”战士

建国后尤其“反右”后的学校，按出身成分“划线”的风气愈演愈烈，众多出身于“红四类”家庭的学生大都成了“党的依靠力量”，出身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家庭的学生则成了当权派警惕防范的对象。文革初起时，当权派和保守派更是“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攻击造反派“反对党的领导，与地富反坏右穿一条连裆裤”……

面对这种“唯成分论”的紧箍咒，造反派虽内心反感，但行动上同样心有余悸如履薄冰。在筹备会上，为了避免当权派和保守派抓“小辫子”而被戴上“右派翻天”的帽子，一致通过决议：首批“主义兵”战士一定要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家庭！几经了解、统计、汇总，最后确定了350名学生作为首批“红卫兵”，其他人则暂时屈居“红外围”。

1966年8月28日，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宣誓，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式宣告成立。

随之，笔者也由“联络员”晋升为“化学系中队长”，化三的贡献临才为“政治中队长”（教导员）。

4. 革命年代，诚信年代

对家庭出身“划分三六九等”风气的副作用不言而喻，其中之一就是把许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老造反派同学关在了“主义兵”首批战士的大门之外。然而，当时的人们都如实报告，没有谁作假虚报。

革命年代，诚信年代，谁也不会说谎！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朝野上下各行各业无不造假互骗。……两相比较，不免泛起一缕无愧于历史的自豪感和忧国忧民的淡淡哀思。

二、“杀回”学校

1966年8月31日，在永定门车站候车时，从车站广场的大喇叭里传来毛主席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盛况。人们虽然因未能接受毛主

席检阅而惋惜，但是，关心本单位运动命运的社会责任感依然令大家归心似箭。

1. 乘车游行示威

山大与其他兄弟院校不同：“校二部”（后勤系统）当权派大都是造反派，其他人也大都跟着成了“造反派”。因而，我们很少遭遇过当权派的“经济封锁”，免除了衣食住行等后顾之忧，“主义兵”杀回学校时更是风光无限。当时，一出济南火车站，汽车班的数辆大卡车、大客车早已等候在那里。大家上车后顺便游行回校，一路上众人瞩目、啧啧称羡。

人们得到消息：孙汉卿书记等学校领导正在农场劳动。车队便浩浩荡荡直奔农场，将孙汉卿夫妇等依次揪上卡车，在校园里游街示众。

孙汉卿毕竟是“老运动员”了，在青岛市党内斗争中曾经失势落魄扫过大街，可谓历经沧桑见怪不怪了，被揪着衣领安静地站在汽车上。而他的夫人余光前，在政治系总支书记任内专横跋扈惯了，何曾受过这般羞辱，发疯似的挣扎反抗。岂料，像“阶级敌人”遭遇过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样，越是反抗越是遭到更加暴烈的行动。她被两个身强力壮的学生揪着头发、抓着胳膊，按压在驾驶室顶棚上……

笔者一向不喜欢“暴风骤雨”，内心难免怦怦直跳，一遍又一遍默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2. 新校“小操场”批斗会

随后，又乘着群情激昂之势在新校女生宿舍楼后小操场召开了“批斗会”。因为没有会前准备，并无高质量的“口诛笔伐”，除了即席性的“质问”“痛斥”，就是按头“喷气式”了。

从此以后，“大字报战”阶段重事实、讲道理的“文化”气息越来越淡薄，重声势重实效的“政治”残酷性越来越浓烈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祖训越来越不时髦了，低头弯腰“喷气式”越来越成了批斗对象的标准化姿势。

不过，笔者对如下两点记忆特别深刻：其一，在一些动手者中，除了“老造反派”，还有原来“誓死捍卫校党委”后又杀回马枪的“新造反派”，其“暴烈行动”更甚。

“主义兵”的诞生标志着：山大正式进入民众自治的文革新阶段。当权派由前台执政指挥转入“地下活动”，对民众造反运动由公开压制转入对保守派秘密操控。

从此，造反派不再是散兵游勇的“人自为战”，取得了与官办红卫兵对称的地位，开始了组织对抗新阶段。

三、高音喇叭大战

中央广播电台和“两报一刊”，天天呼吁民办的造反派红卫兵“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谨防‘走资派’躲在幕后挑动群众斗群众”。然而，官办红卫兵“誓死捍卫校党委”的初衷和惯性很难根本改变，与造反派对立对抗仍在继续。

在组织纪律性和斗争手段方面，自发组织的“主义兵”无法与官办的“山大兵”相比。而且，造反行动和造反组织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即使组织起来之后，也少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和“现阶段任务”，更谈不上什么“具体计划”。除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就是“创造性地向官办山大兵学习”。

1. 从“大字报战”到“高音喇叭战”

早在文革前，学校广播站就是校党委的舆论阵地之一，虽然名义上是“校学生会”主办，政治问题的决定权却始终牢牢掌握在党委宣传部和“校团委”手中。当权派转入“地下”时，顺理成章地将位于老校六号楼西侧小平房的广播站，交给了官办“山大兵”大队部。从此，广播站也由“校党委喉舌”变成了“山大兵”喉舌。响彻校园上空的高音喇叭声势浩大、如雷贯耳，其宣传、鼓动、反驳、批判等效果不言而喻，造反派的大字报、大辩论根本无法比拟，证据再确凿、论说再有理，只要人们“非礼勿视”，一切都等于零。而高音喇叭的强迫力谁也无法听而不闻，不想听也得听。

“主义兵”面对“山大兵”舆论攻势的强大压力，在新校学生宿舍一号楼也建立了广播站。从此，开始了高音喇叭对攻战。从原“学校广播站”造反出来的两位播音员（数三的曲姓女生和政一的孔姓男生），播音水平之高不亚于专业广播电台；大批判文章更是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其冲击力前所未有的。

以中央广播电台和“两报一刊”为龙头的全国舆论，日益向造反派一边倒，“山大兵”广播站依然顽强地坚持对“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和“愤怒声讨”。

一直到党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官办“山大兵”气数将尽，“主义兵”才采取“革命行动”，抢占了他们的广播设备和器材。此后，校园上空飘荡的“党的声音”换成了“主义兵”的一言堂。

这种运动形式的负面作用显而易见：人人平等参与的大揭发、大批判日渐冷却，代之以高音喇叭的“愤怒声讨”；畅所欲言的大民主“群言堂”日趋岑寂，代之以少数“秀才”的高水平批判稿件；造反派群众的精神自由和思想独立逐渐弱化，代之以高音喇叭的灌输和召唤。它意味着：民众自治的文革之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悄悄失去了独立性，日益被少数领袖人物或“乱世英雄”所操纵。

2. 抄家——向官办红卫兵虚心学习

“山大兵”广播站高音喇叭整日高喊：造反派把“延安”说成“西安”，以“揪走资派”之名行“否定党的领导”之实，“说出了阶级敌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穿一条连裆裤”……

在对方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主义兵”坐不住了。不得不向“山大兵”虚心学习，也对“反动学术权威”和有历史问题的人抄家，以证明自己“不是右派翻天，不是与地富反坏右穿一条连裆裤”。再者，抄家也是从北京取来的“真经”之一：诸如对胡耀邦、蒋南翔等权贵政要随意揪斗，即使对一切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群众也采取“革命行动”。所有这些，对于青年学生的感染力太强烈了。

作为“主义兵”化学系头儿，笔者理应“冲锋在前”。在行动前会议上：首先，明确宣布只准组织统一行动，不准私自查抄；其次，确定抄家对象，系主任阎长泰、副教授徐国宪、武际元以及实验员王景尧（其父曾任日伪青州道台）；再次，确定抄家内容，所有“宣扬封资修的东西”；最后，统一规定抄家程序——所有抄没物品都开列清单一式两份，由小组领队和被抄家者共同签名后分别保管。

随后，将红卫兵分作三个小队，分别进行。他们或许早就不止一次被“山大兵”抄过了，除了戴博士帽的男照和穿旗袍高跟儿鞋的女照，极少“缴获”。

四、“抢档案”？还是抢“黑材料”？

“主义兵”诞生后第二件大事是抢黑材料（当权派和保守派称之为“抢档案”）。

1. 事件起因

运动之初，按照“刘、邓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校党委也收集整理了大批黑材料，为秋后算账抓新“右派”做准备。

其实，这并非文革时期的新发明，而是1957年“反右”后新官僚权贵的惯用伎俩。党委领导的文革后期，如何妥善保管这些黑材料，成了当权派最后的“神圣使命”。最保险的地方莫过于机要档案室（全国各地莫不如此）。

原因有二：其一，“苏联模式”下的人事档案，历来就是对民众进行组织控制的工具，重在记录“历史污点”，以便将每个人的“小辫子”牢牢抓在手里，与文革时的黑材料大同小异。其二，文革之初，党中央三令五申“严禁抢档案”，档案室随之成了“尚方宝剑”严格保护、平民大众不准入内的机要重地。

造反派为了揭露当权派的“秋后算账”阴谋，搬掉压在头上的“黑材料大山”，全国屡屡发生“抢档案事件”，“毛中央”在“严禁群众抢档案”同时，也“严禁当权派将黑材料存放档案室”。然而，“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早已成了摆设，“县官不如现管”

当权派依然我行我素。“抢档案事件”接连不断。

2. 事件过程

1966年10月10日，“校一部”造反派干部揭露：学校当权派已经将大批“黑材料”转移到了老校1号楼（办公楼）二层的人事档案室。消息传出，数百名“主义兵”群众闻风而动、一呼百应，群情激昂涌向了1号楼，责令校党委“交出黑材料”！常务副书记孙汉卿已成众矢之的不便出面，只得由副书记房金堂出面阻止，并紧急调集数百名“山大兵”群众和机关干部“保卫档案室”。

攻方由一楼向二楼涌去，被守候待命的守方阻截在楼梯上。双方推搡冲撞了许久僵持不下。房金堂书记颤颤巍巍地喊：“同学们，不要上当受骗，档案室里没有黑材料……”

与“山大兵”相比，“主义兵”最大劣势是组织涣散。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中更是群龙无首，难以形成步调统一的统一行动。根本不是“山大兵”的对手，只能眼睁睁任由守方从档案室后窗将一大包东西转移走了……

3. “偷鸡不成蚀把米”

失败的“抢档案事件”给“主义兵”造成两个不良后果。

其一，因为没有获得黑材料的真凭实据，对“抢档案”的罪名百口莫辩，任由当权派和“山大兵”理直气壮地痛击，被“愤怒声讨”了好多天：“充分暴露了‘主义兵’某些人心里有鬼，妄图掩盖见不得人的历史！”“10月10日抢档案就是要以此纪念‘双十节’，这充分证明他们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

其二，导致“主义兵”内部第一次意见分歧：一种意见是“策略派”或“温和派”，认为“抢黑材料”不符合中央指示，白白让当权派和保守派抓住了“小辫子”，得不偿失；另外，失败的教训在于无组织无纪律、不讲政策和策略。另一种意见是“激进派”，认为当权派拒绝交出“黑材料”，必须发扬造反精神、采取革命暴力行动；失败的教训在于头头儿右倾保守、未尽到组织领导责任。

从此，“主义兵”大队部威信顿减，组织益发涣散，为后来的

“政变夺权”走向“极左”种下了祸根。

五、唯我独革——“山头林立”

“造反精神”与“政策和策略”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造反派与生俱来、困扰始终的“元问题”和“两难选择”：太注重“政策和策略”吧，难免“造反精神”不足，根本无法承受当权派的高压政策和保守派的猛烈攻击；“造反精神”太强烈太坚定吧，又难免忽略“政策和策略”，被当权派和保守派抓住“小辫子”，招致更厉害的高压和更猛烈的攻击：

1. 老造反派“先天不足”

或许是青年学生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吧，全国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老造反派几乎都“造反精神有余，政策和策略意识不足”，“鲁大主义兵”也不例外，主要思想和行为表现是“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

①. 造反精神有余、谦虚谨慎不足，兼容胸怀和团结意识缺失，在“反对折中调和”的慷慨激昂中排斥不同意见的“同类”。致使派中有派、山头林立，“鲁迅大学八·三一红卫兵”和“新山大红卫兵”不得不相继另起炉灶。结果，难以形成人多势众这个唯一的阶级（或派别）优势。

②. 即使本组织内部稍有意见分歧，同样是剑拔弩张、怒目相向，“坚持原则，眼里容不得沙子”，人人自以为是、各行其是。致使组织体系日益松散，徒有组织名号，难能形成“拳头”发挥组织整体优势。最终，唯一出路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分道扬镳分崩离析。

2. “政变”——“曹靖、张发玉新时代”

正是这种“唯我独革”心态，使“主义兵”徒有组织之名，很少形成真正的组织体系和统一行动，最终导致了“政变”：张连荣、刘仲连等第一届民选领导人成了“领导不得力的老右倾”相继“靠边站”，迎来了“曹靖、张发玉新时代”。

全国政治形势急剧向左转，“主义兵”也急剧向左转，以“老造反派”自居，“唯我独尊，舍我其谁”。最终成了“极左派”或激进派。对外，越来越采取“关门主义”，傲视并排斥“鲁大八·三一红卫兵”和“新山大红卫兵”；对内，则排斥主张“注重政策，讲究策略，团结同志”的不同意见。

①. 曹靖——形势分析报告会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官办的“山大兵”名存实亡，两派对抗的激烈程度日益减弱，派仗越来越“乏味”。

除了少数人应对派仗以外，“主义兵”多数人都无事可做、无所适从，产生了“运动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等问题，产生了空前的困惑、迷茫和彷徨。

为应对这种局面，“主义兵”在老校大礼堂举行了形势报告会，由“形势分析组”组长曹靖作形势分析报告，回答群众各种困惑、疑问和迷茫。报告发扬中四的“领军传统”，思想深刻而条理清晰，激情洋溢而充满理性，令人茅塞顿开、心明眼亮，无异于在众人“心灵的暗夜里点燃起一蓬篝火”。结果，赢得了全场由衷的长时间热烈掌声。以此为契机，在“主义兵”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他取代了张连荣、刘仲连，由“精神领袖”成了“新的掌门”。

②. 张发玉——“诸侯割据”

如果说曹靖是靠思想深刻和广大群众拥戴而光明正大地成为掌门人的话，那么，张发玉则是靠煽动能力和少数激进分子拥戴而“阴谋政变”成了割据老校的“新诸侯”。

当时，群众运动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使造反派头头儿，对“怎么办”等问题同样是不甚了了。或许以往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和血腥气留在青年人心灵中的阴影实在太浓烈沉重了，一向以老成持重著称的刘仲连、张连荣等第一届领导人，深恐自己判断失误而把造反派同学领进“瞎马临深池”的境地，因而，非常谨慎小心，宁可“不作为”也决不贸然“胡作为”。与“造反精神强烈，理性思考不足”的激进分子之间分歧冲突在所难免。再者，山大由青岛

迁往济南后，一直分为老校和新校两个校址，其间相隔 2 公里，来往全靠徒步。“主义兵”成立后，大队部设在新校，与老校的联系诸多不便。

正因如此，为张发玉等“诸侯割据”提供了机遇。他串联了十几个激进分子，跑到新校 1 号楼“主义兵”总部围攻张连荣、刘仲连，强烈要求设立“主义兵老校分部”，张发玉成了理所当然的“掌门”，控制了物理、电子、生物、外文等四个系。在其后数月里，他除了鼓吹、顺应“唯我独革”的极左情绪，就是争夺领导权，最终“彻底独立”。众多不乏正义感的“主义兵”战士都斥之为“私心太重，官迷心窍”。

这种领导班子和组织体系的改变，成了后来“主义兵”沦为“极左派”悲剧下场的开端。

第三节 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1966 年 10 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山东省委的领导地位摇摇欲坠了。

一、济南红卫兵师

为了延续反文革路线，阻击文革派冲击旧秩序的洪流，省委将驻济高校的官办红卫兵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了“济南红卫兵师”，“山大兵”大队长郭德宏任师长，山医附院“人工喉”青年专家杨仁中任政委。

为了“誓死捍卫省委”这个大局，省委再次丢车保帅，抛弃官办红卫兵曾经“誓死捍卫”的校党委。在省体育场召开的“热烈庆祝济南红卫兵师成立大会”上，山大校长兼书记成仿吾、山工书记张国忠等驻济各高校当权派，都成了被揪斗和游街示众的对象。各校官办红卫兵，为了发泄对他们“蒙蔽群众坑害保守派误入歧途”的愤怒，难免对昔日“誓死捍卫”过的老领导施以“暴烈行动”。例如，成仿吾被打得无法站立，只得从解放路七中附近爬回了家，并落下大便失禁的终生痼疾……

二、红卫兵济南串联站

济南红卫兵师成立后，各高校官办红卫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实力和声势大增。造反派红卫兵一向善于向官办红卫兵“猴子跟着人学事儿”，也随即串联组织成立了“红卫兵济南串联站”，山师“革命串联红卫兵”负责人王竹泉为召集人。

1. 组织名称释义

根据王竹泉的提议，造反派红卫兵“联合体”的名称定为“红卫兵济南串联站”，其含义如下：①“红卫兵”置于最前面，标志着：本组织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全国红卫兵继续革命大军的一部分，而非各自为政的“济南红卫兵”或“山东红卫兵”。②在深入开展本校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要密切关注济南市和山东省的文化大革命，并坚持经常相互串联，共同寻求解决本市本省问题的统一行动。③它并非严格的统一组织，更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与各高校红卫兵组织之间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为各兄弟院校红卫兵之间平等交流、联合行动，提供一个站点或平台。④向解放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并非“驻济南的部队”，而是包括整个山东和苏、豫、皖部分地区的部队。“红卫兵济南串联站”并非“济南市红卫兵串联站”，它既容纳济南市的民办红卫兵，也容纳全省的民办红卫兵，拥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发展空间。

2. 组织形式及其工作机构

“串联站”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各高校造反派红卫兵负责人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是王竹泉建议并联络召集的，地点在历山旅社会议室，“鲁大主义兵”张连荣到会，王竹泉被推举为联席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会议决定：在历山旅社二楼设立“串联站”办公室，为造反派战友联络、交流提供场所和服务。各高校红卫兵组织选派一名“驻站代表”，负责“串联站”与本校红卫兵组织的信息沟通；另外，选派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鲁大主义兵”的“驻站代表”是秘书长赵柏林。

“红卫兵济南串联站”的成立，是山东省造反派红卫兵运动一

个重要发展阶段。从此，驻济各高的民办红卫兵组织不再是关起校门“各自为战”，而是拥有了更壮大的组织形式。虽然尚处于“邦联制”阶段，而非“红卫兵师”那样的统一组织。但是，毕竟是获得了与官办“红卫兵师”组织对称的地位，为规模宏大、范围广阔的组织对抗奠定了组织基础。

3. 笔者被派驻“串联站”

在曹靖的形势分析报告会上，笔者也应命宣读了预先准备的发言稿为主题报告敲边鼓，倡议：认清形势、振奋精神，克服急躁情绪，脚踏实地“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获得群众好评和头头儿赞许。

没过几天，历史系贴出大字报揭露：“赵柏林原来是党委打入主义兵内的卧底”！其“驻站代表”资格也随之终止。笔者成了“鲁大主义兵”派驻“串联站”的代表。

三、“红卫兵师”砸了“红卫兵串联站”的牌子

历山旅社坐落在解放桥东北角。最早，在四楼设有“解放军济南红卫兵联络站”，负责人先是转业不久的副省长杨介人，后又换成现役军人宋一民（职务不详，在革委会领导的文革中，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济南市红卫兵师”师部设在三层。

“红卫兵济南串联站”设在二层。

1. 亲历冲突

组织对称，为对抗奠定了基础；对抗，为冲突铺好了干柴。不久，烈火烧起来了。起因是，“红卫兵师”派人到“串联站”摸底。据他们说：“串联站”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说“红卫兵师是省委官办的老保”。如此“诬蔑真正的革命派”，是可忍孰不可忍？

次日上午，历山旅社门前开来四、五辆大卡车，从车上跳下二百来名“红卫兵师”战士（大都是工学院的），不由分说把挂在旅社门口左边的“红卫兵济南串联站”木牌砸成了四五瓣。接着，又

冲到二楼要砸“串联站”办公室。当时，我们只有七、八个人，寡不敌众。情急之中，笔者打电话向山师告急求援。不一会儿，山师“串联红卫兵”体育系中队长高士健率领李敦义等乘坐三轮运动摩托车赶到，几分钟后大队人马（四、五十人）也乘卡车赶来，个个都是彪形大汉。

笔者简要介绍情况后，高士健说：“反了他们了！”即刻与对方领头人理论。人高马大的李敦义抓着衣领拎小鸡儿似地把他拎到人少的地方，并说：“弄这一套没用！过来，过来，好好谈谈！”其他人或捉对或扎堆地辩论起来……

红卫兵师的人气焰顿挫，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蛮横荡然。说实在话，虽然官办红卫兵整体实力和声势远远强于民办红卫兵，但是，各自为战的能力却从来就不是对手。这或许是：受人操控的傀儡或“驯服工具”，终究无法与挣脱了枷锁的反叛者匹敌。更何况，数十名彪形大汉，不论是动嘴还是动手，都堪称以一当十锐不可当。

2. 第一次充当谈判代表

笔者刚到“串联站”时，在“解放军济南红卫兵联络站”召集“串联站”与“红卫兵师”的见面会上，宋一民说：我们是遵照毛主席“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而设立的，是为红卫兵小将服务的。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会一碗水端平……”

其实，笔者心里明白：这完全是“美丽的谎言”！不久，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当“红卫兵师”强势时，他们“来不及做出反应”，任由“红卫兵师”放手砸“串联站”牌子和办公室。当“串联站”援兵赶到而“红卫兵师”处于劣势时，他们则迅速做出了反应，出面“居中”调解。

他们要双方各出两名代表进行谈判，高士健与笔者代表“串联站”。高士健阳刚而激烈唱“红脸”，笔者阴柔而冷静唱“白脸”，可谓“刚柔相济相得益彰，义正词严有理有节”。

尽管宋一民等对“红卫兵师”心存回护，但是“一碗水端平”

的执法者形象也不便轻弃。最终，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迫使对方承认：“将思想观点分歧升级为暴力行动是不对的”。我方也高姿态保证：“不再继续追究，也不会以牙还牙”。并形成书面《谈判纪要》，双方签字画押。

自此，笔者与高士健结为至交，交往半个多世纪。

四、“鲁大主义兵”争座次

曹靖、张发玉接掌大权后，“主义兵”从上到下“唯我独革，舍我其谁”的极左思潮急剧膨胀，对外自诩“鲁老大”，不甘居于山师王竹泉之后屈居“鲁老二”。对“串联站”联席会议和联合行动，态度冷淡消极，最终拒绝出席联席会议。

对这种自命不凡、妄自尊大的做派，笔者反感而忧虑：难道座次和名分就那么重要？连乡野儿童都知道团结就是力量，“谁胜谁负”八字还没见一撇，就兄弟阅墙争座次、闹内讧，如何战胜手握强权的“走资派”和人多势众的保守派？

当时，也曾考虑过去留问题：同班同学都“长征串联”去了瑞金和井冈山，此时只身一人回到学校，除了忍受难耐的寂寞和孤独，还能干什么？继续留在“串联站”，起码还能维持兄弟院校造反派之间表面的大联合形象……

五、山东省红卫兵联络总站

“主义兵”从争座次走向了另立山头，又一个“乱世英雄”粉墨登场了。

邵长文，曹靖的同班同学。在“大串联”中，与昌潍医专的张继胜、烟台师专的刘继光一起，联络两地的中学造反派红卫兵成立了“山东省红卫兵联络总站”，并以“鲁老大”代表的身份自任“总负责人”。

1967年初，邵长文率领一些外地中学造反派红卫兵抢占省委大院，无异于单方面“抢权”，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造成了诸多

副作用。

1. 对于邵长文打着“鲁大主义兵”旗号另立山头的行为，包括中四他同班同学在内的绝大多数“主义兵”都坚决反对，甚至对外声明：他无权代表“鲁大主义兵”！然而，“红联总”进占省委大院后，许多被“极左”思潮控制的头头儿和骨干却把“红联总”视为“主义兵的红外围”。并选拔一批“出身好，根子正”的“主义兵”战士，组成“红色敢死队”进驻省委大院（化二丙班学生、烈士子弟孙玉朝任队长），与“红联总”并肩战斗。从而，把“主义兵”“山工联”拖进了“破坏大联合，单方面抢权”的泥坑。

2. “红联总”唯我独革、舍我其谁的狂妄心态，以及排斥造反派战友独吞“胜利果实”的霸道做派，理所当然遭到兄弟院校造反派的反感和反对，造反派队伍大分裂无可挽回。这种“自残式”的内耗，削弱了文革派继续革命阵营的实力。这种副作用，在其后的两年里无时无刻不在，致使山东省文革“气血两亏，四肢乏力”。

3.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条件不容忽视。否则，如果不能慎重把握“合法性”原则，不注重趋利避害的斗争策略，难免“疤痢眼照镜子——自找难看”。“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不论如何“动嘴”揭露批判走资派的罪错都是“合法的”，都会受到“毛中央”继续革命国家法权（最高权力）的支持保护。然而，一旦要“动手”夺取省委“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就绝非仅凭想当然就能自主决定的，必须首先面对“是否合法”的判断选择。纵然是民主制度相当发达的国家，痛骂总统无罪，但要占领政府机关也难免因为违法而受到镇压。何况中国这类“苏联模式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主义兵”头头儿们却认定：只要人多势众拳头大，就能造成既成事实，逼迫别人乖乖就范。便“老子天下第一”恃强凌弱、横行霸道，忽略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存在，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柱石”——军队的存在。结果，拒绝“大联合”，既失去了民心，又失去了“毛中央”的认同和保护，只能授人以柄遭到镇压。

只可惜，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并未被“鲁大人”所接受，极少有人像“中四”那样深刻检讨和反省，而是一味怨天尤人。以至于，又为以后“闹翻案”第二次遭劫埋下了祸根。

六、王竹泉冲冠一怒，“红卫兵山东指挥部”诞生

“红卫兵山东指挥部”是造反派队伍内讧的产物。

1967年初，经过数月动荡和无政府状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成了新的运动大方向。当时，工厂、农村、机关等造反派组织，大都是造反派学生串联、发动、组建起来的，“唯红卫兵马首是瞻”，造反派红卫兵成了实际上的领头羊。所以，能否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关键在于：各种名目的民办红卫兵组织能否实现大联合。

1. “大联合”诚意遭亵渎

面对造反派内部的分裂趋势愈演愈烈，作为省会济南的民办红卫兵“实际领袖”，王竹泉内心十分焦急，出于社会责任感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主动登门找邵长文商谈山东造反派红卫兵的大联合问题。

事前，他与身为“鲁大人”的笔者商谈过，基本模式是：以“串联站”为基础，扩充青岛、烟台、曲阜等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山东省大学分部”；以“红联总”为基础，扩充济南、青岛等地中学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山东省中学分部”，合二而一组成“红卫兵山东省总部”。若能与邵长文达成共识，再邀请青岛、曲阜等外地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共同会商实施。

一天上午，王竹泉与笔者一起骑自行车到了省委大院东南办公厅楼二层一间大办公室见到了邵长文。他披着棉军大衣，戴一副浅色框眼镜（笔者第一印象：与儿时所见过的乡长张连祥差不多，只有呢子大衣与棉布大衣、墨镜与眼镜的差别）。王竹泉向他说明来意，表示了大联合诚意。不料，话还没讲完就被邵长文打断了，他傲慢地拒绝道：“你们是济南市红卫兵串联站，我们是山东省红卫

兵联络总站，怎么联合？如果真想联合，你们加入进来不就得了！”

真可谓“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无异于当头一盆冰水，王竹泉被呛得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改称‘国际联络总站’，你就能成世界革命领袖吗？”

笔者更是羞愤难当，既为这等无知傲慢的“红卫兵领袖”而愤慨，更为有这样连起码教养和礼貌都不懂的“同学加战友”而羞愧。

2. “串联站”更名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在返回路上，两人只顾闷着头蹬车，除了狠狠骂了几声娘都很少说话。到了历山旅社，王竹泉怒火未消当即宣布：从今天开始，“红卫兵济南串联站”改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并立即安排专人负责赶制新牌子。

从此，“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宣告诞生。

七、造反派分裂成温和派与激进派

从“红联总”进驻省委大院起，省委无法继续正常办公了，主要领导人大都住进了荣军医院或其他医院高干病房。由于不能获得省委领导的指示，红卫兵师气势锐减，最终濒临瓦解。民众自治的文革随即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1. 激进派与温和派分道扬镳

然而，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及平民阶级民主素质决定了，文革不可能从“造反派的胜利”走向“平民阶级的胜利”。两千多年的官僚专制在泯灭人性、培养奴性的同时，也扼杀了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至于，惯于内讧、内争、内耗的“一盘散沙”愈演愈烈。

在民众自治的文革后期，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再一次重复了这种历史悲剧，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

①. 激进派组织体系

以“鲁大主义兵”为精神领袖，树立起了两大“山头”：一是

“红联总”以鲁大中四学生邵长文为掌门，号称“10 万天兵天将”。二是“山工联”（山东省工人造反联合会）以鲁大汽车班工人董金福为掌门，鲁大政三学生范长江为顾问或军师，号称“80 万产业工人大军”。

②. 温和派组织体系

以其他五所驻济高等院校（外加“省团校”）造反派红卫兵为精神领袖，树立起了四大“山头”：一是“红山指”（红卫兵山东指挥部），以山师政四学生王竹泉为掌门，人数一万余人。二是“山工总”（山东省工人造反总指挥部），以济南市印刷机械厂工人韩金海为掌门，除了汽车总厂大都是被“山工联”排斥在外的中、小厂矿“非产业工人”。三是山东省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包括省京剧团、省歌舞团、省吕剧团、省戏校等造反派，以省歌舞团常新文为掌门。四是省直机关干部造反组织，包括：以杜春胜为首的省委机关造反派、以刘新德（省财政厅）为首的省直机关造反派、以武如山为首的大众日报社造反派、以花光隆为首的省公安厅造反派，等等。

2. 激进派与温和派战火愈演愈烈

两派彻底决裂形成组织体系对抗，造反派之间的“内战”取代了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外战”。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对攻战铺天盖地，宣传车、高音喇叭轰炸战震动泉城。

①. 相互指责为“新老保”

当时，社会舆论已经改变，“保守派”“保皇派”“老保”，不再是“党的忠诚卫士”，而变成了“走资派的御用工具”。保守派为了与“走资派”划清界限，又避免与“造反派亡命徒”混为一谈，自称为“革命派”，随之“铁老保”称呼也成了“恶意攻击诬蔑”。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内战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是言之凿凿地攻击对方是“新老保”“新保皇派”。

为了充分展现自己“真造反派本色”，以反衬对方的“假造反派嘴脸”，双方开始争抢批斗省委“走资派”。为了不给对方揪斗

“走资派”的机会，又对省委“走资派”藏起来垄断独占。由此，又引发了一场“口水讨伐战”：激进派攻击温和派“名为揭批白如冰，实为保护最大走资派”；温和派则攻击激进派“名为揭批谭启龙，实为保护头号走资派”。

②. “君子协定”并非莫须有

数十年后的今天，流泻出的“内部讲话”等诸多史料证明：谭启龙等并非被动地“被抓”，而是主动地“投靠”。支持山东夺权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和平让权，君子协定”之说，并非“莫须有的虚构”，更非“蓄意陷害”。

③. 内战主旋律外的小插曲儿

省委当权派之间潜在的旧矛盾也公开化了，谭启龙、苏毅然支持激进派，白如冰则倾向温和派。“二·三夺权”后，谭启龙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白如冰“被解放”，成了“省五七干校”校长。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白如冰因为“见风转舵，投降变节”，成了“风派”代表人物，被“邓中央”所唾弃，官运不畅。谭启龙则因为“立场坚定，惨遭迫害”，成了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不忘旧情，每年都专程派人慰问山东老同志们，每人一筐黄岩蜜橘，并贴上人名标签，唯独没有老搭档白如冰的份儿。

3. 苏毅然与“主义兵”的“交情”

谭启龙、苏毅然滞留山大期间，生活起居和日常活动由李本玉（“主义兵”对外联络组组长）负责。虽然没能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通过多日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却也真正了解了“老造反派”（他们曾经要抓的“新右派”）真实的思想观点和内心情感。后来，苏毅然复位后一直对“鲁大主义兵”印象不错且多有回护照顾。

苏毅然与李本玉还结下了一段“友情”。他急匆匆离开时，秘书将公文包丢在了山大。李本玉发现后，以“主义兵总部”的名义写了一张警示纸条贴在包上：“这是省委xx的公文包，里面可能有

机密文件，切勿乱动！”并与省委有关部门电话联系，通知其秘书来学校认领了回去。

1974年春，在中央举办的“山东省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晚饭后散步时，苏毅然亲口与笔者谈起此事并深表赞许。

4. 笔者：第一次成了“鲁大叛徒”

1966年底1967年初，造反派内部的派仗火药味儿越来越浓了，“红山指”由历山旅社迁到了山医朝大门口的楼上。山师“串联兵”向“红山指”报告：“主义兵”已经把宋书星定为“鲁大叛徒”，并计划“抓回学校公审”。省团校造反派二把手、派驻“红山指”的代表赵树森告诫笔者：无事不要离开山医校园，有事外出时，最少要有一人陪同……

第四节 筹备“夺权”

邵长文“准夺权”后，激进派“单方面抢权”行动急剧升温，两派群众冲突愈演愈烈。温和派首领们也加紧了筹备“夺权”的脚步。

一、“夺权筹备会”

1967年1月中下旬，王竹泉与笔者开始了频繁的串联活动，先后串联杜春胜、武如山、刘新德、常新文、刘长茂等十多人，在山东剧院二楼举行筹备会，商讨“夺权”事宜，并起草《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筹备会声明》（记忆不很准确），会议开了一下午加一通宵。

数十年后的今天，对每个人的发言内容，记忆都朦胧模糊了，唯有与“丐帮帮主”的偶遇终生难忘。

第二天清晨会后，笔者与王竹泉等七、八人到西门桥附近的汇泉饭店二楼吃早点（烧饼、油条、豆浆）。疲劳不堪、困意难消，便到楼下门外一边“醒盹儿”一边等候其他人。当时，汇泉饭店和其他店铺在同一栋连体二层楼上，楼南面搭了个席篷，白天供顾客

和员工存放自行车，晚上则成了丐帮的栖息地。笔者出门后正赶上他们十几个人分派任务，“帮主”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女孩儿，别看跛一条腿、眇一只眼，就连五六十岁的老乞丐都绝对服从她的吩咐。笔者大脑中蹦出一个雅号——“跛足独目凤”。她把众乞丐分成三人一组、指定负责人，将旧布袋、破瓷碗、茶缸子等分发给众人，分别派往火车站、汽车站、大观园、泉城路等等闹市区，并宣布：谁也不准到别人的“领地”去！众人走了以后，她便悠闲地哼起了小曲儿。

笔者问她：“你咋不去要？”她头不抬、眼不睁，平静安详地说：“我不去，到饭时他们会把好吃的送来。”

笔者心灵像是被什么猛撞了一下，闪过一个念头：这可真是“乞丐有乞丐的快乐，皇帝有皇帝的烦恼”。苦与乐，存乎一心，大都是自找的。……什么名权利？身外之物，更应是心外之物。得，未必福，不足喜；失，未必祸，不足悲。

正是这次偶然的点化和感悟，使笔者在其后数十年起落沉浮中，得以心理较轻松地化解了诸多烦恼。

二、王效禹来济南“夺权”

1967年1月31日青岛市夺权九天后，青岛市革委主任王效禹手持中央指示“尚方宝剑”，率领青岛市革委代表团来到省会济南，主持筹备山东省的“夺权斗争”。

代表团成员有王效禹、张子石、孙枫丹、彭世杰、王世岐（山大中四学生，“声援三大院校代表团”及青岛市革委“第一笔杆子”）等十多二十来人。

当晚，在山东宾馆三楼会议室召集济南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开会，商讨山东省夺权问题，“红山指”王竹泉和笔者等到会。公安厅造反派负责人花光隆首先发言，向济南造反派介绍了王效禹：这是青岛市革委主任王效禹同志，是入党多年的老干部，在青岛市夺权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他是奉“中央文革”指示，来济南与各位造反派战友一起商讨向省委夺权问题。

然后，每个与会者作了简单自我介绍。笔者碰巧与王世岐邻座，当自我介绍“我叫宋书星，是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红卫兵山东指挥部代表”后，王世岐也主动向笔者作自我介绍。继而，孙枫丹等也离开座位到笔者身边热情握手打招呼，并给笔者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字体遒劲而秀丽）。

当时，有关夺权斗争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是造反派内部分裂冲突愈演愈烈。自我介绍后，王竹泉介绍两派分歧、分裂、内讧的根源和由来。

笔者随后作了简要补充，重点介绍了温和派争取大联合的努力，以及与邵长文会谈的过程和结果。其间，王世岐插话：“我们中四同学都知道，邵长文既无头脑又无水平，写东西都狗屁不通。怎么能让他当‘联络总站’负责人呢？”

济南造反派汇报完后，王效禹接着讲话：“我们来之前，原本打算到济南后依靠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战友大联合一起夺权。现在看来不行了，他们闹分裂、搞唯我独革，违背中央大联合的指示……”

会议进行中，笔者被花光隆拉着去处理“主义兵冲击公安厅事件”。其实，花光隆的本意是：为了“保守筹备夺权的最高机密”，必须严防“鲁大主义兵”的人混入！作为公安厅政治部主任，他对“阶级敌人专政”已久，既定思维传统根深蒂固：每个人都形迹可疑！为了确保安全，“宁可冤枉多人，绝不漏网一个”……

从此，笔者又从“鲁大叛徒”变成了“鲁大主义兵二线人物”！虽然觉冤枉，但从未耿耿于怀记恨过谁：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大革命年代或政治斗争非常时期，这种“误伤”无处不在不胜枚举。

三、“131 冲击公安厅事件”

当时，真可谓动荡年代，群情激昂、人心浮动，各种传言和谣言不脛而走。1967年1月31日，一条消息四处流传：“公安厅抓了老造反派战友”！晚上，众多“主义兵”学生和其他单位激进派群众涌进公安厅大院“营救战友”。结果，被“关门打狗”圈禁在了

院内。此即“冲击公安厅事件”，激进派则称为“陷害老造反派的‘白虎堂阴谋’”。

夜已很深了，隆冬腊月寒气逼人。花光隆领着笔者进入公安厅大院，千余名群众挨人站满了整个院落。楼门口、一楼走廊上站满了公安厅的人，与院内群众形成对峙。花光隆将笔者带进二楼一间大办公室。一位“公安”简要汇报了情况后，花光隆问笔者：“怎么办？”笔者说：“群众大都不明真相、误信谣传，应动员他们尽快离开。”花光隆表示赞同。然后，笔者在花光隆等陪同下，站在楼门口台阶上，作了简单的动员讲话：第一，毛主席党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冲击公安机关，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必须立即撤离。第二，希望以后要冷静思考，明辨大是大非，不要轻信谣言，不要跟着少数人瞎跑……

众人慢慢散去。花光隆提出，要笔者到大门口看看，有没有“坏头头儿”。其意昭然：如果有就抓人。笔者心中涌上一丝不快：两人交往数月，当他遇到疑难时，都向笔者请教或求援，可谓尊敬有加。现在却把笔者当成了告密“鹰犬”，令人难以接受。沉吟片刻，还是答应了。直到众人散尽，也未指认出一个“坏头头儿”。

这或许是笔者坐实“鲁大主义兵二线人物”的重要“铁证”。从此远离了山东省夺权斗争的筹备中心。

四、民众自治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教训

毫无疑问，以红卫兵运动为代表的民众自治的文革，是文革群众运动的真正高潮。虽然它历时短暂仅存在了不到半年，但是，其伟大意义和惨痛教训都不容忽视。

1. 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作为中国第一次真正的民权解放运动，它在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对于平民阶级的民权解放，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

①. 极大地冲击了新官僚权贵的公权垄断、政治隔离和信息封

锁，“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真正成了广大民众的实际行动。他们以“关心国家大事”为己任，对上层建筑和上流社会的黑暗面大胆揭露痛加批判，七嘴八舌“指点江山”，民权意识和社会责任精神得到空前充分的张扬，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无愧于史无前例！

②. 随着新官僚权贵的“庐山真面目”暴露无遗威风扫地，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成了风中残烛，新官僚专制的权威也烟消云散了。两千多年来压在平民阶级头上和心中“怕官怕权怕政府”的奴性，以及官僚崇拜、政府崇拜和国家崇拜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代之而起的是民权意识的觉醒以及人性解放、思想自由和行为自主。

③. 除了1957年短暂的“百花齐放，大鸣大放”运动，以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基本都局限在“苏联模式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内，是毛主席继续革命国家法权对新官僚政府官权的斗争。平民大众只是旁观者或“被运动的对象”，他们民权解放的理想追求少有表露和伸张的机会，民众自治的文革给了他们第一次充分表露和伸张的机会。

④. 此前，平民阶级只有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或武装暴动等“非法斗争”经验。而民众自治的文革给了他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合法斗争的第一次尝试和体验。前者是变态化社会的矫正力；后者则是常态化社会的推动力，对于平民阶级的民权解放和民主政治发展，更具有长效性的示范意义。

⑤. 它是平民阶级第一次真实的民权体验，也是民心民情民意第一次客观真实的表露。为以后的社会改革或继续革命实践，提供了国民民权觉悟程度、自治能力、民主管理能力等民主素质的真实数据。这是任何理论学说都无可替代的。

⑥. 中国在漫长的专制社会，名曰君主专制，实为官僚专制。诸姓王朝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代又一代，名副其实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仅见于各朝“其兴也勃焉”的开国之初一两代人。其后，便是愈演愈烈的官僚专制。整个官吏队伍及其官权急剧恶性膨胀，寄生于日益孱弱不堪重负的社会肌体上，野蛮贪婪地吸食劳动人民的血汗，

直至民不聊生揭竿而起。此即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患痼疾！

民众自治的文革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民众自治的“无官社会”，社团政治取代了威权政治，民众自治取代了官僚专制。从中央到地方，五花八门、等级森严的官权专政机器一律“停摆歇菜”。然而，天并没塌下来，老百姓生活一如往常，各厂矿企业的生产活动也都照常进行。95%以上的民众，不分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人人平等，充分享有两种自由和自主权利：其一，摒弃了一切形式的政治垄断和信息封锁，国家大事和政治活动公开透明，全国人民通过大众传媒直接接受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和党中央号令，自主决定政治立场，自我规范政治行为。其二，摒弃一切形式的官员专制包办和“代议”，自由行使“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力，直接表述对国家大事和社会公事的政治诉求或批评意见。

民权得以充分伸张，本身就是社会稳定最强有力的保障，“群防群治，群众专政”其权威性和威慑力远远超过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专制！公、检、法被“砸烂”了，社会却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犯罪率时期。

后来，一些单位和地区发生的停工停产、“天下大乱”和“全面内战”，完全是新官僚权贵文官或武官们反文革路线因势而作的“杰作”！

2. 事实胜于雄辩

当时，笔者村里庄乡们两派对立也很严重。原来大队、小队干部都靠边儿站了，新班子又成立不起来。八月十五过了，熟过头儿的棒子（玉米）还戳在地里没人收。

刚满十五岁的小妹，与十来个同龄小姐妹一啮咕，乘着月光把一块七、八亩地的棒锤子掰下送到生产队场上，整整干了一个通宵。

大人们一看，连孩子都这样儿，咱再不干那还算人吗？于是，纷纷“搁置争议”齐心合力完成了秋收秋种。所有秋庄稼没有一样像五八年“五风”时那样烂在地里。

两相比较，发人深思！民众自治的文革证明：脱离平民大众的官僚机构像一条盘绕在社会机体上吸食民脂民膏的巨大寄生虫，它之于社会进步的破坏作用远远大于促进作用，理应而且可以逐步精减直至废除。

3. 历史教训值得牢记

中国官僚专制的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太漫长太沉重了！平民阶级的自主能力和民主能力奄奄一息，被扭曲到了病态化怪异程度。一旦搬掉压在他们心中和头上的官僚专制大山，又心理失重和行为失控，积压在内心十多年乃至数千年的冤、怨、怒“三气”以火山喷发之势猛烈爆发或爆炸开来，其破坏性和破坏力可想而知。

①. 片面强调阶级矛盾的对立对抗性（“你死我活”），否认相互依存、共生共进的统一性；片面强调“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忽视政策和策略的保障作用，既不懂得合法斗争的意义，更鄙视和平改良，拒绝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条件（法律规则）规范继续革命行动，对当权派以牙还牙、残酷斗争，既加剧了阶级矛盾斗争的破坏性冲突，又吓跑了平民阶级中间派大多数。

②. 即使革命队伍内部，也要“纯粹而又纯粹”。片面强调“反对折中调和”的斗争性，拒绝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阶级大联合，更拒绝五湖四海的统一战线。始终未能形成平民阶级的合力，极大地削弱了人多势众这个唯一的阶级优势。而且，相互之间山头林立、派仗不休，造成了革命力量的严重内耗，根本不能像成熟的革命者那样冷静思考谨慎选择，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

民众自治的文革到头了，进入到革委会领导的文革新阶段。

第四章 革委会领导的文革

(1967.2—1969.9)

历经半年的“天下大乱”，打破了新官僚文官专制旧秩序。为了尽快结束“无法无天”混战不休的局面，“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建立新的政权组织以填补延续了数月的“权力真空”，进入了革委会领导的文革新阶段。

毋庸置疑，各省、市（自治区）的“夺权斗争”实际上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夺“旧省委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二是夺造反派红卫兵对运动的控制权。

后者的合理性与历史功绩同样不容否定，它结束了愈演愈烈的造反派内讧内战，终止了文革阵营内部破坏性冲突所导致的内耗，避免了民众刚刚苏醒的民主基因恶异化成“巨噬细胞”在混战中相互吞噬同归于尽。

第一节 “二·三夺权”

1967年1月31日晚，王效禹在山东宾馆“夺权见面会”后，又不止一次召集过夺权筹备会。因为，王效禹手中握有“毛中央”尚方宝剑，不仅温和派造反群众组织代表一呼百应，即使军队代表也“少有疑义”。笔者猜测：或许是“军委办事组”或“军委文革小组”打过招呼？

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在高度秘密状态下组建成立了。首先确定了常委班子（中央批准前）：

“青岛市赴省会夺权代表团”：王效禹、张子石、彭世杰；

“红山指”：王竹泉（山师）、徐金华（山医）、孙振发（山工）、姜庆本（省团校）；

“山工总”：韩金海、刘长茂、张美智；

省委机关造反派：杜春胜（省委办公厅）；

省直机关造反派：刘新德（财政厅）、花光隆（公安厅）、武如山（《大众日报》社）；

济南市委机关造反派：王新阳（宣传部）；

军队代表：童国贵（省军区司令）、何志远（省军区政委）、赵修德（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陈凤来（省军区）；

领导干部：穆林、晁哲甫、王路宾、王立波。

中央批准后，又增加了：杨得志（济南部队司令）、陈雷（原省检察长）。

如下几点可以肯定：①“常委”并非“由全委会投票选举”产生，而是先有了常委才有了委员。②除了王效禹，其他领导干部此前并无“站出来”的实际行动，更非“取得了群众谅解”，而是由王效禹拉进省革委的。③所有群众组织代表都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并未经过本单位和本组织群众充分酝酿民主选举。④王竹泉、姜庆本是本校造反派学生领袖，而徐金华、孙振发只是“被派出来参加会的”。

这种少数人密谋突击夺权的形式，虽然雷厉风行成效显著，但也难免负面作用，遭到不同意见民众非议和反对，被骂作“阴谋偷权”、“恃强抢权”，因而大大削弱了“省革委”的群众基础，留下了诸多后遗症。

二、激进派与温和派最后的大碰撞

1967年2月5日上午，“省革委”组织十万人在八一广场召开了“热烈庆祝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精心策划，激进派十万人同时在体育场召开了“沉痛悼念孟昭凤烈

士，愤怒声讨走资派”大会，掌权派称之为“二五吊丧会”。

1. “庆祝会”与“追悼会”对台戏

“追悼会”的起因是：山大电子系一年男生“主义兵战士”孟昭凤在一次翻车事故中被卡车压死，其他人人则安然无恙。根据这个“疑点”，又经过一番“小说思维”演绎，得出了“铁案如山”的判断——“走资派御用工具公安厅阴谋制造的残酷杀害老造反派的大阴谋”！

第二天，印有孟昭凤“惨遭杀害”照片、质问“这是为什么？”“血债要用血来偿！”等口号的各种传单，像雪片一样飞遍泉城大街小巷。2月5日又在体育场举行了“追悼大会”。

当时，笔者已经成了“闲人”，八一广场的“庆祝夺权胜利”大会与我无关，更不愿意去体育场“追悼革命烈士”，便找了一辆吉普车，到大街上“观光”。据目测、耳闻及听人介绍：“追悼会”声势浩大、口号震天；而“庆祝会”不仅人数少，而且群众事先根本不知所以然，因而会场气氛冷冷清清、口号稀稀拉拉。但是，因为济南部队出动了大批大炮、军车，“庆祝会”形色大壮气势大增。而“追悼会”，除了人多势众以外，就显得有点儿寒酸了。

尤其，“庆祝会”还派出直升机飞临体育场上空撒传单，向“受蒙蔽的群众”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螺旋桨搅起的狂风夹杂着轰鸣声震颤每个角落，“热烈庆祝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认清一小撮坏头头儿的反革命阴谋”等传单雪片似的从天而降。许多愤怒的群众仰起头、挥舞着赤手空拳，诅咒“新走资派的法西斯暴行”……

两相比较的强烈反差更为“追悼会”增添了几分悲壮，也预示了“谁胜谁负”的结局。

2. 两支游行大军夺路大碰撞

两个大会几乎同时结束，又同时在同一座城市开始游行示威。笔者乘坐的吉普车沿文化路东行至体育场北门外，有幸目睹了两只游行队伍一场空前的夺路大战。

双方各有数百辆汽车，拥堵在马路上互不相让，汽车喇叭声、

高音喇叭声交响回应震耳欲聋。原本相互敌视火冒三丈的人们相互指斥怒骂，甚至相互撕扯起来。山大汽车班造反派司机“孙大鼻子”的夫人“孙二娘”表现尤为抢眼。三十来岁的妇女，操着东北腔撒泼破口大骂：“日你奶奶，不要命了，老娘跟你们豁上了！”一边骂、一边发疯似的跳出驾驶室，跳上对方一辆卡车驾驶室踏板，隔着车窗揪住司机的前胸衣襟，拼命往外拖……

这是“鲁大主义兵”最后的疯狂，也是最后的“辉煌”。

激情燃烧得几近疯狂的年代！人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信仰，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与改开后人们的精明算计相比，真可谓彻头彻尾的傻瓜和疯子……

三、“主义兵”和“山工联”成了反革命组织

“主义兵”和“山工联”造反精神恶性膨胀，致使毫无政治敏感，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真意和规则一无所知，更不屑于密切关注冷静把握党中央意向和客观形势，盲人骑瞎马似地勇往直前“一反到底”。结果，把无辜民众的命运连同大民主权利，轻率地押上了政治博弈的赌台，遭受到继工作组之后的第二次大镇压。

关于“主义兵”“山工联”的定性和处理问题，省革委曾经发生过分歧和争论：

以公安厅花光隆、“山工总”韩金海等为代表，认为：“鲁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冲击公安机关、冲击解放军，就是“阶级敌人操纵控制的反革命组织”，必须坚决彻底镇压。军队代表大都支持或默许这种意见。

以“红山指”王竹泉为代表，坚持认为：“鲁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不是什么“反革命组织”，而是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群众组织。虽然在“大联合夺权”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对山东文革做出过很大贡献。对他们不应当镇压，而应当通过批评教育，团结广大老造反派群众。

争论不休，难能统一。最后，王效禹折中调和一锤定音：“鲁

大主义兵”都是青年学生，“山工联”也是最大的造反派工人组织，牵连全省数十万群众。干坏事的只是极少数头头儿，绝大多数群众都是上当受骗跟着跑的。“反革命组织”不应当是“鲁大主义兵”和“山工联”整个组织，而应当是他们总部一小撮头头儿。

四、围剿“主义兵”和“山工联”

“鲁大主义兵总部”及其控制下的“山工联总部”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终于为自己目空一切的狂妄付出了沉重代价，饱尝了被自己极度蔑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血腥气。

1. “总部”头头儿被一网打尽

关于“主义兵总部和山工联总部是反革命组织”的严正声明一经公布，凄厉的警车啸叫伴随“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高音喇叭声，将激进派“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冲天牛气扫荡一空。曾几何时，他们以“鲁老大”自居，自恃人多势众，迷信“拳头大就有理”，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然而，一旦面对军警的“资产阶级专政”，便立刻土崩瓦解了。

“主义兵”曹靖、张发玉，“红联总”邵长文，“山工联”董金福、张金城、蔡长江等，相继银铛入狱。广大无辜民众的慷慨激情荡然，一边怨天尤人“操爹日娘骂祖宗”，一边豕突狼奔如鸟兽散。

中国自古以来，不论在相互拼杀的战场上，还是在争权夺位的政治舞台上，强者对弱者、胜方对败方，从来就不会心慈手软，而是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尤其是，书面文件可以咬文嚼字，容易分清“整个组织”还是“总部头头儿”，然而，一旦付诸实践行动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局面了。逮捕了“总部坏头头儿”，摧垮了激进派造反组织，还要继续“宜将剩勇追穷寇”。于是，又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现代神话产生了：“主义兵”垮台前，安排了大批潜伏的“二线人物”流窜各地，阴谋“分散发动群众，农村包围城市”。

于是，全省从城市到乡村展开了一场声势更浩大的围剿战。各路各级新老“土皇帝”为“政治需要，凡是需要整治的人都成了“主义兵二线人物”。

2. 全省大围剿

全省各地旧当权派垮台后，由省军区、各地（市）军分区、县武装部、社队基干民兵构成的军队系统，成了上下贯通的唯一行政通道。此时，又顺理成章地成了围剿“主义兵二线人物”的主力军。

尤其是，各军分区、武装部的军队当权派，大都原本就与地方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僚之间难免同病相怜、同气相求，成为反文革势力的潜在力量。压抑已久的怒气终于有了喷发机会，更是“宁左勿右”，层层传达、坚决贯彻“上级命令”：

①. 各公社、大队都建立空前严格的基干民兵组织，并发放枪支，有的还发放了弹药。

②. 各村一律实行“民兵联防连坐”制度，在各个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

③. 一旦发现流窜的“主义兵坏头头儿”，立即抓捕、押送至公社武装部、县武装部，或严密控制起来立即报告上级。

④. 隐瞒不报、包庇纵容者，严惩不贷。

如果说，在省会济南“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主要是砸向“主义兵总部坏头头儿”的话，那么，到了下面各个地（市）、县、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则完全指向了山东大学（不分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乃至全国大、中专学校的所有学生。

当时，正值春节之际，笔者家乡乐陵县各村基干民兵接到“上级”命令：为了不使一个“鲁大主义兵坏头头儿”漏网，凡是在外地上学的学生回乡探亲者，一律严密控制起来，并报请上级严格审查，确认不是“主义兵坏头头儿”后才能释放。无异于“宁可错抓一千，严防一人漏网”。

五、中央批准山东省夺权斗争

“二三夺权”后，中央通知省革委推举工、农、兵、学、干等各界各派代表组成代表团，赴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可怜“鲁大主义兵”都被打跑或吓跑了，除了拖家带口、无法逃窜的教职工，以及少数“自信一身清白”的保守派或逍遥派，整个山大都“万户萧疏鬼唱歌”空荡荡的了。省革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丁式地找到三个造反派群众作为“鲁大主义兵”代表，纳入“山东省各界代表夺权汇报团”。他们是：物理系教师王东才、政一学生陈元松，外一学生张元苓。

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军委首长”等“毛中央”几乎全体大员，都出席了汇报会并作了“重要指示”：其一，坚决支持山东人民的夺权斗争及其“省革委新政权”；其二，充分肯定“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道路；其三，严厉批判“鲁大主义兵”的“极左错误”。

其后，人民日报又专门发表社论，将上述指示精神进一步文本化、权威化：……山东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阶级斗争的紧急关头演出了假夺权的丑剧，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些反动分子，利用各种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收买某些组织的个别头头儿，把这些人变成他们的代理人和保护人，他们进行秘密交易，搞什么“君子协定”“和平让权”，以达到幕后操纵、保护自己、继续把持权力的目的。同时，他们利用那些受蒙蔽的群众，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施加压力，使工作机构陷于停顿，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们狂妄袭击公安部门，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必须彻底揭穿，迎头痛击！……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不搞联合、搞单干，不搞团结、闹分裂，不搞“三结合”而排斥一切领导干部，排斥一切其他的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鲁大主义兵”三位代表，毫无政治素质和经验可言，好不容易见到了“中央首长”，就像被人暴揍一顿的孩子见到了亲娘，只顾感动得热泪满面失声痛哭，顾不得审时度势“高姿态假检讨，抓

住机会争取主动”，反倒要为自己辩解开脱，倾倒挨揍的委屈和苦水。结果，又遭到了“中央首长”尤其是康生的严厉训斥。他们唯一的收获只有，当自我介绍是“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时，江青插话：“主席历来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还是称‘毛泽东思想’好。”从而，为后来恢复或重建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提供了“中央首长亲切关怀和指示”的尚方宝剑。

六、“二七拜大年”（第一次围攻“鲁大”）

莫说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激进派，即使在比较冷静的温和派里，像王竹泉那样头脑清醒者也寥若晨星。绝大多数人都是权力意识强烈，阶级觉悟缺失，把“唇亡齿寒，兔死狗烹”的历史教训忘得一干二净。

1967年2月7日农历大年初一，四百多辆汽车巨龙蜿蜒游行穿越山大校园。“打倒主义兵总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高音喇叭口号声震颤每个角落，大长了“无产阶级红色新政权”的威风。……接着，所有高音喇叭、宣传器材、笔墨纸张等被搜罗一空，连外文系教学用的录音机、物理系的实验设备等等也未能幸免。

七、伟大的壮举

然而，一件“伟大的壮举”令笔者终生难忘。

当时，两大苹果筐金银珠宝首饰（各派抄家的战利品）就摆放在“主义兵总部”办公室里。各色民众数以万计，且分属全市各个不同单位，彼此互不相识，可谓乌合之众。然而，该办公室进进出出不知多少人次，却无一人随便乱动。

后来，一向爱管闲事的会计“孙秃子”（孙玉容）用平板儿车拉到老校财务科锁进了铁皮保险橱。退赔认领时，从未听说谁说少了什么东西。

何等不可思议的奇迹！只有在革命年代，只有真正的大民主，才能唤起民众的人格尊严，创造出如此“惊天地，泣鬼神”人间奇迹！

第二节 “主义兵二线人物”

“追悼会”与“庆祝会”大碰撞次日，笔者冥冥中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更兼清闲得百无聊赖，犹豫再三终于在2月6日农历年三十（或小月二十九），依依惜别地离开“红山指”，回乡陪老母和小妹过年。

一、长途汽车站：遭遇逮捕和“示众”

当时，围剿“鲁大主义兵”的指令尚未传达到乐陵县，笔者得以在年三十傍晚回到家中，赶上了除夕年夜饭，给卧病在炕的母亲和小妹以极大的安慰。

那是怎样动荡不安激情燃烧的岁月啊，人人都被弄得神魂颠倒。大年初一整天，笔者都魂不守舍心不在焉，家庭的温馨无法抵御政治风暴中心那种血雨腥风生死未卜的悬念：“主义兵”是我参与创建的，“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同样是我全身心投入其发展壮大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是否又发生过更大的骨肉相残？……牵肠挂肚的滋味实在难以忍受，顾不上反哺病中的母亲，于大年初二凌晨又急急忙忙返回了济南。

笔者乘坐的汽车尚未停稳，长途汽车站的高音喇叭就传来“亲切的召唤”：“乐陵来的宋书星同志，请到车站办公室！”笔者全身涌上一股暖流：“不知‘红山指’哪位战友来接站了？”……急急忙忙挤下车到了车站办公室，见到的却是四五个陌生面孔。其中一位盯着笔者问道：“你就是宋书星？”笔者答道：“我就是，请问……”话未讲完，其他几人蜂拥而上抓住手腕来了个“别鸡翅”，外加揪住头发来了个“仰天长啸”（嘴巴根本无法合拢，只能半张开）。随后，押到院子里现场批斗示众：“这就是流窜到乡下搞农村包围城市的‘鲁大主义兵’坏头头儿！”

接下来，便是二十来个候车的围观群众一阵劈头盖脸、急风暴雨式的拳脚和口水，表达了“对反革命的革命义愤”。笔者头脑中闪过及个恶毒的字眼儿：群氓，一群流氓！

其后数十年，每当忆及那一幕，心中就泛起一丝悲哀和凄凉。不是为自己遭遇不幸，而是为同胞无药可治的“人性本恶”和落井下石闻风而动（手）的猪脑子……

二、济南市公安局：单独关押两昼夜

汽车站“批斗洗礼”后，那几个人用汽车将笔者押往济南市公安局，单独关押在南院靠经三路的办公楼二层一间大空房间里，既无办公桌椅，又无床铺被褥，更无取暖设备。正值“五九尾六九头”春姑娘来临前的严寒季节，心中寒意与屋内寒气内外夹攻。白天还好过，冻得受不了时就做室内运动，夜里却冷得无法入睡。感谢省委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斗、抄、挖、赶”运动，抄来的羊毛大地毯就卷放在墙角处。一到深夜，笔者就私自将它展开，将自己卷裹在里面，虽不很舒服，倒也挺暖和。次日清晨，再将地毯按原样卷放好，以免给“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添麻烦。一日两餐，都是“人民勤务员”送来的两个馒头加一块儿疙瘩咸菜……

如此“晾”了两昼夜，盼星星盼月亮始终不见有人来审问。这又给了笔者猜测揣摩的充分机会：连我这“红山指”元老都要抓，证明已经对“主义兵”和“山工联”下了狠手，只是不知道究竟要抓到哪一级“坏头头儿”？也不知道究竟以什么罪名逮捕了我？虽然知道“瞎猜没用，不如不想”，却无意中找到了一种打发时光的有效方式，因而并无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第三天下午，一辆中吉普停在楼门前，上来三四个便衣将笔者押解下楼塞进了车内，向北驶出市区。笔者扫了一眼，车内连司机在内一共五个便衣，外加一条牛犊子似的狼狗。笔者一如既往坚持不闻不问，心中却嘀咕起来：“难道抓的人太多直接送到黄河劳改农场？”汽车驶过商河县城，终于明白了押送目的地——故乡乐陵县。

三、乐陵县城：无人过问享清闲

中吉普开进县委大院，四个人和一只狼狗将笔者押进一间平房

办公室，接受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两个人讯问：“你是‘鲁达主义兵’吗？”笔者答：“我是！但我一直在‘红山指’工作，是负责人之一，并未参与学校的各种行动。本人回家后，除了家人和邻居相处并未接触任何人，更未做任何事。不信，可以调查！”

看来，作为掌权派群众组织领头羊，“红山指”在下面还算享有盛名。审讯者犹豫了，两人耳语了一会儿，宣布：“接上级紧急通知，‘鲁大主义兵’骨干分子已经流窜到全省各地，阴谋煽动群众以农村包围城市。为了粉碎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凡是来本县的外地学生必须老老实实就地接受审查，未经允许不准擅自离开！”

笔者终于明白了被抓原因，也大致了解了济南的运动近况和省革委的“战略部署”。

然后，被送进了县委招待所听候审查处理。当时的招待所除了房顶是“起脊儿大瓦房”，其他与车马店并无两样，一律是铺着柴草的大通铺，一人一床棉被。从此，就无人再过问了，笔者得以享受半年多来从未有过的清闲，清闲中也进一步明白了被抓的原因。

①被“就地审查”的不止笔者一人，而是所有在外地上学春节回家过年的大中专学生。

②对上级指示“活学活用，搭载私货”历来是各级当权派的传统。当时，以县武装部为代表的本地当权派和保守派，正忙于围剿“本地主义兵”——乐陵一中的造反派。原校团委书记王荣才等人被五花大绑请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

③他们之所以放着笔者这个“鲁大主义兵流窜嫌犯”不管，集中精力围剿“本地主义兵”，或许就是精明算计的结果：“鲁大主义兵”再十恶不赦，毕竟离咱很遥远，即使把他们全部剿灭了，对乐陵有多少现实意义（利益）？身边的敌人最危险！要想恢复和巩固本地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先消除身边的危险。

④当然，对为害本地父母官的外地学生，也决不会心慈手软。结果，老校长王耀华的公子青岛海洋学院造反派王士震成了“鲁大主义兵流窜犯”，被请进看守所。理由是：其未婚妻孙香兰是县城造反派骨干，他不仅支持其“臭老婆”造县委的反，而且，还亲自

为乐陵造反派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这样的人不是“鲁大主义兵坏头头儿”还有谁是？

四、二姐全力营救

“每逢佳节倍思亲”。二姐随班级长征队返回学校，到“红山指”去找笔者一起回家过年，遭遇了一片冷脸和白眼后，终于获得了一个天大的噩耗：宋书星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冷静而固执的理性烟消云散，只剩下举目无亲六神无主了。她急得打了半天转转儿，终于想起远在青岛的未婚夫高志宏，便立即到邮局拍电报：“书芳病重，速来济南”。

其时，身为青岛市革委常委秘书长、“春节拥军慰问团”副团长的高志宏，正在远离青岛港执行巡逻任务的军舰上慰问海军官兵，接到电报后其焦灼可以想见。军舰专门派直升机将其送回青岛岸上，连夜乘快车赶到济南，方知上当受骗。

二人几经辗转终于打听到：“宋书星已被押回乐陵县。”便又急急忙忙赶回老家，差点儿成为“鲁大主义兵流窜犯”被联防武装民兵抓住。多亏其堂弟徇私枉法极力回护，才得以安全到家。

不料，笔者“审查结束”返校了。

从乐陵返回济南后，随着围剿“主义兵二线人物”的不断深入，在“红山指”等昔日温和派今日掌权派心目中，笔者成了“最大的嫌疑犯”。共同战斗过的大小老战友们不见了昔日的亲切，就连油印传单的中学生小李儿也像躲瘟疫似的。

“质本洁来还洁去”，笔者在“红山指”的历史使命结束了，该是“回校闹革命”的时候了。可亲可悲可怜的老战友们历经劫难如今不知怎么样了？

第三节 与“主义兵”老战友共渡难关

任何新政权建立之初，第一政治需要都是“安定巩固”，省革委也不例外。为了维护安定恢复秩序，防止“主义兵”“死灰复燃，

济南部队和省革委向“鲁大”派驻了第一届“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

毋庸讳言，除了人员构成不同，政治目的、工作任务、操作方式等都与“原省委工作组”别无二致。

一、鲁大校园：“精神废墟，万马齐喑”

省革委、济南卫戍区、公安厅关于“主义兵和山工联总部等反革命组织”的通告发布后，“主义兵”兵败如山倒，“鲁大必胜”的牛气荡然无存：“二·七拜大年”后组织被彻底打垮了；面对《大众日报》、省电台、宣传车反复广播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二·三夺权”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社论，精神也被彻底打垮了。板上钉钉，翻盘的肥皂泡彻底破灭了。

中国人哪！中庸之道挂在嘴上两千多年了，却总是在的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蹦去：“当不成大爷，就甘心当孙子”，少有“朋友”和“兄弟”；顺境时忘乎所以，非要“主宰一切，决定一切；一切都想要，一切都归我”，一旦把道义和优势老本儿都折腾光了，逆境从天而降，又一落千丈天昏地暗，“一切都完了！”只要能活着，“一切都不要，一切都归你”。

这或许就是“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文明在中国迟迟不能健康成长开花结果的主观原因吧。

1. “官办红卫兵”复活

军宣队一进校就理所当然坚定不移地依靠保守派，并扶持组织起了“山东大学东方红公社”。

首先，为了弱化造反派群众的反感、增强组织吸引力，并未重新起用原来官办红卫兵头头儿们，而是选拔了一批“新干部”。主要负责人是数三女生孙凤玲、政一男生邢××等。

其次，彻底批判“主义兵反动思想和行径”的同时，对造反派群众开展深入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动员他们“与一小撮坏头头儿彻底划清界限”，表现好的还可以“光荣加入东方红公社”。当然，

“为了严防贼心不死的骨干分子混入革命队伍，决不容许集体加入！”

2. “主义兵”群众：精神彻底崩溃

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太强烈了！往往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面对军宣队和“东方红”强大的政治攻势，“主义兵”群众的政治信仰和造反精神彻底崩溃了。

①昔日的“最革命”纷纷反戈一击。昔日的大字报棚曾经贴满“坚决拥护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革命行动！”“热烈欢呼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伟大胜利！”等等严正声明。如今却贴满了“彻底与‘主义兵总部’脱离关系”“愤怒声讨一小撮坏头头的反革命罪行”等郑重声明。虽然“主义兵”组织伴随总部早已不复存在了，然而许多昔日的“造反英雄”却纷纷声明“集体退出”；一些曾经“引领极左潮流的干将”，如今也贴出“认罪书”“悔过书”，沉痛反省反戈一击。……“主义兵”被自己人抛弃了，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真可谓“形势一派大好”。

②“老造反战士”情绪一落千丈。政治形势大局已定，军宣队政治攻势日益强劲，即使一些良知未泯信仰尚在的“老造反派战士”，大都也情绪一落千丈极度苦闷彷徨：一是昔日燃烧的火热激情熄灭了，代之以沉重、压抑、困惑和迷茫，战友相见泪眼模糊，实在无法排遣时就低声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二是昔日“舍我其谁”的慷慨激昂风流云散，代之以三缄其口“莫谈国事”，即使对军宣队和东方红公社的种种诟病和笑柄不吐不快时，也是把声音压到最低，几近于交头接耳。

3. 中四：白色恐怖中的星星之火

一张“检讨‘主义兵’错误”的长篇大字报，引起了笔者高度关注，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一看署名，又是中四那二十来个人！在笔者心目中那简直就是白色恐怖中的星星之火！既无对自己“罪恶”痛不欲生的忏悔，又无“对主义兵一小撮坏头头儿不共戴天的诅咒和鞭挞”，也无“上纲上线”的悔罪和声讨，更无趋炎附势地

把历史骂个狗血喷头，有的只是冷静反思、客观评述、深入探究，以及尊重历史、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良知。

更可贵的是，组织体系从未“如鸟兽散”，而是每天按作息按时间集体学习讨论，每个人都以高度的责任精神认真发言交流。其中，原来的班长后来的“战斗队”队长功不可没。他们无愧于“真正老造反”的称号！

笔者返校后幽灵似的寻寻觅觅四处游荡，要寻找的不就是这样的同学和战友、这样的心态和精神吗？从此，一头扎进了中四，成了“编外成员”，虚心倾听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和探求。同时，也结识了一群老学长知音，诸如丁宗学、韩剑秋、张明岚、孙向铸、王瑞功、李际田、张凤清等等。从而，为以后的文革生涯找到并结交了一大批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优秀人才。

二、第一张大字报：招致“红山指”严正声明

经过多日游荡、观察、倾听和思考，笔者对鲁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亲身感受更强烈了：再也不能坐视造反派战友迷茫沉沦下去了，必须充分发挥“无罪一身轻”的优势，大声疾呼、唤醒民众，抚平伤痛、继续前进。

1. 笔者：第一张大字报

当时，笔者同样“谨慎小心，三思后行”，经过一番斟酌写了一张纸的大字报，题曰《向中四造反派战友学习》。内容是：赞扬中四对待“主义兵”错误的正确态度、表现和经验；呼吁造反派战友像他们那样发扬革命传统，深刻反思过去的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绝望、不气馁、不颓废、不沉沦，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污泥浊水继续奋勇前进！

笔者的如意算盘不言自明：“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冒名自重，制造轰动”。①内容全是“如何正确认识、反省自身错误，如何‘放下包袱，继续前进’”，并无一句“为主义兵总部坏头头儿鸣冤叫屈”的词语。不仅完全符合对待自身错误的“最高指示”，而且，

完全符合军宣队政治思想工作冠冕堂皇的花腔高调。②“绵里藏针”旗帜鲜明地与军宣队唱反调，鼓动造反派战士“自己解放自己”，抵制“分化瓦解主义兵”的政治阴谋。③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造成“一夜之间，风向突变”的轰动，决定采取“夜战”等到晚上贴出。④让更多的人看到从而扩大影响，决不贴到军宣队规定的大字报棚，而是贴到茶炉门口右侧最显眼的墙上。当时尤其是早上，那是人流络绎不绝最繁华之地。⑤为了增加大字报的分量和影响，署名“红山指 宋书星”。如此，既非“盗用红山指名义”，又非一个“普通人”，更非“犯错误的主义兵骨干分子”。

2. 王庆森：“红山指严正声明”

大字报引起了巨大反响，连老校的人都赶来观看，一整天都读者如流熙熙攘攘。对这种“阶级斗争新动向”，军宣队理所当然地给予了严重关注并立即作出强烈反应。

第二天，“军宣队副队长”王庆森（山师政四学生）急忙向“红山指”报告“阶级斗争新动向”，并写了一份《严正声明》大字报，盖上“红山指”的大印，贴在了笔者大字报旁。

它对笔者大字报的观点和内容避而不谈，专门揭露“宋书星盗用红山指名义的阴谋”：“宋书星，鲁大主义兵骨干分子，顽固坚持主义兵总部反动立场，被公安机关逮捕，红山指早已将其开除。他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无权代表红山指。希望广大革命群众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受骗！”

鄙人既然“投石击破水中天”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且效果远远超出所料，根本不屑与“假解放军冒牌儿货”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纠缠！

3. 造反派战友：精神复活

对于广大造反派民众而言，笔者大字报无异于“一石激起千层浪”，扫荡了笼罩在心头的压抑沉闷和悲观绝望。他们从中四经验中看到了出路和希望。老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和斗争意识开始复活了。接下来，又顺理成章地“精神变物质”了。

老造反派战友们沉默得太久了，一旦看到光明和希望，便立即开始了第二次自发而秘密的大串联。造访笔者的人蜂拥而至应接不暇。新校学生宿舍 5 号楼三层武桂馥的房间，成了临时“接待站”和“活动室”。经过几天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一个大胆的议题成了交谈内容的主题——恢复（或重建）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三、“二月逆流”横行全国

文革是平民大众民权与政府官权的阶级大碰撞，始终存在着攻守和进退，政局起伏动荡、左右摇摆。

1. “二月逆流”

“一月风暴”向走资派夺权，触犯到了新官僚权贵们的命根子。“这不是要推翻共产党政权吗？”

虽然文官们的党政组织系统被冲垮了，然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武官还在，而且军队组织系统毫发未损，“反击”的历史使命落到了他们肩上。于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三老四帅”终于忍无可忍，于 1967 年 2 月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围攻“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敲山震虎”向毛主席文革路线发难，全国各地武官闻风而动，向文革派反攻倒算。文革派称之为“二月逆流”或“二月黑风”。

2. 武官复活保守派

山东武官们早已忍无可忍闻风而动。军队参政的“三结合”和“三支两军”给了他们难得的机会，压抑了数月之久的心头怒火终于可以发泄了，在围剿“主义兵”和“山工联”声讨“极左思潮”的同时，又接过文官们的接力棒，重新扶植起早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拉起了“4·22”新保守派，纵容他们对新生的省革委开展“反文革”斗争。

3. 造反派又成了“臭狗屎”

学校和厂矿企业都派驻了军训团、军宣队或军代表，他们按照指令统一行动：扶持保守派，弘扬“忠于党”的顺民精神；压制造

反派，以“批判极左思潮”之名，声讨“无法无天的造反精神”。

曾几何时，“主义兵”和“山工联”遭劫时，温和造反派“热烈欢呼”了好一阵子。结果，高兴劲儿还没过就感到“不对劲儿”了：亲人解放军坚决支持的原来不是我们，而是早已被造反派打垮的保守派。他们打击的也不仅仅是“主义兵、山工联一小撮怀头头”，而是包括温和派在内的所有造反派及其造反精神。一时间，造反派又成了“地痞、流氓、异己分子”，造反精神又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四、山东“反逆流”

武官们对文革的反攻倒算甚嚣尘上，复辟逆流席卷全国。以“毛中央”为代表的文革派别无选择被迫应战，开始反击“二月逆流”。

省革委和王效禹闻风而动，对山医附院“抓典型解剖麻雀”，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

1. 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造反派及其造反精神”

“坚定不移地支持造反派，与造反派并肩战斗！”并利用到手不久的新政权，奖赏“发扬造反精神，不屈不挠抵制二月逆流的先进分子”。于是，孙琦便光荣地增补为省革委第一位“女常委”（山东医学院第二个常委）。

2. 扶持重建老造反派组织

济南铁路局、机车工厂、机床二场、淄博“501厂”、枣庄煤矿、新汶煤矿和各地中学，重新扶持组建起被摧垮的“山工联”和“红联总”下属组织，并被接纳为“山工总”和“红山指”下属组织。

“鲁迅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诞生的“天时”到了。

第四节 鲁迅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经过短期串联酝酿，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派积极分子新骨干，诸如：中文系丁宗学为代表的“中四群体”，政治系武桂馥、陈祖

型，生物系董明仓，外文系周长琪、戚兆芳，化学系韩洪秋等等，成立组织的“人和”也条件具备了。

一、“筹备会”

“筹备会”第一项议程：确定组织名称。笔者提议：称“鲁迅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此表明新组织是“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新生”；再者，“主义”改为“思想”也是践行“江青同志的重要指示”。得到了全体一致拥护。

第二项议程：确定领导机构名称。笔者提议：称为“指挥部”，以此证明新组织抛弃了“主义兵”另立山头闹独立的极左路线，回归于“红山指”为代表的山东造反派红卫兵大家庭。

第三项议程：推举学校“指挥班子”，也顺利达成了一致。

第四项议程：推举“总指挥”。绝大多数人强烈要求笔者“勇挑革命重担”出任“一把手”。然而，笔者最大优点是不乏自知之明：“秀才”本性，勤于动脑、拙于动嘴、懒于动手，思想筹划尚可，组织能力不足，尤其不善于宣传鼓动将自己的意志化为群众的行动，只能当副手，不适合“挂帅”。便断然拒绝，并提议刘全复（年长笔者7岁）出山任“总指挥”。

最终，形成决议：由笔者出面，请刘全复出山。若能如愿，大家坚决拥护他；若不能如愿，笔者无权再“拒挑重担”。

二、刘全复拒绝“出山”

会后，笔者立即找到刘全复转达众人意愿：强烈要求他“出山”带领大家继续前进。结果，他在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坚决拒绝。不得已，笔者只得尊重大家信任荣膺了“指挥”，丁宗学任“副指挥”。

所幸，不久之后在第一届“校革委”筹备时，刘全复终于接受了笔者“坚请”成了鲁迅大学“实际的第一把手”（高登仁为主任），可以真正说了算。从此，笔者得以放下了肩头和心头的重担。

三、中四只派出丁宗学为代表

笔者还有一个遗憾。政三武桂馥和中四诸位大师兄，不愧为“久经正反两方面考验的优秀造反战士”，理应被推上“思想兵”领导岗位。然而，当笔者动员他们“出山”时，不论如何苦口婆心，还是被婉言谢绝，且态度友好而坚定。

武桂馥竭力保举政一陈祖型任“思想兵”政治系指挥。

韩剑秋说：“又不是去打狼，出那么多人干么？‘思想兵’是全校的，又不是中四的！”结果，“中四”只派出丁宗学为代表。

笔者除了遗憾还是遗憾：中四何尝仅仅是学校的“头脑”？它早已成了全省造反派的“人才库”和“思想库”了。诸如，曹靖，“主义兵”首脑；王世岐，青岛市“第一支笔”；邵长文，“红联总”大当家，等等。不过，遗憾过后，笔者依然庆幸：中四毕竟为笔者输送了一位“文革生涯”好搭档——丁宗学。他是鲁西南红脸大汉，粗喉咙大嗓门儿，满是疾恶如仇“怒向刀丛”的英雄气概，更不乏敢爱敢恨熊熊燃烧的斗志和激情……

1967年4月4日，历尽劫难之后，“鲁迅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终于诞生了。

第五节 第一届“校革委会”

“二月逆流”激起了整个文革阵营的反抗，“反逆流”浪潮席卷全国。

一、第二张大字报——《提着脑袋呐喊一声》

“思想兵”成立后，立即进入“老造反派”角色，投入到“反逆流”大潮中。笔者到“省革委作战组”（后改名“群众工作组”），刘崇业（省团校学生、原“串联站”工作人员）简要介绍了北京和全国反逆流”的形势。

对“二月逆流”的认识，笔者仅凭亲身遭遇和见闻就能体察到“问题的根子在武官”。回校后，即刻写了第二张大字报：《提着

脑袋呐喊一声——揪出隐藏在济南军区的大水怪》：列举了镇压造反派、扶持复活保守派的种种行径，质问了六七个“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最后，呼吁造反派战友，继续发扬造反精神，投身“反逆流”斗争，揪出隐藏在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丁宗学过日后，深表赞同并签了名。为了实现数月来“请刘全复出山”的风愿，未经他本人应允笔者就擅自签上了他的大名贴了出去。目的是：请不动就推他出山，逼他出来亮相。在引起极大轰动的同时，刘全复也主动到新校一号楼“思想兵”办公室，对笔者冒用他的名义表示了几句抱怨，其后渐渐参与到政治漩涡中来了。

不久之后“省革委”常委杜春胜的有线广播形势报告成了全省“反逆流”的动员令。他披露了“二月逆流”的形成原因、各种表现及其本质，号召造反派继续发扬大无畏造反精神，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迎头痛击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攻倒算！虽未明确提到“军队”“军内”等字眼儿，但无人不明白其矛头所指。

造反派誉之为“杜铁嘴”，武官则斥之为“反党乱军干将”。1968年，在南郊宾馆“造反派代表大会”上，与“军人小护士”奸情败露，在房间暖器包上用鞋带儿上吊自尽。笔者始终疑窦未解：究竟是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大暴露”，还是小护士“奉命而为”？

二、筹备成立校革委

“反逆流”的形势发展突飞猛进，笔者决意“乘此大好形势尽快成立校革委”。表面理由是：既成事实，稳定大局。内心理由却是：让刘全复名实相副、有职有权、安心领导。此议既出，包括刘全复等众人一致同意。

笔者一直希望将政三武桂馥和中四张明岚、韩剑秋等在“主义兵”遭劫逆境中表现优秀的同学推到“校革委”岗位上。不料，却遭到刘全复温和而坚决地反对：“他们既然不愿意出头，就不要勉强！”同时，他又提出了电四杨汉平、物五叶景伦等几个“主义兵”老骨干人选。

笔者内心虽然难免隐忧，但又想：“既然要人家主持大局，就

应当充分尊重其意见，按他自己的要求搭建‘顺手班子’。否则，让人家如何工作？”

领导干部和教师代表，他提出了高登仁（原校团委书记）、刘俊峰（原组织部长）、邱锡彬（原科研处长）以及教师代表王东才（物理系辅导员）。笔者不认识，提不出什么异议。

关于主任人选，笔者坚决要求刘全复担当，他则极力推辞而举荐高登仁。最终，达成一致：高登仁任主任，刘全福、宋书星任副主任。具体分工是，刘全福协助高登仁全面负责，宋书星负责对外联络，杨汉平、叶景伦任作战组正副组长，丁宗学任宣传组长。

另外，还确定了“校革委委员”多名，诸如：王琏（原宣传部长）、王婵（政治系教师）、周长琦（外三学生）等。

三、报请省革委王效禹批准

校革委是权力机构，不同于“思想兵”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可以通过自身行动证明自己的存在及合法性，校革委必须得到上级权力机构的认可批准。在校革委成员中，笔者是唯一与王效禹有过接触的，有责任向他介绍众人。大家到了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经一路一路一座德国式建筑），王效禹及其夫人刘崇玉在一楼会客厅接见了我们。

首先，笔者向他们逐个介绍了众人，然后，简要汇报了相关情况。最后，王效禹表示同意和支持，并讲话作指示。究竟讲了些什麼，笔者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因为，目的就是要“省革委”承认批准，既然“同意支持”，其他都不太重要了。

1967年4月19日，在老校大操场召开了“热烈庆祝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笔者终于松了一口气：“回校闹革命”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第六节 “逆流”与“反逆流”

军队当权派一向信奉“官大一级压死人”，“二月逆流”有恃

无恐的强势更令他们目空一切。对“中央文革”和省革委区区几个新当权派“乱党”和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反贼”，根本就“尿不着”，岂能任由他们扬风扎毛、胡作非为！

于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抛弃了“三结合”的紧箍咒，开始了大决战前的组织准备。各单位的军宣队按照统一布置，重新组织起保守派组织，并于1967年4月22日组织起了全市的统一组织——“四·二二派”。负责人是济南针钉厂保守派头头儿张兰英。他们人数众多、声势浩大，远非原来地方当权派“土八路”们所组建的“红卫兵师”可比。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准备，矛头直指省革委的斗争开始了。

一、“四·二六砸大众日报社”事件

省革委掌控的大众日报“充当了反逆流号角”，许多火药味十足的高质量长篇文章“大长了造反派志气，大灭了新保守派威风”。尤其是，其发行量位居全省第一，覆盖了所有城市乡村，其宣传鼓动作用超过千百万张大字报，成了传达省革委声音引导造反派“反逆流”的主渠道。要彻底打垮全省“反党乱军势力”，就必须首先斩断这条主渠道，让省革委变成哑巴，让全省造反派变成无头苍蝇。

1967年4月26日，“四·二二派”数千人将大众日报社团团包围，群情激愤、口号震天，大标语攻势同时展开：“强烈要求对革命派群众一碗水端平！”“坚决反对支一派打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揪出一小撮反党乱军分子！”“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柱石！”，并冲进了报社办公大楼。……山师、山工、山医等报社附近的大专院校造反派群众最先赶到，双方展开了争夺战。山大距离报社约5公里，当笔者接到“红山指”紧急通知、随同数百名造反派战友跑步赶到时，战事已形成了攻守阵地战和包围与反包围的对峙，未能进入办公楼主战场，只能在外围策应，有的与对方群众捉对辩论，牵制其有生力量；有的则呐喊助阵，壮大声威。

事件过后，笔者到报社办公楼内转了一圈，第一印象是：满地

狼藉，激烈冲突迹象刺眼，据此判断：“四·二二派”攻方曾经攻占得手，几经冲突又被守方增援大部队夺回。

二、张春桥、姚文元奉命来济南“调解”

面对山东省军地矛盾日益激化，为了避免更大规模冲突，毛主席派张春桥、姚文元亲赴济南“灭火消灾”化解冲突。

然而，军权在握的武官们岂能把这两个穷酸秀才“钦差大臣”放在眼里？遂决定：以文武斗两手给他们来个下马威。

他们从司令部和政治部两个大院儿选拔了10名（或7名）立场坚定、头脑敏锐的“铁嘴辩手”组成“辩论团”，决心以“向中央首长反映意见”的名义，利用“四大”武器，与张、姚开展“革命大辩论”，驳斥他们“包庇纵容王效禹等造反派反党乱军的谬论”。

所幸，张、姚并非私自流窜到济南，而是奉了党中央之命并确知了毛主席对山东问题的态度和意见，故而心中有数底气十足，“你有千条妙计，我有既定之规”，始终“稳坐钓鱼船”不温不火。

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五七事件”应运而生。

三、“五七事件”：省革委大院儿攻防战

4·26大众日报社攻防战的失利，激起了“四·二二派”及其幕后操纵者的报复欲。他们因羞辱而恼怒，因恼怒而更加狂野。经过一番组织策划，一场对文革派“击其首脑，直捣黄龙”的进攻战开始了。

1. “四·二二派”攻占省革委大院儿

1967年5月7日上午，“四·二二派”数千群众（号称万人）采取“乘其不备，隐蔽行动；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战术，轻而易举攻占了省革委（原省委）大院儿，并全部控制了所有办公楼。借口却是：“要求中央首长接见！”

真该感谢“苏联模式”的信息封锁制度，他们从策划到实施的所有内幕至今都未透露出一丝半毫，所有当事人更是讳莫如深。但

是，仅凭事发前密不透风的保密措施和实效，以及干净利落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成功，就不难判断：这绝非刚刚成立的“四·二二派”的“群众自发行动”！

2. 省革委大院儿争夺战

造反派历来的传统是：太平无事时懈怠涣散、内讧不断，一旦形势危急则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他们绝对不容许“新政权”得而复失。一场“收复失地，誓死捍卫红色新政权”的反击战开始了。

①包围分割，“关门打狗”

省革委常委会商讨对策，决定“坚决反击！”随后，“红山指”“山工总”等群众代表新当权派们，迅速打电话将“反击决定”通知下去。刚刚从“二月逆流新资反路线”下获得第二次解放的造反派民众，更是义愤填膺、斗志昂扬，“与红色新政权共存亡”的政治觉悟空前高涨，招之即来、闻风而动。一时间，各路造反派队伍潮水般涌向省革委，将大院儿团团包围起来，真可谓“里数十层，外数十层”水泄不通。至此，占领省革委大院儿的数千名“四·二二派”群众，退路被切断了，完全成了“孤立之敌，瓮中之鳖”，落入被“关门打狗”的劣势。

②切断电缆，“瓮中捉鳖”

不论是老保守派还是新保守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或劣势——“奴隶主义”和“驯服工具精神”强烈，凡事都要向“领导”请示报告，一旦离开“领导”的指挥棒，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怎么干”。

为了彻底切断占领者与外界尤其主谋者的联系，防止“幕后组织操纵者”电话指挥，决定：切断通讯电缆！即刻交由熟悉电缆位置的南郊宾馆革委会头头儿张××负责实施，并很快完成了任务。

③政治攻势，分化瓦解

当时，正在珍珠泉招待所召开“红卫兵山东省代表大会”。傍晚，王竹泉向驻济各高校负责人传达了省革委紧急通知，人们立即赶回学校组织队伍。笔者回校后未找到刘全复，紧急中以“思想兵

指挥部”名义，通过新校广播站发布“保围省革委”紧急动员令。笔者自知喜静不喜动缺乏组织指挥能力，只能请丁宗学率领数百名学生，跑步赶往省革委，笔者随队前往。因为距离省革委较远（十多公里），当赶到时，造反派早已完成了合围态势。现场指挥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院墙外东北角为“鲁大”安排了十来米的“战位”。

天色已晚，只见人山人海。按照统一部署，首先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摧垮受蒙蔽群众的精神支柱，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院墙北面，各单位的五、六两辆宣传车艰难地挪到队伍最前面，在墙外一字摆开，高音喇叭朝向院儿里，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揭穿大阴谋”“省革委紧急通令”等，震耳欲聋。

人群太拥挤，根本无法自由行动，大院儿其他几面的阵势笔者无缘得见。

④激战通宵，大获全胜

夜已深沉，强攻战开始了，担任“攻院突击队”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工人。攻势首先从大院西北角开始，许多人用肩膀将战友送上墙头，又被守方击退，纷纷跌落下来，被下面的战友接住。再攻，又被击退。如此反复了四、五次。目睹此情此景，笔者同样热血沸腾，跟着呐喊助威。

攻方始终未能得手，不得以改变战术：主攻方向转移到常年紧锁的大院东大门，此处防守薄弱。原来的西北角转为佯攻。

没有“幕后主帅”现场统一组织调配，一群“驯服工具”要想改变原定部署重新组织有效防守，谈何容易！

8日黎明时分，终于攻进大门，解决了战斗。

⑤大围剿，大清算

接下来就是接受“俘虏举手投降”。从省革委正门往北到纬一路，站满了数以万计的胜方群众，许多人拼力维持，才在厚厚的人墙中勉强留出一条不足半米宽的通道。可怜的“俘虏”们高举双手，鱼贯向北离去。因失败而精神支柱坍塌，再加通宵未眠，个个蓬头垢

面神情沮丧。

胜方队伍中同样不乏“人性本恶，动手取乐”者，在攻防战中吃亏者的复仇心理更是可想而知。“俘虏”们每走一步都要经受拳脚加口水的“洗礼”。数百米的漫漫长路，不知承受过多少老拳和口水……

笔者自幼就有“心软”的毛病见不得暴力，再加身心疲惫不堪，觉得实在乏味，便匆匆赶回学校蒙头大睡了。

后来听说，像全市各单位一样，校内也是一片“大围剿的红色恐怖”，所有参加攻占省革委的保守派群众，都成了“死不悔改的铁老保”，受到多次批斗乃至武斗。政治系一位“顽固不化的女老保”被迫站到凳子上，有人又一脚把凳子踹倒，她便两脚悬空摔到地上。虽经如此“触及皮肉”，她却始终坚贞不屈，不能不令人好生感佩。

3. 济南部队：未出兵动武

面对“四·二二”新保守派民众的劫难，济南部队武官们始终没有像后来武汉陈再道等那样挺身而出“与革命群众并肩战斗”，避免了更大的冲突或血案。

对此，笔者终生都额手称庆：山东造反派有福！摊上了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这样的忠厚长者“老实人”。如果，摊上赵永夫、陈再道、韦国清等那样的司令员，不知要有多少无辜民众白白付出热血和生命……

四、省军区“五点声明”

6月初，省军区的“五点声明”和毛主席“很好，正确，范例，仿行”的批示转发全军，并向全国公开宣传，标志着山东的“反逆流”斗争胜利结束。

然而，省军区领导尤其一向与人为善作风正派的政委何致远却终生都背负着“军队叛徒”的骂名。

五、武官——文革派真正的“克星”

毫无疑问，“二月逆流”是武官借助军队组织系统搞起来的，陈再道等导演的“武汉7·20事件”则是其最高峰。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为此，既需要发动群众“部分地”冲垮旧的党政组织体系，又需要维持秩序相对稳定，不至于“天下大乱”完全失控。他把维持“继续革命”与“秩序稳定”二者平衡的希望，寄托于亲手创建的军队。虽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然而，在文革实践中，党、政和文化界的文官们大都成了“文革对象”，在军队成为“文革禁区”的同时，武官们却成了“文革动力”。

可惜，毛主席的主观愿望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客观规律，也不可能改变武官们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上海、山西等地“向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迅速蔓延，各地文官当权派惶惶不安，极大地刺激了武官们，他们物伤其类、同病相怜，感到自己的既得地位也同样受到了严重威胁。北京“三老四帅”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和京西宾馆，吹响了“二月逆流”的冲锋号；各地武官闻风而动、群起响应。

如果说，“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是“二月逆流”的冲锋号，那么中央军委的《“三支两军”决定》则是“二月逆流”的“尚方宝剑”。它无视半年多造反派与保守派对立冲突的文革现实，无视“反右斗争”后“左派”与“右派”被完全颠倒的历史，模棱两可地要解放军“支持左派”，为反文革派武官复活扶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提供了充分的“中央文件”支持。

第七节 鲁迅大学“闹平反”狂潮

在毛主席亲自干预下，山东省“反逆流”与“二月逆流”的斗争平息了。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刘全复等“鲁大翻案派”又掀起来了闹平反的狂潮——“为主义兵和山工联总部彻底平反！”

一、“立即平反”还是积极要求

反逆流结束后不久，一股闹平反的暗流涌动起来。“翻案派”闹平反的理由是：既然全省的山工联和红联总下属组织都平反了，对总部也应当一视同仁彻底平反。

1. 大礼堂形势报告会

1967年7月份，校革委在老校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刘全复主讲以后，要求笔者介绍山东形势以平息“闹平反”情绪。

笔者说：镇压主义兵和山工联的根子是“二月逆流”，不是王效禹省革委。咱们的组织恢复了，山工联和红联总的下属组织也都恢复重建了，要相信省革委也会合理解决总部问题。我们应当接受犯错误的教训……”

刚讲了几句，台下一些人就开始起哄。笔者只好草草收场，忧心忡忡离校返回“红代会”。

2. 校革委全委会

几天之后，在老校一号楼大会议室，校革委又召开过一次全委会，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叶景伦、杨汉平坚决主张：“必须立即公开平反！”

丁宗学则坚决反对“闹平反”，主张“相信并积极要求省革委尽快平反”。

历史系教师王婵、外文系革委主任周长琦等坚决支持“丁意见”。

刘全复始终未表态，但其翻案派立场尽人皆知。

笔者则认定：主义兵和山工联当然应该平反，但是，应当汲取过去的教训，采取合作态度，要求省革委尽快作出平反决定。否则，如果采取对抗主义“闹平反”，势必事与愿违鸡飞蛋打。要人家为自己办事，又要和人家大吵大闹，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再者，省革委是党中央毛主席肯定的全省最高权力机构，与其对抗只能是以卵击石葬送学校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二、排斥异己：“闹翻案”的组织和舆论准备

“闹翻案”情绪越来越强烈而高涨，尤其一些惯于在“极左”与“极右”之间跳来跳去的人，更急切渴望通过“闹平反”再造昔日“老造反”的辉煌，洗雪曾经“杀回马枪”的耻辱。

1. 组织准备：彻底改组校革委

经过一番酝酿发动，刘全复做出了“彻底改组校革委”的决定，为全面“闹平反”进行组织准备：①刘全复升为主任，高登仁降为副主任；②罢免宋书星、丁宗学、刘俊峰、邱锡彬、王琰等的副主任或常委职务；③增补李存友（化一学生）、徐经泽（原政治系主任）等为常委。

其后，又对各系革委会进行了大改组。所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被清除出革委会领导班子。

2. 舆论准备：把宋书星批倒批臭

在组建“思想兵”和校革委中，笔者的表现有目共睹，虽在一些“极左派”心目摘不掉“投机分子”的帽子，但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力却一时难能清除。

为了把群众从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全心全意投入“闹平反”，就必须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彻底肃清“宋书星为首的反翻案派”的影响。于是，一场揭露批判“反翻案派”的运动席卷全校，大字报铺天盖地；相声、山东快书、天津快板等各种形式的暴露性文艺节目也应运而生。

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是针对反翻案派思想观点的批判说理，几乎全是诋毁谩骂、侮辱丑化。随之，笔者再一次成了“鲁大叛徒”，外加“官迷”“野心家”“两面派”“小政客”“儿皇帝”，等等。

就连“头号走资派”孙汉卿也未曾享受到如此被高度重视的“荣耀”。

三、“黑色恐怖”：围剿不同意见群众

经过一场深入持久的“大揭发，大批判”，宋书星等反对闹翻案的人终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广大群众也迅速聚拢到闹翻案的大旗下，建立起了浩浩荡荡的闹翻案大军。

1. “黑色恐怖”：开创武斗新时代

对于反对闹翻案的群众，则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口水、拳脚开展围攻战术。于是，各系、各班都开始了大围剿，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同学，不论在教室、宿舍，还是到食堂吃饭、到厕所方便，到处都难逃“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甚至，即使上到自己床上钻进被窝里也不能幸免，常常被揪出来围攻、偷拳、口水一番。

为了表示“与狱中难友共命运”，许多翻案派骨干都戴上了黑袖章。因而，被后来的“红二·三战斗队”和“红旗战斗队”称为“黑色恐怖”。

2. 丁宗学：《海燕》油印小报

“压迫愈甚，反抗愈烈。”丁宗学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办了一份油印小报《海燕》。他一个人身兼撰稿、编辑、刻版、印刷和散发。所幸，中四全班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闹翻案，只是在黑色恐怖重压下隐忍而已。丁宗学得以将《海燕》一直办了下去。

散发却成了大问题，每次散发时都遭到围攻、嘲笑、谩骂、口水和拳脚，头上的伤口一个接一个，包扎伤口的白纱布成了他的主要标志。《海燕》像“黑色恐怖”暗夜里的一星灯火，给了不同意见的群众一线光亮和希望。

3. “红旗战斗队”：第三代保守派组织

“黑色恐怖”日益猖獗，所有不同观点的学生、教师和干部，越来越无法忍受没完没了的围攻、谩骂、口水和拳脚，相继逃离学校四处流浪。逃难者渐渐聚拢到一起，立起了“新山头”。思想观点的对立发展成了不同组织的对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二·三战斗队”（后改为“红二·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红旗战斗

队”（第三代保守派组织）相继成立，形成了激进派（翻案派）、温和派（反对闹翻案）和第三代保守派“三国鼎立”的局面。

“红旗战斗队”顺天应时而动，利用翻案派反对省革委的大好时机，继续为孙汉卿“平反昭雪”，上演了一幕幕曲折离奇的长篇活剧。这在当时全国高校极为罕见！

极左的归宿是极右！一向自诩为“老造反、最革命”的翻案派惯于怨天尤人，至今无一人反思过自己的责任。

四．翻案派：打上了省革委家门口

校内“一统天下”后，立即杀向了社会。“为山工联彻底平反”的大字报、大标语、宣传车、文艺节目、铅印和油印传单等海潮般涌向泉城街头，什么“只要地球转，老子就翻案！”“还我山东，还我权！”……

如此，仍嫌火药味不够浓震动不够烈，不能“击中王二麻子”的要害。于是，又大张旗鼓地在省革委大门口对面十几米的马路边搭起了“擂台”，唱起了“对台戏”。扬言：“不论任何人，只要不服气且有胆量，都欢迎上台来进行大辩论！”

此时的王效禹早已今非昔比，“六个第一，两个委员”（济南部队和省军区第一书记和第一政委、省革委第一主任、省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更使省革委新政权稳如泰山，在耐心劝说无效之后，采取了“静观其变，等待时机”的政策。

上帝要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翻案派又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自以为“真理在手，天下无敌”。在狂妄心态驱使下，反把对方“引而不发”当成了怯战，更加目空一切轻狂恣肆了。

第八节 “红代会”生涯

校革委成立后，笔者又回到了省红代会。原因有二，一是“二·三夺权”后鲁大成了另类，远未融入主流社会，亟须改善对外关系；

二是校革委“三主任”分工笔者负责对外关系。

即使翻案派公开闹平反实行“黑色恐怖”后，笔者仍未能及时“回校闹革命”，原因是：李广文与王效禹暗中勾结全力支持“红旗队”，孙汉卿正稳步重返“山大主宰”的宝座。

在笔者心目中，这才是“鲁大”最大的危险！至于翻案派，纵然翻案狂潮冲天，终归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头儿。

一、《揭盖子》：笔者拒绝签名

“红旗队”的不懈努力终于结出了一个特大硕果：孙汉卿进入了从中央文革到省革委新当权们的视野，迅速成为“准革命领导干部”。

1. “揭盖子”——“准省革委文件”

“反逆流”以后，王效禹成了公认的“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而孙汉卿，与王力、关锋、李广文、王效禹等都是原渤海区的老战友。

基于上述两点，“红旗队”审时度势，选择了与翻案派截然相反的道路：“坚决拥护省革委”，精心撰写出《彻底揭开山东省十七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传单，把王、关、李、王效禹、王路宾、潘复生（黑龙江省革委主任）、刘格平（山西省革委主任）、赵健民（云南省革委副主任）等，统统列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贯坚定不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把“藤景禄反党集团”以及历届旧省委中曾经整过上述人的政治对手，统统打入“刘邓司令部的人”。终极目的就是要将孙汉卿塑造成“革命领导干部”。

任何阶级或政治派别夺取政权后，无不以攻心为上，需要的正是这种歌功颂德无限美化的舆论攻势。在王效禹、王路宾等新当权派心目中，《揭盖子》抵得上造反派十万精兵，成了“准省革委红头文件”，要求所有省级群众组织签名，省革委、青岛市革委、济南市革委等则以部、组“战斗队”名义签署。“红旗队”也随之成

了省革委特许的与“山工总”“红山指”平起平坐的“革命组织”。

王效禹还特批：省财政厅给“红旗队”拨付专款 1 万元（约相当于今天 100 多万元），支持鼓励他们再接再厉。这在全国都实属罕见！

其后，“揭盖子”印刷发行就完全成了各级“新政权”官方以公款支付的政治任务了，先后印发了至少数百万份。

2. 顽固到底，拒不签字

王效禹要求在《揭盖子》上签名的指示下达后，王竹泉除外的“红山指”头头儿轮番“轰炸”，说服动员笔者：一定要“红二·三”签名！然而，笔者虽然尚和厌争，但“撞到南墙不回头”的牛脾气难以改变：我不想强迫改变任何人，别人也甭想强迫改变我！

①. “李主任”打头阵

打头阵的是省革委委员、红代会常务副主任李仁光（省中医学院学生）。他传达了省革委意见和“效禹同志”指示：省革委对你们“红二·三”非常关心，为了帮助你们扩大社会影响，特别嘱咐要请你们在上面签名。笔遂以“感谢领导关怀”婉言谢绝。

②. “孙常委”再度关怀

第二天，省革委常委、“红代会”第二副主任孙振发再度送来关怀。他比笔者年长几岁，一向充老大哥称呼笔者“小宋儿”。操着满口胶东腔倚老卖老地边骂边劝：所有省级大组织都签名了，你个屁养的不签名，真想“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啊？别啰唆，签名、签名！

笔者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避免闹僵，也随之亦庄亦谐地回答：“君子不掠人之美”，你们都参与过审查修订，完全有资格签名。我们既没参加调查，更未参与审稿，平白无故签名岂不成了作假冒名吗？不就是一张传单嘛，没那么严重。老果果（哥哥）放心，没事儿，没事儿！

二、“红旗队”手眼通天

8月上旬，笔者亲耳聆听了另一件更加惊心动魄的内幕，终于明白了：王效禹省革委那样不遗余力支持孙汉卿和“红旗队”的原因。

1. 济南部队和省革委“慰问团”：走了王坤泰的后门儿

“武汉 7·20 事件”后不久，鉴于王力的诸多错误，为了平息事态稳定大局，毛主席不得不决定：他“停职养伤”（罢官，内控）。

当时，各省（市）革委和造反派组织哪里知道内情！在“愤怒声讨陈再道等一小撮走资派”的同时，也纷纷给中央发电报，“向王力同志致以崇高敬礼和亲切慰问”。

王效禹更是不甘落后，组成了“济南部队党委和省革委联合慰问团”赴京慰问。济南部队副司令员张仁初任团长，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任副团长，包括诸多常委和各界大员 40 余人。回来后，在省革委第一宿舍小会议室举行了“慰问团汇报会”，笔者作为“省红代会”代表参会。

首先，张仁初简要汇报：没有辜负军区党委、省革委和全省军民的重托，终于受到了王力同志亲切接见，胜利完成了慰问任务。

然后，副团长韩金海详细汇报了经过：到京后，与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多次联系，人家要么说“不了解情况，无法安排”，要么说“报告请示后再予答复”。结果，等了十多天，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多亏省革委驻京办事处王万成同志几经周折找到了王坤泰，他领着我们几个人到了李广文同志家中，向他简要报告了来意。李广文同志又帮助我们联系安排，最终完成了军区党委和省革委交给我们的慰问任务。接着，又传达了王力接见时的讲话。王力“讲话”既无实际内容，更无革命激情，昔日雄风荡然无存。

当时，笔者真是方寸大乱，只觉耳鸣心跳背后冒凉气儿：如此高规格的联合慰问团，竟然四处投靠无门，不得不像“乞讨团”一样让王坤泰领着“走后门儿”才得以见到“中央首长”。孙汉卿和“红旗队”真的手眼通天，比济南军区党委加省革委的总和还厉害……

2. “宋丁搭档”分工格局

孙汉卿“红旗队”的强势和高能令笔者惕厉有加，原有“红旗队逆潮流而动成不了大气候”的无知心态一扫而光，并确定了“宋丁搭档”的分工：丁宗学始终与翻案派短兵相接，既有不可动摇的情感基础，又有知己知彼的思想基础，就侧重“反左”；而笔者深知“红旗队”的底细和厉害，主要精力必须侧重“反右”！同时，暗下决心：上述两大黑幕以及王效禹支持“红旗队”的所有内幕绝对保密，不惜蒙蔽所有人，以免“红二·三”在风雨飘摇中树倒猢猻散，原保守派群众“良禽择木而栖”倒戈投向“红旗队”。

“红旗队”的强势和王效禹的实用主义，将“红二·三”逼进了“阻于巨石，据于蒺藜”的空前逆境。但是，天生的轴子性格令笔者顽固到底：宁死不出卖政治信仰，决不与“红旗队”同流合污！

后来，听到“王、关”被捕的小道消息后，笔者方才明白了其中的猫儿腻：当时，王力已被内控，不准随便会客。之所以又允许他接见山东慰问团，要么是内控比监押宽松，要么是为了维稳而演戏。“真他妈的！虚惊一场”……

第九节 “八·二九”事件

校内武斗风愈演愈烈。多亏历城县委招待所员工容留了我们，敢于亮明观点的四十多个“红二·三”战士寄宿在一间地下室大房间里，铺上草帘子席地而眠，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和会议室。男女分作两摊儿互不干扰。笔者也从“红代会”（原团省委院内）搬到了那里住。

一、恃强凌弱——全校大围攻大武斗

1967年8月29日早晨，各系尚未公开亮明观点的同学相继跑来报告：住在校内的许多“红二·三”观点的同学被从床上拖下来围攻揪斗，多人受伤。笔者一听顿时悲愤交加，顾不得多想就急忙到老校向一号楼疾步走去，要找刘全复讲理：制止武斗，立即放人！

1. 第一关

刚走到大门里学生食堂处，就被食堂工人“尹大个子”（三十来岁，身高近2米，体重200斤）截住了，揪住笔者的衣领，像提溜小鸡儿一样拎到了伙房里，“刁班长”等五、六个人也围了上来。

尹质问：你算什么狗屁造反派！为什么反对给“山工联”平反？说！“山工联”是不是反革命组织？

笔者回答：不仅“山工联”，即使“山工联总部”也不是反革命组织！我们从来不反对平反，而是反对“闹平反”！

尹火气大减，又将信将疑地问：你真同意给“山工联”平反？

笔者说：不是口头平反，而是公开正式平反！

尹又问：你敢签字吗？

笔者答：宋书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走到天边也是这种观点，用不着签字！

第一关总算过了。看来，群众根本不了解“翻案与反翻案”分歧的实质和真相，刘全复等翻案派一味蒙蔽欺骗群众，既不敢公开我们的真实观点，又不准我们向群众宣传申述。

2. 第二关

刚从伙房走出，一群以外文系为主的数十名学生又将笔者团团包围起来，压根就不再质问，而是嘲笑、谩骂、吐口水，外加“偷拳、偷脚”。此时，笔者才发现，二姐一直跟在身后保护我，它那1.58米又瘦又小的个子，不知替我挨了多少拳头和口水？看来要找刘全复们要求放人是不可能了，只能尽快逃生。

3. 第三关

校门口往南百十米即洪家楼村，村民大都是解放前夕逃来济南在天主教堂“上帝身边”安家的外地人。后来，公安机关努力多年，始终没能查清他们的祖籍，更不知逃亡缘由。这些人少有传统农民安分守己的淳朴民风，有的是刁钻狠辣的流民习气。

“鲁大”闹翻案后在社会上非常孤立，便尽力去拉拢他们支持

闹翻案。开始时，将多余的饭菜等熟食无偿送给他们；后来，又将米面、蔬菜等生食无偿或贱卖给他们（当时，市民每月口粮27斤），最后连桌椅板凳乃至学生双层床，也半送半偷的成了他们的家产。因而，整个村都成了坚定的翻案派。

二姐护着我刚出大门口，从南面涌上来二、三十个洪家楼村民。一个学生指着笔者喊道：这就是“小瘪三儿”的头头儿、官儿迷宋书星！

只听一声喊：“揍！”众人一哄而上一阵拳脚暴风骤雨，笔者就鼻口踹血两眼模糊了。二姐护着我向南跑进了洪楼派出所院内，意图寻求救助。数十名如狼似虎的村民和学生紧追不舍。

不料，派出所干警一边把笔者往外推，一边高喊：“出去、出去，都出去！不准到公安机关闹事！”他们的“中立公正”之后，又是一阵更猛烈的拳脚风暴。笔者的粗布白衬衣前襟沾满了血迹，头脑昏沉沉麻木不灵了。二姐不得不又拉着笔者跑出“人民公安派出所”。

正在危难之际，从南面开来一辆三轮跨斗摩托，到笔者面前戛然停住，一位胖大军人跳下来，不由分说将笔者塞进跨斗中，命令驾车者飞速撤离。

后来方知，那位胖大军人是附近十里河驻军“济南部队通讯团”孙教导员，驾车者是无无线电技术员李垂柱。

从此，笔者对解放军救命之恩由衷感戴的同时，对“人民公安专政机关”也更加印象深刻了……

二、救援队伍遭伏击

笔者与二姐逃离了险境却没能完成营救战友的使命，许多“红二·三”同学仍然陷身于口水加拳脚的围攻中，处境十分危险。笔者心急如焚，立刻给“红山指”打电话求援，要求他们急速派人救出无辜群众。

结果，又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

1. 救援不成遭伏击

“红二·三”群众大都被困在老校校外学生宿舍，那里也随之成了“营救与反营救”的主战场。当时，新老校之间建筑物极少，大都是一片连一片的庄稼地。新校翻案派闻讯后，翻案派头头儿赵恒乐（数三）带领手持棒球棒的百十名“棒子队”赶往老校增援，埋伏在了学生宿舍对面的地质局职工宿舍院内张网以待。

一辆解放牌卡车满载数十名赤手空拳的七中学生最先赶到。在大门口停稳开始跳下车，“鲁大”伏兵呼啸而出。一个刚跳下车的中学生尚未站起来，赵恒乐及时赶到迎头一棒砸下，那人当即躺倒在地不动了（目击者数学系四年级石广标亲见所述）……

其他地方的“截击战”也相继展开，详情不知。后来听“红山指”工作人员讲：根据各增援学校统计并电话报告，受伤挂彩的学生100多人。

2. 大礼堂内暂休整

天已过午，“红二·三”被困群众相继逃离，陆续聚拢到了历城县招待所地下室，笔者见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伤痕累累。为了避免更大的武斗围剿，“红山指”要求“红二·三”立即撤离，并派来汽车将众人拉到山师，安排在大礼堂里暂时安歇。此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像众人一样，笔者从清晨到现在水米未进，经过一场暴力围攻洗礼终于安静下来，方觉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伤痛隐隐。

不大一会儿，山师医务室大夫来帮助众人检查、处理、包扎伤口；食堂工人师傅又送来包子、馒头等食物聊以充饥。肉体和心理承受过超常的暴力和压力，一旦安静下来并填饱肚子之后，因疲劳过度而“食困”。众人大都昏昏欲睡，女生大都趴在座椅靠背上，男生则躺在连椅上打盹或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向晚时分。不久，杨化军（山师体育系学生、“山工总”顾问）来到大礼堂，对笔者说：“小宋儿，赶紧走，有紧急任务！”笔者与他们一起乘坐一辆中吉普向“鲁大”老校方向驶去……

三、“鲁大”第二次遭劫

汽车驶出山师校门，天色已经黑了下来。一路上，见到大队人马首尾相接络绎不绝，在军代表带领下向“鲁大”方向跑步前进（此时，遵照党中央命令，除了“鲁大独立王国”外，济南各大、中学校已经实行了全面军训）。仔细一看，每支队伍和分队前面都是军人。大队人马中，还夹杂着乘车的“机械化部队”，可谓威武雄壮。

1. “前沿指挥部”见闻

汽车将笔者送进了历城县邮电局院内，韩金海将笔者迎进北屋一个大房间内，并介绍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军人：“这位是崔司令。”握手之际，笔者打量了对方一眼：他个头儿与笔者相仿，体型偏瘦，面目清癯，身着毛料军服，儒雅中透出几分刚毅。笔者心想：此处或许就是“前沿指挥部”，此人是总指挥，韩金海是“督军”……

“崔司令”要笔者简要介绍老校校园地形，尤其是变电室、易燃易爆物品存放场所。他根据笔者的叙述，在桌上铺开的一张校园地图上，标明了危险建筑和地段。笔者暗想：“行家！地道！”此时，各路大军也陆续完成了对“鲁大”的合围，可谓水泄不通。随即，发布了“总攻命令”，攻坚“敢死队”首先冲进了校园大门……

孰料，与收复省革委大院儿截然不同，“铁拳”重击处却像打进了空气，没有任何反应。“翻案兵”早已四散逃窜，校园里空空荡荡，围歼大军未遇到任何反抗。

2. 大搜捕

大围歼转入了第二阶段——大搜捕。大部队化整为零，对山大方圆3公里内的闲置房屋、庄稼地等一切可疑之处进行大搜查，抓捕逃逸的“翻案兵”；抓到以后由各单位酌情处理。

至此，笔者的任务完成了。杨化军又开车送我到“红山指”，回宿舍安歇了。至于“红二·三”战友们，笔者已疲倦的无力多想了，反正有老丁和他们在一起。唯一纳闷儿的是：不知有多少无辜同学又要遭劫了！

3. 无辜群众扛人祸

以后的大半年中，先后有二、三十位同学（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向笔者倾诉过当天深夜和其后四五天内的“悲惨遭遇”。

根据在校总人数等实际，笔者分析推测：无辜（包括有错者）受害群众数百人。仅山东机械学校就抓捕了60多名“鲁大翻案兵”，其中不少都是保守派或逍遥派，只是迫于校革委当权派和“翻案兵”主流派的高压和淫威，不得不先随大流活动，又随大流逃难，最终随大流落入“法网”。

受害最深的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群众。校革委头头儿们早有精神准备，且最早获悉“围歼战”消息，比兔子跑得还快早已提前逃离了。而广大无辜群众，既毫无精神准备，又未及时得到撤离通知；有的更因“未做亏心事”抱有侥幸心理，延误了最佳撤离时间。

据笔者所知，未能逃脱的翻案派最高领导人是化学系革委会主任郝树仁，被抓进了省机械学校关押了四五天，始终未敢暴露真实身份。不知挨了多少拳脚、棍棒，获释时整个脑袋肿得像“胶东发面大馒头”，双眼多日难以正常睁开。

四、不幸中的万幸，翻案派放弃抵抗

翻案派放弃抵抗无疑是唯一明智而正确的选择，也是避免更大悲剧的“善举”。

此前，他们让金工厂加工了一批“土长矛”——自来水管头部锤扁、剪尖、磨利，准备“武装护校”。如果翻案派不是及时撤离，而是按原定计划死守顽抗，甚至听从一些“极左中的极左”混账意见，用“土长矛”甚至用化学系易燃易爆药品“武装护校”，不知会酿成怎样的惊世大血案？又会有多少无辜的校内外学生死伤于暴力冲突之中？

如果死了人，笔者必将难逃“惨案参与者”罪责。因为，在事件的因果链中，“宋书星被打伤”成了事件的直接诱因。正如：文革初泰安农学院在两派冲突中，一位学生意外死亡，成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国恕连被判无期徒刑的主要“法律依据”。

五、“八·三〇决议”：解散“鲁大革委会”

当时任何人，不论革命动机如何崇高美好，不论革命激情如何熊熊燃烧，只要忽视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条件而成为“非法”，就难免受到现实的严厉惩罚。

次日（1967年8月30日）上午，省革委召开紧急常委会议，听取“围歼战”战况报告，研究对“鲁大”的政策，并决定：下午，在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愤怒声讨鲁大革委会一小撮坏头头儿的反革命暴行”。

首先，各界代表发言“愤怒声讨”。作为受害时间最长、程度最深的“红二·三”群众组织代表，笔者也发了言。内容无非是揭露校革委翻案派：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黑色恐怖”，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比“走资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后，省革委代表宣读“八·三〇决议”：解散“鲁迅大学革委会”。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震天：“愤怒声讨”“严惩凶手”“血债血偿”……。

笔者一旦坐到位子上听别人发言和宣读《决议》，真是五味杂陈，不仅没有胜利者的振奋，反倒涌上一股“残阳如血”的悲凉和“关山重重”的沉重。就像自家的孩子闯了祸，把他臭骂一通后又坐在一边看着别人对他轮番切齿痛骂拳打脚踢。翻案派毕竟曾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校革委更是自己亲手参与建立的。尤其是，“八·三〇决议”无中生有地硬塞进一句“殴打革命领导干部孙汉卿同志”，这无异于向全省宣布“就是要孙汉卿回校复辟！”“极左”尚未解决，“极右”又泰山压顶了，劫难何时是个头儿？

六、“逃宴”：拒绝与王坤泰谈判联合

极左错误必然导致极右结果，故而称之为“形左实右”。五七年的“右派”是如此，六七年的“翻案派”同样如此。正是他们无知狂妄对省革委新政权公开对抗以卵击石，致使官办“山大兵”死

而复生，走资派孙汉卿也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在山东省绝无仅有！

在王效禹等人心目中：“红二·三”区区不足百人，既无兵强马壮的实力，更无任何坚挺的后台，如何与强大的翻案派抗衡？再者，宋书星“脑后有反骨”，仅凭那几个鸟人就不自量力目中无人，胆敢违抗省革委旨意，拒不在《揭盖子》上签字。若将山大交给他们，一旦羽翼丰满，岂不又要像“主义兵”和“翻案兵”那样继续与省革委对抗？

遍观全校，唯一可以信赖且有实力主持大局的，唯有孙汉卿及其“红旗队”。只可惜，他们是“老保”，若公开掌权，既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更不合乎全国大势。

于是，便确立了治理“鲁大”的方针：高举“红二·三”旗帜，依靠“红旗队”力量，分化瓦解“翻案兵”。

1. “晚宴陷阱”

“声讨大会”尚未结束，孙振发通知笔者：“散会后回‘红山指’，有重要事情。”等他“忙完公务”，已是深夜时分，他拉着笔者乘车到了“山工总”（原省总工会），进入一楼一间大会议室。诸位大员们起身热烈欢迎，并主动鱼贯迎上来与笔者握手表示祝贺，场景相当隆重。他们是：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以及刘长茂、张美智、花光隆、徐金华等“五常委”（包括孙振发）。坐定后，韩金海首先致辞：“大家都是老战友，用不着再介绍了。小宋儿长期坚持反翻案、反极左思潮，实在太不容易了，今天终于胜利了，值得庆贺。老战友们一块儿聚聚表示祝贺。”

我朝大会议上扫了一眼，只见摆满了菜肴和酒水，虽然与今天的官宴无法相比，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罕见的丰盛了。当时，笔者心里真是热乎乎的激动不已，大有受宠若惊之感：“第一副主任”携“五常委”为笔者专门举行晚宴，并虚席以待至深更半夜，这是何等的重视啊！虽说我曾不止一次代表“红山指”支持帮助过“山工总”和公安厅的造反派，但毕竟是官民有别、尊卑贵贱不同了……

接着，韩金海又说：“来，小宋儿，我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话音刚落，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位30来岁的汉子，只见他身高一米八多，穿一件咔叽布军大衣，扣紧的两排金属纽扣在灯光下闪烁，更显得魁梧挺拔、儒雅大方。他矜持而稳重地走到韩金海身旁，大家一齐站起来。韩金海对笔者说：“这位是王坤泰同志，也是老朋友了，大家一块儿聊聊……”

虽然这是第一次与王坤泰幸会，但是，笔者早已久闻大名——“红旗队”队长！当时，真是如雷贯耳被震得脑袋一片空白。我习惯性地与他伸过来的手轻轻握了一下，木然随众人一起落座。

经过短暂的痴呆之后，当刘长茂忙着斟酒时，我脑袋里蓦然浮出一幅画面：一个被捕共产党人拒不叛变，特务头子便设下招待晚宴。当两人碰杯时，照相机闪光灯此起彼伏，夹杂着一片劈劈啪啪的掌声。然后，便是报纸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并配有“欢聚一堂”的大幅照片……

笔者心中一激灵，立刻清醒过来，一切都明白了！于是，谦恭地含笑说：“不好意思，请诸位稍等，我出去方便一下。”

2. 一路痛骂诅咒

笔者出了楼门，一溜小跑（不是被尿憋得）；一出大门就沿着经二路向东撒腿飞跑起来。过了普利门，确定后无追兵时方才放慢了脚步，心脏却依然怦怦狂跳。时间已过半夜，任何公交车都停开了，从“山工总”到“历城县招待所”大约9公里，只能徒步走了回来。

夜风习习，笔者渐渐冷静了：操他娘的！看来，王效禹是铁定了心要让孙汉卿回学校“复辟”了，我们只不过是可供利用的造反派招牌而已……

因被愚弄而羞恼，因羞恼而愤怒。一路上先是痛骂“新权贵”们：“为了自己保官保权保地位，就不顾别人死活，搞这等下三烂的卑鄙伎俩。算他娘的什么造反派？与翻案派一丘之貉，没有好下场！”

继而又诅咒刘全复等翻案派：“不干点儿人事儿！害得别人受此愚弄。这可好，不仅第三代老保复活了，‘头号走资派’也成了‘革命领导干部’，还腆着脸骂别人出卖鲁大，真他娘的不知羞耻！”

痛骂归痛骂，诅咒归诅咒，决不能丧失理智，暗下决心：事关“红二·三”生死存亡，省革委的混蛋决策和“晚宴陷阱”必须绝对保密，以免“红二·三”树倒猢狲散。再者，只要“红二·三”存在一天，只要宋书星死不了，就一定顽抗到底，决不能坐视这帮势利小人阴谋得逞！

第十节 张子石“省革委工作组”

“八·二九事件”和“八·三〇决议”后，学校的武斗局面不仅没有好转，反倒因为双方许多无辜群众惨遭皮肉摧残，对立情绪和复仇心理更强烈了。唯一的变化是，“红二·三”和“红旗队”结束了流浪生涯返回了学校。“红二·三”占据了老校1号楼和新校1号楼，“红旗队”占领了老校4号楼。其他教学楼和宿舍区，依然是翻案派的天下。开始了“三国鼎立”混战。

“三国”各有优势各逞其能：翻案派人多势众、群情悲愤，自信“民心不可侮，哀兵必胜”；“红旗队”仰仗直接通天、后台坚挺，省革委全力支持；“红二·三”自信“路线正确，名正言顺，胜券在握”。笔者虽然领教了官场险恶，却依然撞到南墙不回头，坚信“天道难违，真理必胜！”

结果是战火连绵：五天一大打，三天一中打，小打天天有。

济南部队党委和省革委会向学校派驻了通讯团一个连队，昼夜巡逻、维持秩序，“制止武斗，不问政治”。带队者正是笔者救命恩人孙教员，技术员李垂柱也在列。

大、中型武斗基本终止。

一、南郊宾馆巧遇

王效禹坚定不移地要将既定方针贯彻到底。既然笔者一再固执

已见抗命不遵，拒不与“红旗队”联合共同辅保孙汉卿，就只能由省革委直接出面强力推行了。于是决定：派出张子石率领的省革委工作组进驻“鲁大”，亲自来贯彻王效禹省革委的既定方针

1967年9月6日傍晚，省革委办公室来电话：“今晚张子石同志有重要事情要见你，请于8时30分准时到南郊宾馆二楼××房间（记不清了）。”

笔者不敢怠慢，应命提前半小时赶到南郊宾馆，却巧遇中了解了黑幕的又一斑。

1. 巧遇孙汉卿“侍从”

当晚8时前，笔者推门进了张子石的房间，会客室朝东的沙发上坐着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

笔者以为它是张子石秘书，问道：“请问子石同志在吗？”

他反问：“你是哪单位的？”

笔者答道：“我是山大的姓宋，子石同志说找我有事。”

笔者的一个“山大”、两个“子石同志”外加“找我有事”误导了他的判断，他急忙站起来主动上前与笔者握手，一边让座一边热情地滔滔不绝自我介绍起来：“哟，你也是山大的呀！我姓林，一直陪汉卿同志从济南坐火车到烟台，从烟台乘船到大连，又从大连坐火车到北京，广文同志（李广文，中央文革办事组长）安排我们住了好多天，又派专机把我们送回济南，要汉卿同志回山大主持工作。这不，下午刚下飞机，现在子石同志正在隔壁与他商讨，请稍等一会儿吧。”

王效禹们的意图笔者全明白了。

2. 与张子石“亲切会谈”

不大一会儿，张子石进来，“小林”随即出去。寒暄几句后，应张要求笔者简要汇报了学校近况。然后，他向笔者传达了省革委决定：一、成立“以宋书星同志为首的鲁大革委会筹备组”暂行校革委职责；二、向“鲁大”派驻省革委工作组，帮助“革筹小组”恢复学校正常秩序。并申明工作组的方针：坚定不移支持依靠“红

二·三”，团结联合“红旗战斗队”，教育争取“翻案派”群众。

笔者心想：什么他妈的，老一套！冠冕堂皇说得好听，无非是要利用“红二·三”招牌，依靠“红旗队”实力和后台，分化瓦解老造反派，最终达到孙汉卿“复辟”的政治目的！

内心虽如此想，却绝不能撕破脸皮公开对抗，既不能无理，更不能无礼！只能谨慎小心、虚与委蛇，顺势应变、机动灵活，与他们周旋到底。

笔者谦恭地说：“首先，衷心感谢省革委和效禹同志对我们的关怀和信任，真诚欢迎工作组进驻我校，我们一定全力支持、配合工作。关于‘红旗队’和孙汉卿的问题，希望省革委和工作组还要慎重考虑，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后再说。”

张又重申：“请你们放心，省革委工作组的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依靠‘红二·三’。对‘红旗战斗队’，是帮助你们团结联合他们。至于孙汉卿同志能否解放结合，取决于他自己能不能得到群众谅解。”

至此，这种虚情对假意的会谈再啰啰儿下去实在没意思更没意义了。双方“在友好气氛中”握手告别。

此次谈话内容，笔者理所当然也列入了“绝密”。虽然，知道已经无密可保了，他们进校后一定会大力宣传贯彻“省革委方针”。但是，本人绝不充当他们的义务宣传员！

二、工作组坚定不移贯彻省革委既定方针

9月7日（或8日），张子石率领百十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大都是从省直机关选拔出来的立场坚定、能言善辩的高手。这是有史以来上级派驻山大级别最高、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工作组。

1. 干部“见面会”

经过十来天调查摸底儿，工作组终于公开亮相了。他们按照孙汉卿或“红旗队”开列的名单，背着“红二·三”和“以宋书星同志为首的革筹小组”，召集“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数十名干部

（无一个造反派观点的干部），在老校 2 号楼小礼堂举行了“见面会”。

首先，传达了省革委工作组对“鲁大”的工作方针：支持依靠“红二·三”，团结联合“红旗队”，教育争取“翻案派”。继而，张子石讲话：希望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发挥干部的带头作用，振奋精神、继续革命，站到阶级斗争第一线，支持配合工作组工作，为建立学校革命新秩序做出新贡献，等等。

对省革委工作组的方针和态度，大多数人的理解与笔者大同小异。虽然嘴上不轻易说，内心肯定震动不小。

当天，就传来了不少干部见面会的消息，经过慎重考虑，笔者作出三个推断：其一，工作重点转向干部，肯定是孙汉卿的意见和决策。因为他多年分管行政和党务，嫡系和基本力量都集中在干部队伍中，要“复辟”必须依靠他们。学生只是“毛孩子跟着瞎呼隆”而已。其二，工作组如此工作是在忠实执行“汉卿同志指示”，为他“复辟”上台铺路架桥。其三，既然背着“革筹小组”和“红二·三”，我们就继续装傻卖呆静观其变，并准备随机应变。

2. 红二·三“见面会”

干部“见面会”后，工作组终于要与“红二·三”见面了。地点在老校 1 号楼大会议室，张石子以下工作组所有大组负责人都到会，“红二·三”大小头头儿也踊跃参加。

首先，张子石传达了省革委的“两个决定”，宣布工作组的工作方针，并发表了讲话。

随即爆发了激烈争论。工作组以“眼镜副组长”（三十多岁，中等身材，圆脸微红）为主帅、以省委党校的人为骨干。“红二·三”以丁总学为主帅、以王瑞功为干将。就“红旗队”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实则孙汉卿能否复辟），双方展开唇枪舌剑。

张子石耐心倾听，笔者原本就不愿抢话，此时就更应耐心倾听。争吵了半天，无果而终、不欢而散。

会后，整个 1 号楼内像开了锅一样。室内、走廊上，或三五成

群，或十儿人扎堆，无人不在议论工作组方针，且义愤填膺口无遮拦：怪不得“翻案兵”骂王效禹“资产阶级政客两面派”……

因为，省革委和工作组究竟要依靠谁？直接关系到他们数月来浴血奋斗历史的评价问题。

三、“革筹小组”今夜无眠

面对“鲁大”和“红二·三”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头头儿们更是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当晚，“革筹小组五人核心”——笔者、丁宗学、韩健秋、张明岚、孙向铸（除了笔者，都是中四学生；除了孙是原“八·三一红卫兵”政委，其他都是“主义兵”老骨干），聚集在张明岚的小房间密谋了通宵。

人们先是痛骂王效禹和“新权贵们”实用主义、两面派、假革命，群情激愤骂不绝口。

即使此时，笔者也不能将亲历和见闻的所有黑幕和盘托出，只能有选择地简明扼要透露了一些相关内幕，以证明：“这不过是王效禹等人一贯的政治阴谋！”

因为，笔者不得不担忧两种后果：其一，崇理尚义不计后果是“鲁大”造反派的共性和传统。弄得不好，他们有可能因彻底失望而破釜沉舟：“去他娘的，老子不干了，不为这帮混蛋卖命了！”若然，笔者就真的成“光杆儿司令”了。其二，即使他们像笔者一样坚定而冷静，一旦传扬出去，众多原保守派群众也难免纷纷倒戈，投奔“红旗队”。若然，我们就更成“小瘪三儿”了。

冷静理性、深思熟虑、温文尔雅是中四主流派一贯的传统，也是笔者最敬佩最赞赏他们之处。众人渐渐冷静下来，开始客观而深入分析个中原委。结论完全一致：“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孙汉卿上台复辟！”

最后，又商讨对策。果然不出所料，丁宗学首先拍案而起：“他奶奶的，还是继续办我的《海燕》小报儿，向全市散发，揭露他们的大阴谋！”

天蒙蒙亮了。最后，一致接受了韩剑秋和笔者的意见，形成最后决议：既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孙汉卿“复辟”，那么，这就突破了我们的底线，在它尚未成为事实之前，依然是“谁胜谁负的斗争仍在继续”，就仍然要与他们周旋下去！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五人并动员尽量多的群众签名，向全省发表公开声明：集体退出“红二·三”！

四、省革委：“副主任”否定“正主任”

笔者虽已精疲力尽，却也获得了极大的精神鼓舞：“在此危难时期，思想情感和观点如此高度一致，真不愧为心灵相通生死与共的造反派老战友！”

既有如此坚强的领导集体，笔者就更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放手干下去了！首先想到了王竹泉，他不仅是笔者最佩服最赞赏的全省造反派领袖，而且是省革委副主任——唯一能与王效禹相抗衡而又政见不同的人。

1. 密派王瑞功“告刁状”

“革筹小组”密会后，笔者立即找到王瑞功，要他全权代表笔者和“红二·三”向王竹泉反映工作组的问题，希望他主持公道扶危济困（此时王竹泉正在南郊宾馆开会）。

王瑞功也是中四学生，或许因为“说话太刻薄，宅心不仁厚”，同班同学多有微词。他又个性特强极爱面子（或“死要面子”），难免脱离群众，先加入了“新山大红卫兵”，后又成为坚定的“红二·三”战士。

笔者之所以选择他担此重任，为“鲁大”和“红二·三”生死存亡“做最后的抗争”，主要出于两种考虑：其一，头头儿不宜出面“告工作组的黑状”，以免“公然对抗省革委”之嫌；只能找个“一般群众”出面，以突出“群众自发的非官方”色彩。其二，他本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且口才极好，伶牙俐齿、煽动性特强，是中四的“二铁嘴”。

不用笔者细说，王瑞功立刻心领神会、慨然答应、即刻动身。

他果然不负重托，超额完成了任务，带回来“省革委王副主任的重要指示”：“什么？要联合‘红旗队’？这个第三代老保组织本身就是一个‘怪物’，它的存在更是山东省红卫兵运动的耻辱！”

2. 形势急转直下

真是久旱逢甘霖啊！笔者一边让王瑞功赶紧向丁宗学、韩剑秋等报告“天大的喜讯”，一边让人紧急通知：所有驻扎在1号楼的“红二·三”战士立即到大会会议室集合，传达“省革委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王瑞功照本宣科后，全场一片欢腾。最后，笔者只讲了两句话：“第一，会后所有人立即广泛传达宣传，不分观点和派别。第二，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尊重工作组，任何人不得与他们发生任何争论！”

“省革委王副主任重要指示”很快传遍了整个校园，形势急转直下。

工作组自进校后，就处于翻案派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申述的意见无非两类：一是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请工作组主持公道评评理“这究竟是什么路线？”二是质问“为什么要支持老保，支持走资派复辟？这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吗？”

然而，工作组成员在集训期间就规定了纪律：以柔克刚！只要翻案兵不动武就耐心说服教育。一向热衷于精神刺激的翻案派，面对不温不火的回避问题，渐渐觉得无聊无趣“懒得搭理他们”了。

天上又掉下如此有趣的话题！于是，“王副主任的重要指示是真的吗？你们有何高见？同意还是不同意？”诸如此类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可惜，工作组成员大都远离省革委权力中心，如何能了解个中奥秘？当众只能回答：“不了解情况，无可奉告。”回到工作组后，他们不能不向头头儿们乃至张子石本人讨个说法。

“半途杀出个程咬金”，张子石同样被置于尴尬境地，“常委”毕竟不如“副主任”大呀。总不能为了一个学校而公开省革委内部矛盾“分裂红色新政权”吧？真是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最终，只能

功亏一篑灰溜溜地撤走了，寿限不足一月。

送行的，除了笔者等“革筹小组”和“红二·三”群众“热烈欢送，依依惜别”，更多的是翻案派群众五花八门的“送殡”花圈和“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等大标语。

后来，笔者终于明白了：凭王效禹“只要有三分把握就要努力争取”的强硬个性，仅凭“王副主任的反调”和“红二·三”群众抵制，根本不可能撤走工作组。根本原因是：王、关、李“出事儿”被抓了，孙汉卿和“红旗队”的后台坍塌了，他想通过他们向“中央文革”邀宠的希望破灭了，要赶紧与“王、关、李”撇清关系，以免相互勾结之嫌……

五、“三国重开战”

工作组撤离后，“三国”矛头转而一致对内，混战烽烟又起。派仗有增无减越打越上瘾，最终由“拳脚式”发展到了“棍棒式”。笔者和“红二·三”的危难尚未过去，来自“左”的方面的威胁日趋凸显，“谁胜谁负的较量”仍在继续。

1. 修复与省革委的关系

在中国要混迹于官场（包括文革中的新官场），最容易最得利的是“紧跟上司脚步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即刘少奇的“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不计后果，要“坚持真理”（个人意见）也不难；最艰难最凶险的是，既要“坚持真理”又不能“撕破脸皮”，维持上下左右平衡的“走钢丝”。

翻案派广大群众既不会轻易归附于“小瘪三儿”，更不会承认“革臭小组”。与他们的争斗，“红二·三”可以凭借的唯一资本是省革委为首的校外主流造反派“坚决支持”。

这可咋整？我们把工作组弄得如此狼狈，如果张子石、王效禹怀恨在心，一怒之下连“红二·三”旗帜也不要了，转而全力支持“红旗队”甚至与翻案派秘密媾和，那该如何是好？

纠结之时，翻案派送来了及时雨。

2. 翻案派好大喜功代人受过

“二·三夺权”后，“主义兵”和“翻案兵”的致命弱点是：忘乎所以好大喜功，惯于夸大自己的优势和能力，少有实事求是的冷静理性，把分析或想象中的“必定胜利”当成现实，并以此鼓舞士气。笔者称之为“逆境综合症”。

工作组被迫撤离，他们同样归功于“翻案派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大张旗鼓热烈欢呼、隆重庆祝了好多天。

既然他们好大喜功自愿代人受过，就成全他们吧。正好“红二·三”继续扮演“坚决拥护省革委，舍不得工作组走”的角色。其后，连续多日，“愤怒声讨翻案兵反对工作组！坚决拥护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红色新政权！”之类的口号，反复广播了好多遍。“效禹同志”和“子石同志”，充其量只能说我们“拥护省革委是虚情假意”，总不能说我们“与翻案兵穿一条连裆裤合谋反对省革委”吧？

六、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预防“翻案兵”偷袭，到时便于奋起自卫迎头痛击，“红二·三”战友把缴获的一根垒球棒发给了笔者，确实“轻重适宜，煞是顺手”，一直横在枕头下多日，直至军训团进校。

翻案派虽然群龙无首，但是，各自为战的造反派传统犹在。尤其是，“八·二九”惨遭皮肉之苦的无辜民众，更是将仇恨一股脑儿记到了“红二·三”和“红旗队”账上，要向他们“讨还血债”。

然而，“红二·三”和“红旗队”也已今非昔比，凭借省革委坚决支持的优势，同样自信“正义在手，真理必胜”，更是豪气干云、以一当十。

结果，“针尖儿对麦芒”针锋相对，谁也不会退让“装蒜种”。派仗越打越大，越打越敌对、越凶狠、越不要命。“红旗队”董以山（政一学生，身高一米六几），曾经创下一根“水火棍”力敌翻案兵数名高手大获全胜的纪录，追得“敌人”狼狈逃窜。

正是这种日益激化的敌对情绪，埋下了可怕的复仇种子。在其后两次“清理阶级队伍”中，又大都发泄到了造反派干部和其他清查对象身上，酿成了空前的大悲剧。

作为“后台老板”，笔者心目中自有“既定方针”：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的并非军事仗、武力仗，而是政治仗、智慧仗。“红旗队”遭受重创元气大伤，“红二·三”成了唯一的“正确路线代表”。而翻案派，虽然组织垮塌成了强弩之末的散兵游勇，但依然人多势众，像一头垂死挣扎的猛兽，仍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作为弱小一方，“红二·三”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是：固守阵地静待其“再而衰，三而竭”慢慢死去。尽量避免武斗“消耗战”，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因而，对打打杀杀的武斗，不以为然毫无激情。

笔者一生似乎与“右倾机会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初中时，就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遥相呼应”说“大跃进”（实为“五风”）得不偿失。第一届校革委闹翻案时，更成了“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此时，依然未能幸免。

笔者对武斗“胆小避战，龟缩退让”的消极态度，让一些义愤填膺的“红二·三”骨干大失所望。连续两天，三、四拨人相继到我住处进行“兵谏”，激愤地质问：“为什么看着翻案兵如此猖狂不闻不问？为什么看着战友挨打无动于衷？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并先后将三、四张大字报贴在了笔者床头和卧室墙上，强烈要求笔者：“走出闺房，带领战友们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与群众同甘共苦浴血奋战！”

同年级同学孙玉朝（化二丙班）最为激烈，说到激愤处气得嘴唇发抖，将办公桌上的玻璃板拍成了两半……

那是怎样单纯而亢奋的年代啊！要的就是提起棍子往前冲，其他都是废话。而笔者最欠缺的恰恰就是这种勇敢精神。

第十一节 军训团（第二届军宣队）

按照中央部署，其他兄弟院校军训已经好久了。为了尽快恢复学校正常秩序，王竹泉提议并经省革委和济南部队党委同意，抽调“山师军训团”骨干力量扩建为“驻鲁大军训团”。学校迎来了“王文俗军训团新时代”。

一、军训团进驻学校

1967年国庆节前后，在省革委北楼地下室小礼堂举行了“鲁大军训团成立暨集训开幕式”。会场相当隆重，王效禹非常重视并到会发表讲话，对军训团寄予厚望。

笔者也有幸参会，静悄悄坐在最后一排，细心观察洗耳倾听。

军训团进校时，军容肃整浩浩荡荡，不愧为正规野战部队。与张子石工作组相比，更觉威武雄壮先声夺人。随即在老校大操场举行了欢迎仪式。王文俗在讲话中重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坚定不移地支持以宋书星同志为首的‘革委会筹备小组’，坚定不移地促进革命大联合……”

1. 王文俗其人

事前，王竹泉专门征求过笔者意见，并介绍了团长王文俗：济南部队司令部动员部部长、大校副军级，军区内誉为“群众工作专家”。他不仅自己坚定拥护文革支持造反派而倍受袁升平（济南部队政委）等排斥。而且，他老伴儿和六位“千金”都是坚定的造反派，是司令部大院儿有名的“造反家庭”，长女海燕更是哈军工“炮轰派”……在反文革势力始终占绝对优势的整个文革时期，像王文俗这样的“军训团团长”实在太难得太可遇而不可求了。笔者欣然同意、热烈欢迎。

2. 军训团内同样分两派

就个人观点而言，军训团内同样分为两派：同情支持保守派的“反文革多数派”与同情支持造反派的“文革少数派”。与地方的

差别仅在于：军纪约束力尚能维护表面的统一。

以马政委为首的多数派包括刘吉宾秘书（军区副司令员范朝立秘书），更倾向并暗中支持“红旗队”。对“红二·三”内，更支持丁宗学对翻案派以暴制暴的强硬政策。

以王文俗团长为首的少数派，更支持“以宋书星同志为首的革筹小组”，真心依靠“红二·三”，真诚教育争取翻案派广大群众。他虽然当众乐观幽默经常与人们开个小玩笑，但独处时，深陷在眼眶里的目光凝重而冷峻，愈发显突出高大额头上双眉紧蹙，为学校的复杂局面和军训团内的意见分歧而苦苦思索对策。

3. 马政委走了

不知什么原因，进校不到十天马政委就走了。张海庭（原济南军区司令部处长）副政委升任政委，对王团长相当敬重，且意见极少分歧。军训团领导层的团结统一基本实现。

军训团领导与革筹小组联席会议成了学校的决策机构。成员是：王文俗团长、王建国（济南军区司令部情报部长）副团长、杨玉华（济南军区司令部卫生所长）副团长、张海亭政委、刘吉宾副政委以及宋书星、丁宗学、韩建秋、孙向铸、张明岚。会议召集和主持理所当然的是德高望重的王文俗团长。

历经三个多月校内外“两个战场”和反右与反左两条战线的折腾，笔者深感身心交瘁疲惫不堪，终于放下了肩头和心头的重担。

或许升任副政委的刘吉宾官阶和号召力不够高，军训团多数派一时难能形成整体力量。只有杨玉华副团长与“红二·三”新校分部负责人耿培成一起，大量吸收“红旗队”成员，“红二·三”队伍膨胀的同时，“红旗队”顺利实现了“一套人马，两块招牌”的布局。

二. 第一次“清理阶级队伍”

武汉“7.20事件”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发表了诸多讲话。文革呈现出紧急刹车之势，反极左思潮成了文革大方向。为“鲁大”

恢复正常秩序提供了良机。

学校开始第一次“清理阶级队伍”，并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由张明岚任主任，下设多个“专案组”；总负责人是“革筹小组”副组长丁宗学和军训团副团长王建国。

1. 第一次“清队”

“苏联模式”传统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凡是群众（尤其青年学生）闹事的地方，背后必定隐藏着“黑手”。要想尽快平息事态，必须揪出幕后黑手、教育受蒙蔽的群众。

“鲁大”像全国一样也必须照办。

随即，王公乾、孙云亭、王玉林、徐经泽等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外加“有历史和现行问题”的人都成了运动对象被隔离审查。

还有高登仁、梁学理、蔡国楷等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毫无历史问题，就连保守派都普遍认为他们“正派且清白”。然而，“没有历史问题，难道没有现行问题？”于是，“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桥牌俱乐部”应运而生，最后一批造反派干部几乎尽皆囊括其中。

更令笔者不安的是，被清查对象的“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大都是以前官办“山大兵”所揭发的。譬如，孙云亭四个儿子分别叫建国、建华、建中、建民（顺序可能有误，但绝非“孙建中华民国”！）。然而，此时又成了“孙建中华民国”——“仇恨共产党，梦想复辟国民党统治”的铁证。

2. 刑讯逼供

各系各单位都设立了重点对象的隔离室，并由专人监押看守；不准外出，不准私自会客……

“清队”迅速深入，清理对象“顽固不化，拒不交代”，随即出现了刑讯逼供苗头。

尤其是，化学系孙玉朝等人对翻案派干部刑讯逼供最为激烈，不止一次把清查对象的双手吊在暖气管道上用棍棒殴打。人毕竟是肉长的，严刑之下终能撬开“铁嘴钢牙”，因而“战绩辉煌”，被军训团主流派某些人誉为“能打硬仗的虎将”。

与化学系刚好相反，物理系、中文系等则比较文明或“右倾”。一天，董怀臣（物理系革委副主任）与笔者聊起“清队”，都不赞同化学系的行为。他邀请我去他们系看看。在物理楼地下室一个大房间里，隔离着高登仁、孙文广两人。房间干干净净，草垫子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像人住的地方”。高、孙俩人也平静整洁，毫无受皮肉之苦征兆。到物理系办公室，笔者听了他们简要汇报，并予以充分肯定。中午，笔者向王文俗简要报告了所见所闻。他沉吟片刻，未置可否。

3. 王玉林之死

刑讯逼供的严重后果终于发生了。在老校大礼堂召开的批斗大会上，王公乾、梁学理、孙云亭、王玉林等十余人，被揪上台示众，一字排开站了大半个舞台前沿，低头弯腰“喷气式”。不大一会儿，王玉林就摇摇晃晃站立不稳，颓然瘫倒在台上。专案组的人将他抬下台走出后门。

笔者以为他因胖大而高血压晕倒，毕竟是重大事故啊，急忙从后面跑到后门外，眼见许多群众还在对他施以拳脚和口水。便上前用身体护着昏迷中的王玉林大声喊：“别打了！别打了！”不一会儿，王玉林面孔的红潮渐渐褪去，由红变黄、由黄变白，死了。

当时笔者以为，是因群众拳脚致使其心脏病发作而死，心情气愤而沉重，对主动打招呼的人一律不搭理。后来方知，他在化学系关押期间多次遭受毒打而伤及内脏。

下午，王文俗召集军训团和“革筹小组”在1号楼二层小会议室举行紧急联席会议，他问笔者：“人到齐了，开会吧。”笔者铁青着脸一声未吭。他原本严肃的面孔更严肃了。

首先，他提出了“一个结论、两点要求”：第一，据初步了解，王玉林属于突发心脏病意外死亡。第二，一定要深刻吸取这个教训，教育群众尤其是负责“清队”的同志严禁逼供信，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第三，在座各位同志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能因为出了一点意外事故就否定“清队”大方向；更不能打击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清队”积极性。

笔者一听，后者分明就是对笔者的“警告”，只能继续保持沉默，自始至终一言未发。这是笔者与王团长之间唯一的一次不愉快。

三、“王、王、庄”被抛了出来

武汉“7.20事件”后，面对武官们的强力顽抗，毛主席不得不扭转文革航向，挥泪斩马谡惩治“反党乱军分子”，并逮捕了“王、关”，李广文也随之倒台。不久，山东军内和地方又涌动起一股“揪出王关戚在山东的代理人”的“倒王（效禹）暗流”。

1. 王效禹抛出了“王王庄”

“倒王暗流”政治压力日增，王效禹为了把自己从“王、关、李反党集团”和“反党乱军极左思潮”中洗刷出来，不得不丢车保帅抛出了“混进省革委内的极左思潮根子”——“王（路宾）、王（历波）、庄（中一）反革命集团”，并将山东“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党乱军”的罪责推到他们头上，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了好一阵子。王路宾更成了《揭盖子》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黑后台”。

2. “揭盖子”成了大毒草

红极一时的《揭盖子》也随之成了“王路宾、孙汉卿秉承王力、关锋、李广文旨意指使少数保守派头头儿炮制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活样板儿，是全面否定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毒草”。

作为《揭盖子》的炮制者，“红旗队”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昔日的“大功臣”成了“为反革命集团张目的铁老保”。

全省上下掀起了批判“王王庄”和《揭盖子》的高潮，《红二·三战报》、“红二·三广播站”也乘势而上，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一向坚定不移的“红旗队”日子越来越举步维艰了。

3. 暗自庆幸

笔者暗自庆幸：“红二·三战斗队”岂能与一统天下的各大造反组织相比？更不能与有权有势的省革委相比！当时，倘若趋炎附势在“揭盖子”上签了名，此时岂不成了“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新老保”？何以立足于“三国”混战的校园乱世？纵然别人迫于形势

不敢公开说三道四，自己又有何颜面继续赖在政治舞台上装猫变狗丢人现眼？

4. “紧急辟谣”

省革委公开批判《揭盖子》的声势越来越大，“红旗队”的迷茫困惑和精神压力实在承受不住了。杨化军（山师体育系学生、“山工总”顾问）领着王坤泰到省革委第一宿舍找到王效禹。王效禹也不忘旧情，接见了他们并极力抚慰：“《揭盖子》的责任不在你们，‘红旗战斗队’依然是革命群众组织！”

面对“红二·三”广播站的舆论攻势，“红旗队”广播站不得不将“效禹同志重要指示”连续反复播放数十次。

当时，笔者正在新校1号楼“红二·三分部”办公室与耿佩成交谈。他问：“‘红旗队’广播的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咱们群众的影响太大了！能不能核实一下？”

笔者拨通了王效禹家（省革委一宿舍）的电话，与其文牍秘书朱文通话。

笔者问：“红旗队广播站说，效禹同志接见了王坤泰，并说‘红旗战斗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他说：“请稍等一会儿。”放下电话去请示王效禹。

一两分钟后，他答复说：“效禹同志从来没有接见过红旗战斗队任何人！”

笔者追问：“可不可以公开辟谣？”

只停了不到一分钟（他又请示王效禹），他果断答复：“当然可以！”

笔者急就一份“紧急辟谣”：x年x月x日x时x分，王效禹同志电话指示“我从来没有接见过红旗战斗队任何人！”并要“红二·三”代为辟谣。“红旗队”广播站所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广大师生员工切勿上当受骗！

写完后即刻交给耿培成，要他立即送广播站播出，并强调：“红旗队广播了多少遍，就广播多少遍。”

“红二·三”群众精神大振信心倍增，“红旗队”却哑巴吃黄连从此一蹶不振。

三、张政委宣讲毛主席南巡讲话

第一次“清队”恢复了学校正常秩序，使翻案派群众“口服”了，却未能让他们“心服”。尤其是，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明显要“刹车降温”。广大群众尤其造反派群众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产生了诸多疑问、困惑，甚至心灰意冷、消极颓废，觉得“反复无常没正事儿”。

军训团决定由张海庭政委在老校大礼堂作专题报告，宣讲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讲话，引导群众正确理解讲话精神，认识无产阶级专政前提条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保障作用。

早在“反逆流”时，张政委就是济南部队为张春桥、姚文元准备的“七辩手”之一，其口才超群和思维敏捷可想而知。其后，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经过大半年自我学习和反思，真正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和必要性。

那是文革中笔者印象最深刻的三场报告之一，也是最精彩的一场报告。思想深刻、思路清晰，观点明确、逻辑严谨，娓娓道来、无一字废话。与曹靖和杜春胜的前两次相比，少了些慷慨激情，多了些平和理性。太精彩了！仅凭半页纸的提纲和几张卡片，讲了大约3个小时。

报告轰动了整个校园。不论“鲁大人”还是“山大人”，一向以“山东最高学府”自居，自恃才高八斗目空一切。对张政委的报告却真的口服心服了，对军训团也刮目相看，不敢再有丝毫小瞧和轻慢。人心稳定又进一步巩固了秩序稳定。

第十二节 第二届校革委

学校彻底稳定下来，王副团长、杨副团长等一批军训团成员返回了部队，军训团也改名为“军宣队”。结束长期没有“新政权”的条件成熟了，第二届校革委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

一、刘副政委要抹掉“宋书星为首”

刘吉宾副政委负责政审，由团部几个主流保守派组成政审小组，又调入化学系“政治骨干”王象效等。他们同样希望建立自己“理想的鲁大革委会”，便确定了“扶丁贬宋”的策略。在是“否同意参加校革委”的政审意见一栏中，丁宗学的是“可以担任领导工作”，笔者的则是“可以考虑”。

笔者并不感到意外。在军宣队主流保守派心目中：宋书星不过是“王效禹的代理人”，丁宗学才是“红二·三”久经考验当之无愧的领袖。对此，笔者一笑了之：我看不出他们有多大本事能把“宋书星同志为首”抹掉……

二、第一个愿望完全实现

校革委筹备工作由政审进入正式组建阶段，军宣队与革筹小组举行联席会议，正式讨论校革委组建问题。

笔者一改“清队”会上发言不积极或一言不发的习惯，抢先提议并坚决要求：“王团长兼任校革委主任，张政委任第一副主任！”提议一出，便引起热烈讨论。

王团长坚决拒绝并提议：“宋书星同志任主任，丁宗学、赵崇德（数学系原总支书记）任副主任。”理由是：“部队有规定，军人不能兼任地方职务，所有驻济高校革委会主任都是红卫兵代表”……

笔者立即反驳：“不能兼任地方职务，怎么全身心‘支左’？与其别别扭扭地‘不在其位，反谋其政’，何如名正言顺地搞好学校工作？再者，如果上级命令你们撤离，职位又带不走不会拖累你

们。至于其他高校，我们有我们的实际情况，何必不顾实际“一刀切”跟在别人屁股后盲目模仿？”

在革筹小组全体一致同意强烈要求下，王团长终于一边摇头苦笑一边勉强同意。

张政委更是坚决拒绝，他半开玩笑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那样还能叫革委会吗？岂不成了军管会？”

既然笔者开了个好头儿，剩下的就用不着多费唇舌了。韩剑秋也半开玩笑地反驳说：“党领导的军队历来军政一家，你不当第一副主任，岂不是军政闹分家吗？再者，如果你不与老头儿做伴儿，他不是太孤单了吗？又怎么保证他安心本职工作？”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王团长也笑着表态：“那么，咱俩就做个伴儿吧。”

张政委又提出：“要么我就做个常委吧，或者后一名副主任。”

同样被革筹小组五票否决。笔者的愿望全部实现了：不论资历级别还是德能水平，只有王团长能与孙汉卿比肩、有可能阻挡他“复辟”；张政委又是王团长最有力的臂膀。

三、第二个愿望基本实现

第一届校革委的教训太深刻了，笔者暗下决心：“职官”同样是学校的重器，必须贤能者居之。虽然本人不适合当官，但是，绝不容许那些无德无行惯于“得志便猖狂”的人再得到一官半职，一定要把中四学长们尽量多地推上各个重要岗位。

在革筹小组会上，笔者首先提出了“五常委名单”：孙向铸、韩剑秋、张明岚、王瑞功、李际田（《红二·三战报》主编）。

丁宗学等几个中四的人边笑边拒绝。韩剑秋说：“中四已经四个人了，如果再增加，还能叫鲁大革委会吗？岂不成了中四革委会？你就不怕我们联合起来架空你让你小子真成了儿皇帝？”

笔者笑着说：“随便你们！若果真架空了，我乐得逍遥自在。如果你们也搞复辟，我再起来造你们的反！”

韩剑秋又推荐了中一的王凤安：“老成持重，好学善思”。众人一致赞同。

对“红二·三”新校分部的代表，颇费了一番斟酌。不论思想水平还是组织能力，耿培成都堪称优秀远远超过崔延奇。可惜他“干的多错的也多”，盲目扩大队伍把“红旗队地下工作者”拉入“红二·三”，帮助他们实现了“一套人马，两块招牌”的布局。最终，崔延奇成了“常委”。

四、不同观点群众代表

除了“红二·三”还有另外三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翻案派”“红旗队”和“新联站”（鲁迅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生战士联络站）。

1. “新联站”王斗资

军训团进校后，结束了武斗混战，许多翻案派再一次从迷执疯狂走向消极沉沦，似乎没有武斗就“迷失了大方向”。

张政委的报告唤醒了许多翻案派同学。他们不甘寂寞和沉沦，通过读书思考，深刻反思“鲁大”接二连三的劫难，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视并尊重现实，重新选择了继续革命道路。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鲁迅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生战士联络站”。它首先发端于生物系一年级，负责人是王斗资（原名王树美）、于启宇等。其他各系也相继响应，诸如历史系韩克佑、物理系赵文锦，等等。

他们在校革委中获得一个常委、二个委员名额，王斗资被推举为常委。

2. “红旗战斗队”董以山

鼎立中的“三国”，要论组织之严密，首推“红旗队”。他们始终保持着对群众的高效领导，还往“红二·三”内安插了大批“地下工作者”，长期保持了“一队人马，两面旗号”的组织格局，令笔者赞叹欣赏。

最终，推举董以山（政一学生）出任常委。

笔者以为，尽管省革委王副主任有“怪物”和“最大耻辱”的指示，但“红旗队”毕竟是在翻案派围攻和世事无常的困境中存在至今。应当尊重客观现实、团结大多数。更有，他们审时度势、因势而作的强烈意识，以及上天入地搅起千堆雪的卓越能力，也着实令笔者惊异感佩自叹弗如。

3. 翻案派刘全复

翻案派组织体系早已垮了，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民主推选，只能由革筹小组越俎代庖。笔者认为：即使有条件推选，也是非刘全复莫属。作为闹翻案的和决策者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能代表翻案派的意愿和要求。

五. 干部代表，军训团说了算

至于干部代表，理应尊重军宣队（主要是刘吉宾副政委）的意见：魏一鸣（原校政治部主任），赵崇德（原数学系代书记），孙兆路（原物理系书记）。他们都是文革前一两年转业军队干部。

对此，笔者与革筹小组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明知他们都是“孙汉卿的人”，除了赵崇德表示过“坚决拥护以宋书星同志为首的革筹小组”，其他两人都“坚定不移支持红旗战斗队”。但是，既然在群众代表问题上，军训团最大限度地尊重了我们，在干部代表问题上我们也应当投桃报李。

所有造反派干部都成了“清队”对象，更无缘什么“委员常委”了。

六、“教师代表”——激烈争夺战

军宣队与革筹小组为了确定教师代表“常委”，在1号楼大会议室召开了各系军宣队与“红二·三”负责人会议，引发了一场空前激烈“争夺战”。

首先，中文系柳明瑞推举李志宏（冯沅君先生研究生），理由

是：出身贫农，与同学张忠刚一起是最早起来造反的老造反派教师（当时研究生凤毛麟角，编入教师队伍），有思想、有能力，文笔超群，而且，作风正派、品行端方，坚持“糟糠之妻不下堂”（纯粹农民，比他年长好几岁）。

化学系孙玉朝坚决推举王象效（化学系有机教研室支部书记），理由是：烈士后代，“老红二·三”，在“清队”中表现突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本系教师中威信高，具有代表性。

随之，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别人再也无法插嘴。最后，孙玉朝凭着多年农村大队干部的“虎将”作风，暴跳如雷啪啪地拍起了桌子，遂以气势取胜：王象效胜出。

七. 常委分工

校革委领导班子分工由王团长指定，大家一致同意。

1. 主任和常委分工

主任王团长和第一副主任张政委负责全面工作；

丁宗学继续分管“清队”，张明岚任“清队”办公室主任，韩克佑（委员，“新联站”）任副主任；

赵崇德分管组织人事和“整党建党”工作，孙向铸任组织组长，王象效任“整党建党”办公室主任；

宋书星分管教育改革工作，孙兆禄任教育改革办公室主任，刘全复、吕经风（委员，外三学生）任副主任；

韩剑秋任办公室主任，邵常新（生物系干部）任副主任；

王斗资任宣传组长；

崔延奇（政四学生，“红二·三”）任后勤组长；

董以山任家属工作办公室主任，林江（委员，翻案派）任副主任。

2. 董以山令人感动

对其他常委分工，笔者虽不完全满意，但在那个年代毕竟还算

是各得其所，唯独对董以山的分工颇觉有点儿“太小家子气”，一个男生大老爷们儿分管家属工作有点儿说不过去，难免“排斥不同观点”之嫌。

事前，笔者向王团长提议：“如果不好安排，就让他到‘教改办’去吧，我愿意与他们一起共事。”（从“三国混战”到“三国合作”未尝不是一件趣事）他解释说：“家属工作同样很重要，尤其‘鲁大’的教工家属对闹翻案起了很大作用，她们是稳定学校局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幸，董以山和“红旗队”智囊团并不在乎分工，关键是能够及时掌握校革委决策层的内部消息和动向。

不过，董以山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责任精神还是给笔者留下了深刻记忆。这或许是绝大多数保守派群众的普遍共性和最大优点吧？

八．省革委审批，王效禹高度赞扬

校革委筹备工作顺利完成，应该报请上级政权机关审查批准了。很快，接到省革委办公室电话通知：领导同志听取“鲁大革委会”筹备工作汇报。

地点仍在省革委第一宿舍小会议室，听取汇报的有王效禹、王竹泉、张子石等省革委要员，学校参加汇报的有校革委五位主任。笔者简要汇报了军训团（军宣队）工作成绩和学校安定局面后，重点介绍了校革委常委班子构成。王团长、张政委在赞扬“宋书星同志出以公心，诚恳让贤，盛情难却”的同时，再次谦让：“军代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不太合适。”

包括张子石在内的省革委诸位要员非常高兴，王效禹发表了“重要讲话”：一是高度赞扬军宣队工作出色卓有成效；二是充分肯定“宋书星同志等红卫兵小将”有觉悟、高姿态，举贤任能、淡泊名利，等等。

随后，在老校大操场举行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热烈庆祝鲁迅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晚上，由济南部队“前卫文工团”举行

文娱演出以示祝贺。

第十三节 工宣队

1967年武汉“7.20事件”以后，面对整个反文革势力尤其武官们的抵制，为了避免更大的流血冲突，毛主席不得不再“刹车”。文革运动大方向逐渐转向：其一，不再强调“造反有理”和“斗争哲学”，转而批判“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其二，不再强调“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转而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一、曾经的“红卫兵小将”成了“臭老九”

在“苏联模式”下，如果没有毛主席“君权”（国家法权！）的庇护，面对强大的官权（文官和武官），任何平民大众个人或组织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异于草芥。昔日指点江山风光无限的“五大学生领袖”概莫能外。

或许是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太恶性膨胀了，根本无视文革大方向的转折，继续沿用“造反精神”和“斗争哲学”。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与“四·一四”的武斗急剧升级，致使许多无辜群众伤亡。

毛主席极度失望，决定：向北大和清华派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让“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曾经风光无限的“红卫兵小将”，又回归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当时，民谚将文革批判对象归纳为“九种人”——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臭。

二. 济南，“棒子队”与“大粪战”

在“苏联模式”国家，凡事无不全国一律一阵风一刀切，各方在执行中央统一部署中，当权派照猫画虎时又难免似是而非，甚至夹带私货。新老当权派概莫能外。

如果说，鉴于清华大学蒯大富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工宣队“占领学校”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它毕竟终止了愈演愈烈的武斗“内战”，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那么，对于各级革委会早已成立、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正常的山东济南，笔者实在看不出“工宣队的伟大意义”，看到的多是负面作用：其一，大学里，在省革委与校革委之间，又插进了“工人阶级”，校革委究竟应该听谁的？其二，社会上，更是人为制造了新的动荡混乱，从而引发了文革阵营又一次内讧和内耗。

1. 工人武装——“文攻武卫指挥部”

省革委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大势，成立了“工人阶级武装”——“山工总文攻武卫指挥部”，老百姓俗称“棒子队”。孟庆芝（“山工总”第四把手）任总指挥，杨化军（山师体育系学生）任顾问，所有队员一屡配发木棍棒和柳条帽。一时间，整个济南市各商店的白蜡杆、铁锨把、镢头柄等等木制棍棒相继脱销。

“文攻武卫”成立后的第一个战役，就是对山东医学院的“大粪战”。当时，他们暴力执法横冲直撞，与今天的“城管”大同小异，成了群众生活和工作安宁的最大威胁，难免受到质疑和非议。批评最激烈的当属山医，他们在市里贴了不少大字报和大标语，痛斥为“新的白色恐怖”。

为了迎头痛击“臭老九藐视工人阶级的嚣张气焰”，“棒子队”创造出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大粪战术”——“对付臭老九，就要以臭攻臭！”于是，“棒子队”武装押运，环卫队数十辆大粪车浩浩荡荡开往山医，朝校园内泼洒起人粪尿来。马路上、围墙上、花草树木上等等无一幸免，铺天盖地臭气熏天。其后多日，过往行人无不掩鼻屏息奔走远避。

2. “红山指”以“文攻”反击

自古以来，“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面对王效禹省革委压制不同意见对青年学生和市民大众“文攻武卫”，手无寸铁的“红山指”不得不再次“拿起笔作刀枪”，对自己参与建立的“新政权”

开展了一场“文攻文卫”舆论战。

王竹泉幕后组织指挥，《山东红卫兵战报》主编孙国华和曹锋（山师中四学生）捉刀撰稿，“红代会”常委集体讨论通过，以头版头条通栏大字标题连续发表了《人民拥护 人民政权》《人民政权保护人民》等四篇社论。强烈呼唤“新政权”回归人民性或平民性，集中代表了青年学生和市民大众的心声，在全省引起了空前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山东红卫兵战报》成了民众心目中的“星星之火”，发行量曾一度超过《大众日报》名列全省前茅。

三、“驻鲁大工宣队”

省革委王效禹斟酌再三，决定：由“汽老总”（济南汽车制造总厂）向“鲁大”派驻工宣队，并按照统一规定，工宣队与军宣队合并为“工军宣队”，王文俗任政委。

1.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作为“山工总”属下唯一的大产业工厂，工宣队对翻案派乃至全校师生带有浓烈的对立心态和“敌情观念”。他们一进校就坚定不移地站到翻案派群众对立面，与刘吉宾副政委等军宣队主流保守派合流，以居高临下“领导一切”的姿态，盛气凌人地否定王文俗军宣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豪情满怀地要“开创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新局面”。

2. “王政委”被晾了起来

首先，他们废除了军宣队与校革委常委联席会议制度，代之以工宣队长加刘吉宾、丁宗学等办公会议，独揽一切大政方针的决策权。

此时，张政委已调任山师任军宣队政委，剩下王文俗虽为“工军宣队”政委，却连研究重大问题的会也无权参加，除了在走过场的会上讲几句“要注意政策”的官腔，就是关在小房间里一支接一支地抽闷烟，一天竟高达三盒夺“大前门”。

三、第二次“清队”——“红色恐怖”

工宣队坚决贯彻执行“北京六厂两校经验”，就是要：像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那样，彻底清理党外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有历史或现行问题”的人。在他们看来，翻案派闹翻案“是阶级敌人操纵的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行为”。要清除隐患，必须“彻底清理阶级队伍”，揪出那些“隐藏在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

一场更彻底更暴烈更惨绝人寰的“第二次清队运动”开始了。

1.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重演

在清查范围上，比第一次清队要大得多，曾经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依然首当其冲；其次，所有“有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的教工工师无一漏网。除了“清队办”直接负责的全校重点清查对象，各系各单位都有本单位的清查对象。真可谓“牛鬼蛇神成堆”，难怪“鲁大问题成堆”！

2. 冤狱遍全校，无处不惨叫

在清查方式上，几乎无不采用各种形式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仅仅是辅助手段。

“第一次清队”时，刑讯逼供仅存在于化学系，王玉林死后，军训团立即刹住了这股歪风。而此次清队，“棍棒加吊打”席卷全校几乎各系各单位，除了化学系，生物、外文、数学、物理等多个系也后来居上。特别是物理系，董怀臣因“右倾”也靠边站了。似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为了弥补第一次清队时的“右倾错误”，更加卖力地刑讯逼供。不久，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普就“自绝于人民”了。

“冤狱遍全校，无处不惨叫”，不足三个月，非正常死亡竟多达12人，成了“山大”历史上最疯狂的“红色恐怖”时期。

3. 向校革委开刀

“工宣队”的五个队长只有刘正军是真正的老工人，“一号灵

魂”副队长王友文是厂保卫科干部，“二号灵魂”副队长孙宝珠以及“苏大胖子”是技术科技术员。他们大都是中专或中学毕业学生。

他们乘“红色恐怖”东风向校革委开了刀：背着校革委主任王文裕和副主任宋书星，伙同刘吉宾、王象效等，指令毕业分配办公室，将校革委常委刘全复随六八届学生一起分配离校。同时，孙宝珠在会上宣称：“董以山这样的铁老保也必须清除出校革委！”

四．五个队长赶走了仨

1968年秋一天上午，在老校1号楼门前的小桥上，笔者问刘全复：“老刘，急急忙忙干什么去？”他答：“去分配办公室办理离校手续。”

笔者闻听此言，一股怒气勃然而生：一个常委（王象效）竟然背着主任、副主任要将另一个常委赶走，真他娘的翻天了！凭什么？不就是仰仗工宣队撑腰吗？狗仗人势。

笔者说：“先别急着办手续，结果怎么样还不一定呢！”

说完沉吟片刻：要不要向王文裕打个招呼？算了！一是他内心肯定支持，但他已经成了“工军宣队政委”，不应把他牵扯进来。二是不能再派别人代劳，一旦传扬出去，有可能影响校革委和“宋丁搭档”的团结。问题太复杂，无人能替代！

笔者骑上自行车立即奔向省革委。

1. 利用矛盾

在路上，确定了“告状”原则：公事公办，实事求是，客观公正！铁路大厂与“汽老总”是济南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厂，为了争“老大”而矛盾历史久远。文革前莫说工人相互瞧不起，就连厂长也暗中较劲。文革后，原来日本人开办的铁路大厂“站错了队”成了“山工联”属下被取缔，长期一蹶不振。新中国开办的“汽老总”却“站对了队”成了“山工总”属下，一直以“老大”自居耀武扬威。铁路大厂的人憋气已久。

首先，找到省革委常委、群众工作组组长、全省“工宣队总管”

乔世俊（铁路大厂工人）。笔者如实反映工宣队的问题：一是踢开军宣队和校革委独断专行，二是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刑讯逼供致死12人，三是推翻了得到“效禹同志”高度赞扬过的军宣队方针政策，造成人心浮动局势不稳，“给工人阶级脸上抹黑”。最后，强烈要求：省革委妥善解决，最好改派铁路大厂的工宣队。

笔者刚讲完，他立即表态：“太不像话了！我一定尽快向‘效禹同志’做专题汇报。”

2. 再搬救兵

笔者仍然放心不下，第二天又找到王竹泉。他对“棒子队”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抵触情绪比笔者少不了多少，根本用不着多讲废话，便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如实反映王团长“被靠边站”、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等，强烈要求：要么撤换工宣队，要么撤换工宣队队长！

他立即带领笔者找到了王效禹，王效禹又通知乔世俊到省革委第一宿舍小会议室一起听取汇报。

王效禹一直视“鲁大”为心腹大患，深恐出乱子影响全省。军训团好不容易稳定了学校局势，解除了他的心腹之忧，高度赞扬的词语表露出内心几分感激。来之不易的形势稳定，不会容忍工宣队给毁了。

鉴于此，笔者打消了所有禁忌，一切都照实直说：其一，工宣队独断专行大权独揽，把“工军宣队政委”、校革委主任王文俗晾了起来，废除了军宣队与校革委联席办公会制度，代之工宣队决定一切，背着校革委要将翻案派常委刘全复分配离校，并扬言还要罢免“铁老保”董以山的常委资格。其二，违反“清队”政策，大搞刑讯逼供，两个多月致死12人，导致人心浮动民怨沸腾。弄得不好有可能激起民变，使翻案派死灰复燃。其三，五个队长只有刘正军是真正的老工人，其他四个副队长都是厂保卫科干部或技术科技人员。群众嘲讽：“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中专生领导大学生，落榜的领导‘中举’的！”

最后，衷心希望省革委深入调查妥善解决。

王效禹听后，异常气愤：“你们学校工宣队的问题我已经了解了一些（乔世俊已经向他报告了），没想到如此严重，简直是瞎胡闹，帮倒忙！不行就让他们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3. 五个队长赶走仁

几天之后，王友文、孙宝珠和“苏大胖子”三位副队长就卷起铺盖卷儿悄悄回厂了，同时撤离的还有一批“冒牌儿工人”。

对于工宣队而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无异于一次大地震。“要领导一切”的豪情和骄狂气势一落千丈。

4. 云开雾散

终于恢复了正常秩序。一是迅速刹住了刑讯逼供歪风，非正常死亡戛然而止，被清查人员陆续解除了隔离。二是重新恢复了工军宣队与校革委常委联席办公会议制度，恢复了王文俗原有的威信和主政地位。三是撤销了刘全复的原分配方案继续留校任常委，“铁老保”董以山也保住了常委名份。

不久，队长刘正军和另一位副队长也离校回厂了，厂里又派来新队长杨丰宝。他是老工人后代，十几岁就到锻工车间当徒工，耿直仗义与人为善，虽常常“执着我见”，但绝少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牛气，对“王老头儿”非常敬重，并与笔者结为莫逆之交，直至九十年代病逝。

五、永远的忏悔

第二次“清队”连同刑讯逼供歪风，在夺走12条无辜生命后终于收场了，它却成了笔者终生抹不去的愧疚和忏悔。

它既是贯彻“红司令”毛主席亲自推广的“六厂两校经验”的“硕果”，也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杰作”，又是“红二·三”头头儿和群众的“革命行动”。故而，笔者称其为“红色恐怖”。

翻案派“黑色恐怖”播下的仇恨种子，收获了“红色恐怖”的苦果！不论“白色恐怖”“黑色恐怖”还是“红色恐怖”，都是恐

怖，都是不人道反人性的，都是仗势欺人欺凌弱小亵渎生命。尤其是，“红色恐怖”不足三个月竟然多达12条鲜活的生命被逼自杀身亡，成了山大历史上空前的劫难，对于“山大人”的伤害远远超过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总和，说是“浩劫”也不为过。

笔者虽然通过努力终止了“红色恐怖”，但是，同样难辞其咎。我不止一次拷问自己的良知：“为什么不早点儿去上访呼吁，非要等到死了十多人？”根源同样是头脑里的“私”字作怪：前怕狼后怕虎，患得患失！每当私下聊及于此，笔者总要加上一句：“以革命的名义，干尽复辟的勾当！”以宣泄心中的郁闷和怒气。

第十四节 “九大”与“红十条”

1969年4月，经过近一年“清理阶级队伍，批判极左思潮”，终于恢复了安定的秩序，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革委会。国家亟须通过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党中央“决议”（文本化的国家法权之一）巩固“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新的权力格局。

一、喜迎“九大”“突击入党”

通过整党建党，许多单位重新建立了党组织。为了迎接“九大”，开始“吐故纳新”发展新党员。当时，王竹泉任“省红代会党支部”书记，经过研究确定了首批发展对象：李仁光、曹峰、孟怀远、孙国华、房公金和笔者。

笔者的情况比较特殊，既是省红代会常委，又是“鲁大”革委会副主任，王竹泉与笔者商定：他与王文俗两人共同但当笔者的入党介绍人。他证明笔者在“红山指”的政治表现，王文俗证明笔者在“鲁大”的政治表现。

经过一番烦琐的程序和手续之后，又在珍珠泉礼堂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和宣誓大会”，笔者成了“中共优秀党员”。之所以自称“优秀”，并非“恬不知耻的自吹自擂”，而是因为：我虽然没有为国为民做过多少大事好事，但是，起码没有像今天从中央到地方

的“共产党员公仆”们那样如此贪污受贿、持券抢劫、吃喝嫖赌。

二、“全国山河一片红”

“九大”前夕，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革委会，当时俗称“全国山河一片红”。

1. 革委会“变味儿”

除了最早夺权的少数几个省市革委会，全国各地的革委会大都“此革委并非彼革委”。

①. 不再是造反派民众自发地、自下而上地向旧当权派夺权，并经中央干预和批准。而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由武官按照党中央要求，通过严厉批判“极左思潮”甚至镇压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与“三结合”。在这些地方，“造反精神”成了“争权夺利制造混乱的极左思潮”，而安分守己的顺民精神又成了判定“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

②. 会社基础不再是“造反派群众组织”，而是“左派群众组织”，主体大都是人多势众的保守派。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也都是保守派头头儿，他们文革前就是当权派的“驯服工具”和“革命事业接班人”；造反派群众代表却成了少数派“另类”或“团结教育的对象”。

③. 权力主导不再是造反派老干部，而是军队武官。他们既是大联合的撮合者，又是权力分配的操盘者。文官老当权派能否“被解放”参加革委会、担任什么职务，完全由军代表说了算。

莫说八大军区（济南军区除外）驻地的省革委，即使其他地区的省革委，“主任一把手”也大都都是军代表。他们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名副其实的“地方诸侯”。

2. 武官——夺权斗争的最大赢家

各地文官当权派倒台后，官办保守派群众组织失去了主心骨而气息奄奄。武官当权派来“支左”了，却大都“支保不支左”，暗中操纵或公开支持保守派，致使派仗愈演愈烈。有的甚至秘密发放

枪支弹药给保守派，指使他们对造反派或革委会进行武装斗争，致使派仗升级为名副其实的内战。

正是武官当权派亲手制造的“天下大乱”，又反过来为他们主政地方大权提供了大好机遇。

平民阶级造反派的阶级实力和政治素质太幼稚太弱小了，始终未能形成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大的继续革命大军，毛主席不得不将全国地方政权统统交给武官们。

毛主席带头“大闹天宫”并发动民众造反折腾了半天，“刘邓司令部”为首的“文官旧政权”打倒了，“武官新政权”的长官们同样大都“对文革不理解”甚至是“反文革派”。

三、“红十条”——武官“再夺权”

在“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映衬下，山东、山西等最早夺权的那几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了另类甚至怪物。当地武官们岂能容忍他们继续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于是，他们乘“九大”各路大员风云际会之机，密谋串联策划，进行“二次夺权”斗争。

1. 《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决定》——“红十条”

对“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划时代大会”，山东造反派民众同样寄予厚望，结果盼来的却是“秋后算账”：林彪“副统帅”载入党章的同时，袁升平等济南部队武官联合北海舰队武官，向山东省革委和青岛市委“再夺权”。并形成了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决定》（“红十条”）。像其它中央文件一样，“红十条”的解释权同样在武官“现管”！他们全盘否定“山东省革委”和“青岛市革委”：一曰“一派掌权”；二曰“极左思潮”；三曰“造反派少数坏人当道，广大群众好人受气”。

2. “再夺权”——毛主席向武官妥协的产物

当时，山东政治形势和生产状况相当稳定，在全国都名列前茅，周恩来总理多次表扬过“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然而，

作为“总结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大会，“九大”怎么又弄出个“红十条”呢？主要原因或许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 面对全国各地武官大权在握“领导一切，主宰一切”，济南部队和北海舰队武官们显得太“鼻涕”太憋屈了！他们乘全国武官主政的“大好形势”拍案而起，强烈要求“党中央”彻底改变山东原来的权力分配格局，允许他们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掌控山东省地方政权。

在阶级社会里尤其“苏联模式”下，一切都凭实力（而非真理）说话，武官们将毛主席逼进了两难选择境地：要么应允他们组成“合法的军政权”；要么拒绝他们不惜冒“非法的军阀割据”风险……

②. 以刘、邓为首的地方文官政权被打倒后，毛主席理想中的“新政权”并非“军政权”，而是将“在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

然而，“无产阶级专政”前提条件与“继续革命实践”之间的内在矛盾无法克服，继续革命举步维艰。结果王、关、戚倒台后，以“五大学生领袖”为代表的“文革闯将”成了“臭老九”。更有甚者，北京以外的许多省市（自治区）更是“天高皇帝远”，那里的造反派头头儿始终也没能摆脱武官的打压，大都成了“无德无能”和“内战内行”的“害群之马”。毛主席对他们大失所望，不得不转而将希望寄托于武官们。

③. 周总理虽然像1957年“开门整风”时那样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一边，但是，作为主管内政外交的第一责任者，饱尝了继续革命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冲突，并为此废寝忘食心力交瘁，日夜渴望政局尽快安定下来，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以至于难免“思想上是跟刘邓的”。

④. 连平民百姓都知道“水涨船高”的道理，“林副主席”岂能不知？尽管其“接班人”地位已经载入中共党章，但是，那只不过是纸面上的空名而已。人能写上去就能删除掉。只有武官们掌控了地方政权，才能为“副统帅”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⑤. 苏联百万大军压境，声言要对我国实行“外科手术式”核

打击。外患压倒了内政，抵御外敌的重任非军队武官们莫属。毛主席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怎么能希望他们效命疆场？

山东、山西、黑龙江等夺权较早的省市（自治区），彻底否定“造反派掌权的局面”势在必行。

3. 对省革委实行全面军管

“九大”后，山东武官们“坚决落实红十条”的第一个战略部署就是：突击“二次夺权”，组成“军政权”。

①. “省革委”变成“军政府”

“二·三夺权”后，省革委实现了“党政一体化”，机构设置是：原省委机关称“省革委”（本部），原省人委（省政府）称“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武官“二次夺权”后，笔者亲眼看见过省革委大院儿天翻地覆的“新气象”。

其一，进出大院的车辆绝大多数是挂白牌儿的军车。当时民谚：“黄牌儿（企业用车）软，蓝牌儿（政府用车）硬，碰上白牌儿吓没命。”

其二，在各办公楼门口进进出出和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中，绝大多数都是穿军装的“兵”，极少穿便衣的“民”（即使有，也是原省委的文牍秘书和办事员之类的“衙役”）。

其三，这些“兵”与文革初穿军装的“红卫兵”大相径庭：个个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脸上绝无稚嫩的“孩子气”，有的只是严肃刚毅、腰杆笔直、威武挺拔。

它向世人传达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省革委”成了“军管会”或“军政府”，“省革委大院儿”成了济南部队司令部和政治部之外的“第三机关大院儿”。

“军政府大当家的”自然是军人政治家、济南部队政委袁升平；而“老实人”杨得志司令员领兵打仗是行家，从政掌权难免外行。

其后不久，毛主席再次“南巡”路经济南时，在专列上接见了两位首长，分别指着二人说：这下好了，你“得志”了，你也“升平”了，该满意了吧？

②. 曹普南——“军政府大管家”

“得志”归得志，“升平”归升平，军区首长总不能为地方上乱七八糟的杂务耗费太多精力。于是，省革委（本部）又成了“省革委政治部”，长山要塞驻军政委曹普南荣任“政治部主任”统管一切党务政务，相当于文革前的“书记处书记”。

此人一向以“偏爱红粉知己”享誉军内，许多属下小护士、文艺女兵等都有幸受到过“恩宠眷顾”。文革初，曾被要塞医院、文艺单位造反派揪斗过，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游街示众，“操不难”的雅号也不胫而走。他对文革和造反派的立场和态度可想而知。

四、“军政府”向“鲁大军宣队”开刀

1969年夏一天上午，校革委办公室突然接到“省革委群众工作组”电话通知：明天上午“校革委”三派群众代表常委准时到省革委北楼二层群众工作组汇报落实“红十条”情况。笔者与丁宗学、刘全复、董以山、王斗资等奉命乘车前往。

群众工作组组长李中元（李宗元？）主持会议，他也是长山要塞驻军的中层干部。他简单讲了几句开场白：省革委对“鲁大”非常重视，希望你们如实汇报学校情况和军宣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上午，笔者洗耳恭听

笔者早知王文俗是济南军区大院儿支持造反派的文革派两个“二级部长”之一，也理所当然上入了反文革派袁升平的“黑名单”。李中元一讲完，笔者即刻明白：“军政府”要对他“秋后算账”了。既如此，就更不能抢先发言，而是一如既往对其他人的意见洗耳恭听静观其变。

首先，董以山、刘全复相继发言，无非是王文俗军宣队如何“一碗水端不平，支派不支左”，如何在“清队”中违背党的政策造成大量人员自杀身亡，如何消极抵制“红十条”至今没有任何具体工作计划和实际行动，等等。

这是笔者第一次领教刘学长“明智”的政治水平，不能不暗自

摇头叹息：他不至于真的以为“红十条”打倒了王效愚，翻案派就翻身得解放了吧？若然，那可真是笔者看走了眼竟然对他敬重甚至崇拜了那么久……

丁宗学紧随其后第三个发言，竟然也慷慨激昂大义凛然揭露批判“军宣队王文俗”：支派不支左，“清队”中违反政策大搞刑讯逼供，对“红十条”消极抵触，等等。

真是令笔者目瞪口呆。此前，对他“耳朵根子软，脱离原则”的瑕疵有所耳闻，此时才真正见识了他“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实相。

作为军训团扶持起来的校革委副主任，丁宗学“反戈一击的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李中元，像打了鸡血似的亢奋。他一改开始时的警惕严肃谨慎试探，顿时眉飞色舞神采飞扬起来，断然说：“军训团和王文俗的问题，军区首长早已知道，没想到如此严重，希望各位下午继续踊跃发言，把话说完讲透！”

2. 王团长成了“霜打的茄子”

中午返校后，笔者向王文俗简要介绍了汇报会情况，刘、董二人的态度和意见早在他意料之中，乐呵呵地一笑了之。对于李中元的表态当然非常重视，狐疑地说：“长山县是我老家，驻军师以上干部我都认识，李中元？不认识……”

当笔者谈到丁宗学发言时，他先是惊愕和半信半疑，怀疑地瞪大眼睛盯着笔者，继而嗒然若丧面色沉凝泛青，皱紧了眉头一言未发，一支接一支大口大口地吸起烟来……

3. 下午，笔者扭转会风

像中国这样的社会等级化和政治专制化国家，一切都“内外有别，上下有别”，一份同样内容的文件，也必须按照省（部）、地市（厅局）、县（处）顺序逐级传达，最后才能传达到群众。党内党外、军内军外的差别就更邪乎了，“内部机密”绝不准向外泄露。整个官僚权贵阶层之所以对文革切齿痛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主席破坏了这种原则和传统，将党内斗争乃至中央内部斗争“一竿子

插到底”直接与人民群众对话，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权威和尊严。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当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明确），下午在去“省革委军政府”的路上，笔者就考虑成熟了对策：这位“李首长”太得意忘形了，竟然忘了“军内外有别”的戒律，过早地向群众（包括造反派）公开了军内矛盾分歧和上级整下级的意图，犯了“自毁长城”的大忌！

下午，李中元开场白后，笔者第一个发言，要点是：其一，济南军区党委坚决执行毛主席“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向“鲁大”派驻军宣队，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全盘否定。（军宣队是你们派出的，不是他们自己擅自跑去的，如果他们错了，作为上级领导的军区党委也难脱领导责任）。其二，军宣队坚决执行军区党委和省革委的指示，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党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号召，通过数月艰苦努力，恢复并维护了学校正常的运动和生活秩序，使广大群众脱离了武斗风之苦，功不可没。其三，“清队”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稳定全国大局的战略部署，扩大化、刑讯逼供等违背政策的错误，作为“地方第一把手”我本人应当负主要责任，其他人也应当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应当将责任全部推给军宣队！其四，即使军宣队工作中出现一些错误，原因也主要是受到了我们大家尤其“工宣队”的派性干扰，本人就是其中一员。请问，有哪个清查对象不是我们提供而是军宣队指定的？你们谁能指出军宣队谁参加过刑讯逼供？谁能指出王文俗政委在哪次会议上或什么场合是如何包庇纵容刑讯逼供的？

在笔者整个发言过程中，李中元坐立不安面露尴尬。话音刚落，他急忙发言：宋书星同志发言很好，这种自我批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支左”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令，对此不能怀疑否定；军宣队成绩是第一位的，“鲁大”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推给他们，希望大家也应当实事求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谢天谢地！汇报会的风向终于扭转了。其后，王斗资也吭吭哧哧地做了自我批评；丁宗学依然慷慨陈词，与上午所不同的只是以自我批评为主，不再是揭发批判军宣队王文俗的“严重错误”。

笔者的发言不过是以实事求是拯救自己的良心，是王文俗“文革派老军人”应得的一点公道，虽然丝毫也改变不了他今后的坎坷悲凉命运……

傍晚返校后，笔者向王文俗简要报告了下午的会议情况，他皱紧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些，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不论他还是笔者，心里都明白：“鲁迅大学”的政治生涯大限已到，只等咽下苟延残喘的最后一口气儿了。

第十五节 革命委员会的功与过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仅存在了两年多（1967年2月—1969年4月），但是，它留下的历史遗产却是丰富多彩的。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反思。

一、对政治文明的历史功绩

文革夺权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意义不容忽视和否定：它突破了建国初照搬的“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对于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具有重要的实践探索意义。

1. 纠正“苏联模式”新官僚专制的实践探索

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代表直接参与政府行政管理，无异于对政府“掺沙子”，增强了平民大众的民主基因，更直接地代表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诉求，为“人民民主”和“人民政府”提供了组织实体保障。而且，与共和国建国之初的政权建设相比，此时的民众代表大都并非有身份和地位的社会名流，而是名副其实的平民。虽然，由于民主监督机制缺失，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化趋势，但是，其实践探索意义不应否定。

2. “三结合”的意义

为了恢复秩序稳定政局，允许军人“干政”或“主政”，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历史倒退”。但是，“三结合”却是对“苏联模式”

新官僚专制体制的改革探索。尤其是群众组织代表，相当大一部分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刁民”，具有独立思考和“反潮流”精神，而非像以往那样是由当权派提拔起来的“驯服工具”顺民。它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有效改变了“一言堂”的政府决策和行政习惯，保证了多元化思想和不同意见的平等交流、优势互补，保证了政府政策“兼听则明”。其二，遏制了积重难返的政府官员“政治世袭，近亲繁殖”旧制，制约他们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要选拔指定接班人，节制他们对真正的民意代表“异己分子”及其不同意见大搞政治隔离。其三，弱化了政府与社会、官权与民权的对立对抗。

3. 纠正了“苏联模式”的官员高薪制

所有当政的新官员尤其群众组织代表，严格实行马列主义关于防止政府官员官僚化的基本原则——“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平均工资”，一律继续执行原有工资标准，并继续由原单位发放；所有学生代表一律回校领取原有的助学金。

这是真正的史无前例！改变了数千年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历史积弊。当官儿不再是谋求个人私利的手段，开创了政府清正廉洁的先河。

例如，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像北京等地一些新当权派老干部一样，在减发“走资派”高薪的同时，也主动将自己的月薪降低为100元。

再如，1968年冬笔者的旧棉鞋露了脚趾头，军宣队再三要求笔者申请了10元困难补助，这是当官两年享受的唯一“特权”

4. 出现了短暂的“其兴也勃焉”政治局面

像历代新王朝一样，在1969年“九大”前，省革委也出现过短暂的政治清明，新当权派忠实奉行“拒腐防变保持革命本色”。1967年6月27日《山东省革委会关于转变作风的决定》（十条）堪称典型代表：取消首长专车，禁止非公用车，禁止收受礼品，禁止为省革委成员歌功颂德，提倡密切联系群众、永不脱离群众，等等。与

今天的“中纪委八条”相比优劣尽显。

5. 下放干部，精简机构——真正的“瘦身政府”

“下放干部、精简机构”是文革对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最成功的最伟大的贡献！当时，党委、政府、人大“三大班子”统统撤销“合三为一”（政协早就成了远离公权的“养老机构”），官员大批被裁减下放到“五七干校”，坐机关、喝大茶、打官腔的陋习彻底改观，成了继建国初第二次真正的机构精简和“瘦身政府”。

二、革委会急剧蜕化

共产党执政前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由“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蜕变成了脱离民众压迫民众。其中，固然有新政权官员们的主观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四大弊端：一是新官僚专制或专政，二是社会等级化，三是干部终身化，四是对国民大众的政治隔离和信息封锁。

革委会新政权本应有所改善有所进步，然而，由于自然农业经济和官本主义封建传统文化的习惯势力太强大了，要想既突破“苏联模式”的弊端又不滑向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陷阱”，谈何容易！以至于，迅速发生蜕化或异化，致使“改革不合理上层建筑”再次显露出“新瓶装陈酒”的趋势。

1. 排斥压制批评监督

在最早夺权的几个省市自治区，武官们为了与文革新当权派争夺革委会控制权，一方面由军代表将“不合作主义”或“牵制主义”进行到底，处处搞对立闹摩擦。另一方面，直接支持甚至武装保守派对革委会和造反派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文革新当权派和造反派群众代表，原本就没有几个人想到、此时就更顾不上思考新政权建设问题：革委会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比旧党委更得民心 and 民众拥护？而是整日处在“新政权风雨飘摇”的危机感之中，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誓死捍卫彻底巩固新政权”。再者，“无产阶级专政”前提条件与“继续革命实践”的内在矛盾任何人也无法绕过。结果，

越“誓死捍卫，彻底巩固”就越混淆群众善意批评与反文革势力捣乱破坏的界限，就越拒绝甚至压制群众的批评监督，越加速回到“旧党委”那样“少数代表人物专政”的窠臼去了。

2. “大民主”不再时髦

在夺权较晚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大都是武官们主持组建并成了实际的主宰。“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军队的决策体制是“首长临机独裁专断”，容不得七嘴八舌的大民主。（早在五十年代“正规化”中，毛主席建立的红军民主集中制就“昨是而今非”了，废黜了“士兵委员会”，只剩下“支部建在连上”）+他们一旦主政地方革委会，难免照葫芦画瓢发扬军队作风奉行“一言堂”。不论是被结合干部还是群众组织代表，都由他们审查批准，凡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一律拒绝“入阁”。如此革委会，谈何“大民主精神”？

3. “造反精神”又成了打压对象

革委会新当权派（造反派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又一次重复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后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转变过程：夺权前高呼“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造反派民众也被视为“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然而，革委会成立了“印把子”夺到手了，造反派及其造反精神却迅速贬值，似乎又恢复到原来的“反动性、破坏性”。而保守派的安分守己则行情看涨，成了革委会可靠的社会基础，顺民精神又成了判定“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首要标准。如此革委会到底有多少继续革命的含量？除了增加了几个群众组织代表作陪衬，与传统的“苏联模式”新官僚专制究竟有多少差别？

革委会新政权与平民大众民权诉求之间矛盾的对立或对抗依然存在并日益激化。

4. 自发的群众组织被取缔

民众自治的文革打碎了党委领导的文革旧秩序，为革委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然而，革委会一旦建立并稳固下来，却成了民众自治文革的终结者。平民大众造反派追求民权民主的群众运动，变成

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在革委会新政权舞台上的独角戏。

革委会建立后，不论是“中央首长”讲话还是媒体舆论，片面强调“秩序纪律，集中统一”，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多中心论”，忽视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制度建设，忽视民主监督机制的落实，误以为：只要有了群众组织代表，就具有了并可永葆人民性。为了维护“新政权权威”，在“批判多中心主义”口号中，群众组织被取缔解散。

没有民主政治体制保障，任何群众代表都不可能保证永远能代表群众，更何况就群众性或人民性而言，仅经过半年“文革大风大浪”考验的新干部，也难能与历尽二十八年血与火考验的老当权派相比，其“暴发户”心态更浓重，官僚化速度更迅速。

5. “新政权”重复旧习惯

例如，1964年山东省委党校成立了“学生班”，都是各中学保送的德才兼备优秀学生。作为同样的热血青年，文革中大都成了造反派。不幸的是，校长王立波（原省委副秘书长）成了省革委会常委，“誓死保卫校党委”的教师和“干部班”保守派，也随之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而“学生班”的青年学生却成了“反对省革委的修正主义苗子”。

王效禹抛出“王、王、庄”后，“学生班”的厄运并未结束。“干部班”利用擅长走后门儿拉关系的优势，又投靠到王效禹门下，依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

1969年“九大”前夕，“学生班”终于被省革委明令撤销解散，所有学生被发配回原籍。群众戏称：“修正主义分子拔掉了修正主义苗子”。

事实证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是何等艰巨而沉重，绝非通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和夺权斗争就能一劳永逸。

第五章 军人当政的文革

(1969.4—1973.8)

中苏边境冲突急剧升级，军事重压日增。毛主席一向深知生存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此时不得不把“最高统治者”的社会责任提升到第一位，“继续革命者”的历史使命随之退居次要地位：一切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要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打核战争”，所有国事都必须服从这个中心。

“要准备打仗”靠谁呢？只能靠军队和武官们。然而，坐天下时的武官已非打天下时的“指挥员”，单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和谋略，越来越难能让武官们“指到哪打到哪”了，必须首先满足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才有望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只可惜像文官一样，武官们的利益和诉求早已不再是“为国为民”，而是相当大部分是为自己、为本山头、为本阶级阶层。当时，他们最根本的利益就是维护权威地位，维护经济的和政治的特权；最强烈的诉求则是镇压造反派乃至整个文革派的“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再者，除了毛泽东领导打天下的红军实行过民主集中制，任何国家的军队和军人与民主自由绝缘，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宪法规定：严禁军人干政！以军人和军队的专制化，换取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自由化。然而，中国当时所有主客观条件一拥而上，再一次把毛主席逼进了两难选择的死胡同，只能将全国地方政权统统交给了武官们。这或许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无奈和悲哀。

第一节 “一打三反”运动

正如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发端于中央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点燃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则发端于“庐山会议”，是“林副主席”亲自发动的。

一、“庐山会议”——反攻倒算总动员

1970年8月23日到9月6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借机发难，打着维护毛主席“天才”地位为幌子，声称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矛头直指张春桥，发动了一场围攻“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的突然袭击。

一时间，反文革派大官尤其武官们欣喜若狂，纷纷涌向主席台，向“林副主席”表示衷心感激和坚决支持。会后，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汪东兴等，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叶群强调要统一口径：“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讲的是‘陆定一式的人物’。”

远在北京坐镇的黄永胜通过电话遥相呼应：“刚才，吴胖子（吴法宪）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讲了，真高兴啊！晚上还真多吃了一碗饭。”

陈伯达连夜搞了恩格斯和列宁“论天才”的语录，汪东兴打印后散发，并煽风点火说：“我们再也不要糊里糊涂的，这里面问题严重呢”“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并要求吴法宪发动空军、海军、总后的武官们群起而攻：“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经过串联鼓动，华北组的讨论会成了愤怒声讨“笔杆子”的批判会。众武官们抢不到麦克风的干脆跳起来高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示众！斗倒批臭，千万万刷！”

他们又发了“华北组六号简报”（毛主席称“反革命简报”）：“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

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批倒批臭，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正如毛主席所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主席识破了林彪一伙围剿“笔杆子”的阴谋，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林彪点燃的这股向文革派反攻倒算的邪火，终于被扑灭了。

然而，这股反文革邪火却通过手握地方政权的武官们，变本加厉烧地向了全国，而且越烧越旺，演变成反文革派对文革派的血腥镇压。

二、“一打三反”运动

武官们为了恢复秩序巩固“军政府”的独裁统治，在全国大开杀戒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正如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对公社社员那样，“军政府”根本就不承认文革派是“政治对手”，而是把他们统统当成“刑事罪犯”！“一打三反”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旗帜下，所有文革派在文革中的言行，大都成了“严重的刑事犯罪”。

在全国统一行动中，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地（市）、县造反派群众组织负责人都成了“文革犯”，“有历史问题”或“民愤极大”的一律枪毙，其他数以万计的人被判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为了镇压一小撮、震慑大多数，山东省“军政府”在体育场举行了10万人公判大会，规定：各单位必须由专人负责，组队将造反派头头儿带到现场“受教育”，笔者忝列其中。

三、“全封闭学习班”

1970年春节后，王文裕随同军宣队悄无声息地离校，从此开始了后半生落魄动荡的降职发配生涯。先是下放到惠民军分区，后又调往烟台军分区，都是最末一位副司令。堂堂副军级大校，只混到师级单位的党委委员。张海亭也下放到益都县（现青州市）武装部任副政委。其后，山东大学更换过两次军宣队，最终置于济南部队炮兵32师军事管制之下，最高首长是“赵政委”（炮32师政治部主任，外号“赵秃子”）。莫说校部机关，即使各个系每个教研组都由一两个军代表主政。人数之众多，控制之严密，远远超过建国初期的“军管会”。

7月，在昌乐县炮32师营房内举办了“全封闭学习班”，学员是三派学生头头儿和干部教师骨干，共40几人。笔者所在的二班，班长是x营教导员和原教育厅副厅长刘辛人，学员有柳明瑞、崔延奇、王东才、辛可温、侯永祥、戚兆芳等十几人。

与后来两次“隔离审查学习班”相比，堪称“真正的学习班”！活动内容是学习相关文件、“斗私批修”等，虽有检查交代问题的规定要求，但是注重政策、批评教育，启发自觉自愿。另外，“集体学习，相互促进”，大家并无多大精神压力，依然心情舒畅，纷纷“竹筒倒豆子”。

笔者自信：违法的不吃、犯罪的不干，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所以，凡是自觉错了的或大家关心的事件和言行，都毫无保留、实事求是地交代清楚。最终，“学习合格，准予毕业”。

四、“学习班”见闻

“学习班”历时4个多月，记忆最深刻的有两件事。

1. “教导员”比“副厅长”大

刘辛人原本温文尔雅、慢声细语，又刚被军人“解放”调来山大工作，处处谨慎小心少言寡语，讲话难免不甚符合军宣队意图。被x教导员当众训斥，与家长训斥孩子、首长训斥下属别无二致。

大家都愕然沉默，为“刘老头儿”尴尬。

2. 真正认识了“孙书记”

虽然与孙汉卿不在同一个班，但除了小组会议，都是集体活动。这是笔者第一次与他平等的面对面接触交流，有两件事记忆特别深刻。

①. 一天晚上看露天电影，放映前大家谈笑风生闲聊，他一连说了好几个英语单词，不仅词义完全正确，而且语音也相当纯正，全无讲汉语时那样满嘴的胶东腔。令笔者愕然感佩，虽然知道他曾是清华学生，但辍学革命已经30多年了。可见，即使学生时代，也绝非庸碌之辈。

②. 历经4个多月，几乎所有人都交代清楚了问题，取得了谅解。唯有他始终消极抵触，拒不“竹筒倒豆子”，坚持“浮皮蹭痒”。最终，“态度顽固，不准毕业”。

然而，紧接而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却证明了：他是何等有先见之明，政治素养远非“毛孩子”们所能望其项背！他与笔者同时隔离在化学楼近一年。因为没有先前的“自供状”为基础，根本找不到“突破口”，只能泛泛地“政策攻心”。再加他继续“顽固不化，拒不交代”，专案组无计可施、疲劳无果，遂使审查味同嚼蜡。不久，“隔离”成了闲居。而笔者正相反，因为学习班上的“自供状”有太多的“突破口”。再加，专案组断定：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就交代了那么多的问题，如果加大心理压力和政策攻心，就一定会交出更内幕更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强大攻势和三堂会审。不论交代什么、交代多少，都是“只闻竹筒哗哗响，倒出来的全是豆荚皮”。直到“九·一三”后方才能喘口匀乎气儿。

每当忆及此，对“孙书记”就肃然起敬自叹弗如。

三、“运动需要，暂缓分配”

返校不久，开始六九、七零两届学生毕业分配，除了六六届毕

业留校学生，其他各届留校学生一律随之重新分配。

笔者与孙玉朝被“运动需要，暂缓分配”，到化学系工厂劳动，继续享受助学金，等待“运动需要”。

正是“暂缓分配”，让笔者因祸得福，有幸成了山大“终身教员（反面）”。若随其他同学一起分配到基层，就凭笔者这种“臭嘴乌鸦”的抗上秉性，在其后的两次大清查中，纵然能侥幸承受住名目繁多的刑讯逼供而死里逃生，也难能在长期的歧视压抑中安身立命忍辱求生。而山大，毕竟有70年“唯理是从”的学人传统，文明基因比县城乡镇多的多了，在两次大清查中，笔者从未遭受过皮肉之苦。而且，其求理的遗风与笔者的“腐儒”秉性也相合，方才得以混到退休苟活至今。

每当忆及此，由衷感恩炮32师军宣队和曾经的校革委“常委”王象效老师。

第二节 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一打三反”运动之后，紧接而来的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运动。

如果说，“一打三反”运动是重点打击有小辫子可抓的造反派头头儿的话，那么“清查五一六”则是专门为整个文革派量身定做的，是对整个文革阵营的大清算和大镇压。而且，像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格林所制造的“国会纵火案”一样，它完全是共和国历史上莫须有的冤假错案！

一、全国“清查五一六”

所有文革派官、民、军代表，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惩罚”：地方造反派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儿一律清除出革委会，其中许多人被送进监狱、送上断头台。据不完全统计，仅湖北一省就有68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严惩。

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所有造反派民众，都要进行“肃清极左思潮流毒”的洗脑和再教育。……举国上下，株连“十族”——“九族”之外再加无任何血缘或姻亲关系的老同学、老朋友。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人专政“绿色恐怖”时期！即使建国之初的“镇反”运动也无法望其项背。那时，只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并无批判和肃清“反动思想”，感到恐怖的只是少数敌视共和国新政权的旧政权军、警、宪、特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广大人民群众乃至包括上述人等的家属，都是主动协助政府检举揭发。

二、山东“清查五一六”

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早就指出：“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既然是“阴谋集团”，就绝不可能人数众多。然而，山东军政府却把造反派民众重新夺回省革委大院的“五·七事件”，定为“五一六”最严重的“阴谋和罪行”。山东“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名正言顺地成了“彻底清查五·七事件”的运动。

他们的意图昭然若揭：就是要向所有文革派反攻倒算，彻底清算一切拥护文革的言行！

其一，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以及各级革委会的所有新当权派，都成了清查对象的“重中之重”。

其二，不论是曾经拥护“二·三夺权”的温和派，还是曾经反对“二·三夺权”的激进派，凡是参加过“保卫红色新政权”活动的造反派民众，都成了“参与过五一六活动”，都被勒令“讲清楚”。即使济南以外地区的造反派民众，也被勒令“清除五·七事件流毒”。

其三，奉毛主席之命来山东解决军、地矛盾冲突的张春桥、姚文元成了“黑后台”。

其四，支持省革委的省军区《五点声明》成了“大毒草”，童国贵司令员尤其何致远政委也随之成了“军队叛徒”。

至于毛主席“很好，正确，范例，仿行”八字批示的是非对错，“你们自己去慢慢体会吧，我们可什么也没说……”何等精妙绝伦的设计！

三、“隔离学习班”

1971年春节刚过，校军管会按照省军政府统一命令，将笔者隔离审查，名曰“隔离学习班”。专案组组长是胡正生，成员有杨景和、蒋德华等等。

隔离室先是在新校学生宿舍6号楼三层原政治系一间宿舍，后又搬迁至化学楼二楼原系办公室，外间是祁学勇、冯绪胜等五、六位专案组监管人员，里间便是笔者的卧室兼起居室。

随后，便开始了正式的“隔离学习班”生活。内容无非两项：一是“三堂会审”，专案组排坐成半圆弧，笔者则坐在圆心处，或“政策攻心”或启发交代或追问疑点。二是潜心反省并按要求写交代材料。经历过“一打三反”的震慑和公判大会的“再教育”，笔者早已有了最坏的精神准备，此时并不感到有多大压力。又经历过“昌乐学习班”检查交代的预习，对三年文革生涯的所作所为，也大都已条理明晰烂熟于胸，第二次交代更驾轻就熟了。尤其是，自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至于检查交代，不就是“回忆录”或“亲历记”吗！

到食堂买饭、晚饭后一小时散步、上厕所大小便等还有两三个“警卫员”。……唯一感到有点不舒服的只有没完没了的“圆弧和圆心”的会审，唯一的精神压力并“誓死不交代”是曾经对“林副主席”大不敬。

当时，“隔离”的含义就是要保证审查对象：绝对隔绝与亲友熟人的接触交流，绝对隔绝外界报纸、电台等一切文图、音像等信息来源。

“九·一三”约半月后，笔者到厕所大便，看到手纸篓内半张人民日报，遂如饥似渴认真拜读了一遍，终于获知“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唯一的精神压力也烟消云散了。

一天，专案组又摆开“圆弧和圆心”阵势。胡正生说：我们有大量证据，你还有许多严重问题没有交代，希望认清形势、丢掉幻想，彻底“竹筒倒豆子”，不要再继续耍花招“只听竹筒哗哗响，倒出来的全是豆荚皮”！

笔者沉吟片刻说：我确实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没交代，“一打三反”前，我与山师高洪德等人谈起究竟谁是右倾翻案否定文革的黑后台。我反驳他们说：不是周总理，而是这个！（边说边做了个握枪姿势）。并说看看他“5·18讲话”就知道这股血腥气的源头了。实际是恶毒影射林副主席！”

笔者话音刚落，胡正生大喝道：“宋书星，不要再演戏了！林彪已经完蛋了，以后不准再称他林副主席！”笔者故作惊愕呆愣。从此，“圆弧和圆心”终止了，改为闭门思过、补充完善既有交代材料。

年春节将近，专案组人们要回家过年，“隔离学习班”宣告结业，转为到化学系稀土材料厂监督劳动。

1972年秋季，笔者方才从隔离学习班“正式毕业”，请假回乡探亲，第一次父子相见时儿子已经快满周岁了。

四、乐陵县“五一六黑后台”

同时，笔者家乡乐陵县也开始轰轰烈烈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笔者也有幸成了“乐陵县五一六黑后台”，不论是亲戚、朋友、同学、师长乃至中学领导，凡是与笔者有过交往的在职人员，一律被划为“与五一六有组织联系”，定为重点清查对象，勒令“竹筒倒豆子”彻底坦白交代，并主动揭发批判。

即使笔者母亲“农村老太太”，虽然大字不识一个，连造反派与保守派也说不清道不明，同样成了为笔者“窝藏黑材料的嫌疑犯”，不止一次被和风细雨的“启发动员，政策攻心”。

唯一例外是，二姑家二表哥张书起，他既是公安局保守派骨干，又是保守派头头儿革委会副主任程彩章的老战友、铁哥们儿。

随之，各种传言在七大姑八大姨中不脛而走，越传越邪乎：“他被北京来的七八个人坐飞机抓到北京去了！”吓得母亲吃不下睡不着病了两场。直到“九·一三”后，专程跑到学校，在各级领导陪同下亲切会见了笔者，亲眼看到儿子“不像是受苦的样儿”，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五、无尽的困惑

笔者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许多问题百思不解：“九大”后党中央的政治格局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变化？政治路线为何如此大幅度向右转、倒向了反文革阵营？毛、林、周各自都充当了什么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困惑探问了30多年“为什么”，无数次对毛主席“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体会他继续革命的艰难困苦，直至懂得了他“继续革命者”与“最高统治者”的双重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方才得以解脱。

1. 谁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主谋？

毫无疑问，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的操控者是官僚权贵武官。但是，如果没有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不可能形成对文革阵营的全国性大镇压。“九大”后，全国政局急剧向右转，始作俑者是周恩来还是林彪？当时造反派内部就产生了分歧和争论并持续至今。

其实，“庐山会议”的风波证明了，林、周两人的政治倾向大同小异，就是要对文革的“无法无天”纠偏，要“清除极左，恢复秩序”。但是，有两点区别应当注意：一是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林彪是出于政治利益考量，周恩来则是职责所系；二是行为方式不同，林彪更刚猛血腥，周恩来较温和策略。“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血腥气，带有更多的林彪特征。

然而，毋庸置疑，最后拍板定音者只能是毛主席！当时，他依然大权在握，牢牢掌握着国家大事的最后裁量权。“清查五一六”

运动，不论是林彪的要求，还是周总理的提议，如果没有毛主席同意或默许，不可能形成党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到各地，形成席卷全国的政治飓风。

2. 毛主席：国家安全重于继续革命

毛主席批准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出于本意还是迫于无奈？他为什么会同意官僚权贵武官向文革派痛下杀手？

要解开这些谜团困惑，只能求助于毛主席“亦圣亦王”的双重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这把钥匙：作为“继续革命者”，他必须高举“反修”大旗，义无反顾地进行继续革命，以绝官僚化“内忧”；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了应对帝国主义（包括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武装入侵，确保国家安全，必须同时高举“反帝”大旗，“要准备打仗”，以防“外患”。

“九大”后，中国面临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外患迫在眉睫。毛主席不得不转换社会角色，“继续革命者”让位于“最高统治者”，继续革命服从国家安全、服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条件。因而，不得不向武官们反文革立场妥协，以换取他们保卫祖国、效命疆场。为此，不能不忍痛割爱让文革派官与民为国家安全作出必要的牺牲，哪怕是无辜而惨痛的牺牲。

官僚权贵武官们，领受了“最高统治者”毛主席国家法权的尚方宝剑，高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国家安全”的旗帜，向胆敢藐视和冒犯新官僚权威的文革派“乱党”和“反贼”开始了疯狂报复。整个文革阵营遭到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像历代官僚阶级一样，凡是要剿杀“乱党”和“反贼”的上级指示，各级当权派执行起来无不层层加码、无限扩大。结果，自上而下对文革派和文革成果的反攻倒算一级比一级疯狂而血腥。作为“文革主力军”，文革派官与民的下场则一级比一级更惨烈。

难怪，毛主席晚年曾有记者问他：你改变了中国什么？他无奈地回答：“我连北京周围都改变不了……”

第三节 “赴京上访”

自从第一次见到儿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快活流浪汉”心态荡然无存，越来越感到巨大的生存压力，再也不能安心劳动享受每月16元的助学金了。先是向学校军宣队“要饭吃”，几次遭遇拒绝驱逐。1973年春节刚过，干脆擅自脱岗跑到社会上“自寻生路”。

当时，军政权的严密控制已大大弱化，许多“文革犯”人心浮动开始秘密串联沟通，探寻求生之路。笔者先找到杨丰宝，再找到马福田，最后找到造纸东厂王文符、李 x 清、万德荣、张承良等。

中国人哪！大都“唯官是从”。因为有原省革委常委张承良，造纸东厂便成了交流议论探求出路的根据地。队伍逐渐扩大，铁路大厂徐传孝、乔世俊（原省革委常委）等也先后汇聚进来。只可惜，张、乔两位能力和水平有限，同样不知所措。连续数月，众人只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始终未找到切实可行并立即行动的出路。

一、集体赴京上访

6月中旬，原省革委常委彭世杰从青岛来济南上访，住在纬四路山东省第二招待所，很快就联系上并融入“探路者”队伍，并提议：集体赴京上访！不论“山工总”还是“山工联”都要广泛联络、多多益善。这无异于在暗夜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众人立刻行动，全力联络所能联系到的人，尤其是原来的造反派头头儿们。

笔者串联过几乎所有能找到的“老战友”，他们大都口头上同情支持，行动上却“不便参加”。只有原“山工联”董金福资助了30元上访经费。

后又与徐传孝一起找到原济南市革委副主任张廷藻，他慨然答应、立即行动。当时，他正抱着未满两周岁的女儿琪琪下楼去公园，随即将孩子递给妻子小安，与我俩下楼“公干”。孩子在母亲怀抱里挣扎哭闹：“上公 yuai (园)！上公 yuai (园)！”笔者心中掠过一丝凄苦和酸涩。其后，每当见到孩子，内心都难免浮上一丝欠疚。

临沂、昌潍、淄博、枣庄等外地区的“求生者”也陆续来到济

南汇合。大家商定：“秘密”赴京上访，立即行动！并预定了出发时间、集合地点，组队分批次出发。

说来真是令人汗颜，所谓秘密，完全是有名无实的自我安慰！其实，市公安局早就在酝酿上访人员中安插了坐探（李登高？）。1974 年在北京“批林批孔汇报会”上，省公安厅革委会主任姜成栋亲口对笔者说：“你们组织者和参加者人数、名单、出发时间、集合地点等等，公安厅甚至比你们自己的人还清楚。”但是，集体上访始终未受到官方阻拦和“截访”。这或许也是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区别吧。

某日深夜，笔者与彭世杰、张承良、乔世俊、张庭藻、徐传孝等六、七人，由王培基（青岛铁路局开往北京的列车员）领进济南站，一起上车……

二、十七天睡马路生涯

大家先是住进前门大栅栏一个小旅馆内。晚上，大家都上床要睡了，张、乔二人一言不合相互攻击谩骂起来，最后赤条条站在床上就要动手，被彭世杰喝止。这是笔者第一次与“省革委常委”们同室共眠，见识了各自的庐山真面目。两相比较，更彰显出彭世杰的杰出优秀，并暗下决心：只听他一个人的！

次日，在天安门广场南端会齐各路人马，分批到了陶然亭公园附近“中央和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站”。众人陆续到达，笔者负责清点登记：共 107 人。堪称前所未有的上访大军，其他省市“散兵”上访者戏称“新梁山一百单八将”。

白天在陶然亭集会活动，早晚各一盘 2 毛钱的炒饼。晚上就铺上能找到的旧报纸、破草席等在接待站门前水泥地上和衣而眠。一般都在 40 人左右（有时 37、8 人，有时 43、4 人），乔世俊等多数人则投亲靠友“享安逸”去了，只是白天来参加集会。晚饭后，每当列队到宿营地时，数十名外省“上访专业户”都热烈鼓掌欢迎。如此生涯虽然凄苦，却并不寂寞。

一旦安顿下来，笔者就开始了紧张的文字工作，公园石桌或亭

子围栏木板成了办公桌。上访团所有告状材料和书面要求，都由笔者起草，交由张庭藻、徐传孝过目提出增删修改意见，修订后再交彭世杰审阅后呈送接待站。

告状材料送上去十来天了，始终不见答复，大家如坐针毡。最后决定直接给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笔者起草时严格遵从三个原则：一是抓住要害、突出重点，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二是注重政策，打击面压缩到最小，矛头集中于袁升平一人；三是简明扼要，戒除一切废话，字数缩减到最少（一是方便首长阅读，二是钱包实在太可怜了）。耗费了两天，反复推敲多次，彭和大多数人都嫌“火力不足，软不拉塌，杨得志罪责难逃……”要求再改。

所幸，张、徐二人完全赞同笔者意见，对其他人的意见“认真倾听，拒绝修改”。因为，任何时候都不应“一口吃个胖子”扩大打击面！杨得志虽为山东和军区“第一把手”，但必须坚持“扬、袁分开”。最后，由我们三人到长安大街东四路北一个邮电所，笔者照原稿填写到电报稿纸上发了出去。每字4分，共40几元，董金福资助的30元不够，全由徐传孝补足（他文革前就是厂办主任正科级，是上访团的“高薪阶层”）。

其后，听说袁升平被中央定为“林彪集团的人”隔离审查。笔者额手称庆：我们的要求无意中符合了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精神。

电报发出好几天了，依然毫无动静。一天半夜刚过，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接待站门前积水很快没过了脚面。那些老上访户，有的睡马路2、3年了，都有帐篷、雨伞、塑料布等防雨设备。我们却只能站立着直接承受暴雨洗礼，大家实在坚持不住了，个个悲愤交加、群情激奋，一致赞同彭世杰提议：冒雨去中南海请愿！并明确限定到西便门儿，以免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大家站好队清点人数，一共37人。

正要出发，接待站四、五个工作人员出来劝阻。不一会儿，某负责人出来把大家请进接待站大厅，先是向大家道歉“接待不周”，继而宣布：中央决定召开“解决山东问题批林整风汇报会”，参加者是地区革委会常委以上人员，其他人暂回本单位耐心等待。

天刚蒙蒙亮，接待站用汽车将笔者等够条件的十几人送到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住下。次日，又把其他几个够条件的人送来，一共约十五、六人。其他人陆续离去。

17天的睡马路生涯终于结束了。

三、“批林整风汇报会”

在中央通知济南部队和省委负责人来京参会期间，笔者也开始了紧张的文字准备工作，主要是紧紧围绕：“五·七事件”来龙去脉、根源起因，各方的所作所为及意图目的，以及各自的错误教训。重点是省革委一方“割断机要通讯电缆”迫不得已的错误行为辩护。因为，这是“五·七事件”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事件”的主要依据。重点部分写成完整文章，准备照本宣科；其他部分则列出详细提纲，以便即席口述。

两三天后，“汇报会”正式开始，会址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人名义上是张延成（潍坊柴油机厂造反派工人，“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十大”委员），此时他正在北京参加“工农兵中央委员读书班”。实际主持人是列席者王洪文秘书班子的米士奇（记忆不确）及其七、八个记录员。

汇报方是上访团代表：彭世杰、张承良、乔世俊、张庭藻、笔者，以及临沂地区顾泰山、曹德雨、xxx，淄博地区牛光春、胡昭所、董学诚，昌潍地区李乃孝、陈xx等。

听取汇报方是省委副书记白如冰和济南部队副司令员张致铄等十多个人（大都是军人）。

1. “主题汇报”

首先，由笔者作主题汇报，因为准备比较充分，发言紧紧围绕“五·七事件”，尤其是突出了袁升平否定“省军区五点声明”和毛主席八字批示，否定张春桥、姚文元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方针的全部工作，否定省革委等所有文化大革命成果。并把杨得志和白如冰完全洗刷出来，强调他们迫不得已的处境。整个发言一如既往坚持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原则。发言用时一整天加一上午，笔者自觉把相关主要问题都讲清楚了。

中午休会，白如冰紧步赶上来，双手紧紧握住笔者的手老泪纵横，连说了好几声“谢谢”，并说：“以后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

2. 终于明白了

当时，笔者对白如冰的“失态”不甚理解：“地方大员对草民学生，至于吗？”

事后联想起1970年“昌乐学习班”学习班上，军宣队一个小小营级干部当众训斥原副厅长刘辛人，那种盛气凌人实在令人难堪。……终于明白了：“省委副书记”白如冰在军政府里的处境可想而知，怕也少不了被呼来喝去、低三下四。对笔者的“失态”并非作秀。

3. 自由发言

接着是其他人自由发言。顾泰山和曹德雨讲述204师秘密发枪支弹药武装“马陵山游击队”，疯狂报复地革委和造反派，武装抢劫、打死打伤普通民众。李乃孝等则揭露昌潍地区五花八门儿的刑讯逼供，xx县对被清查者某年轻女性（忘记名字），像拉大锯那样用草绳子拉阴道。许多刑罚前所未闻！

其后，便是董学诚“大批判”。他大段大段地熟练背诵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以及卓越的口才、充沛的情感，给米士奇等“列席者”留下深刻印象。据说，米曾向他当面表示：要吸收他参加“中央读书班”，像张延成等那样“被重点培养”。

直到“上访团”实在没话可说了，米士奇班子起草了几条《汇报会纪要》（内容忘光了），张延成宣读后，一致通过。

约半个月的“山东批林整风汇报会”宣告结束。

四、笔者成了“山东名人”

回山东后，“上访团”陆续散去。白如冰新省委和济南部队党委则开始传达贯彻《汇报会纪要》和中央指示精神。

在南郊宾馆“两委联席会议”上，杨得志和白如冰讲话中，盛赞笔者“实事求是、客观公正，重政策、有水平”。其后，全省各级传达贯彻会议又不止一次重复。

在青岛市革委常委座谈会上，“新省委”政治部主任徐雷健更赞誉：“山东造反派头头儿，宋书星最年轻也最有水平！”

笔者随之成了“名人”，结束了“故人相见不相识”形同陌路的处境。不论在济南还是到青岛，联络者、求见者应接不暇。回乡探亲时，老师、同学乃至县里一些中上层干部等在职者，只要能扯上一点儿关系，都争相宴请交流。

他们的心意无非是想借助笔者“争取进步”。中国人这是怎么了？连最起码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的大有人在，距离民权更是十万八千里，就纷纷做起了官权梦。可见官本主义社会基础和习惯势力是何等深厚而强大。唯有母校的老师们，不仅没有宴请和赞誉，反倒比以前多了些疏远和生分。由此，笔者终于理解了：五七年何以出了那么多“右派”？

所有这些领导赞誉和众人追捧，笔者固然感到某种精神慰藉，但对于远离官场的草民而言，并无“大如天，重如山”飘飘然之感。远没有“被落实政策”那样的满足和欣喜：正式分配留校工作，补发三年多工资 1070 几元（扣除助学金）。终于如愿争得了工作权、生存权等最起码的人权！

五、徐雷健征求笔者意见

当时，徐雷健已是新省委政治部主任，具体分管所有人事安排。一天，见到笔者主动征求意见：“你想干点儿什么呢？”

笔者早有自知之明——这种性格根本不适合当官，与其德不配位地胡混，何如干点儿自己喜欢的？沉吟片刻答道：“我这种臭脾气能干么呀？怕是只能搞点儿理论研究工作。”

他笑着说：“这可难了，文革前省委还有个政策研究室，现在也没了……”

笔者也笑着说：“不忙，再说吧。”

第六章 “二次革命”

(1973.8—1976.10)

中共“十大”，正式褫夺了林彪的“副统帅”地位，并指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防他们坐大不听招呼。随之，开始了“打扫庙宇，请回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至此，四年多军人当政的文革结束了，步履蹒跚地进入“二次革命”新阶段。

军人当政的文革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反动，除了毛主席羽翼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and 上海市，几乎所有文革派和文革成果都被扫荡一空。

“批林批孔”运动，是对军人当政的文革一次小反弹；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则是对军人当政的文革借尸还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又是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小反弹。

政局步履蹒跚、摇摇摆摆，每一步都是“迫不得已的两难选择”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自残”。

第一节 北京“批林批孔汇报会”

军人当政的文革结束后，全国再次出现了权力真空，并开始新一轮权力再分配。

像全国一样，山东也遵照毛主席“小兵回营”“请回真神”的部署，仿照中央大量提拔任用工农群众代表的示范，在“还权于文官”的同时，也开始逐渐重新安排原革委会中造反派群众组织头头。这又刺激了一些不安分的“勇敢分子”，也希望在权力再分配中分

得一杯羹。

同时，整个官场都在忙于权力交接和权力再分配（武官还权，文官受权），对民众控制的严密性和高效性，难免大为松弛和弱化。这又给“新老勇敢分子”们提供了“自由驰骋，放手大干”的空间。

人心浮动跃跃欲试，社会安定和生产秩序又面临新挑战。1974年初春节刚过，为了稳定既有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中央决定举办“山东省批林批孔汇报会”。

一、“汇报会”概况

地点：北京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

主持者：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木为首的领导小组及工作班子。

1. 参加者及分组

①. 省直组，以副书记苏毅然为首的省委代表；省革委常委徐金华、孙振发、彭世杰及其随从宋兆义、房公金、刘焕鲁；“山工联”代表董金福和项观奇；501厂（张店铝厂）两派群众代表胡兆所和盖x兰；923厂（胜利油田）两派群众代表牛xx和xxx；姜成栋（公安厅革委主任）、孙维臣（原省委机关造反派核心组成员）和笔者等省直单位群众代表。

②. 济南机车工厂（铁路大厂）组，除了现当权派，还有徐传孝、韩仁俊、高士健为首的造反派骨干，以董昊为首的保守派骨干。

③. 枣庄煤矿组，现当权派、两派群众头头和骨干。

④. 新汶煤矿组，现当权派、两派群众头头和骨干。

同在二所参加“汇报会”的，还有四川大足汽车厂的人，都在一起开大会、在一个餐厅吃饭。共约四、五百人。

2. 会议程序

先是各位领导主动自我批评，继而群众代表“充分鸣放”，批评领导们的错误。

王洪文、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接见全体参会者，并由李先念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发表重要讲话，严厉批判愈演愈烈的错误思潮——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政府主义、破坏生产秩序和团结稳定的“拉队伍，立山头”等等，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抓革命，促生产”。

扭转了汇报会方向，开始人人“斗私批修”、自我批评。为了启发人们的阶级觉悟，还专门开展了“忆苦思甜”。

二、董金福装神弄鬼儿

一天，省直组在北楼二层大会议室“忆苦思甜”，袁木等领导人悉数到场。董金福照例坐在前排大会议桌前，当讲到“今昔对比”处，激情迸发抽咽不止，直挺挺地从椅子上慢慢出溜到桌下，“痛苦过度，昏厥过去”。

众人涌上前将他高高抬起送医务室抢救，他则像死尸一样僵硬，直挺挺的像根木头。莫说昏厥之人，即使刚死的尸体，也绝不可能僵硬得如此之快！仅凭这一点，笔者就断定：这小子装神弄鬼儿！

可笑的是，这却成了袁木亲自发现和树立的好典型——“阶级感情无比深厚的老工人”，并成了轰动整个汇报会的重大事件。专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表彰大会，大张旗鼓地号召大家“向老工人董金福学习”。

董金福自从当了“山工联 80 万产业工人领袖”，眼睛既不近视也不老花却戴上了眼镜，并像“自以为大人物”的邵长文等一样整天批扇着军大衣，一副走江湖的流氓无产者标准相。

再者，笔者从未听说过他有昏厥的毛病，包括被收监的那一年多里。回校以后，曾先后询问过汽车班老司机，得到的答复，要么是摇头一笑，要么是不屑的一声：“操！”

为此，笔者感慨至今：这是怎么啦？上有国务院副秘书长，下有各路群众“英雄”，中有副书记等省委领导，堂堂四、五百大活人，我就不信没人看破这种装神弄鬼的拙劣伎俩！抑或像笔者一样看破了也不说。究竟是袁木需要被骗并以此骗人？还是大家都需要相互欺骗？直至数十年后从网上知道了袁木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公仆”及其家属，都到美国等外国去“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方才真正明白了他们的“伟光正”，这些疑问也迎刃而解。

三、省委：“双管齐下”

北京汇报会转向后，为了稳定局势、巩固刚刚建立的“文官政权”，省委立即开始“双管齐下”：一是对省市革委群众组织代表“落实政策，封官上位”；二是“削平山头”，收回被抢占的招待所。

1. “落实政策”

原省市革委群众组织代表，一律恢复原来主任、常委等名号，并安排相应工作。例如：王竹泉，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徐金华，省卫生厅副厅长；孙振发，团省委副书记；张庭藻，市革委副主任兼财贸办公室主任，等等。

2. “削平山头”

在北京“汇报会”同时，省会济南又“群雄蜂起”抢占招待所，各种“山头”相继破土而出。例如，“山工联”派抢占了泉城路上的省一所，“山工总”派抢占了市二所。其他各种名目的“山头”也在其他招待所扎了根。

然而，与文革初截然不同，所有这些“山头”都是建在沙滩上的，空有显赫名号，并无多少人马，更无群众基础。北京汇报会风向一转，经过省委“大力整治”，都铩羽而归、烟消云散了，上演了一出乏味的闹剧。

3. 蒙难民众“盼星星，盼月亮”

只可惜，“落实政策”的温暖阳光，一如既往难能及时照耀到普通民众，他们只能耐心等待祈盼。

在四年多的军政权时代，像笔者一样的受难者大有人在。然而，像笔者一样的幸运者却寥寥无几。譬如，原红卫（历下）区革委主任朱存宽，文革前是临时工，解除清查隔离后就丢掉了饭碗，失去了工作权、生存权等最起码的人权。夫妻俩连同六个年幼的子女，只能靠到垃圾箱捡拾菜帮菜叶和其他破烂儿维生。他们最需要“落

实政策”，却无论怎样“盼星星，盼月亮”，总也等不来温暖的阳光。

第二节 山大“批林批孔”运动

自1973年春串联赴京上访，到1974年7月“汇报会”后返校，一年多时间里，学校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华山（原农学院书记）、郭林、李震成了正副书记，张侠（华山夫人）、徐经泽成了政治部主任。

群众又分裂成了三派：翻案派、红旗队派、红二·三派。虽未像社会上那样立起“有形山头”，但已经拉起队伍，并展开了大字报战。校党委完全倒向翻案派，成了“翻案派党委”。随之，群众也分成了“捍卫派”（翻案派）与“炮轰派”（红旗队派和红二·三派）两个阵营。并演绎出不少趣事。

一、翻案掌控了学校

翻案派孙良臣（保卫处校警）、李廷朝（历史系教师）等编写印发了“大事记”。名为客观记录，实乃“春秋笔法”：失忆与演绎携手，虚拟与误解比翼。例如，对工宣队清队两个月就致12人自杀身亡的刑讯逼供，笔者曾抨击曰：“以革命的名义，干尽复辟的勾当”“大事记”里却变成“红二·三头头儿宋书星自己承认，红二·三打着革命的旗号，干了复辟的事情”。以证明：翻案派“一贯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其他各派都是“复辟势力”

二、“现书记”向“前书记”追讨黑材料

还有更离奇的。在“军政权”还权于文官之初，原保守派干部群众纷纷“强烈要求孙汉卿同志复位”。结果，省委却派来了华山等“外来人”，难免“不受欢迎”。这却成了新当权派们的心腹大患，认定：孙汉卿是对自己的“最大威胁”。与翻案派一拍即合。

经过一番研究，副书记郭林跟着孙良辰等几个翻案派群众到孙

汉卿家里，义正词严地勒令他“交出黑材料”！

孙汉卿是何等样人，岂能屈服于此等拙劣伎俩！结果，只能悻悻空手而归。

“现任书记”率领一派群众向“前任书记”追讨黑材料！此等荒唐笑话，恐怕在全国也实属罕见。

三、原保守派猛烈炮轰校党委

校党委完全倒向翻案派，激起了其他各派尤其原保守派民众的强烈不满，成了“炮轰派”纷纷以各种形式炮轰校党委。

其中最抢眼的当属邵长卿（原电子系教师）。在一次校部机关大会上，他猛烈抨击校党的所作所为，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且夹带着尖刻与嘲讽。连笔者都替华山、郭林们感到难堪。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邵长卿成了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后又升迁到省政府大院儿，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四、张发玉杀回学校

不知何故，当时还有个驻校军代表浮耀庭（济南空军），与华、郭等意见不合。为了治理学校乱象，成立了“调研组”到生物系“解剖麻雀”。他自任组长，并指定回校不久的笔者任副组长，组员有马长义、汲代昌等多人。笔者对此缺乏热情，却有幸了解了另一件趣事。当时，浮耀庭单身住在老校8号楼二层，几次到他房间开会，几乎每次都遇见张发玉，笔者疑问：“他早在1968年就分配离校了，又调回来了？”

与浮耀庭几次见面后方才得知：“批林批孔”之初，张就“杀回了学校”在8号楼二层安营扎寨，恰巧与浮比邻而居，并粘上了浮：“要求调回学校，辅佐他掌权执政”。就此，浮还专门询问过笔者。

五、校党委挽救了笔者

回校不久，董金福便调到交通厅就任副厅长了。笔者却一直不见动静，虽不急切渴盼，也总是悬念磨人。不久，传出了“内部消息”：对笔者工作安排，省委提出三种预案征求校党委意见：化工厅副厅长、《大众日报》副总编、团省委副书记。结果，被校党委否决或无限期拖延了。又一次因祸得福被挽救了，为笔者成为山大“终身教员（反面）”提供了第二个契机。

作为党员，服从组织决定是最起码的义务，必须无条件接受。而三种预案的任何一种，都直通农村公社或工厂企业基层。“四人帮”被捕后，都难免跌落到最底层，难逃刑讯逼供暴风骤雨的洗礼。就像董金福那样，从副厅长到副经理、从副经理到副队长，一路“减负”直至回归于汽车司机本业，从山大汽车班司机变成了运输公司汽车三队司机。

每当忆及此，就由衷感恩华山书记及其夫人张侠主任，尤其感恩徐经泽老师！山大所有旧人旧事，华山夫妇悉数交由他取舍定夺。

正是这些颠颠倒倒的历史往事和热热闹闹的官场现实，让笔者浮想联翩：“你若爱谁，就让他当官，那是富贵乐园；你若恨谁，就让他当官，那是坑人陷阱”……

第三节 “批林批孔运动”喜与忧

整个文革时期，充满了迫不得已的两难选择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自残，“批林批孔”运动同样是喜忧参半。

一、毛主席“批孔”

“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等，这种“纯粹意识形态革命”远离平民大众的民生和民权诉求，不可能得到工兵乃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众的真心拥护积极参与。

最值得欣喜和关注的，莫过于毛主席关于孔子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历来反动派都是尊孔的。”“如果共产党到了自己没法统治

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前者是对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规律一剑封喉的总结，后者则成了对“邓时代”执政党蜕变的准确预言。

今天活生生的现实证明了：他老人家是何等高瞻远瞩！

二、“批林批孔批周公”

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周恩来与文革阵营分道扬镳，毛主席“继续革命司令部”分崩离析。

1. 周恩来与文革派分道扬镳

重新掌控官权的官僚权贵文官们，急需要一位新的核心以凝聚力量，继续与孱弱却顽强的文革派和“可怕的文革惯性”相抗衡。虽然邓小平重新上台，但是在群众大批判下，昔日的权威已经大打折扣，号召力更难与毛主席相提并论。众望所归，只有周恩来了。

毛主席曾说：“他组织上是紧跟我的，思想上是跟刘邓等的”。此时，面对自己和毛主席病入膏肓不久于世，面对反文革势力汪洋大海汹涌澎湃，面对“四人帮孤岛”日暮途穷却依然咄咄逼人，他不得不作出新的抉择：顺应大势，融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官僚权贵主流。结果，与江青等文革派的矛盾冲突空前尖锐起来。于是，便有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投降派”。

所幸，周恩来满怀对毛主席的尊重和敬畏，凭着几十年老战友和老盟友的情谊，始终未与之彻底决裂，而是在继续革命者毛主席与邓小平等反文革势力之间左右逢源，维持若即若离的动态化平衡。

2. “周恩来何许人？”

“周恩来何许人？”自文革初期就存在争议，造反派乃至整个文革派内部亦然，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说“是中派”，有的说“是右倾势力总后台”等等，笔者都不敢苟同。“邓中央”复辟后，为“反毛”而“拥周”，说他“迫不得已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其实，1957年“开门整风，大鸣大放”时，他就是毛主席“纵容自由化”的坚定盟友（七常委中的唯一），并一直是毛主席继续

革命的支持者。尤其是文革中，他虽然“思想上是跟刘邓的”，但对毛主席指示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历史证明，毛主席与周总理是中国历史少有的“最佳君相配”。如果说毛主席是共和国大厦的“设计师”，周总理就是建筑施工的“工程师”；如果毛主席是掌控大局调兵遣将的刘邦，周总理就是总理朝政筹措粮草的萧何。他对于继续革命实践探索同样功不可没！

三、周、江矛盾浅析

周总理与江青同志之间确实存在矛盾，到“二次革命”时发展到了半公开状态。这是客观事实，不应回避更不能掩盖。

周、江矛盾的根源何在？就在于毛主席身兼“最高统治者”与“继续革命者”双重社会角色，在于“反帝”与“反修”同时并举的双重历史使命，在于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冲突。

周、江矛盾不过是上述矛盾冲突的人格化呈现！

众所周知，为了顺利开展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预先做了组织准备：林彪掌控军队，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周恩来掌控内政外交，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免除“吃饭穿衣”等后顾之忧；江青则率领“中央文革小组”造反秀才，向刘、邓掌控的“旧世界旧秩序”冲锋陷阵。

不论是力保民主人士，还是力保当权派大官，拟或举荐起用邓小平，周总理都是在实现毛主席的本意，替他尽“最高统治者”的社会职责。而江青乃至整个文革派则站在“继续革命者”立场上，不能不对此强烈抵触。二人职责所系，矛盾在所难免。

第四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军人当政的文化大革命终结了，却未能终止反文革的政治走向，而是以文官反文革势力，取代了武官反文革势力。正是重新上台执掌官权的文官，为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提供了强大而坚实的社会基础支撑。

一、邓小平“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等重新上台的大官们，反文革政治立场没有根本改变甚至根本没有改变，只是韬光养晦——忍。为了骗取“最高统治者”毛主席信任而复出，口头上“拥护文革，永不翻案”，实际上把对文革的阶级仇恨埋藏在心底，并把它伪装成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仇恨。

邓小平复出后，立即采用惯用的伎俩，“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定文革，高喊“抓革命，促生产”口号，推行“以生产压革命”路线，以“安定团结，整顿秩序”之名，行清除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的社会基础之实。

为了填补“小兵回营”出现的权力真空，毛主席迫不得已还权于文官，“犯走资派错误的老同志”一阵风似地回归官场，分享权力再分配的盛宴。

早在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一段讲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历经两年多夺权斗争和“全面内战”和四年血腥镇压文革派的“绿色恐怖”，偌大中国除了早已去世的刘少奇，“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只剩下“林彪反党集团”和王、关、戚等“坏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三年文化大革命，竟成了堂吉珂德大战风车。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刮起的翻案风，令毛主席大失所望，不得不又迫不得已地“反击右倾翻案风”。只可惜，“反击”只能是“批林批孔”那样的“文字讨伐”，在报刊上发几篇指桑骂槐“空对空”的批判文章。远离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远离平民大众尤其文革派的疾苦。

按理说，“二次革命”是“文革犯”们得以平反昭雪的唯一机

会。然而，阶级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为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声誉，对武官们血洗文革派的暴行讳莫如深。无辜群众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一律被禁言，被错抓错判的“文革犯”们“抓错的放了就行了”。侥幸活下来的毕竟有幸享受到了“落实政策”的一缕阳光，那些冤死于“无产阶级专政”刑场上和武斗枪炮之下数以十万计的冤魂，只能“死者长已矣”！

正是基于此，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复辟的官僚权贵反倒成了“无辜受害者”，声嘶力竭地控诉“文革浩劫”“造反派暴行”，真正的最大受害者——文革派，却成了十恶不赦的“加害者”。

这是怎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啊？究竟是继续革命错了，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名实不符？

历经四年多的残酷镇压，文革派一蹶不振，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也跌入了冰谷，“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群众运动，唯一的成果就是再次罢免了邓小平等人。

然而，反文革是整个新官僚权贵阶层自发或自觉的阶级行动，目的就是要维护既得利益！罢免一个或几个邓小平如何能扭转乾坤？

文革派造反半年、执政两年，最终遭到了长达四年的残酷镇压。不仅民权解放和民主诉求没得到伸张，甚至连普通人起码的人权——生命权和生存权也被剥夺殆尽。平民大众也早已厌倦了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悲剧，厌倦了“革命口号震天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斗争闹剧。

如此社会基础决定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能是有气无力的强弩之末和短命的昙花一现。伴随着毛主席病入膏肓，它只能强支孱弱的病体，摇摇晃晃地踟蹰了半步，最终油枯灯灭过劳而死了。

三、“中发 1976 年 4 号文件”

文化大革命幸存的全部成果，除了锻炼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文革派，再就是毛主席尽余生之力，把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等一批普通工农兵代表扶上了中央及各级领导岗位，尽到了“继续

革命者”最后的历史责任。

然而，在官场反文革势力的汪洋大海里，区区几个草民代表纵然有三头六臂，也难有什么作为。此举的历史意义仅在于，以典型人物向历史证明：“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这条马列主义原则，对于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完全可行！

社会客观环境对于任何人的制约力都强大无比！毛主席晚年“亦圣亦王”的双重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出现了分离对立：在政治实践上，不得不把“最高统治者”责任摆在首位，对昔日臣属部下，只要口头上“拥护文革”就一律重新起用回到官位上来。在思想理论上，依然执着于“继续革命者”的理想追求，超脱任何尘世羁绊和精神束缚，孜孜以求至死方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光辉顶点。

1976年中央4号文件发表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讲话。尤其是，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讲话，首次指明了共产党蜕化变质的根源，不再是“思想认识问题”和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而是：“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真正完整而系统了，成了当之无愧的马列主义继续革命科学原理顶峰！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同样值得大书。虽然依旧沿用“苏联模式”马列主义传统概念，把新官僚阶级混同于资产阶级，难免似是而非。但是瑕不掩瑜，其思想认识空前深化，首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领导权“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将官僚主义和新官僚阶级产生的根源，追寻到了经济基础层面，使之超脱了“思想认识问题”的偶然性，落实到了“维护既得利益”的必然性和实然性。

只可惜，毛主席自知不久于尘世，没有时间和余力“理论联系实际”了。在为后人留下至理名言的同时，只能无奈地忍看继续革

命实践探索江河日下气息奄奄。

四．“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心血熬尽溘然长逝，全国人民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出殡时，数十万民众自发聚集上演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一幕。建国27年来，他日理万机恪尽职守，而且在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中，是唯一始终追随毛主席继续革命脚步的忠实盟友，为文革——继续革命实践探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理应受到各阶级阶层民众的尊敬和热爱。

然而，江青等人却无视周总理的卓越功绩和巨大魅力，无视他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和号召力，误以为他的去世“削弱了反文革势力，值得庆幸”。在他去世后，违逆民众的情感和意愿，限制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甚至，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压低悼念规格，剥夺了他理应享有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荣誉。

他们太缺乏政治家胸怀和政治智慧了，无知地把行政实践混同于理论研究和“革命大批判”，把聪明才智都浪费在咬文嚼字上了！结果，“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大批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推到了“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

事实证明，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绝非“群众的自发行动”，而是大官们“隐秘而成功的杰作”！他们指使其子女、秘书、部下等，利用当权派掌控的政府资源，串联组织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高举“悲情主义”大旗，以“为周总理讨还公道”的名义，向病入膏肓的“继续革命者毛主席”发难示威。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反革命事件！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胡耀邦等当事人透漏出事件内幕：“直径好几米的大花圈，自发的群众是做不出来的……”

毋庸讳言，这是一次成功而漂亮的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窃国复辟后，胡耀邦奉旨成了“总书记”，与此不无关系）整个天安门广场，一片悲壮肃穆，哀哀动人催人泪下，一副“受害弱者”的无辜奇冤，又不乏“死士”冒死直言的慷慨气概，呼天抢地“大义凛

然”……

正相反，江青等人的“二次革命”，却始终带有毛主席“撞到南墙不回头”和江青“倒驴不倒架”的性格特征：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直面险阻、永不言败，革命豪气冲天，拒绝悲情哀怨。原本是夕阳西下的强弩之末，却依然气势如虹咄咄逼人。虽然令人敬佩，却犯了政治斗争的大忌。自古哀兵必胜！过分的强势和高调，不仅未能鼓舞起士气，反倒把悲情连同道义拱手让给了反文革势力，原本是反对新官僚封建特权的文化大革命，却成了“君主专制”的代名词和替死鬼！

五、惊闻毛主席逝世

1976年7、月份，北京传来毛主席临终讲话：“搞得不好，有可能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继续革命实践探索到头儿了！去青岛享几天清闲等待那最后时刻的来临吧。

早饭后，笔者正在鲁迅公园一处海边礁石上观澜，有线广播里传来毛主席逝世的讣告。虽然早有思想准备“这一天不会太久了”，还是难免震惊得呆若木鸡，欲哭无泪脑子一片空白，根本无法进行连贯思考，一些乱七八糟毫无关联的念头却纷纷涌来。不吃不喝在礁石上呆坐到傍晚。回家路上，各店铺收音机里传出的依然是铅一样沉重的讣告和哀乐。

唯一明确清晰的念头儿是：中国将会怎样？自己将会怎样？“只有天知道”！等着吧。

第七章 宫廷政变与过渡政府

(1976. 10—1978. 12)

除了秦始皇和隋文帝的变法，历朝历代的改良运动大都伴随国君驾崩或退位而被废止。“继续革命者”毛主席逝世后，文化大革命也同样未能避免被彻底否定的历史命运。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10月6日，他去世不足一月正所谓“尸骨未寒”，“新四人帮”（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背着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发动了反革命宫廷政变，用阴谋手段逮捕了“老四人帮”（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和姚文元）。开创了用刀枪解决党内分歧矛盾的罪恶先例。

“二次革命”结束了，进入“华国锋过渡政府”时代，开始了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第一阶段，文革派官与民面临灭顶之灾。

一、真政变粉碎假政变

中共官方文件的定论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所谓“铁的事实”无非两条：一是江青不守妇道、不安分守己为“领袖丈夫”守孝，反而到处自我标榜鼓吹“吕后亲政”，“篡党阴谋昭然若揭”；二是王洪文电话指使上海“工人民兵”提高警惕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武装政变图谋暴露无遗”。

明眼人一看便知，“四人帮”的一切言行，无不是预感到危险将临而自我防护的本能反应。

假的就是假的！“华中央”贼喊捉贼的伎俩可以蒙骗一时，却

不能蒙骗一世。不久，他们的阴谋内幕就被他们自己暴露无遗了。最典型的是中央电视台等官媒关于纪念邓小平、李先念等政要们诞辰（或逝世）的长篇文章和纪录片：阴谋政变的罪犯都成了新官僚阶级复辟的大功臣！

毫无疑问，所谓“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不过是一场拙劣的宫廷政变。它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反动作用在于：打着“毛主席放心的接班人”和“文化大革命捍卫者”的旗号，对文革派进行了第四次血腥镇压，“假继续革命”国家法权与复辟的新官僚阶级官权联手，对平民阶级民权解放和民主诉求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

二、华国锋——小人得志，小官得势

在毛主席心目中，华国锋是王陵式的“老实人”。然而，为什么毛主席尸骨未寒就向“毛夫人”和“毛家族”继续革命派开刀呢？答案：见利忘义！典型的小人得志小官得势的“暴发户”。

作为国家法人和法权代表，“国君”的首要职责理应是：左右兼顾抑强扶弱，维持各阶级、派别和各种不同意见的动态平衡，促进相互之间共生互补、协同进化。

然而，华国锋原本是湖南省中小官僚，因为领袖家乡父母官的身份和机遇，得以进入毛主席的视野。再有他老实（平庸！）无缘跻身大官们的帮派，因而成了“文革暴发户”，由湖南省革委会主任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去世和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又因其小心翼翼不露锋芒，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双方都能勉强接受，遂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他无德无能无威，在顶层毫无政治根基和势力，凭借的仅仅是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如此“英明领袖”，根本无力驾驭平衡两大政治派别。“毛主席信任”的政治资本也必然随着毛主席去世而烟消云散。

要想保住并彻底巩固既得地位和权势，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背叛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倒向并仰赖强势方——

叶、李等“中派”（文革抵制派）。经过一番利害得失权衡，抛弃势单力薄的潜在对手“四人帮”，伙同叶、汪、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把“四人帮”投入大牢。

他之所以要高举文化大革命旗帜，坚持“两个凡是”，原因是：作为文革爆发户，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文革经历是主要的政治资本。否定了毛主席和文革，就是否定了他自己，只能回到地委书记“州县吏”位置上去。

华国锋“过渡政府”的小职员心态鲜明而强烈，最突出的是“政治人格分裂”：左顾右盼羞羞答答，毫无大丈夫主沉浮敢做敢当的王气或霸气，惯于鼠窃狗偷的阴谋伎俩。“打着红旗反红旗”，既当婊子又立牌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颠覆继续革命灵魂；“高举文化大革命旗帜”，血腥镇压文革派。

后来，连他的山西老乡都说：“此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三、享受“王耀武、李先洲待遇”

1977年3月7日春节刚过，厄运再次如期而至，没想到的只是笔者竟然僭越成了全省四十几个“重点清查对象”之一，隔离审查升级到了山东省看守所（原战犯管理所），有幸享受到与王耀武、李先洲等战犯的同等待遇。

看守所分为三部分，最前面是管理处办公室、食堂、医院、理发室等。前院儿口字型四层楼房原来关押国民党校官战犯，当时关押着韩金海、张美智、刘崇玉、国恕连、孙文广等被逮捕或判刑的政治犯。后面是一排五座独立小院儿，内有里外大小两间正房，院内有洗漱水槽和厕所等，原是王耀武、李先洲等将官战犯关押处，当时又成了部分“重点清查对象”的隔离处。

江青同父异母哥哥李干卿（铁路局退休工人）第一个进去，隔离在最西头院内；笔者是第二个，隔离在中间院内；公安厅花光隆是第三个，隔离在笔者西邻；南郊宾馆革委会主任张xx（五·七事件“割通讯电缆者”）是第四个，隔离在笔者东邻。

省军区某部一个连队80多人负责看守所外围警卫。内部监管则

由专案组抽调本单位职工组成监护组。小里间是笔者的卧室兼书房，监护组约七、八人住在大外间，白天“共管”，夜间轮流值班。

1. 随时准备转捕

如此阵势震慑力强大，只是笔者早有最坏的精神准备，并不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一日三餐监护组都集体跟着笔者一起去食堂买饭，在经过前院的山路上，不止一次遥见（相隔约 150 米）国恕连、孙文广戴着脚镣手铐分别在院内“放风”。精神准备更充分了：离他们一步之遥，随时做好转捕准备。并在心中构思一首《无题》以自勉：卅三风雨今初度，仰天长啸意何如？朝看光剑刺阴霾，夜梦柴斧断玉笏。（五、六两句忘了）披红戴花笑对刀，蹙眉侧目不丈夫。

2. 检查交代——小菜儿一碟

至于检查交代，更是小菜儿一碟。历经“一打三反”的“隔离学习班”小学阶段和“清查五一六”的“隔离审查”中学阶段，已经阔步迈入驾轻就熟的大学阶段了。

再者，文革中曾经脱离官方口径非议过的大人物，全都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所有“恶毒攻击”嫌疑的忧虑和精神压力都烟消云散了，有点儿心轻如云优哉游哉：爱咋咋地吧……

不久，所有交代材料都写完了，专案组的疑难问题也都答疑解析清楚了。剩下的日子，除了旁听内卫监管人员和几个外围监管连队战士海阔天空摆龙门阵，还跟着于保平初学了治印术。内心悠悠，时光悠悠。

四、笔者又成了全省“名人”

一晃到了夏末秋初，妻子从老家来探视了。“清查办”负责人郑明训等陪同她一起乘车来到看守所，与笔者亲切会谈了近一小时。看到笔者心宽体胖，也就放心了，又由郑明训等人陪同返回学校。

1. 违规潜逃

晚上，躺在床上情绪躁动不安，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来不及冷静理性思考，决定回校再次与她“鹊桥相会”。风平浪静的时

间太久了，监护组人们都早已精神松弛呼呼大睡。笔者穿上裤子，假装去厕所解手，看看无甚异常，便轻轻打开院门走了出去，又回身轻轻带上院门，沿山路向北走去。路经岗亭时放慢脚步，把衬衣搭在肩上点了支烟，并问站岗小战士：“几点了？”他答：“快x点了。到山上遛遛？”笔者答：“太热了！睡不着。”远离岗亭后向学校方向疾步走去。

摸黑进了宿舍，“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都不用（也不敢）多说，紧紧相拥而卧共度良宵。工夫不大，门外就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手电光在门上晃动了一会儿（或许是观察屋里有无异常动静）。笔者与妻子屏住呼吸拥抱得更紧了。不大一会儿，又来了第二批追逃者，但始终未破门而入。

待走廊上恢复了阒寂，估计天色将亮，笔者悄悄起身下楼沿原路赶回看守所。

2. “严重政治事故”

两地相距约十几公里，赶回看守所时旭日已升起，心中庆幸及时返回了。进了院子却空无一人，心知违规潜逃败露了。只能到前院看守所管理处去报告，除了值班岗哨和在办公室值班接听电话的长者，同样空荡荡的。

笔者简要报告身份和原委，值班老者说：“你弄得这套可好！人们都连夜找你去了，快回去等着吧。”

上午，众人陆续返回，见笔者安静地坐在桌前写检讨，谁也不说一句话。不一会儿，进来两三个身高约一米九伟岸英挺的年轻军人，在笔者身后站住了。笔者做好准备被扭胳膊揪头发反背手铐。结果，他们只是站了一会儿，又进进出出三两次，什么也没说没做就走了。

其后就是监管组大换班大改组。后来慢慢知道，当夜所有内卫外卫都乘车分头去火车站、汽车站、洛口渡船码头搜查堵截，整整折腾了一夜。

说实在话，笔者心中还真有点儿歉疚：并非存心给大家添麻烦，

更不敢戏弄隔离清查运动、挑战“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只是想要回一点儿最起码的人权和人事儿。

不料，这却成了震动全省的“重大政治事故”，分管清查运动的省委副书记苏毅然在各地市负责人会上严正通报后，又层层传达贯彻到各县：接受教训，进行安全大检查。

笔者又成了全省“名人”。

1978年1月春节将至，学校实在派不出愿意担负监管任务的人了，隔离清查阶段草草结束，转入到学校农场监督劳动阶段。

第八章 彻底否定，全面复辟 (1978.12—1981.6)

“小人领袖”华国锋，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或“清道夫”。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了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第二阶段战役。华国锋勉强维持了两年的“傀儡中央”摇摇欲坠，短命的“过渡政府”名存实亡。中国进入新官僚阶级全面复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新时代”。

一、批判“两个凡是”：清除继续革命国家法权残余

邓小平深知：要想树立起本朝“太上皇”的权威，必须彻底清除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路线和国家法权束缚！否则，他就只能永远蜷缩在毛泽东的阴影里。

1. 批判“两个凡是”

首先，发起一场批判华国锋“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凡是党中央正式文件决定，都不能否定）运动，官方自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结果，毛泽东思想被腰斩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前的毛泽东思想全部肯定和继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却成了“极左错误”而被彻底否定。最典型的论调就是“（毛泽东）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复辟的新官僚权贵阶层及其御用文人对毛主席的肆意诋毁涂污、诅咒谩骂。

历史总爱捉弄人！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探索被全盘否定了，“邓小平理论旗帜”却总也树立不起来，反而导致了资产阶级

自由化大泛滥，对新官僚自由专制形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维护刚刚获得“彻底解放”的新官僚权贵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得不返回头来肯定“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等“四项基本原则”。

2. 一脚踢开华国锋，继承发展“华事业”

文化大革命暴发户华国锋被一脚踢进了历史垃圾堆，根本原因是：“华中央”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顽固坚持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国家法权残余。

华国锋过渡政府垮台后，又出现了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怪病：华国锋靠边儿站了，残酷镇压文革派干部和群众的“华事业”却被全盘继承下来并发展到了极致，以更多的“新凡是”取代了两个“旧凡是”。

其一，凡是“文革积极分子”，不论官职大小，不论干部、群众还是军代表，一律彻底清查；凡是与上级造反派头头儿有过接触的，一律定为“与四人帮有组织联系”，统统纳入重点清查对象从严惩处；凡是能枪毙的绝不判死缓，凡是能投入监狱的绝不就地管制。

其二，至于那些没有丝毫过失和任何小辫子可抓的文革派，成了“更阴险狡猾的危险分子”。凡是文革前入党的老党员一律开除党籍，凡是文革中入党的新党员一律取消党员资格，严防他们再次混入“革命队伍”。

经过一连串的“新凡是”，华国锋没能完成的“华事业”全面完成了，平民阶级的民权解放和民主诉求被彻底粉碎了。

二、“邓小平新时代”——全面复辟“苏联模式”官僚专制

邓小平真正“划时代的伟大功绩”，不仅在于继承发展了“华事业”，更在于如下三个方面：

1. 彻底颠覆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国家法权，复辟了刘、邓“彻底巩固”的国家法权。通过“修宪”，彻底剥夺了平民阶级使

用“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争取民权解放的斗争权利，彻底剥夺了平民大众对新官僚权贵实行民主监督的权利。

2. 全面复辟了“苏联模式”新官僚专制制度，将“毛时代”加在新官僚权贵头上的一切紧箍咒（组织纪律的、法律法规乃至宪法的、理想信仰的、伦理道德的等等）打得粉碎，给了他们“第二次解放”和“第二个春天”。

所有反文革派有功之人一律提拔重用封官晋爵，并提供国家法权保护伞，纵容他们利用国家公器和公权肆无忌惮地“持权抢劫”，以充分或超额补偿他们及其子女在文革中“蒙受的伤害和损失”。

3. 以具体而专指的“反政府罪”，取代了笼统而宽泛的“反革命罪”，并定为重罪列入《刑法》和《宪法》，为强化新官僚阶级官权、剥夺平民大众民权和人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法权保护。

如此，又必然地导致了如下三种社会恶果：

1. 平民阶级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平民大众劳动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对政府行政的监督权利等民权被剥夺殆尽；只剩下为国家为政府无偿作贡献的“光荣义务”，外加默默承受“改革开放”的“牺牲和代价”。

2. 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本末倒置。一切反文革功臣和有关系有门路的纷纷“人往高处走”，如蝇逐臭般往各级政府和其他公权机关里钻，原本就已经庞大无比的官僚队伍像“吹气球”似的无限膨胀。从中央到乡镇，“四大班子”“六大班子”冗员（吸食劳动人民血汗的寄生虫）翻着跟头恶性膨胀，工人农民和所有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负担与日俱增不堪重负。

3. 政治腐败恶性膨胀。新官僚和新新官僚们无法继续忍受“低薪”和“清贫”，大肆贪污受贿，官僚腐败、政府腐败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经济领域，政府机关大肆倒卖紧俏物资乃至“进出口批文”，政府走私、军队走私等公权犯罪席卷全国上下。政治领域，毛主席亲手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及其国家法权被彻底打碎，“苏联模式”新官僚专制全面复辟，并发展到官僚自由专制新

阶段。

上自“太上皇”下至村官儿“土皇帝”，整个官僚阶级特权者对上无视国家最高利益，肆意破坏国家法权法律的权威性；对下无视社会公众利益，残酷镇压国民的民权和人权，按照本阶级乃至官员个人的利益和意志，自由自在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各级当权派“一把手”都成了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土皇帝”，把“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发挥到了极致。

邓小平无愧于“新贵族领袖的光荣称号”！

三、二十三年图书馆生涯

众所周知，自“反右”后，图书馆就是两种人的归宿：一是无处安置的官太太和家属，二是“不能不用，又不堪重用”的“政治残疾人”。

1982年11月，笔者结束了十三年的动荡飘零，带着“严重政治错误，取消党员资格，行政记大过”结论，到了学校图书馆与书为伴，漫步于书山文海，就教于先哲前贤；寄情问道、解惑释疑；明目清心，受益良多。

1. 考英语——“唯我独清”

1998年调入参考咨询部，负责编印《高教信息摘编》和新生“图书馆利用”教育，发表了《图书馆教育学概论》专著和20余篇论文。

为了职称，考试英语，四十多人的考场只有笔者一个须发斑白的老者，其他都是二、三十岁的俊男靓女。结果可想而知。

虽然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指标超过众多博导，却最终无缘跻身于“一毛钱买十一个——个个都一文不值”的正高大军，只能苟且于“一千元买四个——个个都二百五”的副高堆里。

对此，笔者无怨无悔，反倒还真有点儿自豪：在全民皆腐的“盛世”里保持了一点儿“唯我独清”实事求是的晚节。

2. 麦克法夸尔——“文革学”导师

有幸拜读了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其中“开门整风”“反右斗争”“党内反自由化倾向”等重要章节反复研读了好几遍。终于，拨开了数十年来官方散播的层层迷雾烟瘴，看清了历史本来面目，了解了毛、周“继续革命派”极端孤立的处境，明白了“开门整风”逆转为“反右斗争”和“党内反自由化倾向”以及“整风积极分子”逆转为“右派”和“补课右派”的内幕，进而明白了毛、周“继续革命派”与刘、邓“彻底巩固派”分歧对立的根源。这不就是缩写的“简明文化大革命吗”？从此认定：毛主席继续革命实践探索的真正起点并非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是1957年“开门整风，大鸣大放”，前者只是后者的继续和发展。

一通百通，欣喜若狂！头脑中纠结了数十年的疑问和困惑大都迎刃而解。从此，笔者就一直把麦克法夸尔尊奉为“文革学导师”，戏称自己是他的“书授研究生”。最终，便有了这堆“博士前研究生毕业论文”——《云烟未散（文革记忆与反思）》。

附：文革中的校领导们

作为造反派，笔者虽然对校领导进行过“大批判”，但是，作为学生，也向他们学到不少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在十三年的挨整经历中，通过对血雨腥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病态化社会现实的认识深化，对他们当年的一些做法越来越理解，甚至肃然起敬。

一．成仿吾——忠厚长者，高风亮节

成仿吾——长征老干部中不多的几个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建国后，虽颇受尊重，却始终难容于新权贵主流派。尤其是，“创造社”年代，曾经与鲁迅先生有过笔墨官司。受到自诩为“鲁迅学生”周扬等人及其把持的文化教育界排斥，从教育部主政（代部长），下调为基层高校校长。以至于，文革中成了最早被打倒的大学校长之一。

1. 许广平来信——仗势欺人

在文革大揭发大批判阶段，中二学生汲玉柱、栾桢贴出《成仿吾的三板斧》大字报，并给许广平写了一封揭发信：“成仿吾公开说，鲁迅曾经与朱家骅过从甚密。”可悲的是，世人只知道朱家骅是“中统特务”，不知道他曾是留英博士、东南大学（现中山大学）校长，“敦聘鲁迅为东南大学教授”并非特殊关系。然而，许广平却复信严正指出：“这是造谣！成仿吾一贯诋毁鲁迅先生！”她是周扬等政要树立的“鲁迅替身”，是京城“当红名人”。结果，成仿吾最早被打倒了。

2. 师表亮节，感人肺腑

“主义兵”在新校小礼堂召开批判会上，成仿吾照例被上台示众（并未低头弯腰“喷气式”！）。中二一位学生发言中有“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之句，可惜他慷慨激昂中将“黑”误读成了“罢”。成仿吾轻轻扭过头去，心平气和带着几分斯文，拖着长腔轻声对那位学生说：“同学——那个字念‘黑’（pi）——不念‘罢’（ba）——”会场上一片寂静，继而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为了打破尴尬局面“维持革命大批判的严肃性”，响起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打倒成仿吾！”、“成仿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声……

作为“文革笑话”，曾在全校广为传播，透露出人们对老校长海人不倦高风亮节的多少感慨和敬重……

3. “游街”成癖，本性尽显

“主义兵”成立后，山大教职工子女小学生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小兵”。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也“猴子跟着人学事”玩儿起“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游戏，当然少不了成仿吾这个“反面演员”。他带着纸糊的高帽子、敲着破脸盆，在校园里边走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仿

吾！”……无论孩子们如何折腾，他从未因为“长征老红军六级干部”尊严受辱而对孩子们“怒目相向，负隅顽抗”。每次游戏结束时，他都弯腰俯下身子，和颜悦色地问孩子头儿：“小朋友——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呀——”这也是文革轶事之一，全校传为美谈。

由此可见，其心境何等平和安详，尽显其忠厚长者与人为善的人性本色……

4. 官办红卫兵的“发泄对象”

1969年春节，王文俗和笔者给成仿吾拜年，当问候他身体健康状况时，成夫人张琳（原教务长）说：在“红卫兵师”体育场批斗大会上，他被打得不能站立；游街示众后被扔在济南七中附近十字路口马路上。自己爬着回家，爬到新校教工宿舍院西面，被于守良同志（成老警卫员）发现，背回了老校家中。从那以后，就一直大便失禁，至今未愈……”

当时，笔者感慨唏嘘了好多天。曾几何时，官办红卫兵“誓死捍卫校党委”口号震天响，政治形势一旦有变，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竟然对曾经“誓死捍卫”的老校长下此狠手，可见“人性本恶”不虚！

更可悲的是，文革被彻底否定后，这丝毫也没影响他们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原因或许是，在复辟的新官僚权贵看来，成仿吾虽入党多年，却始终“拖着一条知识分子尾巴”，不肯对上阿谀谄媚，实为“对党三心二意”。对他搞点儿过火行动，根本算不得“打砸抢”……

二. 孙汉卿——不屈不挠，多彩人生

孙汉卿，分管学校党政的常务副书记“二把手”，文革中造反派戏称为“孙二叔”。他是山大最有争议的人物，也是文革全过程的“核心人物”，保守派“誓死捍卫”与造反派“坚决打倒”的纷争都是围绕他展开的。

1. 坎坷经历，多彩人生

他原为清华大学学生，先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日本侵华后又回乡参加“天目山起义”，曾任渤海分区组织部长。建国后，官至青岛市委副书记“第二把手”，在“借反右倾之名，行争夺权力之实”的官僚权贵内斗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监督劳动在青岛市扫马路数年。

文革前，在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生们心目中，他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典范：艰苦朴素、衣着朴实，天天骑着一辆没有链盒的破自行车，奔波在从新校家属宿舍到老校的上下班路上。靠链条一侧的右腿裤脚挽到膝盖，从外表上谁也看不出他是大学的常务副书记“二把手”。然而，在众多造反派“知情者”干部心目中，他却是“心狠手辣的整人专家”，又是冠冕堂皇的“阴谋家，笑面虎”，惯于“以势压人，以权整人”；而且，“不整则已，要整就往死里整，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文革时，不论造反派如何批斗，他始终未“认罪悔改”；而且，也从未停止过“地下活动”，从山东到北京“上下串联勾结，企图为自己翻案”，

是山东大学“头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此，他也付出了惨痛的肉体代价，先是挨过北京“衙内红卫兵”的军用皮带猛抽，又饱尝本校造反派的低头弯腰喷气式甚至耳刮子的“武化大革命”。

2. 顽抗到底，活路一条

从1969到1979十年中，不论军人当政的文化大革命阶段，还是“还权于文官”后，他不仅未能像多数老干部那样“获得解放”，而且，一直是山大乃至全省各种“清查运动”的重点对象。这在反文革派老当权派中也不多见。

1970年，在昌乐县炮兵驻地“全封闭学习班”上，笔者有幸与他“同学”四个多月。其间，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为军代表的“帮教诚意”所感动，对“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信以为真，纷纷“竹筒倒豆子”检查交待忏悔自己的“严重错误”，希望得到“党组织”谅解和宽恕。

唯有他无论军代表如何严厉批评和“热心感化”，都“顽抗到底，拒不交待”，或者“避重就轻、浮皮蹭痒，企图蒙混过关”。结果，因为“态度恶劣，死不改悔”，未能“合格毕业”。许多人都不理解，军代表更是义愤填膺。

然而，事实狠狠教训了笔者这样“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年轻后生。不久，来势更凶猛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了，笔者与他同时被隔离在化学楼里近一年。他一如既往“顽抗到底”，几次交锋之后，军代表和专案组就彻底失望了，甚至认为：“他可能真的没有多大问题吧”，其后的隔离审查基本成了“悠然闲居”。

而笔者，在昌乐学习班上“竹筒倒豆子”却成了“竹筒摇得哗哗响，倒出来的全是豆荚皮”。几乎整个清查过程，都处于高压逼迫之下，少有片刻清闲，直至9.13林彪“折戟沉沙”消息公开后，方才获得稍许轻松。

或许是像中共历次清查运动的操控者和执行者一样，谁都希望挖出“爆炸性材料”，“抓到个大坏蛋，立大功获大奖”，为政绩添砖加瓦，为升迁铺路架桥。其思维定式：“这小子，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就交待了那么多问题，肯定隐瞒了更大的问题。要想攻克堡垒，就得施加更大的压力！”

正是，“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

3. 笔者：由衷叹服，自惭形秽

其后数十年中，随着对政治斗争残酷性和血腥气的切身体验，对他“宁死不向命运低头”的不屈不挠顽强精神，笔者越来越真正理解了，越来越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说山大还有“真正的造反派”的话，那么，他就是孙汉卿！他面对高压不屈不挠的抗争个性、为改变命运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都是笔者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这或许是，对于中国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有进无退”的残酷血腥，他既有丰富的经历和经验，更多惨痛的切身体验和感悟。

由衷感谢孙汉卿书记的身教！

4. “秋后算账”，夙愿得遂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第二把手”，他一直关注山大这个“身边的重点单位”。肃反运动中揪出了“反革命分子”束星北，“反右”运动中揪出了陆侃如等一大批“右派分子”。1963年他成了山大副书记副校长，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大管家，一直到文革“受迫害，被打倒”。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官僚权贵阶层为了“补偿浩劫中的损失”，在“妥善安置”子女的同时，对曾经“誓死捍卫”过自己的保守派大小头头儿也加倍奖赏，乘“领导班子年轻化”的东风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1978年，他一次提拔任命副处级以上干部200多名（文革前全校科级以上干部103人），就连烧茶炉的临时工也成了正科职副处级干部。更有趣的是，山东省委“严肃查处”的结果是：任命有效，下不为例。

他恩怨分明、睚眦必报，对曾经“迫害”过自己的造反派学生，即使早已毕业离校多年也绝不放过！文革中妥善保管的黑材料终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按照毕业分配名单，将300多份“组织证明”分别寄到有关单位，以避免他们“混入革命队伍，继续为害革命”。

令人感慨的是，在他去世前几年，却终于又成了对“邓式改开”不满的“毛粉”，并不止一次在左翼民众的请愿书上签下了大名。

三. 吴福恒——标准学人，生不逢时

吴福恒，美国文学专家、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唯一有职有权的学人校领导。早在1966年5月份党委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被省委和校党委抛了出来，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历史系“中国思想史讨论班总后台”。坏事变好事，其后多年他得以远离两派争斗的漩涡，乐得逍遥自在，只是在各种批斗大会上陪斗而已。

1. 温文儒雅，特立独行

他身材伟岸、仪表堂堂、衣冠楚楚，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与孙汉卿恰成鲜明对比。据大字报揭发：夫人陆凡为他制作的高档衣服再新，一旦发现别人穿过相同质地和款式的，他就坚决不再穿。按照“时代语言”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大暴露”。其实，这无非是他内心“领异标新，不合流俗”学人个性的外在表现。

文革前，作为教学主管，他与孙汉卿时有分歧冲突。按照官办红卫兵的说法：他既是“教授治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忠实推行者，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总后台”，更是“反对党委领导学校的罪魁祸首”。

在今天看来，他们之间分歧争斗的实质是：高等学校究竟是以官为本，还是以学为本？究竟是要“突出政治”，还是要“突出真理”？当然，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和社会大潮流决定了，在争斗中他只能处于“逆潮流而动”的劣势地位，不可能“阴谋得逞”。

2. “以学为本”的垂死挣扎

或许是像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对改开后科教的“第二个春天”及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太过轻信了。八十年代初，他成为山大校长后精神振奋，决心恢复“以学为本”的办学路线，振兴高等教育。难免与时任党委书记的多年老搭档孙汉卿多有分歧和矛盾。

然而，在官权复辟和官本位恶性膨胀的大潮冲击下，许多有关系有门路的教师都纷纷由潜心治学转向要官跑官买官。他及其继任者邓从豪教授“以学为本”的办学理想，只能落得个苦苦支撑、垂死挣扎的可悲下场。百年名校唯理是从的文化传统也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了。

其后便是潘成洞校长主政十年。身为数论专家执政却难免外行，大权多有旁落，正是“有所不为而有所为”。只要能保证自己的权位尊严和应有权利，不妨一切都悉听他人做主。新添置了 50 万元的原装林肯牌专车后，去世前不久又花费 11 万元为高度近视作了角膜移植手术，全部公费医疗。

像其他兄弟院校一样，山大也迅速由**学府**蜕变成了**官府**、由**学术机构**蜕变成了**权术机构**，在“第二个春天”里日益溃烂化脓、繁花似锦……